



昨天的记忆
(下)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下)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定价：HK\$260元(上中下三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顾问：陶世龙 何蜀 吴迪

策划：蔡新平 田春林 伏庆是

编辑：张运钧 李颖

特约撰稿人：本书所有文稿的作者

二〇一九年一月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责任编辑：许阳

封面设计：铁壁

ISBN 978-988-77056-1-1

2019年1月第一版

开本：210mm X 285mm

字数：1200千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岭安全街33号丰盈工贸中心5字楼G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 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9 5333

定價：HK \$ 260 元

敬畏历史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陶世龙

总 目 录

上 册

序 一	陶世龙：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i
序 二	闫长贵：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v
序 三	孙怒涛： 我与地院文革	ix
序 四	何 蜀：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xvi
	阅读指南	xix
	前 言	1
第一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0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上）	50
	目录明细	
	【乱世的记忆】	
	蔡新平口述： 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53
	伏庆是： 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73
	田春林： 田春林的回忆录	141
	蒋良朴： 在校友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176
	李 颖： 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185
	张华府： 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194
	张华府： 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207

梅建明：	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	272
陈永迪：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280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287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292
殷惟侯：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315
林天民：	文革回忆录	333
胡昌铭：	文革回忆录（节选）	343
何建勋：	文革回忆录（节选）	370
陶世龙：	我的 1978 年	396

【六二〇事件】

万天丰：	回忆“六二〇事件”	411
------	-----------	-----

【九四事件】

大批判联络站：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423
聂树人：	“九四”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429

中 册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中）

目录明细

【神秘人物】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5
------	---------------	---

王大宾：	我陪肖力去京西门头沟煤矿	27
王广宇：	寻找肖力	28
王大宾：	叶向真与朱成昭	30
【老师的昨日心迹】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1-6）	32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7-12）	129
唐振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279
钱佩娟：	文革回忆录（提纲）	291
【岁月的印迹】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99
古宝琳：	古宝琳日记摘抄	336
梅 村：	工作组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	351
【外地串联】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二个事件	352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365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381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407
【保护老干部】		
王大宾：	地院东方红成了部分被冲击的老干部的 避难所	414
【忆旧思亲】		
石白河：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节选）	416

下 册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下）

【口述历史】

梅建明： 我的文革回忆 1

第三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

重要人物专题

目录明细

- 一、 “高安邦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120
- 二、 周永璋两次被抓专题 181
- 三、 王大宾专题——王大宾庭审记录 213
- 四、 揪彭德怀专题 226
- 五、 朱成昭专题——朱成昭八大观点 256
- 六、 杨雨忠跳楼自杀专题 274
- 七、 二进地质部专题 287

第四篇 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目录明细

- 一、 北京地院因文革而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317
- 二、 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而遭受打击、
挨整的地院师生 320

三、地院革委会领导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而 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26
四、军宣队进驻地院后，因文革、因清查“五一六” 分子而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35
第五篇 涉及地院文革的回忆、讨论、反思和研究文章汇集	
目录明细	
【文革研究者专论】	
一、陶世龙：不能压制不同意见——“620事件”中 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343
二、何 蜀：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肖李廖、罗广斌案	346
三、敖本立： 红楼座谈会王大宾没有参加	360
四、肖劲东 蔡新平：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363
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 重大贡献	372
六、 蔡新平： 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险遭“覆灭”的命运	386
【对地院文革的反思和研究】	
一、 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392
二、 刘建业：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406
三、 肖劲东：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有感	408
四、 王 锐： 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409

五、晓星：谈伏庆是回忆录	410
第六篇 本书编辑中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史料	
一、中央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在地院文革的指示、谈话	412
二、地院文革期间重要文字史料	413
三、地院师生已发表的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目录）	414
四、其他参考文献史料	417
编辑后记	420
附件	422
一、蔡新平：关于请张运钧、李颖着手整理编撰《地院文革史料汇编》致信各位校友	422
二、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代序	424
三、蔡新平：《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426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下）

【口述历史】

我的文革回忆（口述历史）

梅建明

（此文由蔡新平编辑、整理而成）

目 录

蔡新平按语：

动荡的年代——我的父亲和我的童年少年

文革开始了

身份暴露，厄运开始。

南冠愤，“八一”魂归“八一”举义地

成长之路

地院文革的早期

形势在变化，我们思想也在变化

广州之行，朱成昭被抓

新东方红公社行动失败后再次“逃亡”

地院革委会的隔离审查

被捕入狱，进了“功德林”

转狱，从功德林到了半步桥

出狱，从半步桥到“789 集中营”

父亲的教诲——再谈我父亲

附：抗战三杰梅龚彬传奇

离开“7 8 9”回校

漫漫平反路

监督改造丹江劳动受欺负

带着帽子当教员处处受制

上北京找陈云
落实政策回北京
露一手，修电视
对话拾遗

蔡新平按语：

本文原始资料由童隆裴提供，计有：牛晓涵 1994-1996 采访整理的原始记录稿；采访记录的电子录入版；晓涵、米雅编著的明镜出版社出版《789 集中营》一书。原始记录稿和电子录入版，没有编排校改，但有阅读者留下的各种记号、疑问，对读不通或不理解的地方有批注。这份稿件可能经过了不止一人的阅读。为编辑本文，笔者购买到了梅建明的父亲梅龚彬的回忆录（团结出版社 1994 年版），也在网上查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以上这些就是本文整理的基础。

由于是口述，在内容表述上或有矛盾和不严谨之处，特别在事件叙述上，时间连接跳跃多变、前后穿插，整理不易。《789 集中营》的作者在成书时对明显有矛盾的地方做了调节和修改，纠正了一些语言偏颇不确之处，内容上也有不少删节。虽然还遗留了一些问题，但结构显得较为合理易读。作为一本严肃的著作这样的修改都是必须的。但不足的是，原叙述者的无拘无束、天真豁达、幽默风趣，情之所至，直言敢言，还颇有些江湖义气的风格则有所减色。有关地院文革的内容，虽然有不少地方与已有资料有不少出入，但他的一些说法或许可为读者另一个思路提供的参照。

本编者更不具完善修编之功，对某些疑问也无从考证。本编者认为还是原汁原味的按讲述着的风格展现给读者或许更好。编者仅为便于读者阅读方便，全面的编辑了版面，调整了部分结构。以现有资料为依据，相互对比、合理分析，在尊重原始资料前提下，对发现的一些语言文字的错误尽可能予以修定。为保证语句通顺，有些地方不得不“猜字填空”。对一些与现有资料有矛盾的地方，以“编者按”，或“编者注”等方式标出，或提供相应的参考。编者对原有的小标题基本保留，有些增补和个别的改动，不一一指出。原始录音资料录入时，保留了很多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对话，成书后就都删去了。本编者发现有些对话有一定史料价值，故或原位保留，或摘录作为附件保留，供读者参考。

梅建明口述历史中有其父梅龚彬的大量回忆资料，虽然表边上看与地院文革无关，但编者认为，梅龚彬作为一个在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处于一个非常特别又非常重要的地位的革命家，他的经历也是对我们了解党内斗争史，了解梅建明文革活动的舞台背景，了解梅建明和朱成昭们的思想发展变化脉络和依据，了解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老一辈职业革命的对文革的体验和批判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编者将这部分内容经过整理大部分保留了下来。

本书还收录了《中国新闻周刊》2015-02-01 采访梅建明后编写的《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一文，可以作为梅建明回忆录的缩略版阅读。

动荡的年代——我的父亲和我的童年少年

我父亲叫梅龚斌，我们家是个大地主。不知道是我的祖爷爷还是祖爷爷的父亲，当了一任县令，现在叫县长，过去叫县太爷。当了一任以后，就有点儿钱了，就从江西搬到湖北。在黄梅县城里买了一片地，盖了大屋，像个庄园似的，叫“梅家新屋”，解放后捐给了国家，就是现在黄梅一中的所在地。黄梅一中，是个省重点中学。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他从中学以后就离开了老家，再也没回去过，他只回过湖北，没到过黄梅。黄梅在九江对岸。

我的出身是革命干部，因为我父亲后来参加了革命。另外中国的领导干部里，能念书的家里没钱怎么行呢？不是资本家就是大地主，我们家就属于大地主。要不然没有这个条件，他念什么书啊？穷得饭都没得吃，就只能种地。

抗日胜利以后，主要就是反对内战，这段时间我父亲就组织了有民主思想的教授们，搞示威游行啊、上书啊等等，就是反内战、反饥饿，他在敌后嘛。同时，因为1947年以后，1948年初开始，国民党的几次进攻后就开始节节败退了，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多了，不是逐渐向北京靠拢吗？几个大战役要打之前，就需要团结全国更多的知名人士，准备建立新中国了。那时候，我父亲主要任务是团结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共产党建国以后，这些人跑光了可不行，所以主要就是做这些人的工作，争取这些人。反蒋势力方面主要是以李济深为首的，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还有什么民盟和民进等等。包括那几个头：民革的李济深、民进的是马叙伦、民盟的是张澜和沈钧儒这些人，都是我父亲做的工作。让他们成立一个一个的反蒋民主团体，联合反蒋。

大概在 1947 年的夏天，由于叛徒的告密，我父亲就被抓起来了，第二次被捕。被广州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我哥哥专门跑去找到了当时的广东省警备的副司令蒋光鼐，司令是张发奎。结果蒋光鼐去了把人要出来了，开着他的专车把我父亲送到深圳，到香港就跑掉了。就这样给救出来了。所以做这个工作没白做呀，救自个儿一命。蒋光鼐是头呀，那些特务哪儿敢惹他呀！

我父亲是搞地下工作，是党内有人叛变了，出来有人告密了，国民党特务就把我父亲抓起来了。

1946 年 10 月我在广州出生，那地方是现在的广州华中农学院，里边有一条 918 路，是因为抗日，那条路的名字叫 918。后来我还找到了我出生的房子，照了张照片。

1947 年的时候大概是在春天或是夏天，发生了这件事，我父就被转移到了香港，于是就在香港，在一个很进步的资本家的保护下，开展了地下工作。这个资本家就是马万其，现在的政协副主席。我一家子也这样子，在蒋光鼐的帮助下，都转移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澳门，我就住在马万其家里。我小的时候在他那儿过了一年多，比在广州住得还长呢，我半岁到那边，在他家里住了一年半，在澳门和香港只住了两个月。所以我的户口本上，还有从澳门迁入的字样。这是可以查得到了，有记录的，我是从澳门迁出来的嘛。他也有像咱们类似户口登记那样的东西，还有什么卫生检查呀，这个卡片什么都有，可以查得到。我那个时候就是躲在马万其家里，我父亲的活动在香港。我们一家子就在他的保护下生活的。

后来北京解放了，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把这些民主人士都动员到北京来。于是我父亲就组织了第一个团体，李济深等都送到北京来。我们是第二批被送来的，捎带的。第二批的人就少一点儿了，第一批的知名度高的都先来了，第二批还有一些，是乔冠华组织的，真正的领导者是连冠，乔冠华那时候是办事的。我父亲走了，连冠就搞第二批，我父亲和连冠等于前后拨儿。这样我们也在 1949 年 7、8 月份被送过来的，坐船送到大连。当时大连的市长是李一氓，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都有人照顾。后来坐火车到沈阳，那时候陈云还在沈阳呢。再坐火车从沈阳到北京。我到北京的时候赶上了开国大典。开国大典是 10 月 1 号，我们是 9 月 20 几号到北京，周恩来还请我们客吃饭，那时我很小了，两岁半多一点儿，不到三岁。事情都不记得了，只知道来了以后，给我们家安排在老

北京饭店的二层正中央，最好的一座房子，因为老要接待那些人啊，给个好房子。老北京饭店大门有石头柱子，二层是个大阳台，把正中间的那套房间给了我们。我就坐在那个阳台顶上看开国大典和游行队伍。

后来找到了四合院，就住在东城区的贡院西街6号。在东总布胡同那边，那是很高级的了，房屋就30多间，大房间都上百平方米。

那是一个由三个大院子组成的房子，前院最大，噢，应该算四个院子，因为前院给分成前后两个院。这个门进来一个院子，后面一个很大的院子，有菜园子，还可以踢足球，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南侧是个大院子，中间隔了一个门，一道墙中间有门，从门进去，分成两个院子。大门进来往北一拐的话，就是一个大门楼，门楼里头还有屏风挡着的，不让直接看到院子里头，要拐几道弯，几次才能进入走廊，从走廊进去是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大概也有30×30米吧，这叫东院，最东侧的是东院。东院围着院子就有房子了，其中有一套房子很大，都是那种古建筑。房子都是上百平方以上的大房子，宫殿式的。东院有一个跨门过来就是中院了，中院一圈都是走廊，每面都有房子。前面这一排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后面就是大客厅，客厅也是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可以开舞会，这些老头子们经常来这儿开神仙会。屋子的空间也比较大，唯一不好的是冬天要升火，我们来的时候没有暖气，后来改成有暖气的了。还有西院，西院有车库，汽车都在里面，司机一家都在我们这儿住，警卫员和公务员都在家里住。在北京大概有这么一条，凡是正部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住独立的四合院。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一个是院子要更好一点、更大一点，还有警卫班。大概就这么一个规定吧。

我父亲按级别不算高，但是资格老，所以给他的可能是相当于副总理的待遇，住得比较大。另外他工作特殊，要招待这些民主人士，所以房子就给得大了些，但是按级别来说，他不应该这么大。我父亲级别不高，正部级。但是他的待遇给得高一点儿。

我们住的房子是清朝一个上尚书的，尚书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部长。后来满清败落以后，就被军阀占据了，解放以后，那些人都逃跑了，这些房子就空出来了。剩下的房子就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现在还有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负责这些高级领导人的住房调配的。如果你够这个级别，有多少这样的院，可以给你哪一个院，你愿意不愿意去，看好了就去。我们大概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年半吧，

到 1951 年的时候搬去的，这时候房子就已经定好了，家具全部是公家的。当时是供给制呀，每个月没有多少生活津贴的，基本上吃、喝、住全是公家提供的。桌子和椅子都是后来机关给你调拨过来的，最后你搬走了，也拿不走，还是公家的。就等于我们没有添什么家具，所以我们搬家也就很简单了，没什么好搬的。我们家有 5 个孩子，工作人员大概有 7、8 个人，后来也给撤了，就是到了 1954 年要勤俭节约了，看门的和公务员都合成一个人了，只有一个公务员，一个司机、一个保姆，共三个人。要是我的同学来找我，门口问一声就放进来了。我们那个院子很大，所以我的同学很愿意到我家里来，可以打仗，没有山，拿那个椅子堆起来堆得高高的，爬上去当山。在家里我是最小的，所以可以无法无天，谁也不管。我们那些同学都很高兴到我们家里来。保姆就管买菜做饭洗衣服。我有个姥姥，就是我的外祖母，她管我。因为我从小是过集体生活的，从托儿所开始——当时在中山公园里面的托儿所，也是特殊的了——就住在那里面，一个礼拜回一次家。后来就到幼儿园，也是住在园里，也是一个礼拜回一次家，上了小学也是住在学校里，一个礼拜回一次家。总之我在家的时间并不长。

我家的气氛很愉快，是个乐园，所以很愿意回家，每个礼拜回一次，就盼望着这个时候呢！回家有吃有喝有玩儿的，那当然好了。

我们的院子有很多果树，有海棠树、葡萄，那葡萄是很好的玫瑰香，特甜。我们家看门那个老头，特别会弄，那花园伺候得好极了，各种各样的花。在后花园里，我们家的海棠结果结得特好。前院还有枣树，无非就是这些树，后来还搞了几个盆栽的果树，什么无花果啊等等，机关给端来的，大柏木桶。因为他那个地方老要有人来，得弄得像样一点儿，只要一到开会的时候，政协就派人来，派厨师来，给做点心呀，就招待这些人，那些老头子们都是国家副主席级的，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父亲要论级别不太高，因为我父亲后来做统战工作，再升也升不上去了，就是个正部级，但是由于资格老，住房和待遇就相当于副总理。主要也是为了交往这些头面人物。

周恩来没来过，他根本没功夫。周恩来忙得要死，邓颖超来过，她不张扬的，悄悄来的。

所以我小的时候看他们这些人很随便，没有什么感觉。就是说，在电影里，

红卫兵被毛主席接见还流眼泪，我那时候一年握两次手，有时候还能说一会儿话呢。我觉得这是很一般的事情，怎么那么激动啊？我不激动。我记得握他手的感受是胖胖的，手上的肉厚厚的，说一口的湖南话，我还听不懂，靠我们老头子在旁边给我翻译。问我念书念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

五几年，那时候我也小，在念小学。老师把我又看成是好学生又是坏学生，论功课算好学生，论表现是坏学生。经常打架，做坏事，闯祸，尽干这个。放过一次火，烧了三百斤柴。恶作剧呀，拿蛇吓唬老师，什么都干。上课玩子弹玩儿炸了一颗，把老师吓得脸都白了。

毛泽东问我问题，我还是有点儿压力的。吭哧了半天说：“还好。”他说了好多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懂了，让好好学习。他湖南口音太重，一口黄牙，他的牙真是刷也刷不干净，他那一口黄牙，整个黄得不得了。我在他面前的感觉是，希望谈话赶快结束好让我走。

和他谈话总觉得精神上有点儿压力似的，受束缚；再一个又听不懂，这个人的样子又不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觉得。虽然他的肉厚厚的，握手的时候感觉还挺不错，就是说起话来以后弄得稀里糊涂，他的话土音特别重，我听不懂，另外他有点儿那种风度，我现在形容不出来，有点儿官腔儿也好，或是什么也好，反正我很不习惯，就觉得这个人架子挺大的。他的个子特别大，因为我父亲的个子特别矮，又瘦又矮，他就显得又胖又大，显得很高大，其实他的个子也不高，但是他宽，很壮。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有这个机会，每年的5月1号和10月1号，天安门都要放花的，放焰火。那个时候凡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就可以上天安门。我们家还可以带子女，不仅我上去，我小学时候的好朋友都跟着我上去过。

我父亲在家里也比较喜欢我，但一般见面的机会很少。他下了班回来以后，吃完晚饭有个散步的习惯，我只要在家，一定要陪着他，跟在他后面走。我觉得这成了功课了，挺烦的，我一直想玩儿别的，不行，得陪着他，耐着性子跟着他，去欣赏花也好，欣赏月色也好，欣赏周围也行。我这儿是心里着急，他还在那儿慢慢悠悠地考我这个，考我那个，他说：“这是什么花儿？”我说：“大丽花、西番莲。”他说：“这是什么？”我说：“美人焦。”问半天，作为他是一种天伦之乐，作为我来说，主要是受罪。

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一个，所以是最受保护的一个，我父亲是政协秘书长，他们公务员都叫我小秘书长，开饭的时候，我要是不上桌，就等着。这对我来说是件坏事，那就是把我给宠坏了。小的时候我没吃过苦头。

虽然在班上我家庭条件是最好的，但是我的父亲对我比较严格。

我上的那个小学都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一般到了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有汽车来接的，而且还互相攀比。进学校时，我父亲给我的第一个规定就是不许暴露他是什么大干部，只许说是普通干部。如果问是哪个单位的，就说是统战部的普通干部，一般人。不准暴露身份；第二个规定就是不准用车送，那时候别人家都用汽车接送，我呢，只有警卫员骑了个自行车，把我带到公共汽车站，上汽车去。同学就笑话我。

我就觉得特掉面子。这就是干部子弟学校里，有那么一种很恶劣的习气呀。回去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说：“你看，人家都是车来接的，你怎么就不能来接我一下子呢？他们都笑话我了！”后来我父亲就说：“你是错的。你小小一个孩子上个学，有人接送就已经很不错了。”又说：“这个车子是公家派给我上班用的，你应该锻炼锻炼，这是私事，和公事要分开。本来我还决定每年接送你一次，那连这次也取消了。”以前放假时，还用汽车把被子给我拿回家，完了，这被子也由警卫员拴在自行车后面给带回去，我得坐公共汽车回家。你说他多那啥呀。其它家的孩子都很受照顾，派司机来接，我就不行。虽然司机跟我那么好，那也不敢违背这一规定。我求了好几回，“不敢，要骂的。”

所以我也很怕我父亲，我父亲从来都没有太凶过，但是我是怕他。他每年也就是成绩册拿来看看，哎，有一个四分出现的时候，就要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还好，我的四分得的非常少，所以就没什么。操行吗，总是优，带个减号。因为太淘气。老师不知道怎么对我格外宽容，还是给我优了，只不过带一个大大的减号。所以在学校老师对我都格外宽容，我估计有家庭的因素在里面。再加上学校里有几个老师，还和我母亲认识。就是我母亲刚到北京的时候，是管教育的，她原来管的女二中啊，有的老师是那边学校的老师，调到育才来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家的这种情况，都打过招呼了，所以我在学校里，就格外受到优待。

在其它方面父亲也比较严格，如我们家的子女要托他办事，比如念书要上好学校，一律不准办。又如我姐夫是在上海参军的，复员以后，不能回北京工作，

只能回到上海去，他的工作安排就在上海。我姐姐最后没有办法了，两地分居，就调到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就等于是待业了，老不给安排工作。我姐姐就想让我父亲帮忙说一声，赶快给她安排个工作呀。结果父亲就连这样一点儿要求也不给满足。最后，害得我姐姐急了，去找赵祖康了，赵是上海市副市长，因为他跟我爸爸是老朋友了，也是民主党派的。找了赵祖康，他一句话就赶快给安排了。我姐姐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父亲了，说这是谁谁谁帮助安排的，让我父亲骂了一顿：“谁让你去找他！”这是六几年的事情，所以他是很严格的。家里的私事一律不管。但是很热心什么事儿呢？单位里的哪个来诉苦了，生活困难，他就想办法给安排，怎么从救济金里面给解决。像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管。

我家乡黄梅来了人，到北京来要求帮忙给家乡解决点什么问题，打报告，都给转过去了。吃要家里管，我们家的房子有的是，住去吧。这他都管。所以我妈妈就发牢骚，骂他，她最烦我们家乡来的人了，我们家的经济收入别看挺高的，但是开销挺大的。那么大个家，谁来了都吃家里的，来个亲戚朋友都吃家里的，老头子不管钱的，老太太得管啊，有时候她也觉得挺紧张的，所以我们家就没有存款。每个月吃光用光拉倒，要是人来得多一点儿，就受不了了。走的时候还得送，这玩儿艺连吃带拿的，真顶不住，她受不了，所以尽跟老头发脾气，那没办法呀，一定要管好。咱们下月节约一点儿，也是亲戚，亲戚来了你怎么办呢？就是老的那种传统观念，大家庭，他是地位最高的，家乡来人也好，亲戚来了也好，必须招待。

对于我呢，一般我回家来他都挺高兴的，要我陪陪他。就是说散散步，出去在街上遛遛弯儿，顺手给我买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他的关怀。这种情况都是很温和的，但是严肃的时间占多数。他做工作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我干扰他，如果当时我跟他多说了两句话，他就把脸孔板起来，如果发起脾气来，就是：“伸出手心来！”拿尺子打两下子，这就算是惩罚了。这个时候是严肃的。每个星期回家见面高兴一下，接着就严肃下来问：“这个礼拜成绩册拿来没有？功课怎么样？”就问这个。这我是不怕的，成绩册拿来看一看，我的成绩册是挺好的，看不出毛病来，打架什么这些事情都不上成绩册的。我最怕的就是叫家长，在学校里，谁要犯了什么大错误，老师要把家长叫来

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有好几次运动，我觉得我父亲从表情上看还是有一些

反应。三反五反我太小，搞不清楚。到了我上小学三年级以后，开始稍微知道点儿事情了。紧接着就是公私合营，那个时候我父亲做工作，成果大大地，多多少少公司加入。所以那个时候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说服了好几个大资本家公私合营了，他搞统战工作的，那都解决得比较顺利，而且有些人表现得很好。那些人也挺左的，挺相信党的，就交出来了。

后来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我父亲还比较积极地搞这方面的宣传。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我当时就提出来要把家里的废铁，甚至把阴沟上面的那个铁箠子都给拔了，说：“咱们小心点儿，掉不下去。”那会儿得交铁呀！我没地儿交铁那哪儿行？要破锅没有，只好拿好锅去，我说：“你再买一个去。”我父亲就批评我了，他说：“炼钢铁是炼钢铁，应该找废铁，你不能把好的东西拿出去。”我爸爸批评了我一顿。你不让拿我也是偷偷地拿走了，你也没办法，你还得买一个去。什么都拿，能抄的都抄了，提得动的都拿走了。我父亲有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好东西，你为什么要毁掉它呢？”他对这个有看法，也批评我。

学校里大炼钢铁需要烧木柴啊，我去参加锯树。我在班里最会爬树了。当然好的地方不能弄，就弄那些枯枝杈，就锯下来。那么我就爬到树上去锯树。他就问，你锯的都是什么东西？我说，有些半青半白的，就是有一半枯萎的，有一半还活着的，我也锯了。他就说：“唉呀，可惜了。你知道你们学校的这些树都是多少年的？明朝的啊！这都是500年以上的树。”我们小学住的是先农坛，先农坛是永乐十八年建的，明成祖十八年建的，它竣工都是500多年了。他说：“可惜了，古物给毁了。”

再一个就是困难时期的时候，困难时期的时候我在学校做小球藻。代食品，没吃的呀。他特别关心这个，做得怎么样？能不能吃？因为这关系到生计问题啊。我就老给他汇报。

我们搞超声波，加热什么的。他说，很好，你搞得不错。蒸汽喷嘴儿提高效率。困难时期，他主要关心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比如吃，还有交通问题等，他老坐小汽车，我坐公共汽车，他问我，公共汽车现在能不能正常走？我就告诉他，车上好多大包，烧煤气的。汽车顶上搞一个大气袋，里头罐上煤气，汽车用煤气开动。所以开得比较慢。他最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向我打听这些情况。

反右的时候我是知道的，他是最先得到中央消息的，赶快去保那几个人。就劝这些头儿别再乱说了，结果龙云不听他的劝。我发现龙云那个人很有见解，当年就对苏联有看法。龙云这个人对蒋介石的看法，对苏联的看法，最后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他对苏联的看法过激了，所以老毛给他定为右派。在国民党里头，我父亲所做工作的几个对象里头，龙云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的好多预见性的东西，最后都被实践所证实了。由于龙云讲得太多了，我父亲劝他不要说了，龙云不听，所以龙云被打成右派。我父亲当时很想保一些人的，象蒋光鼐、蔡廷楷这些人早都做好了工作了，不说了，不说了也就算了。所以就都过关了，没有被打成右派。龙云就不听，不听就被打成右派了。我哥哥也是属于最早提意见的，后来我父亲一说，他就不敢讲了，没捞上个右派帽子，可是后来仍记了一笔——思想右倾。

有关这方面事情，如果你们要真想了解，那你们还不如去找我的哥哥，他知道的事情多，毕竟以前的事情他知道。特别是他怎么去向蒋光鼐报的信儿啊，怎么救我父亲出来这一段，他自己做的事儿，他自己经历的事，他都知道。

当时可以说，我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里生活，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家庭生活很优越了。那时候我父亲一个月，交完了房租、水电，还有大概三、四百块钱的工资，这已经非常好了。那个时候钱很值钱的啊！哪儿像现在啊。所以一个大家庭，就靠这些钱，生活就非常好了。

文革开始了

我父亲曾在老中山大学的法学院当院长。他是最早搞政治经济学的，跟王亚南是一起的，所以跟陈云也特别熟，全都是搞经济的。但是陈云是土的，我父亲那是正规学院毕业的。困难时期时，父亲就经常和陈云去议论点儿事。当然就是对总路线三面红旗有点儿意见。大概是对如何善后的问题讨论了一下。所以后来陈云那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提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说，那是很自然的，很可能是他们商量的，就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而且我父亲就告诉我说，陈云这个人很不简单。加上我现在的分析，综合起来看，陈云对老毛没危险，就是陈云没有野心，所以，遇到什么事情，他不听老毛的，跟老毛的意见相对立的时候，就让陈云靠边站，也不狠搞他，就是让他休息。大跃进的时候陈云靠边站了，

大跃进完了，三年自然灾害，让陈云出来收拾残局。陈云不会造他的反，也不愿意当大头儿，老处于一种闲散状态。所以说，当一个闲人不容易，陈云基本上做到了，又管了政治，又当了闲人，平常不管什么事。

到了恢复时期以后，1965年形势好转了，工业、农业都猛上去了，那个时候就比较宽松了，我父亲回到家来散步也多了，还有时候高兴地唱两句戏，吟几首诗，他那摇头晃脑的样子都是按古时候私塾先生的念法儿，连吟带唱的，摇头晃脑的。有点儿利用这些东西来陶情释性的啊，比较高兴。

文革开始了以后呢，就比较紧张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弄到他头上，只是弄到了党内上层，先从彭德怀开始。所以他每天只关心外面的情况。我这个时候任务很重，天天替他传递外面的消息、大字报都有些什么？他也不敢去看，他就很认真地听我说。听我说的时候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很认真地听，私下里可能会表露点儿，他老说：“彭德怀这个人很了不起，很能打仗的。”老说这些话，但是多了也不讲。关于《万言书》的事儿是后来跟他议论才谈到的，那时候没有说到。

当时我记得最明显的一次是，上边决定抓我鱿鱼的时候，就是要揪出几个坏学生代表，被称为鱿鱼了。我是坏学生，我是跟工作组作对的坏学生。上面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工作组的组长找到我的头上来了。问我：“你父亲是谁？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我调不到档案？我是拿着地质部办公厅的信去的，为什么不给我档案看？”我当时说实话很客气了，要是现在我就说：“你算老几呀？！到中组部去不给你打回来才怪呢！”连湖北省为了什么事情，去找了一次都被打回来了，说：“这是绝密。”我父亲后来就是党的身份不公开呀，公开身份就是国民党。自1931年回来以后，去完日本回来以后啊，就把共产党的身份全部隐瞒了。只有单线联系，就是只有联络人，象孙大光啊这些人，都当过我父亲的联络人。孙大光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交通部的部长，后来是地矿部的部长。我回北京就是他下的手令给调回来的。1949年以后我父亲还是国民党的身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我父亲的身份暴露以后，很多人都特别惊讶，最奇怪的就是那些元老们。觉得欺骗性太大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惨了，在外面布下的那些网全完了。在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布下的网损失惨重。暴露了就没有用了，一个点儿潜伏下来多少年，有一个我父亲的部下，他布下的一个电台，在他去世以后这个电台

还在工作。这特务工作的年头可长了，四几年布的，到现在还在工作。所以说我父亲是大特务嘛！所以现在台湾说，中共真正做统战工作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李维汉，公开的，一个就是我父亲，秘密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回家，住在家里。还跟我父亲经常交流外面的一些情况。但交流得也并不多，他老要追问我外面的情况，我就一点一点地报给他。比如说我们东方红成立了，后来炮轰地质部，我们进军到地质部游行、示威、静坐，甚至还有人绝食，这些事儿都做了。因为我父亲和何长工很熟呀，就专门打电话问：“何部长，我这个儿子参加地质东方红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他说：“知道啊，是革命小将啊，这是中央支持的。”讲这些，那我老头子也就放心了。你说何长工能讲什么？完了以后我父亲就说：“何部长可是老干部啦，所以你们对他要客气一点。”完了就问我怎么批判他？我就说：“开会的时候把何长工、旷伏兆叫到台上，一个个的先弯腰，然后就进行批判，弯腰完了检查，检查完了进行批判斗争，最后让他走。”他说：“唉呀，你们应该客气一点，这可是老干部呀！将来都还是要用的。”那时我父亲还没有垮台呢，还在台上，何长工们已经先倒霉了。

我父亲当时是统战部的一个不公开的常务副部长，统战部部长是李维汉。不公开吗，所以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公开的是政协秘书长、民革秘书长。实际上他等于是民主党派的党组书记，所有民主党派的这些秘书长都归他管，都是党员。

张经武来统战部相当晚，从西藏来的。可以说我父亲没有与他共过事，只跟张经武的前任徐宾共过事。因为我父亲抓起来了，徐宾也抓起来了，之后张经武接替了一段儿，就是他们没有见面。徐宾到我们家来就太频繁了，等于是同级的，所以来往相当频繁。就包括以前李维汉也经常来商量事的。

李维汉他原来叫罗迈，在中央主持过工作，老资格的。他自解放以后就一直主持统战部工作，他是按中央最高领导的待遇，但是兼任统战部部长。当时北京刚解放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笔杆子，要他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主任，他没有去，去了就可以恢复他的党员身份了，李维汉硬说：“不行，我们好不容易埋下了这么一个××，不能让他走掉。”结果硬是扣了下来。

要是进了办公厅，可能干脆公开身份了，什么都好一些。虽然到文化大革命

的时候还是会倒霉，那至少其它方面要好一点儿。我至少也讲得清楚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当时我讲不清楚，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身份。学校工作组调我父亲档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身份。就是说这个工作是很严密的，根本就不知道，虽然很多人猜测我父亲应该是党员，但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我白天在外面工作，晚上回到家里，向他报告外面的情况。他除了关心外面的形势，最多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做过激的事情，说：“你们不要搞得太厉害啦。”还有对打人的事情，他是最反对的。他说：“尽量不要抄家。你不懂，这以后会有很多后患。”他想到后面去了，我们那时候哪儿管那个！好在我也没有轮上抄家的事儿。

批斗的事情有，但是我听了他的话。他说：“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对他们好一点。”所以我有时搬个凳子去，把他们斗累了，我就让他们坐一坐，我只能做这个，还能怎么样？再严重一点儿我该倒霉了。

私下我也要与他们交谈的，我什么不说呀！他们跟我父亲又那么熟，就是批斗会上只能是这样，下来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单独去看他们，或者他们来“汇报”，押来汇报，我就把人给轰开了，轰开了我们就两个人在那儿，两个人的话，什么汇报啊，无非就是谈谈话呗。什么都说的，完了我就告诉他，你下次检查的时候，哪方面哪方面你就再加深刻一点儿。我得告诉他们，让他们过关呐。

后来我始终没有机会再见到何长工，他已经死了。太遗憾了！地质部还剩下唯一的一个离休的副部长，前年我们见了一次面，还认得我，还邀我到他家去，当时我忙得也没去，还有一个叫李宣的，还活着呢。旷伏兆调到部队去了，徐光也调到部队去了。现在他们还活没活着也不知道了，这些人，估计可能对我不太好。这两个人是和何长工有点儿矛盾的，我对何长工可能要比对他们好一点。

以前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可能要受到冲击，到了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已经指示我们去搞那几个副总理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父亲迟早要完蛋。完了就是到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起冲统战部抢档案的事情，是统战部系统的造反派干的。

抢了档案，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就被公开了，档案里都有记载。那我父亲是党员的身份就公开了，详细的不知道，详细的还有更秘密的东西，至少我父亲的身份被知道了。因为一抢，至少你还保留着统战部最高领导的一些材料，有一些最

基本的东西，包括身份啊，这些都有。就都暴露了，那我父亲是不是共产党员就很清楚了。接下来就不客气了，原来按照民主人士对待还客气些，还有个保护政策。但一暴露的话，就没有这些了，他可以随意搞。

那个档案一被抢的话，我们就知道：完了，肯定好不了几天！除非周恩来能撑得住，周恩来撑不住就完了！那档案当然是中央文革让抢的呀，肯定是！不是中央文革支持他们，他们有那么大的胆子？！当时那几个头儿，一个叫刘运，一个叫洪涛，我还记得名字呢。就是民委统战部系统造反派的头头。

我父亲之所以备案审查呢，得从头说了：

我父亲是个老资格了，1923年跟恽代英一块儿搞团的工作，1925年还是1924年转的党。后来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我父亲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然后参加北伐军，当时在张发奎那个部队，是一个师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党代表了。当时跟国民党已经有了很深的联系了，主要是他当时在的那个部队的前任，就是张发奎的前任是李济深，那是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当时北伐的第一路军蒋介石是司令，第四路军的司令就是李济深，广西的。

我父亲不是黄埔的，他是国共合作时，作为党代表参加北伐的，以后就是做政治宣传工作，就是鼓舞士气啊，帮助国民党和军阀打仗。这样子，就是到了打下武昌以后，后来蒋介石就是占领了东边了吗，从江西打到上海了。蒋介石不就搞一个“4、12”政变吗，1927年的4月12号，政变的时候就通缉了一批共产党，当时我父亲就在通缉之列。所以我父亲和郭沫若、李一氓，还有阳汉生，四个人，都是在北伐部队里头的，就离开了张发奎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令就向南昌集结，赶往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这段历史呢，郭沫若有一个《革命春秋》里面写过，有书的。在这个路上还被截了，反正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还有他们当时离开部队的照片，赶往南昌之前的照片。

赶到南昌的时候已经是8月3号了，起义已经成功了。后来蒋介石就开始了反攻，就撤退了。离开了南昌，不能守着大城市了，就向赣南转移，转移在三河坝那个地方被打散了。毕竟力量还少，打不过人家。打散了以后，我父亲就跟着郭沫若等，几个人就从三河坝那个地方去了香港，然后转移到上海，回到中央，当时中央在上海。

那时候朱德在三河坝打完了，就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是一个分手点。当

时党中央在上海，浙江省委、江苏省委全部都在一起办公。当时康生好像是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我父亲好像是浙江省委的宣传部长或是组织部长。当时可能就有意见不一，大概发生过争执。我父亲当时叫梅电龙，这个时候都是公开的共产党。1931年我父亲在日本被捕以后，就完全转入地下了。那个时候，他可能跟康生在那个时候就有矛盾，就是1925年我父亲在上海，主要主持了五卅运动，我父亲是10个领袖中的学生领袖，就是管学生的。当时我父亲在上海是党团部长，就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头儿，上海市党部的头儿。就搞了五卅运动。

到了1930年，共产国际派人来，我父亲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当时是谭平山、张国焘他们传达，后来中央就决定派我父亲到日本去，东渡到日本去和日共联系。大概是给他们送一笔什么钱，还有办什么事情。当时我父亲是以日本人，换了个名字，叫高桥平，和一个日本向导一起过去。去了以后，因为我父亲在大学里念书就是念的日本人办的学校，上海同文书院，所以他日语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派他去。他去了以后呢，刚上岸，那边那个接头儿的人，一个牙科医生，大概已经被捕了，就交待了，说有第三国际要派人来呀，跟日共接头联络。迎接的这个人，他已经被捕了，他就交待了。那么我父亲一下船就被逮捕了，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我们共产党有一个东京特别支部，廖承志在那儿，东京特支呢搞了一次游行，在东京最繁华的地区叫银座，在银座搞了一次示威游行，就营救我父亲，结果把我父亲的名字喊出来了，糟糕了！这一喊出来，日本人一查就查到了，同文书院是日本人办的，这样子，连毕业照片都翻出来了，跑不了，你是共产党，国民党通辑的名字有。我父亲就这样子，身份暴露了。但是我父亲没有认这个帐，只是说他到日本是属于私人访问，探亲访友，就一直咬着。在日本的监狱里待了将近大半年吧，快一年了。后来就把他释放了，可是这个时候他身份已经暴露了。回来以后就不好办了，公开活动就处处受影响。于是周恩来和陈云就商量说，干脆就是给他换一个名字。当时还有李维汉，最后说以一个灰色身份出现。就是说，因为我父亲的老关系很多了，国民党那些元老里面有很多熟人。公开就是以灰色身份出现，跟他们联络，就是争取反蒋派。就是说，如果共产党这边拉过一个反蒋派，和蒋介石作对的话，共产党方面的压力就要轻好多。于是，我父亲从此就在上海搞新闻、搞报纸啊什么的。然后主要的活动就是，和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接触。包括中统的陈果夫、陈立夫，军界的各地方的军事首领，象李济深啊，

19 路军的陈明书啊，蔡挺楷、蒋光鼐他们。

后来就是策划了一次反蒋运动，利用对蒋介石的不满，就策划了一次福建暴动。就是以 19 路军为主，建立了一个福建人民政府，和蒋介石公开对抗。可惜，那是 1934 年的事情，当时共产党这边正在反围剿当中，又是左倾路线占上风的时候，王明、博古那一套，所以没有获得支持，就没有坚持住，被蒋介石给镇压了。你要是合起来打就好了，就等于是起来了还没站稳脚，那蒋介石是大兵压境，把 19 路军给打散了。打散了呢，就是几个头儿都跑了，剩下的部队就被蒋介石收编过去了。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我父亲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我父亲改名叫梅龚彬了。

我父亲当时是福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联络员也是跑了几趟没办法，叫郭洪涛，跑了几趟苏区，就没有取得保证。不然，要是搭上桥的话，两边合起来干，那第五次反围剿，搞不好就不来了呢。所以，这个左倾路线要不得，危害太大了。

福建政府完蛋了以后，我父亲就是纯粹转入地下。就是按照中央的指示，专门做反蒋派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从 1935 年以后，一直到解放前，全部是在进行地下工作。第二次国共合作要建立八路军、新四军，新四军呢，必须要南方出一个特别有名的将领，才能够服众啊，大家才能够服他，当时最理想的人就是叶挺。可是叶挺呢，对老毛有意见，不肯出任。

身份暴露，厄运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就比较紧张。但先整的是党内高层，没整到他头上。我父亲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受到冲击，但他那样的经历，挨整是迟早的事。六六年底统战部的造反派，冲进统战部抢了很多机要档案，我父亲的身份算是暴露了。这以后厄运也就开始了。

这样，67 年五一还见了一次报。五一过后，就没名儿了，后来 7 月份就被抓进去了，进了秦城。我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去了一趟广州，他被抓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回来的时候才知道他被拘留了。

我是从广州打电话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我老给家里打长途。在广州我不是在地质局当过联络站站长吗，总机就告诉我那个账号了，我只要一报账号就能打长途，反正也是公家出钱，所以我在那儿打长途随便得很，老往家里打，北京的事

儿都知道。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早就知道是必然的了，你想想，那么多人，何长工打仗的还这样呢，你搞地下工作的不更惨吗！那些搞白区工作的，不都特惨吗，我父亲是典型搞白区工作的，比白区还白区呀！已经就是不在乎了，因为早就预料到了，所以一点儿也不感到怎么紧张。不进去才是怪事了，就觉得早晚都得进去。从1967年进去到1973年我们才见到，我曾经想过一个办法，就是想找周恩来。我能见周恩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事儿，出了事以后，我又见不到了。毛病就出在这儿，本来我有很多机会的，可以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一讲。可是我并不知道是周恩来签署的，要是知道是他签署的，那我见到他又怎么样？没有用的。老毛又发了话了，这是回来才知道的。当时想进中南海也有这个原因，公私兼顾了。

是老毛在政治局会上点了他的名，他让抓的。老毛下命令了，那逮捕证只需要他签，他是管具体事的。

我父亲被逮捕以后，待遇就是秦城那个待遇。有一本书《炼狱春秋》，写陆定一的，在秦城陆定一的待遇非常不好。我父亲要是遭受那样待遇的话，陆定一的待遇肯定也好不了，因为我父亲是陆定一的入党介绍人。

陆定一的待遇不好也因为当时毛恨笔杆子，这些人的脑子也多一些，已经想一些不同的东西，就不听他的了。知识分子难弄。

我在2月份开始挨整以后，就已经落入低潮，所以我父亲再挨整的话，就是低潮里再加一下，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迟早要进去的。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只要“四人帮”在台上，我就没好日子过。那么我在监狱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保持锻炼身体呀，悄悄地做各种运动，就是要坚持等到这一天，我相信我是正确的。早做好这种精神准备了，所以我觉得，我被抓也不奇怪。在这之前，我父亲被抓，我也不感到惊奇。但是我惊奇的是我母亲被抓。出来以后我知道我母亲被抓了，我是非常惊奇的。

问：“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你的父母怎么样？”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母亲一定出了意外，是生是死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在我之前关起来的，我知道，而且住在秦城我也知道。但是在秦城里如何情况，就没有人透消息了。

问：“到了789家里可以联系吗？”

可以呀，好象是一个月可以来探望一次啊。头一个月是我的嫂子和我的姐姐，跑来看我。那是在外仅有的有自由的人吧。她们来探望我，送点儿吃的，送点儿什么。

问：“她们也不知道你母亲当时的情况？”

知道，这回我就知道了，说我刚抓起来的时候她也被抓起来了，她关在哪儿也不知道，是抓起来了。

问：“你感觉到怎么样？你爸爸在秦城，你妈妈被抓了。”

那个时候那就没办法了，听了也就只好听了，那怎么办？因为什么？谁也逃不过的，这叫在劫难逃。我还不算惨的呢，还有更惨的，父母都被整死了的！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世，还没死，我知道，要死了会通知我的。

问：“会通知吗？”

当然肯定通知的。第一次来探视的时候，到探视的时候我嫂子告诉我，她按期到卫戍区接待室去送东西。那就是知道了，那就是被关着呢。

我母亲就是一点儿也不沾边，我父亲绝对不让她知道他搞什么，这是纪律。但是她也被抓起来了，我就觉得这很奇怪。我想，我母亲最多在单位里挨挨整啊，单位的领导干部也得挨整啊，最多是住住牛棚。谁想到把她也给关起来了。

对于我父亲我们可以探视，就是说我父亲在这个73年以前，是可以送东西，就是到卫戍区，正义路那个地方，一个可以接待的地方，在那儿送东西。由他们给转送，比如他需要衣服了，需要生活用品了，可以送去。当然吃的东西不行。

问：“信能不能送？”

信啊，不能送。到了大概是74年，73年底以后，就可以让接出来。就是他们卫戍区派个汽车，把人接出来，把人接到沙滩儿那地方有个全国工商联，那的大楼里头有一个会客厅，挺大的一个会客厅，就在那个会客厅里头，全家人到那个规定的时间去，可以见面两个小时，可以谈话，同时可以送东西。大概是一个月能够有这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到一个月半月。

问：“你第一次见到他怎么样？”

我记得，忘了是73年底还是74年初，第一次。第一去的时候，那几个当兵的来，把他送过来，我们都先在那儿等好了，一家人。他来以后呢，就说，你们可以谈谈话了。完了他的人就在旁边坐着。你也讲不了什么。

问：“你看他怎么样？”

我父亲那个时候瘦的很厉害，本来是就瘦，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一个瘦小老头儿，现在里面关押了两年更瘦了，很瘦很瘦的。而且，很奇怪有几次报病呀，住医院呀，在北京都抢救过来了。我父亲就是属于那种很严重的支气管炎，什么肺气肿，最厉害-大概住过三次 262 医院，先是在 262 医院。后来到了 74 年的时候，特别是 74 年，就给转到那叫什么 304 医院。这几次吗都给抢救过来了，262 两次，304 也是两次。304 第一次好了又回去了，完了又住了一次，住了两次。第二次就是 74 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是都已经可以见面了吗，就让我们到医院探视，一个礼拜可以去一次。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在旁边了，

虽然那个楼道把口是挺严的，但是你是他家属，你进去他也不管。

南冠愤，“八一”魂归“八一”举义地

从六七年五月到七四年我父亲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七三年以前，家人可以按通知的日期，到正义路北京卫成区的接待室送东西，再由卫成区的人送到秦城。不能送吃的东西，不能送信，只能送衣服这样的必需品。

七五年三月，父亲在三 0 四医院住院时写了一首小诗。诗的题目叫(南冠愤)，可见他的心情非常不好。南冠是古代楚国的帽子。左传中记载一个戴着楚国帽子的人当了囚犯，以后「南冠」便成了囚犯的代称。初唐的大诗人骆宾王的《在狱咏蝉》也说：“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的蝉在狱外鸣叫，图囿中的骆宾王深深地思念故乡。骆宾王因为触怒武后，被诬坐牢。古人认为蝉饮露而不食，居高食洁。所以在一诗的最后，骆宾王问：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没有人相信我清高廉洁，又有谁会为我申明冤情呢？

我们老家是湖北，父亲又在牢中，真正的南冠。他纯粹被康生诬陷，关了几年不给平反，当然很愤怒。父亲说：“旷时何所得？落笔实茫然。冷露迎霜起，寒灯伴月眠。久积南冠愤，而今又几年？”我父亲的这首诗，是偷偷地写在一张旧报纸上。我侄子去看他，偷偷地带出来。诗中“旷时何所得”的“得”，指在监狱让逼他写“学习心得”。“寒灯伴月眠”，是说牢房的灯彻夜不熄。我坐过牢，很能体会父亲。写下这首诗的两个月后，我父亲又被强制转移到江西宜春。当时父亲的病已经很危险了，他是带着氧气袋离开北京的。

我父亲在北京几次犯病，都抢救过来了。到了江西宜春，当地县医院根本没有抢救这种病人的经验和条件。而且不让家属陪着去江西。在这种情况下把父亲转移到外地，等于送父亲去死。父亲一到江西就报了病危，我正在北京，马上和母亲赶到江西。在江西母亲写了(和逸仙)的诗。“逸仙”是我父亲二十年代写文章用过的笔名，以后母亲就用它称呼父亲。母亲用诗回答和安慰父亲：“平生憎昧得，义正字归然。洪府揭竿起，袁州积郁眠。旷时何所得，潜奸应有报，夙志岂消烟。且抑洶涛愤，颐身送危年。”“洪府”是南昌，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的第一句就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诗中的“洪府揭竿起”，是说父亲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

(编者注：一九二七年八月，梅龚彬在叶挺部参加南昌起义，是聂荣臻通知梅龚彬可能要举起起义的消息。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和梅龚彬从九江出发，坐着手摇着铁路巡路车，赶往南昌参加起义。一九四八年夏天，郭沫若用诗人的手笔，写下他们参加起义的兴奋心情。但 39 年后，等待他们的是牢狱和磨难。)“八年寒窗八年苦，到头还是病和死。冰若精神最可钦，革命到底不悔死！”

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到七五年病危被强制转移到江西宜春，宜春古时称袁州。物转星移，四十八度春秋，父亲由革命宿将，被诬陷成为叛徒特务，关在监狱整整八年。所以母亲诗中说父亲是“袁州积郁眠”，“八载寒窗八载苦，到头还是病与死”。父亲知道自己生命垂危。母亲坚信坏人肯定会受到报应，安慰父亲，要保养好身体，熬过苦难的日子。但是父亲还是没熬过来。

父亲是七五年八月一日凌晨两点去世的，这正是一九二七年八一起义的那个时刻。在他揭竿而起的地点含冤去世！

强迫父亲去江西一事，至今仍有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让我父亲去江西，是周恩来提出来的，也是他签的字。他心里肯定明白，我父亲那么重的病，到江西就必定死，可他还是签了字。按说当时他是能保护我父亲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坚持要把我父亲送到江西？为这件事情，母亲对周恩来很有看法。所以，为我父亲平反的事情，我母亲找了陈云而没有找邓颖超。

成长之路

我小时候（编者注：三岁以前）是生活在一种动荡的环境里。三岁到了北京以后，很快全国就解放了。解放以后，我是在供给制下生活。从上幼儿园到上小学二年级，全是享受供给制，也就是说一切都由国家管的，吃穿住全都由国家包了。没有多少津贴，像我父亲那些人的津贴都很低的，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全都是国家包了。

我从小住在学校，上幼儿园就住在幼儿园里，托儿所就住在托儿所里，上学以后就住在学校。到了1952年、1954年，供给制取消了，这时候才规定了级别，就是享受工资制了。

那时候还是住校，以前是什么也不用交，改为工资制以后，就要交钱了，需要交学费，每个月还要交生活费之类的。

我在育才学校，原来叫北京育才小学，这个学校原是延安保小，在延安打仗的时候给那些军队干部和中央一些干部的孩子们念书的。解放后，学校就从延安迁到了北京，在先农坛里占了大半个先农坛，建立了一个小学，叫育才小学。这个学校的干部和教师基本上是延安保小来的，到北京后招收了师范大学的一些毕业生。高级干部的子女可以入读。当时对高级干部的定义就是12级以上的干部。在这个学校里我小学念了6年，初中念了3年，这个学校在我念到5年级的时候又加设了初中，这样我就在这个学校念了9年。我是1953年入学，到了1959年小学毕业，初中还在那儿念，一直到1962年。所以说，困难时期我是在这个学校度过的。

在这个学校经历了几件大事，“三、五反”运动，那时还太小不懂。后来大一点儿了，大炼钢铁、大跃进都参加了，还有“除四害”、打麻雀呀这些都干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这个学校属于特殊一点儿的，至少能够吃饱。当然吃粗粮很多了，窝窝头等，这算好的。有的时候还要吃豆腐渣，还要吃榆树的榆钱儿。困难时期由于肉食很少，油也少，就是油水很少，粗粮吃得比较多，同时也搞过一些培养小球藻、人造肉等，这些事儿都干过。另外为了节约能源还搞过超声波加热：拿一个管子，砸瘪了，塞一个铁片在中间，然后蒸汽吹的时候，会产生超声波，用以节约能源啊，超声可以使得米饭快点儿熟，水可以快点儿开。这些都是由国家的困难而做的。

到了 1962 年以后，困难时期逐渐过去了。困难时期即便学校吃不好的话，家里还有些特供，因为父亲是正部级干部，所以还有些特殊供应，甲级供应证。每个星期六可以回家补一下，所以我在困难时期过得还可以。特别是在 1961 年，因为每年我父亲可以有一次休养，我们那年到青岛去，那就是天天鱼呀肉啊的，都是充分供应。专门配了一个厨师，你想吃什么就报，反正不用掏钱的，他去给你买来，给你做好。大鱼大肉吃了一个月，我那一个假期下来长了十几公分。所以那个时候在这样的家庭中，待遇还是很高的。别人还吃不饱呢。当然，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么多了。反正就是说，我还有这样的待遇。

学校里管得非常严格的，基本上有点儿接近于军事化。因为这个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样的。我们虽然住校，幼儿园里每个班都有阿姨，小学 1-4 年级的时候，每个班都有生活老师，我们叫阿姨了，就是管你的生活：按时睡觉、起床、洗澡，还要做一些劳动。那都是在监督下的，吃饭都是要排队去，每个桌 10 个人，都有固定座位，不能乱坐，打饭分饭都是有规矩的。桌有桌长，宿舍有宿舍长，班有班长，所以管理是很严的。每天真正的自由活动就是每天下午有一个半小时。由于校园很大，里面有草坛，有很大的操场，所以说活动范围还是很大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踢足球，可以玩儿各种体育器械，像什么双杠、单杠、游泳等等，各种各样的，那都是很好的条件。要不就到草坛里去玩儿捉迷藏，还有一些小孩儿们的游戏，什么骑马打仗啊、撞撞拐了、打个瓦了，这都是随便的，在这一个半钟头里头都可以玩儿，那是很自由的。

我们在孩童时代过的是一种很有趣的生活。虽然其它时间都是军事化，在严格的管制下，但是稍微有一点儿空闲的话，总是需要发泄一下，所以就想出一些鬼主意来。当时冬天要生火，生火就需要劈柴，这个劈柴堆得像山一样高，我们那个时候刚三年级，三年级小孩子看到高高的劈柴堆，就觉得它像山一样。往上爬也不容易，一边爬一边滑，觉得很有趣。外面吗，大家都看得见，总想找一个别人都看不见的地方，就在劈柴堆里挖了一个洞，上头拿草席子给盖上，像一个地窖似的，藏在里头讲故事。但是里头又太黑，太黑怎么办呢，就从草地里随便拣了点儿草来，点火玩儿。这一点不要紧，把上面的芦苇席子给烧着了，这下可吓坏了，大家拼命地跑。一下子大火冲天，劈柴堆吗，你想想，点起大火来，那还有救啊！把这个劈柴堆烧了起来，劈柴好大的一堆呢。大概好几万斤的劈柴

堆在那儿，很高的山呐。完了，这消防队就来了，来了 11 辆消防车，把火给救了。然后罚款 300 块钱，把火给浇熄了。损失了大概三千多斤的劈柴。

我们当时就吓坏了，都躲在草坛里不敢出来了。然后生活老师就来找啊，一个个的从草坛里给揪出来，由消防队的队长来审讯，说：“你们怎么点的火？”当时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或者说是信仰吧，就是大家谁也不愿意揭发别人，所以不说。最后实在逼得不行了，大家都说是自己烧的。查到最后，也查不出到底是谁弄的。结果，从那个火柴查到，是我们某一个同学干的，从他那儿找到了突破口。那没办法了，就诈出来了。小孩毕竟不行吗，经不住大人七骗八骗的，就给骗出来了。最后学校就要惩罚了。怎么个惩罚呢，就是你们烧了这么多劈柴，值多少钱，要靠你们的劳动挣这些钱！我想实际上也算不出几个钱来，就算我们赔了。家长出钱是不要的，说要用你们自己的劳动来补偿！后来就利用以后的课外时间，让我们糊火柴盒、糊信封用来还钱。我们也就糊了，当然这就是象征性的，差不多意思意思，我们糊了一阵儿就算了。教训够了也就行了。否则糊一个信封一分钱，那得糊多少？后来说要找家长，我们赶快认错，最后就没找，所以家里不知道这件事。

作为我来说，我最怕的就是把在学校里做的坏事告诉家里。坏了！就要打屁股板儿了！要挨揍了。但是我发觉我们那个老师对我还挺好的，始终没走到这一步。老师是看功课，功课好的就算是好学生，闹就闹点儿，我这个操行好几次都得良，得优的时候也有，就是闹得少的时候就能得优。

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师也怕见家长，家长去了怎么说？他也怕。但是我们不懂，我们不知道啊。如果家长要反提出点儿什么来，他吃不了兜着走吧。所以老师也不轻易找家长，再加上成绩也不坏，就算了，成绩坏找一找的话，让家里帮帮忙，管一管，管好一点儿，这还说得过去，像这种，我们要出点儿什么事，他们的责任也大，反过来想他也怕，我们那时候只是一面想，就是怕把在学校做的坏事告诉家长，那非挨揍不可！其实老师也多余担心，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只能对我发火，不会为难学校的，很相信学校。要是叫我母亲去就不一样了，她是要挑毛病的。我父亲去肯定只会从我这儿找毛病，要是我母亲，她要挑学校的毛病，你这不好，那不好。所以倒相反，开家长会的时候，只有我母亲去，我父亲不去，他也没功夫去。

当时的游戏也还有很多，比如说，小时候玩儿的骑马打仗，一个人背一个，上面的人是战将，下面的人当马，当时这是很热门的游戏。冬天的时候穿得厚厚的，也不怕摔，所以一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起码有半个钟头以上是玩儿这个骑马打仗，冬天最冷的时候，那也不愿意进屋子，就搞这些活动。还有一种叫撞拐，怎么个撞法，就是单腿着地，一个手抱着腿互相碰撞，一个把另一个撞倒了，站着的就是赢的。从小就训练这个。我发现这个东西很有好处，一个是训练很多自己的灵巧和耐力；另一个是智谋，要战胜别人，就要用些什么办法。还有就是摔跤，那小孩子没有不摔跤的，练摔跤。当时就是搞这些名堂。我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再就是打架，这也是经常发生的，好斗。因为分两拨，一拨输了，总是不高兴的，最后就只有诉诸武力。一般打架就是把人打倒在地，认了输了就算完了，不再打了，要么就是被打哭了，就不再打了，就是没有出什么大事故。

就是说，我成长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丰富多彩的，还有那么一点点儿自由，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自己尽量地充实自己，来享受这一点自由。小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了。那女同学就是跳皮筋儿啦，跳房子了，就是搞这些明堂。

我当时还有几样东西，是带有点赌博性的：比如说弹球。在文化大革命中，烧一些属于破四旧的东西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罐子的玻璃球，都是我当年赢的，很大一罐子。我玩儿这个弹球就从来没输过，弹那种玻璃球，各种玩儿法，我打得很准的，玩儿这个没输过；还有一个就是拍洋画，洋画就是印的那种一张一张的小纸片，印有各种图案的，有脸谱的，《西游记》的故事啊，有《封神演义》啦，还有画的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等等，画的这些人物。煽洋画也好，拍洋画也好，这个我也有一盒子，都是赢来的。买来的不算数，要是赢来的放在家里就是很光荣的。这个是我的专长。平常在家里没有这些东西，就是搞搞集邮了，做做无线电，我那个时候是喜欢搞无线电，最早是搞矿石收音机，后来又搞电子管收音机。那时候我们很原始了，不像现在半导体。后来我们念到初中的时候，好几个月攒几块钱，买一个晶体管，去做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就很高级了。

这些家里不管。我父亲只是看看我的成绩册。因为我念小学功课不差的，我这个小学不知道是怎么念的，反正是不用功的，班上同学都一致公认，但是老师始终把我当成好学生，因为成绩比较优秀。玩儿、闹都有份儿，就是班里最差的

学生跟我是好朋友，是哥们儿，班里最好的学生也跟我在一起，大家都相安无事的。我好像属于中间的联络纽带。班长要是管不了那些不听话孩子的时候，叫我去劝劝他们还是管用的。另外呢，学校里有一个很坏的风气，就是老比。怎么比呢？就是我家老子是部长，你老子是处长，你就得听我的。这是个很坏的风气。

我们家就我一个小孩在育才，我哥哥都比我大得多的多。我是我们家最小的一个，我们兄弟姐妹 5 个，就是老四都比我大 11 岁，所以他们都大得多。我的大哥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他就比我大了整整 18 岁。我们是一个母亲生的，其中有一段我父亲根本没在家，所以中间就空白了，不然我得早点儿出生。

念中学的时候，我都是双百成绩考上去的，就是念初中的时候，本校升本校啊，那是双百成绩升的。到了考高中的时候，大家都愿意考 101 中，101 是育才又分出去一拨人建立的。延安保小到了北京来，一部份大学生就要毕业了，这时候就分来一部分人当教员和干部。所以 101 中就老说，它的前身是延安保小。实际上它是育才分出去的，101 中不是在北京分的，而是到了河北平山就开始分了。101 在北大的隔壁，实际是圆明园最靠外的地方。它占的地方就是圆明园的旧址。所以高中的时候我就去考 101，因为 101 属于全国重点。那时候只有两所学校是全国重点，101 是一所，还有上海的一所。101 是所有学校里收分最高的，比男四中还高。当时我们家已经搬到西城厂桥那边去住了，离男四中很近。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特别后悔，我不应该进那个 101，应该考男四中多好。他们那些大班的学生都说 101 好，我以为就应该上 101 似的，就考 101 了。我是平均 99.5 分考进的去的，也是很好的成绩，我考试的本事很大的。但是进了 101 以后，我的成绩直线下降，在育才那个环境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学得很好，老师教得好不说。我为什么后悔上 101 了呢，因为 101 的教学很死板。它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升学率，就是因为它进去的学生质量好。就是进来的学生都已经是最拔尖的学生了，然后培养了半天，还不能达到 100% 的升学率，就说明你这个学校不怎么地吗！你想 98 分的平均成绩才能够进这个学校，那是多好的学生啊！结果它还不能 100% 地全升大学吗？

101 动不动就讲思想政治，老讲那一套，极左派，老是一套说教。在育才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压力，它给你点儿自由。就像我们烧了劈柴以后，它就让你用劳动来补偿你造成的损失，这样你自己也受教育。101 就是一套传统的说教，枯燥

而无味，有时候你不服气的话他还来压你。所以，我进了 101 以后，处处觉得很别扭。

我可以获得这么好的身体，最后在监狱里呆了那么多年出来也没事儿，这跟学校的培养有关系。在育才的时候因为隔壁就是先农坛体校，所以我从小就被选拔到那儿去了，我进了很多班，从体操班到游泳班，到跳水班，又进入足球班。所以，我游泳、踢足球都是校队的，我为 101 中争夺过北京市高中组足球冠军呢。当时前四名的第二、第三、第四都被我们给刷掉了。当然因为育才这帮子人全都到了 101 去了有关系，就是我们原来先农坛体校六班的学员，一半到了 101，一半到了男四中。特别有趣，最后我们都是自己打自己了。但是 101 由于有它的老底子，它配了一些和我们踢得一样好的人，所以能够配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把别人都战败了，这样，我们还得了冠军。我当时就是属于足球踢得好的。这练了一个好身体，后来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还可以经受得住。

再就是在育才也有这个条件，育才属于宣武区的，有少年之家，少年之家对我们也很重视。我去了以后在那儿就进了无线电班，学了很多有关知识，特别是发射和接收等专业知识。比如搞无线电的收发报，搞无线电遥控，都干过。所以，从德智体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但是一进了 101 中以后，虽然也是军事化，早上起来也排着队操练，下了课吃饭也要排队，也要高唱队列歌曲，但是我只要想稍微自己活动一下，脱离集体一下，马上就说我自由散漫，说教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处处都不好，不对胃口。我觉得很受压抑。

1962 年到 1965 年我是在 101 中度过的。那时候困难时期逐步过去了，但由于我在 101 的时候是足球队的，吃饭享受运动队员的待遇，比一般同学给的饭量要大一些，菜要好一点儿，吃运动员灶，所以都没吃苦头。但是就这样，也免不了要偷偷从铁丝网钻出去，跑到校外的小铺儿去，买点儿能够买得起的东西解解馋，买个肉皮冻儿啊什么的。当时旁边地里种了好些萝卜，我们馋了就跑出去偷萝卜吃，最后又给人家包一毛钱压个纸条搁上，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像这样的事情都干过。反正在 101 我就没有什么好回忆的了，就那么过了。

大学之所以考地质学院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同桌的同学，是地质部一个副部长的孩子。老师上自然课的时候拿出好多矿物标本，他说：“这算

什么标本啊？星期六放学，你跟我一块儿走。”因为我们在五年级以后，可以自己回家了，不需要有家长来接了，这时候就可以先不回家了，想到哪儿玩儿去，先玩儿了再说。他就带着我们到地质部博物馆的仓库，钻进去，那些标本本来就是送陈列的，不陈列时都在仓库里锁着呢，人家送到那儿的都是好标本呀，什么玛瑙、黄玉，什么石榴籽石、黄铁矿、金铁等，就往家里带，书包能装多少装多少，沉得不得了，每回回家弄一大堆。再上课的时候，老师摆一个我也拿一个，反正我那个都比你的好。因为我太猖狂了，摆得太多了，最后我们那个自然老师看我的东西太好了，一下子全给我没收了，他都要了。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老师对我还是不错的。甚至有一次我在学校里玩儿子弹，玩儿炸了，把老师的脸儿都吓白了。不过也就是大操场上点个名，也没给任何处分。一般这要给处分的。当时看了一本书，是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看他怎么拆炸弹。我有好多子弹，子弹头一拔，里头有好多火药，把发射药倒出来，剩下个底火儿。我想这个底火我慢慢抠，大概那个火药也能让我抠下来。上课不好好听讲，反正也会了，就不听他的了，不听了就抠，结果一抠，一入神，不小心，乓！嘭！就爆炸了，整个手全崩黑了，脸也黑了，没受伤。那底火药没多少，就是吓了一跳。我们那个自然老师脸都吓白了：“你，你，你还有没有？”我也没办法，很舍不得的，很不情把我那些从小到大、从小口径的、手枪的，然后是半自动的、冲锋枪的子弹全都拿出来了。还有美国卡宾枪的子弹。都是我姐夫给我弄的，我姐夫在部队里呀。我上课还都带着这些宝贝。这都在课桌里放着呢，就是那天劲头特别大，刚看完《把一切献给党》，脑子里老是想着我也来抠一抠，就这么着给抠响了，没办法。

在学校里就这么一种环境吧，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学和初中是过得最舒服的。到了高中以后就不行了，我觉得不顺利，一天到晚批评我，说我是自由散漫，我是没办法。

我上大学就是因为受那个同学的影响，喜欢玩儿矿物吗。从小就知道，搞地质的可以游山玩水，我是最爱玩儿的一个，想着考地质吧，名山大川都可以玩儿，这样就进了地质学院。这是1965年。在地质学院时，我实际上就是好好念了一年的书。当时也正处在最轻松的时候，要减轻学生负担，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上半截课听课，下半截课我作业都能完成，自习的全部时间我是想干嘛就干嘛，

全玩儿了。

上大学时搞无线电发射，我做一个小电台，让同学在别的宿舍收听我的广播。这个东西很吸引人的，同学们都要来学，于是我又教他们怎么做，每个人都做一个。上课还不敢这么干，因为我的那些东西都挺大的，不像现在搞的半导体，那个时候主要还是电子管。

我那时候用的频率不是规定的频率，我就用了咱们的广播频率，就咱们的中波，用的中波发射的。无线电俱乐部的老师教我们的是用无线电许可的频率，它有一个线圈。后来我嫌那个太复杂了，而且功率小，不容易做大，就把它改了，把圈数一增加，电容一算，算到无线电中波的接收频率，650-1200 这个范围，而且是可调的，我想变动的的话在这个范围是可以变动的，就像调台一样，我想用820 发射，我就用北京台，我周围的人都受干扰。这不是挺好玩儿吗，可以给人捣乱。恨哪个老师的话，比如我们的外语老师，我们都恨他。他老听广播、听新闻。那个老师挺左的，只要他听新闻的时间一到，我就把那个干扰打开，然后用一个再生发生器，专门发出怪叫的声音，他一开机，唉呀！怎么搞的！他以为他的收音机坏了呢。我们也买不到大功率的管子，发射距离都是在几百米以内，公安局也查不着。要是公安局查着了，那罪过还不小呢！所以我们无线电俱乐部的老师说，你千万注意要用无线电允许的频率，你要是用其它频率，被公安局抓住的话，这个罪名还不小呢。就是说我们无线电俱乐部的老师对我也是挺欣赏的，他给我的东西我都可以改成跟他不一样的。

我捣乱的老师最后也不知道是我给他使坏呢。后来干扰了他几次也不干了，烦了，我自个儿也烦了。

当时北京市有一个无线电俱乐部，这个无线电俱乐部主力就是搞测象的。就是哪儿有电台我要把他找出来并收发报，比赛谁发得快，接收、抄、翻译快，最早是这个发家的。后来我们这个无线电俱乐部和航模联合，航模搞飞机我们搞接收，发射设备遥控。就是飞机可以在天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翻跟头、横滚、侧飞、转弯、放八字等等，就是我们给一个什么规定动作，它就上去做什么动作。这个发射范围和频率都是有规定的，都是国家许可的。后来我就把它给改了，而且改成不是那种信号了，改成我可以说话的了，就是电台了。我们那时候不是高三二班吗，我就让他们在那儿大喊大叫：“高三二班广播电台。”让所有的班都听

得到，就是食堂里放广播的时候，他不是放电台里播的那个频率吗，我就对准那个频率，然后大家就叫，他那个也响，我这个也响。各班都能听到高三二班广播电台。

他们不知道是我，没追出来，到最后也没追出来。这些同学们都很保密的。就在我们宿舍里放的：高三二班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最后懒得叫了，就拿一个唱片在那儿放《黄河大合唱》。完了就是一块响。我的发射机的功率是有限的，大家的强度都差不多。就是我发射的强度和它现在天线接受到的电台的强度都差不多，所以喇叭里响的时候，两个声音谁也盖不住谁。另外，我那个机器还比较好，噪音也小，所以听得都挺清楚的。

在高中就搞这些明堂，后来到大学还接着搞。大学因为农村来的学生多，觉得特别的新鲜，都愿意玩儿一玩儿。但是做的人就不多了，不像高中。那时候我觉得特得意，像个老先生一样到处做指导。

一进大学，让我管系里的文体，后来改成军体了。当时挺左的，去了以后抓体育训练，逼着大家都得上操场去跑步。学校里搞长跑比赛，就我们这个勘探系，一年级六个班的学生有4个是长跑前10名，很厉害的，长跑谁都干不过我们。足球也踢上去了，篮球也打得不错。我们勘探系在我任军体部长的时候，还是挺红的。当时我真到教室里去查，谁要是到活动时间不出去的话，都一个个提着轰出去。有的都被我给推哭了。

学校发的歌片里，凡是抒情歌曲一律没收，不往下发，扣住。当时我也搞得挺左的，现在想想挺好笑的。什么时候自己挨了整了，才知道别人挨整的滋味，才发觉自己简直像个暴君。

一入学校就我就管文体。大概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当过班里的文体委员吧。我是北京的，受到重视，这是第一，第二属于有特长吧。在大学的时候先是当学生干部，所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要介入到政治活动中去。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记得我们正在进行普通地质的实习，因为在这个学校里，我属于见世面多的，像老师讲的一些东西我是不用听的。老师说爬山怎么艰苦，这东西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不知道早苦练多少年了，你这点儿小山算什么？逢山过山，逢河过河。那个老师说，宁绕10里，不爬一山。我就宁爬一山不绕那10里，我还比你到得早呢。就这样跟他对着干，老师拿我也没办法。我经常跟老师

辩论，老师讲喷出岩的时候，就是那个岩浆啊，从火山口喷出来以后凝固的过程中，越容易流动的它就越容易形成气孔、孔洞。越不容易流动的，它很快就凝结了，不形成孔洞。我就提出相反的反证来，我说，你这话不对。应该是越流动的，气体一跑，它马上就密合了，它流动啊。我说酸性岩浆那股气一跑的话，它很粘，它根本来不及密合，才留下孔洞来。我就跟他辩论，他也讲不出所以然的道理来，我说你要是真让我信服的话，你就拿标本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基性的多孔洞，还是酸性多孔洞。照我看哪个都多孔洞，因为我看到的都有孔洞。

最后他也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我说，你是想当然。大概是他的老师这么教他的，他也这么教我们。这就启发了我，后来研究矿物的时候，要研究得比别人再深一点儿。我教课的时候，学生要问不倒我才行，要探讨一些机理。一些老师他就是这么学的，那么他也这么教，他也无非就是到前人研究到的那一步。

我后来搞矿物学的时候，之所以能够突破苏联的那个界限，能够预测得更精确，就是因为我研究机理。很多是研究经验，就是大量的测试数据，然后和实践相对照，那么从这些数据总结出一些经验来，那些数据显示的是什麼，可以支持什麼情况。又为什么如此？他们没有能力去探索，特别是我们国内也是，这些老先生们，现代物理学不懂，就是量子这一套东西他不懂。不像我们这些人，喜欢涉猎群书的，越是看不懂的，越新的东西越要沾一沾。我有一个哥哥是搞物理的教授，专门搞这个的，反正我有人问啊。所以我量子物理这方面就掌握得比较好一点。我就顺着我的问题研究下去，一直就把机理研究透了。那么这时候再说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它的机理我都能说得出来。

我到后来就想，在育才的时候就培养了这么一个好争论、好辩论的习惯。当然了，有些老师可能很讨厌，这个学生太刺头了。像我这样当学生也是不太老实的。但有的老师特别喜欢，他就希望能挑起这个气氛，大家进行辩论，活跃气氛，多动动脑子。就包括我说的那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那个老师，和我们的普地老师都一样，都能容忍我这样的学生，所以我那时候运气也挺好的。

地院文革的早期

后来正在实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就下了命令，把我们在周口

店野外实习的师生都调回学校来了。到了学校以后，满墙都是大字报，揭露校党委一些内部的东西。我们看了大字报以后就要产生共鸣了，对我们系里一些干部也就提了意见，这样我们就成了提意见的学生了。我是属于学生干部里的叛逆者，属于参加了提意见那一头的，大部份的学生干部都是保这些领导的，所以就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不怕，讲理吗，所以我们就辩论，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大多是站得住脚的，总是赢。那些人就说他们是代表党的，所以你不能攻击党。我说，你这说不过去，你出了事儿就得认错，错了就不代表党。于是就对着干，互相都学毛选，都会念两段毛主席语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反正就弄得不亦乐乎了。

当时广播里也广播了，什么第一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出来了，当时彭德怀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提出来了。那么各个单位就应该搞自己单位的革命了。当时也就是针对学校的党委提意见，学校有些什么不正常的现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提。那无非都是小问题，什么食堂办得不好啊，什么辅导员不关心学生，一门心思谈恋爱啦，都是这些。这都是小问题，我们能知道点儿啥？当时才进学校一年，根本也了解得不多，至于官场上学校领导干部之间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我们知道得更少了。但是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总愿意出来说说话吗，因为相信真理吗，总愿意辩论辩论。就这样的话，我就提了几条意见，特别是对食堂的意见特别大。结果辅导员就来劝我说，你是班里的干部，小心点儿。当年57年反右的时候，你还在小学没经历过，这将来是要算旧账的。又说你们要小心，当年反右斗争开始就是大鸣大放，最后你看说的人都倒霉了，你也小心点儿。他好心好意劝我，我也不听，我说：“这次和那次不一样，就是要利用这次运动来减少我们的一些弊端嘛，提提意见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管你旧账不旧账的，反正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说。那个时候我挺积极参加运动的。写大字报我也挺积极，属于有理走遍天下，什么都敢说。这样我就被院党委列入不好的学生了。但不怎么厉害，因为我在学校、在班上、威信还是挺高的，我又是年级的头儿，所以虽然提意见，最多上面对我有看法，是不听话的学生，但是并没有把我怎么样。从小学我就得到一条：有理走遍天下。我就认这一条。我说，只要我有理，谁跟我辩论我也不怕。你就是给我打成反革命，我也不怕。

后来地质部就派工作组进到学校里来。工作组进到学校以后，就把矛头对准

了院领导。这时候我又反过来了，我觉得我们那个院长挺好的，我们那个院长高元贵是个极好的人。他是老干部了。这高元贵资格很老，抗日战争在河南，就是中原、华北地区，那都是有名的，搞财经也是很有名的。后来，因为他资格也老，何长工当地矿部的党组书记时，要管他，他也不是那么听话。他是段君毅那个系统的，所以何长工就对他有意见，就派了工作组来整他。

但我觉得工作组整高院长，实在是不应该。这样我就对工作组有意见了。此外，工作组除了整院里的领导以外，还挑动学生斗学生，就是组织一帮听话的学生，去整那些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学生，我又看不过了，又给工作组提上意见了。正好就落到工作组要整的人的范围里头。后来工作组对我越来越反感，最后就打入鱿鱼之列，就是反动学生了。于是我就真正地被抓了鱿鱼了。我属于坏学生了，捣蛋的学生了。这时候就开始什么围攻、辩论都上来了。但是那时候我也不怕他们，自由还是有的，照吃照喝照睡照写大字报，就跟工作组对着干。这样呢，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几起几落了。

我有一个逆反心理，你越整我，我就越不服你，我就跟你对着干。当时我很清楚地记得，管我们的班的那个工作队长，还要查我的档案，还要查我家里的档案。结果查到统战部去，让统战部给骂回来了。他就害怕了，就没动我，查不着啊，他也搞不清楚，就没怎么动。后来我就朝着工作队的队长写大字报了，所以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就把我列入鱿鱼的名单，就是反动学生的名单。这样就正式开始挨整了，组织学生批判我。他也没什么好批判的，就说什么经常回家等等，都是说不上事情，鸡毛蒜皮，要不就说我平常的思想反动，经常提什么不同意见等等。我那个时候是作为反动学生的一个知名人士被提出批判的。

就算是反革命学生。那也是工作队定的，根本不算数的。我根本不信他们的。而且我周围总有一帮人挺相信我，就是说一直跟我站在同一战线，支持我，我也不觉得怎么样，你怎么孤立也孤立不了我。到了后来呢，这工作组的事儿闹大了，我们就串联起来了。就是所有这些被整的各个班的同学都串联起来，先年级串联，年级串联完了系里的串联，最后几个系合并，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叫：东方红，就是地院东方红；院文革，就是工作队支持的那一帮叫斗批改，都有名称的。有一个组织对组织了，当时工作组管的是院文革啊，院文化大革命革命领导小组，和我们东方红就成了对立的两派，开始了争斗，开始了大辩论。

地院东方红成立以后，就公开亮出旗号了。从8月份起，三次进驻地质部，要求工作组做检查，承认他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整了群众，整了学生，给我们平反。说实在的，所以我们之能够成立的起来，能够成气候，最后串联各个院校形成整个的首都三司，这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

在我们还是弱势的时候，肖力就来了。就李讷是呀，江青的女儿。肖力来了就对我们表示支持。当时我们还把江青叫江青阿姨呀，“江阿姨如何如何……。”那个时候还把她当救星呢，她最早带来信息要支持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对，说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这样我们就更硬了。她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闹到中央，中央文革就可以出面了。这样我们在下面就狠干起来了，跟工作队斗不说，还要揪工作队队长，批斗他呀，他就是不给我们平反。在学校里搞了几次有声有色的大辩论，全院性的，就是几千人的大辩论。在辩论会上，我们是大发议论，把他们辩得哑口无言。真理在我们一边，可能几个雄辩家都在我们这边，再加上我们又有后台。几个辩论会之后，支持院文革的人越来越少，大部分的人都加入了东方红，从8月开始吧，到了8月中的时候，我们成了多数了。

李讷就是要我们顶住，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还说：“你们放心，去跟地质部斗，斗到底。直到把黑线的尾巴揪出来了以后，你们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你们放心，中央是支持你们的。”这些话都讲过。当然更常来的还有什么戚本禹啦，什么关峰、王力都来过，都来找过我们。

由于我们几进地质部以后，何长工也做了检查。何长工、旷伏兆，尤其工作队长邹家尤，都被揪出来了，都被批斗了。这样子声威大振，于是在北京市就形成了一个造反派的中心地带。所以能够成为三司最早的发起人。

1966年的8.18，我没有上天安门，小时候每年上俩次，我都已经不希罕去了。而且8.18那次提出最好不要让干部子弟去，而要派工农子弟去似乎省得让人家说。因为干部子弟，就是红卫兵的那件事搞臭了。当时东方红本来就被人骂成一个坏组织，都是坏人组成的吗。但是你要上几个工农子女，那不是挺撑场面的吗，家庭出身也没问题，那都是查五代的。后来我们上去个王大宾，王大宾是农民出身，贫农。（注：王大宾不是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门的。）一是我也不愿意去，二是有这个说法。此外，当时说东方红头儿最好不要干部子弟。所以朱成昭后来

一直是在二线，没有在一线。

朱成昭也是干部子弟，他父亲是上海建工局的局长。

当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正在受压呢，他力量不够了，跑到我这儿来搬救兵。我说，给你派两个战斗队！支持你！这都是我干的事儿。1966年的8月底9月初的时候，蒯大富派人来找我，他自己也来。当时我们地院东方红学生领袖叫朱成昭，他是地质东方红的创始人，当时他是司令啦，副司令就是蒋良朴，他们都是高年级的学生，朱成昭是水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蒋良朴是我们勘探系的五年级的学生。核心组成员还有王大宾，我当时什么也不是，但我是属于总部的，我是东方红总部的人吧。算是高参也可以。反正最后定罪名我是叶朱反革命集团的黑高参。我很奇怪，我在那里头什么正式职务都没有担任过，我只是作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儿出事儿了，我就代表东方红总部出面去处理。

当时并没给我一个明确的职务，我就是个总部的人，大家都认识我，去了就听就行了。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在东方红里什么职务都没有任。但是几进地质部的时候，我是驻地质部联络站的站长，这是真的。我带了一个特殊战斗队，都是各个年级派出来的最得力的干将，能说善辩，能写会唱的。

这都是挑出来的。就是说，这么一段时间，参加了无数场的辩论，也组织了很多很多的行动。谁能干谁不能干，我都是知道的。各个战斗队的队长不能调走，调走的话，肯定这个战斗队就要瘫痪。战斗队长你不要挑，但是副队长，以及骨干这是可以挑的，哪些方面谁最强，都可以任我挑，我就挑了十几个精明强干的人，有能写的，有能说的，有能辩的。男的也有，女的也有。那一辩论的话，对方女的来了，你就得女的上阵，对不对？不然的话，他讹你个啥，你没办法。

那个时候！好像一天24小时都在那儿干活呢！我就在地质部联络站驻守了很长时间。文化革命回到学校以后就再也没上过课。整天就辩论。就在学校里，天天就是看大字报，写大字报、辩论、揭发等，搞这些明堂了。

在地质部联络站主要是了解动态，搜集全北京市的动态。还要进行广播，要对地质部进行政治攻势。买了放大器和喇叭，把它架设起来，我架设的喇叭功率又大，还不回声不带叫声的，这些招儿全使上了，要用最小的功率获得最大的效果，以前学的全都用上了。机器坏了我也会修理。所以那时候我除了要指挥，还要拿个电烙铁焊一焊呢。那个放大器都不知道用过少年了，都是二、三十年的老

货了，我焊吧焊吧给篡好了。

人一旦投入了，就根本不管那一套，那夏天多热啊，光着个脊梁，还拿着300瓦的烙铁，就那么焊，满身大汗。旁边的人就都服了，没法儿不服呀，人家不会我会呀。

有时还得把那些部长们叫来，教育一顿，谈一谈话。我在那儿唯一的好处就是从来没有打过人，不搞武斗，我是最反对武斗的。批斗的时候我是有心想帮那几个老干部解脱，开始批斗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应该批一批，他们整人整得太狠了。批到后来我又觉得他们也太冤枉了，挺可怜的。我有时候给他们送个凳子啊，让他们坐一坐呀，可你又不敢做得太过分了，做得过分了群众不饶你啊。所以就不着痕迹地想办法帮他们一把，有时候帮他们说两句话：“今天态度还好啊。”就算了，要不然怎么办？当时也就是想帮帮那些老干部。这里面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脱不开的。因为我参加东方红，我是造反派，而我的父亲呢，又和何长工是老朋友，而我的斗争对象就是何长工。我父亲马上打个电话给何长工：“何部长，我儿子参加的这个东方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啊？”结果何部长说：“喔，革命小将。”说得还挺好的。所以我想这怎么办呢？你说真是！我是很想帮他们的，我实在就是一种很复杂的心理。

我当时想帮他们，他们当然能领悟得到了，那还能领悟不到？你做了一点点，都能领悟得到的。在那种环境下，只要对他一点好，他总感悟得到的。就包括有一个原来广东省的副省长，暨南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挨整，我是以造反派的司令，北京派去的视察大员的身份去的，我说要提审谁谁谁，就专门去看他。我到了暨南大学，说我要提审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我就说这是机密问题，你们全部回避。外面老远围着一圈岗，不准人进来。我就悄悄地说，我是谁谁谁，我爸爸让我来看你。后来他解放以后，专门跑到北京来找我。逢人就讲，我那时候去看他，是在他最惨的时候。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这是一场群众运动，这是中央发起的，是毛主席发起的运动。毛主席发起这个运动是为了反修防修，因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中国不能再出现修正主义了，所以需要搞这场运动。我呢，就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就是对一些不好的现象要抨击，要批判。当时横扫牛鬼蛇神的时候，什么对于地富反坏右啊进行清理啊，对他们进行批判等我都是赞同的。我不赞同的就是，随便打

砸抢、抄家、打人，这不对。我认为无非就是做得过头了，因为从小就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不知道学了多少遍了，对于群众运动中的过激行动应该可以谅解。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应该是正确引导的。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思想，所以当时还是积极拥护中央文革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他让我去整什么周恩来啊，整陈毅这些人的时候，我才反戈一击的。我才和他们站到了对立面。那个时候我还是支持他们的。

我可以这么讲，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个运动搞得差不多了，不应该再这么搞下去了。再这么搞就过头了，觉得开始变得危险了。这个时候只是潜意识的，但是我没有觉得中央文革有错儿。我认为毛主席搞这个运动，中央文革发动群众，有些过激行为是可以允许的，只要正确引导，不要再发展下去就是了。那时候认为上面的意见还是对的，只不过底下的发展过激了，发展得有些过头儿了。所以我自己在对这些所谓部长们进行训话的时候，

所谓的部党组开会我去参加，听他们自我检查的时候，我就存在一种心理，希望他们快点儿过关，认错就算了，这就可以早点儿结束了。何必这样子呢？搞得生产都停顿了。我在地质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不能让生产停顿了，还要处理一些日常的事情。部长们处理了之后，我代他下决定。所以呢，那一段，我在地质部联络站一直坚持搞到11月。从8月下旬一直到坚持到11月份。然后搞得地质部联络站建成非常稳固的一个团体以后，我就走了，就撤走了。

这时候，好多人都已经串联回来了，一些人就都跑到地质部来。我心想，有人在这儿干活了，我何必还赖在这儿呢，你们都串联了，我也该串联了。但是我这个串联还是按照毛主席那种串联，就是了解访问贫下中农啊，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想做社会调查。再加上我那帮最早的地质部联络站的那帮最精干的人，因为我的关系都没有串联，都没有出去过，希望我跟着他们一起走。那时候我很左呢，为此我还请我父亲为他们做了一个革命传统的教育报告，讲了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后来的红军长征等等一些事情，希望大家出去做社会调查。挺正统的。然后到11月的10号左右吧，我们就悄悄地走了。因为我要走的话，朱成昭是不会放我走的。我就带着这个长征小分队离开了北京，真正地步行串联。背上背包，每天走几十里，上百里地。最长的一次是140里，就是搞行军啊。从邯郸一直走到安阳。

开始的路线是由北京一直向南走，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当时一路走就一路了解什么地方可以考察一下。我们出了北京就走到了白沟儿那个地方，打听到有白洋淀就在附近，就去了白洋淀，去看看当年的小兵张嘎，真人。访问访问他，看看当年打日本的台岗，白洋淀水乡怎么作战的环境，坐着船在里面荡一荡，完了开两枪，“咚！咚！”接着往前走，走到（任丘）一带就帮着老乡摘棉花，干活，一路走一路宣传。当时叶剑英一个讲话，说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说什么能活到一百几十岁。叶剑英的一个讲话，有一个传单，就给老乡去念。老乡都挺郑重其事地听呢，北京来的红卫兵吗。

现在想起来像神经病一样。然后还一路走一路刻钢板，那时候油印机一路上都背着呢。一路总散传单啊，报告北京的消息了，老是宣传，真是的。我们那儿又有笔杆子，又有能说会道的，给人表演一通儿。就像小兵张嘎一样，叫一帮小孩当听众，再弄两个老乡围一圈，然后就大表演一通儿。我们一共 13 个人。

走到邢台，正好地震过后，人家要建设家园，我们帮人家打土坯、烧砖窑，帮老乡干这些活儿，跟人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可领教到了，这个地方吃那个叫红薯面儿加高粱面儿，棒子面儿是最好的粮食，都吃不着的。就是红薯面加高粱做成那个紫不啦叽的窝窝头，很难下咽的。吃淹的那种咸菜，咸得不得了，给你一点点儿，就等于吃点儿盐粒儿似的。这也不错，我觉得这是体验了一点儿生活。当地的盐碱地也见识了。老乡吃的盐怎么来的？就是把地皮刮起来，用水泡，泡完了一过滤，把这个水一煮，出来就是盐了。老乡吃的盐就是用这个方法弄出来的，盐含很多的碱，有一股苦涩味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中国确实很贫穷，还有这么多农民生活水平这么低下。我觉得我够福气的，觉得责任感特强，觉得这个国家真得好好地建设。

之后我们就一直走下去，比如路过邯郸的烈士陵园，华北最大的烈士陵园，看了“4.8 烈士”纪念塔。“4.8”是飞机失事，叶挺、王若飞这些人都摔死了。叶挺跟我们家有特殊关系，所以我就专门去拜祭一拜，到那儿看看左权将军墓。还请陵园的负责同志给大家讲一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地的一些革命活动，对我们这个小分队进行一番教育。这都是我去组织的，很正统的。到了汤阴，想看看岳飞的家乡，岳飞的庙，这是民族英雄啊，得去拜祭一番，结果给封了，不让进去，这玩意儿！真扫兴啊。第二天，走！就直奔新乡。到了新乡以后又奔郑

州。到了郑州不放心学校，就打了个长途回去，朱成昭接的电话，说：“你跑到哪儿去了？”我说：“我们这个小分队，一个劲儿要拉我走，结果我也来不及告诉你。我现在在郑州”。他说：“你小子快给我回来！我都急死了！你这家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这么多事堆在这儿，你给我赶快回来！”我没办法了，只好跟他们打个招呼：“得，得，得，我先回去了。”责任感还挺强，一召唤，就弄了个串联票，赶紧赶回北京。我也没走下去了，就从北京走到郑州，就走了这么一段儿。

形势在变化，我们思想也在变化

1966年8、9月后关峰、戚本禹频繁地到我们学校来布置任务，要我们支持某某学校：比如揪农口的陈半云，要搞倒谭震林；财经口的从什么张劲夫搞到李先念；工交口的从地质部何长工一直揪到薄一波。开始搞到部这一级的时候是在8月9月，我们还是支持的，支持人家各个地方的造反派。到了10月份，揪到副总理这一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反感了，就开始有点儿醒悟了。因为有时候做得没道理，做得过头了。一点儿小事情，让你搞一场运动，去开大会批斗。有的人犯了一点儿错误，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批评批评就完了，检讨检讨就算了，非要开批斗大会，非要把他揪出来！所以到了正部级干部时，我们就反感了。不知道要干什么？！没功劳有苦劳呀，那都是老革命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可能跟朱成昭是还有些区别的。我毕竟是在这样一级干部家庭里长大的，至少对这样一批老干部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真整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要反过来想一想 批判何长工派工作队，那我出出气也就算了。你要真去把他打倒，我又觉得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人家是红军井冈山时候的老干部，好家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何长工也没有多大的屁事，就是爱跳跳舞。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也拿出来批拿出来斗？！

我父亲是1967年抓起来的，之前他还上天安门呢！就是主席接见的时候，还跟着上天安门呢。在单位里还主持工作。

串联回到北京，朱成昭就问我：“对这个运动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些老干部检讨得也差不多了，反动路线也肃清得差不多了，不该再这么没完没了地搞下去了：“再这样搞就过头了。这些老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们都是在杀场中打过来的，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有过错的话，也可以将功抵过了。在这个运动中已经接受了教训，应该过去了。应该放过他们，不应该再这样抓住不放了。”这是其一。其二，我回到北京就听说了抓联动的事情：

联动实际上都是些中学生组织，主要是初中和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搞了一个联合行动指挥部。都是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中的骨干成员，红卫兵东城有东城纠察队，西城有西城纠察队，这些纠察队们就联合成立了联动。开始江青让红卫兵他们破四旧，干些抄家什么的，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抄了，把他们一些陈旧东西砸烂了，把他们一些反动的东西抄出来，公之于众。就这样，这些红卫兵小将听了江青的话去抄家的，同时对这些地富反坏右进行了人身攻击，也就是肉体的攻击了，即打呀骂呀，甚至打死，搞逼供啊，有的让他交钱，把金子藏在哪儿了？不说，不说就打。打死人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后来联动就因此而臭名远扬了。

本来联动是由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破四旧的，但是在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以后，就对中央文革不满了，反过来就对中央文革有意见了，这时候就不听他们的话了。不听他们的话，中央文革就发动造反派的群众来整联动了，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这样联动就惨啦，受到各个组织的围攻，有的甚至全部给逼得没地方退了，藏到地下室里边，唱着国际歌，外面还点火，拿烟熏，往里面灌水……，石油附中搞过，八一学校也干过，当时在石油附中地下室，听说水都灌到脖子了。

我那个时候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没有去。我正在管宣传。这个事情我要见到就阻止了，我当时权力大得很。

本来联动在破四旧的时候是先锋啊，是江青支持他们出来搞的啊。当然打砸抢也是由他们搞起来的，搞过头了。但是后来又宣布他们为反动组织，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那就是把他们逼到地下室里，不投降就灭亡啊。我觉得对他们的做法过份了，我说，这些子弟们不管怎么样，他们出来参加运动，都是你这个发起者支持的，他们是响应你们号召的。即便有错儿的话，你就批他的错儿就行了，有罪行的话，真正杀人偿命，有法律啊，可以把他关起来审查。审查到了，有什么罪定什么罪。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凡属于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你就都给人家往死里逼。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

我当时就发了一大通儿牢骚。朱成昭就说了：“现在很有必要，大家都应该痛快地发表意见，咱们这些总部的领导都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我准备汇总一下，跟中央文革谈一次。”就是说，对于运动是不是应该改弦更张了？不要这么下去了。

后来我就回到学校了。回到学校以后，我开始扮演什么角色呢？代表北京地质东方红参加大联合会议。就是北京市当时已经成立了三司，还有二司、一司。这几个司令部都要串联起来，搞整个的大联合。我去参加会议，我的任务很明确：聂元梓是野心家，不能让她上台。宁可我们不上台，也不能让她上台。就是说，阻止聂元梓上台。所以，我在那里面也是绞空心思，专门宣扬聂元梓搞了些什么坏事。所以最后选举的时候，几次都不成功。这个会不知道开了多久，一次又一次地拖下去，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总也达不成协议。就是北京市大专院校造反派的大联合总也搞不成。

这也是中央文革非要将一二三司给统一起来，内定是聂元梓要上台当头。就是这么一个背景。这个事儿之所以后来谈成了，北京市设立了那五大学生领袖，是因为后来我进监狱了。我要不进监狱，他们也搞不成这个事儿。最后把我抓起来了，我没办法了。

开会是利用一机床厂的一个礼堂，一个会议室，经常变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学校，有的时候在那个学校，几次主要的会议聂元梓都来。当时我们三司的力量是最大的，我一串联，什么建工学院，什么轻工业学院，那些头儿都跟我熟得不得了，我只要打一个招呼，大家就一起骂她，都揭发她。所以跟北大的斗争也是，我后来到了广州也是一直在斗下去，我都不愿意再斗了，她还在斗呢，就是北大的。我在广州，总理来的时候，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北大的还在攻击我呢！完了总理就说：“地质东方红的这个人还是胸怀宽阔，根本不予计较。”其实我底下早都把他们骂够了。我是利用影响吗，我们就是搞串联呀，我人数比你多呀，对吧。你找谁调查去，最后我们得票也是多数。

我回来后的1966年11月-1967年1月，我一直在搞这个事情。同时还处理一些学校的特殊事情。比如当时在西南要把彭德怀抓回北京。中央文革都发了令了，于是我和朱成昭商量，我说：“彭德怀的万言书其实有许多地方是不错的，是对的呀。结果谁也不敢说这个事儿，老毛一巴掌把人家往死里打，他挺冤枉的。

咱们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别让他掉到中央文革手里。哪怕交给总理也好，当时还以为总理还可以保他呢。于是呢，我们就设了一个计，明着执行中央文革的抓彭德怀，暗地设法保护老头。

那是1966年的12月份，或者是1967年的1月份，我记不大清楚了。

到了成都去抓彭德怀的时候，先是派的王大来（注：原文是王大宾，后同）去的。王大来去了以后就跟彭德怀谈话，与彭德怀交谈之后，王大来也觉得彭德怀说得挺有道理，而且彭德怀对红卫兵非常理解，就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不错吗！完了就回来汇报。可是王大来不知道情况，中央文革是要把彭往死里整的。所以就说，抓是一定要抓，但是抓了以后怎么保他一下？我们只能不得以求其次了。当时就设了一条计。于是派胡乐成带了一帮人，第二次去抓彭德怀。就真把他从那儿弄出来了，弄上火车。但是在石家庄把他截下来。我呢，从地质部调旷伏兆、何长工的小轿车，开到石家庄，让他从火车上提前下车，然后用小汽车快速地开回北京，送到我们学校再说。（编者注：抓彭德怀一段与王大宾等回忆有较大差别，彭德怀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下的火车？其它细节也多有差别，读者可参阅王大宾回忆录和本书的“抓彭德怀专题”比较分析。）这样北京站这边，卫戍区不是受了中央文革的命令，在这边等着呢吗，没想到我们玩儿了这一招儿，把他半路上偷下来，偷运下来直接小汽车开往北京，送到学校里来了。

然后我们把他先扣起来，说不见总理的条子不放人！军分区马上知道消息了，就来要人。我说：“不见总理的条子不放人。”

这样的话，总理就派人打电话来，让我们交人。那没办法了，只好交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只有总理派人来，我们才放，总理不派人来了，我们不放不行，没想到根本把持不住了，很快就转到中央文革手里，拉到北航批斗去了，不在我们这儿了。

当时周恩来应该说是没办法的事，也是迫于中央文革的压力。

彭德怀在我们学校没呆多长时间，一共三天。我在学校呆的时间很少，基本上住在地质部，我那时候还在地质部联络站，处理那边的事儿呢。好多部里的日常工作我还得请示呢。

我们给他一个单独的比较好的房间，让他住在里边，吃饭尽量给他好的。这个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倾向性，本来就觉得同情他。后来都成

罪状了。这段时间一共三天。

整个这个事情都是我和朱成昭策划的，我是参与者之一。我主要是调配汽车呀。到学校以后又有别人管了。我只是石家庄到北京这一段。

这个点子是朱成昭出的。朱成昭提出这样做行不行？当然跟我讨论过可行性，我说，一定行，他们一般都是命令式的，在那儿接就是在那儿接，在那儿上就在那儿上。如果我们来一个突然袭击，一定成功。结果就成了。

实际上当时中央文革也只是派我们去抓，上车以后就交给卫戍区的人了。但是我们这边呢，冲进去，把卫戍区的人调开并缠住他们，把人给弄下来。几十个人，你想想，我两个人对付一个当兵的还不容易啊，连辩论带推带搽带阻挡，都让你过来，把你憋到一个地方，其实他们都在另一个车厢，而彭德怀是单独一个车厢，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人在他身旁。我们把这两个人一调开，车厢里也有我们的人。另外护送的时候也有我们的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了，调开以后我们的人上去，把他一弄，弄过来。后来就把彭德怀弄到地院了。

放到地院以后，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我们就和他去聊天了，我们都很喜欢彭德怀。因为我对彭德怀还是有印象的，我在中学念书不是在101中吗，当时彭德怀被整了以后，就软禁在我们隔壁，就在挂甲屯，一墙之隔。我经常钻铁丝网偷萝卜时——那是我们的秘密通道——出去到小铺路上，往往可以碰到彭德怀出来散步，有警卫跟着。所以我觉得他这人挺好的，给我印象挺好的。我那时候也很尊重他，这是一个沙场老将啊，身经百战呐。所以我心里一直就对他有好感，弄到他了，就喜欢跟他聊聊天，听听他说一些话。他呢，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愿意说话，可能怕说多了，而且他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我也不好跟他说太多，就是泛泛地见见，想跟他聊聊天，也没聊出个什么来，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事儿。本来我是想跟他探讨探讨，跟他聊聊他的万言书的。本来就喜欢动脑子吧，这正是缘头。

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地质部，主要搞外面的事情，大联合的事情。在这个期间我就开始越来越觉得，中央文革搞过头了。当时中央文革给我们下达指示，要我们动手去搞周恩来、陈毅。于是我们就开始彻底地明白了，恍然大悟，原来你们这帮人是弄这个，把一些元老搞下去，这不就是朱元璋那一套了吗。国家建立起来，就把功臣全宰了，所以就开始跟中央文革对立了。

当时刚好，中央内部也在斗争。像叶剑英、谭震林这些人跟中央文革在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叶帅把手指头都拍断了。这之前，就是我回北京那段时间，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她在戏曲学院，五年级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在文艺界，他们是少数派，受到压制，也找人来求援。我便派战斗队去支持他们，后来他们去抄彭、罗、陆、扬的家，我们也出了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讲，始终是个污点。就是我们学校不应该派人去参加那个活动，文艺界搞，你们文艺界去搞好了，至于你叶向真的战斗队在文艺界受压，我们去帮帮忙还是可以的，但是搞彭、罗、陆、扬，我感觉是不应该的。而那一段时间刚好我不在位，就是我出去了一段儿，所以没有碰上这事儿。我不是出去串联去了吗，还有几次我在北京，但是我处理别的事情，我没有参与。

另外，当时有好多联动被抓，我们学校有一个叫陈广志的，是我校的一个同学，他负责公安部系统的事情。总理派于桑，上面主管是廖承志，廖承志、于桑和我们这个同学陈广志来负责处理有关民委的事情，还有就是联动的事情。当时我们这个陈广志权力很大的，说放谁就可以放谁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这些被抓的联动，你只要看他没有现行的事情，能放的尽量都放，所以他放了好大一批人。包括一些冲公安部被抓进去的也都给放了。这头抓，那头放，赶快让他们回去。

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在1月初的时候就召开会议了，叶向真也在场：叶向真、王大宾、朱成昭、蒋良朴还有我和杜金山，这都是核心人物，我家里开会。我家的地盘大，秘密会议，对当前形势提出了几点看法，我们都纷纷提了意见。我提了几条，一个是认为运动搞过头了，运动扩大化了。我说这个群众运动好像不太像群众运动了。结果他们说：“是不是运动群众啊？”我说：“对，对，这个词用的很恰当。”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比如江青在粮食系统讲了一个话，到处印发，其它的地方都照着去做。农业口点了那个部长，比如陈万年的什么不好，于是农业口的人就攻他，别的口的人也跑去攻他。这玩儿意，你了解情况吗？你根本不了解情况，你听了点儿就胡说八道。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群众运动，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朱成昭就说：“是不是运动群众啊？”我说：“是，是。”于是就定了一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

那时候是秘密的。因为在我们没有商量好之前，如果这个东西透露出去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者说我们就要倒霉。其实在这之前，大家对中

央文革都有看法。但是前面反中央文革的人，像李红山呀这些人被抓起来了。所以我们都是发过誓的，说：“你怕不怕坐牢？”“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当然对我们来说，没这第三条了，前两条得有啊，都是发了誓的。才可以进入这个圈子来讨论这个问题。不怕坐牢才能进去开这种会呢。所以大家都是铁了心的，要跟中央文革干到底的。

讨论了以后，归纳起来有八大条：第一，是群众运动问题；第二，是首长讲话不应该乱发。这些讲话都是有针对性的，只能适用于某一段，某一个部份，乱用的话要出问题的；第三个，是对老干部问题。这些人都是功勋卓越的、久经沙场的战将，为我们新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有这种或者那种错误的话，进行批判都就可以了，不要把人往死里整呀。接着就难听了，说有的人是不是别有用啊，把他们整倒了自己好上去啊？这就涉及到中央文革那帮野心家了。还有对联动问题；第四条，往死里整人家。还有那个就是彭德怀问题。还有什么呀？一共八条。这八条观点后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了，批斗朱成昭，让朱成昭做检查，朱成昭干脆就把这八大观点给念出来了。他一整理啊，就更厉害了。因为我们都是个人的，你发表一条，他发表一条。他一归纳就非常系统、非常全面，而且是论据非常的确凿。可惜那份大字报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底稿或记录，要是找到了，那才精彩呢！

当时我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民主党派，所以还没有整到他。他是知道我们的观点的。我父亲是支持我们。就是当时我们要开会，要到家里开会。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们同学要到这儿聚一聚，要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我父亲就说：“你们要当心一点儿，不要做太过激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我就跟他提出来，我们有一个同学，住在医院里，需要用你的车去接一下。当时我们住地下室，王大宾住的时间长一点儿受到放射性的影响，身体弱一点儿，有点儿半瘫痪，所以他在北医三院治疗呢。要把他接来，用用车。我说叶向真会开车，要让她去接一下行不行？他说：“那我就睁一只闭一只眼吧，只要你能开得去再开回来，别出事就行。”车其实已经封了，司机把点火的那个分线器都拆了，叶向真找了个司机来，给接上，车里还有油就开出去了。后来我们为了学车，就把那车猛开呀。大家都开一开，过过瘾。这时他是支持我们的。

我们的看法都对我父亲谈过，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了就对我们讲：你们就是

有意见，向中央文革提意见也要缓和一点儿，别做得太过激。他说：“你们不懂。”我们说：“我们不怕坐牢”，他说：“唉，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不懂得这个厉害。”就说了这个话。后来就在我们家开会，议论完了，八大观点出台，他们都撤走了，我父亲又交待给我，说：“你看，你们这是胡说八道，这要是让人听去了，一汇报，就是很大的罪状。你们没做过地下工作，你们不懂，哪有像你们这么搞的？”

我们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我觉得有理走遍天下，老是那句话，跟谁辩论我都不怕。另外，那时候还对周恩来很担心，对老毛还有一定的信任感，总觉得是中央文革欺骗党中央。当时已经冲过统战部了，一冲他就知道完了，已经坐卧不安了，后来单位里也经常叫去批判批判。以后又被批斗几次，那时候忧心重重呀，那也没办法，完了就跟我交待，就是说：“小心。”但是我们不听啊，那时候他讲的话后来都应验了，那没办法，当时就不认为如此，你有什么办法呀，跟对牛弹琴一样，我们不听呀。

到了1967年的5月份以后我们第二次开会（编者注：时间有误，根据其它人回忆资料核对应当在2月下旬，这一段回忆内容与时间关系没有缕清，与王大宾等回忆有差异）是中央文革公开亮出来对着干呢？写大字报呢？还是请中央文革派人我们先内部交流？如果中央文革可以让步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了。当时我就主张，没有什么好谈的，谈了反而挨整，还不如干脆就亮出来，反正也是挨整。由于我们有这些观点，我这个人又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就到处散布。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我回到学校，我们班同学把我围住了，问我当前形势如何，于是我就把我们座谈的一些内容讲了一番。我刚到外面处理事情三个钟头不到，因为天黑我回不了家，回到宿舍，在我自己的床上睡了。睡觉的时候，门缝儿里塞进一份东西，我一看，是一个战斗队写的小报，很厚一沓子。我一看，全篇都是我的“反动”言论，署名是丛中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学校二团干的。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就是说中央文革对我们学校早有控制，鼓励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是他们，一旦我们造反有功劳了，掌握了大权以后，如果你不听他的控制，他就要继续派一些谍报人员。他的谍报是谁呢，就是我们内部的反对派。就是说大家都是造反派，对工作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以后的问题毕竟会有分歧的，我们最早造反出来的老东方红里，有一些和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者，这些不一致的人就组织了个二团，第二团体。这个二团也正是中央文革

在同时指使的，就是要他们在暗地里搜罗我们的言论行动和一些活动的情况。他们不断地攻击我们。我们一放出什么“反动”言论，就给我们揭露出来进行批判。在群众中败坏我们。这是中央文革老早就下的一步棋，也就是说，在支持我们的同时，也同时支持我们内部的反对派。

看来中央文革的情报系统还是很灵活的！反馈也很快。

当时这些学生谁不听中央文革的？！都代表毛主席！学生懂什么？中央文革来找他的话，他觉得给了他好大的面子，那他可高兴了。喔！都过问到我这儿啦，赶快提供点儿什么，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们又肯听话。哪儿像我们这些人啊，不管怎么样，本来对江青印象就不好，家里谁都知道她那点儿老底，她那点儿丑事儿。所以我们这些家庭的人说起话来，都很不尊敬她。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知道得太多了。后来能够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因为知道得太多了。党内的某些事我们也都知道，家里的家长都知道。互相之间的同学串联，什么都知道。像叶向真她也是，叶帅那儿的消息情报多多啊。

那时候我没有怕的感觉，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想有理就不怕，走遍天下都不怕。早晚我会胜利的。就是我坐在牢里，我还是这么觉得。这是从小训练的，这个教育就是这样，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有理，我认为我没有错，所以给我的结论很坏，老是态度恶劣、顽固、拒不认罪。没办法，走到哪儿都是这样，一直背时到出来。学习班出来还是这一套。

后来，王大宾害怕了。王大宾说：“我们最好还是先接触一下中央文革，，希望他们派代表来洽谈一回。”于是，就打了报告，给中央文革提出要求，要派个代表来听我们的汇报。

当时就派了闫长贵。我们在地质部联络站的时候，他跑到地质部来，在会议室听了我们这几个人对他发表了一通我们的观点。这时候八大观点公开亮相就在这儿，让中央文革知道这些。

结果闫长贵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表态就是说我们是一派胡言，纯属是反动言论。就把我们惹恼了。惹恼了之后，我们说既然是这样，还不如公开论战呢！咱们就写大字报吧，这个时候呢，王大宾害怕了，就跑到中央文革去告状去了。中央文革来个先发制人，就宣布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成立，由地质东方红自己内部把朱成昭揪出来批斗。那他们的指令一下来，东方红战士们都感到很突然，

一听广播里头说召集全体东方红战士大会，哇！这边就私下里派了一帮人，主要是二团的人，把朱成昭从地质部给抓回去，弄到学校里批斗去了。

在批斗会上就让朱成昭做公开的检查，朱成昭这时候就干脆把八大观点给亮出来了。他所谓的检查就是说，把我们的想法，就是八大观点在学生中散布出来了。然后还有有心人全记录了以后，把它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了。没听到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个大字报在外面贴的时间不长，大概就被撕掉了。但是据说观众已经成千上万了，特别是外地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手里是否还存有这个，因为当时搞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是谁搞出来。

丛中笑的小报给我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意识到什么，是后来才知道的，是中央文革指使的，后来一想就全通了。在这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中央文革的人为什么命令他们的人去抓朱成昭啊？他要找的人不是二团的还不肯干呢，谁理你呀！他们先发制人，让另外的人去抓。

等于王大宾把我们这伙人给出卖了！王大宾出买了我们，他就进入学生领袖了。本来他只是核心组成员，是我们的部下，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闹起来了。于是，我们在朱成昭被批判以后，就纷纷下马，在东方红里的职务都撤职了，一律下台。我这个地质部联络站的站长也没有了。

当时批斗的气氛是这样的，大家莫名奇妙地就听，安安静静地听朱成昭讲完，回来很多人见到我都说：“讲得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当然也有人说：“唉呀，胆子真大，真是不怕坐牢。看样子朱成昭过不了多久就得被抓起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当然骂的也有。

当时大礼堂里挤满了人，包括教职员工全都参加了，大概有两、三千人。外面也是人。当时没有抓着我呀，但是开会的时候我得去听一听，我就在旁边听着。朱成昭被他们抓起来了，还没来得及抓我们，蒋良朴也没被抓。当时二团的人数有限，他们的人很少，所以大概没发现我们，要是发现了我们，也得把我们弄起来，陪斗去。当时反正是没搞到我们头上。

就这样子，我们的人就都被轰下了台。

中央文革在朱成昭检查完了就宣布：朱成昭闭门思过。不准见任何人。但是我还是比较自由的，我属于闭门思过，就是精神上要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论，但是自由没有受到限制。所以，我还可以自由地去看朱成昭。这样我在他闭门思过期

间，成了他的对外联络人了。好多中学生听了这个以后特别高兴，特别是联动的，最早的那个中学红卫兵都跑来找我，包括什么宫小吉呀，彭晓蒙等等。因为宫小吉跟我还有一层关系，他哥哥跟我是 101 的同学，所以宫小吉把我叫到他家去，然后再听一遍我们的八大观点。

虽然我下台了，但是老东方红战士要为我办点儿什么事，对我还是挺好的。各个战斗队长说什么话也还是听的。所以，我说的那个陈广志放联动，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他对联动还是挺客气的，把没有现行的，能放的都放了。这是 1967 年的“二月逆流”时，也就是 1967 年的 1 月份，2 月份。

这样我们下台是下台了，但是就是由公开转入地下了，而对中央文革的敌对情绪也更加严重了。后来听说中央文革又要组织进一步的批判，要肃清我们余毒。大概要涉及到我了，我就在 2 月份的时候，找了一个差事：调查一下“湘江风雷”的事情。湖南有个“湘江风雷”，闹得挺厉害的，武斗了。我就找了个借口，要了几张火车票，到湖南调查去了。

广州之行，朱成昭被抓

我们一共拿了八张票，都是一个车次，都是 15 次。我本来不是去调查“湘江风雷”的吗，“湘江风雷”有什么好调查的，我都下台了，我管个屁用啊！我去他的吧，咱们玩儿去吧，到广州去玩儿去吧。那几个人也左劝右劝的，说咱们到广州玩儿去吧，这个机会多好，走得越远越好。把我说动我了，那我是头啊，那我说好，那去广州玩儿去吧。

一到广州以后还有联络站，我去了以后还以为是总部的大员来了，这是钦差大臣，这隆重接待呀，赶快腾房子，还专门给我弄了个办公室，吃的住的都安排好了。跟我一块去的，他们单独给安排。广州联络站站长就把那个位子让给我了，这样我在那个联络站就住下来了。

后来我给朱成昭打了个电话，我说湘江风雷我不调查了，我到广州了，现在我在联络站当站长呢。他说：“那好！那太好了！我正要在广州建立根据地。你在那儿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要了解一下形势，当地的情况了解了解，告诉我这些。最主要的你办报纸卖钱，咱们攒点儿钱，到时候我在北京呆不住了，咱们出来游山玩水也有点儿花头儿。”

我们在北京发行的东方红报，有航空版，把这个航空版用飞机运到广州，然后我就可以到广州的报社去印，就可以发行了，一发行就卖钱了。哪怕两分钱一份也赚。我可以利用这个职权。当时地质东方红在广州可有权威啦！广东造反派都是地质东方红支持的，包括《南方日报》，好多都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于是纸呀什么都先不要钱的，都先给你，完了，你出了报纸，卖了报纸你把纸钱、印刷费付了就完了。赚了钱都是你的。那成本费是很低的。卖了没几天报纸，大概有一个月，就有不少的钱。因为发行份特多，还都卖得完。在那里那些推销员都不用花钱的，都是中学生。广州的中学生到处给你去散发，卖得快极了。一印就上万啊，好几万份，很快就给你销光。一个礼拜来那么两个航空版，你想想，我卖多少报纸！就算一份报纸一分钱，卖一次就得好几百。所以我们一下弄了好几千块钱。没多少时间，这些推销员不要钱，还特别高兴呢，能从你手里拿到报纸，好像多看中他似的。中学生，初中生那迷信得不得了，能卖东方红报就很得意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那儿卖报纸，挣两钱儿。那个时候也有几千块钱了！

那个时候在广州还是挺不错。然后就是哪个单位有事情啦，请我们去一下。什么造反派的庆贺活动，我们就去一下，或者是两派闹纠纷了，去调解调解，这都去，都干。甚至那个时候广州那边的干部子弟，都闻风而动啊，也都找上门来。一谈话，说，唉呀，我们这边，广州叫主义兵啊，相当于北京的联动，也是受压。是不是能给打打气呀？我说，行啊，给你们做形势报告。体育场开大会，给他们做报告，鼓励他们。栽了跟头爬起来，在那儿栽了还得爬起来，怕什么？！犯一次错，第二次不犯错就行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毛主席不是讲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吗。

在广州的时候，等于在人家捧着的情况下度过的。所以，在还是很得意的。当时有些单位跟我们走得比较近，比如说广州什么文艺团体，广州的歌舞剧院，什么广州的艺术专科学校，那些学生老来。来了让我们给他们审查节目，跳那些造反有理那些舞。于是跟广州的一些院校啊，就都有一些来往。有什么庆祝活动啊，开什么会啊，都去一下，表示一下支持。

当时那个揪叛徒集团，就是搞刘少奇他们那个三十几个叛徒的事。到了那儿，他们的人还专门来找我，来请示一番，问应该怎么操作？对这些叛徒应该如何处理？我说，我先看一下吧，你们怎么弄的。结果去了以后，好家伙，给人家抄

家。我就劝他们，真是特务，你搜查就搜查，客气一点儿，要真是特务，你翻着东西了，有证据你怎么说都可以，不要搞得太过分了，不要打人。说话要客气点儿，这些人如果不是特务、不是叛徒呢，以后不好交代。当时好几个，什么林蓄民啊，冯铿啊，好多。当时都是地方派性，广东不是地方主义吗，挨整的那帮人。其实这帮老头我父亲都认识，都告诉过我底儿了。所以我也不好直说，就说没有查着证据，就是暗地里说两句好话，保一保。因为我父亲那在广州很长时间，广东那些省级的干部都知道的，能暗地里说一两句好话，保护一下就保护一下。

有些所谓叛徒不是真叛徒，被捕了是被捕了，但是不能算是叛徒，整得挺惨的。是那样呢，我又不好说得太厉害，最后就给规定一条，不准打人。他们还听。抄家是抄得够惨的，砸东西。我利用职权去看了一下扬长华，那是我父亲的老部下，所以，特地去看他一次，安慰安慰。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克里，就是广州中山医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悄悄看他们去了，结果没看着。给广州警司给关起来了，这下子怎么办？当时我还没接通关系，要是时间再拖久一点儿的话，打通警司的关系，要去看他也是可以的。当时没接通关系就没看他，很遗憾。最后帮他送了一份材料给总理。他儿子，无论如何说他爸爸怎么冤枉，说陶铸整他爸爸，说：“你无论如何把这份材料送给总理。”总理来开会了，正好召见，就给送上去了。

在广州就是这些活动，另外，搞了一次日本青年和广州青年联欢。

这个刚一到广州的时候，因为头一次到广州，回到我的出生地了，总要游山玩水地玩儿一通啊。看照片：

这是白云山的，我刚去的时候。这是中山纪念堂。农民运动讲习所。这都是有些革命纪念意义的。这是刚去的时候，联络站的陪我们的。我们在白云山山顶公园玩儿的时候。

后来我接到情报，说我们一个同学，还就是我们本班的一个同学，被困在云服了。他不是到地方去煽风点火儿去了吗？结果云服有个小姑娘，支持造反派的，她的父亲是地方干部，是保守派的。结果，这个小姑娘在家里就呆不住了，跟家里的意见不和吗，就跑到我们那边办联络站的人那儿去了，就想通过我们那儿的的关系离开家乡，省得挨整。弄不好回家还要挨揍呢。我那个同学就想带她离开。当时地质队是造反派的大本营，就在云服地质队呆着。于是当地人造谣言，说我

们那个同学在那儿拐带幼女啊，什么的，好家伙！帽子一扣，就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把地质队给包围了，出不来了。那边就打长途，告诉我说出事啦。那我就得过去解救他们去，我作为联络站的代表，作为驻广东的最高代表，跟他们谈判。我们到那儿去的时候，农民已经散了。做了些说服工作就散了。我们想既然散了，我们回去就完了，就买了公共汽车票，上了公共汽车。没想到，他们的家长煽动另一个乡的人，又来了。在汽车的下一站，把我们给截住了，截住了不让我们走。

后来就是经过了十七个小时的谈判，当时就我跟当地的武装部进行了 17 个小时的辩论，最后他们说不出理来了，要下台阶怎么办呢？就把我们的学生证，都拍了照，没有复印机，就拍了照，留在那儿，存档，放我们走了。后来那个女孩子跟我们一起到了广州，就在广州联络站给我们卖报纸啊什么的。

放了我们以后，松了一口气，于是我们就到了肇庆，到了肇庆就下车了，汽车就开到肇庆。说下一段我们不准备坐汽车了，我们准备走水路了。顺着西江啊，一直可以到蒲头，我们坐船了。那个船是很好的，船前面是个动力船，一根长缆绳拉着走，我们去好好玩儿一玩儿。

从七桥回来，我们没想到对手那么厉害，查到我一个同学的姑姑家，我们在广州就住在他们家，被对手查到了。他们找到我同学的这个亲戚家，没想到我们刚好就住在那儿。我们那个同学叫张华府，他的姑姑和姑夫在中南局里工作，也是中南局的一个司局级干部吧，（是管农业的书记，张补正）当时我们就暂时在他家落了一下脚。后来就去七桥山了。到了七桥山回来又到他家去了。没想到广州警司因为接到了总理的通知，就是周恩来通知广州警司说：如果发现朱成昭、叶向真在广州的话，把他们请回北京。（编者注：本回忆把两次不同时间因不同事由去广州搞混了，读者可以从本书所列史料和其他人，如张华府的回忆录中对比来看。）

因为我们一离开北京以后呢，中央文革为了整我们，正好找到理由了。就由戚本禹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说，朱成昭、叶向真携带了地质部的机密资料，企图叛国外逃。（编者注：王大宾回忆录写到，67年6月7日，朱成昭等去广州因一位和朱成昭关系密切的同学向他报告，他直接向谢富治报告后启动了抓朱成昭之事。）说我们要跑出去，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总理就通知北京市卫戍区、上海市的警司、广州的警司，也就是我们这几个有可能到达的地方，警备司令部和卫戍

区的负责同志，就跟他们通电话，告诉他们找我们。找到我们就把我们弄回北京来。他们以为我们可能要去香港，也可能从上海坐外轮走掉了。他们估计我们是往南边走。

就是说我们跑不跑是次要的，他要给我们加这一条罪状，只要我们离开北京，他就可以给我们按这么一条叛国罪。

发出的命令就是，我们这些人有外逃的企图，要把我们找着，找着要把我们送回北京。不让我们再出去。“请回北京”，这个话很客气的。

我到了广州以后，就跟北京打电话了。北京王光美的侄女王白莎就告诉我说，戚本禹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我们企图外逃。我们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我们也不要跑吗，对吧，我们无非就是不愿意挨批斗，我们出来玩儿一玩儿，所以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们确实确实是行动了（离开北京了）。我们本来要广州下车，幸亏那个列车长让我们半路下了，要是到了广州，那个时候警司就等在车站呢。所以我提前下车了，我很轻松地进入了广州市，他们都不知道啊。就这样躲过去了，不然到了广州就进警司，七桥山也去不了了。所以我还出去玩儿了一趟。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没有一点儿紧张，我觉得像开玩笑一样，我还骂呢，我说这戚本禹胡说八道！觉得很好笑。后来，关起来以后才想出这些事情来，噢，他要给我们加一条罪名。他要整你吧，最后就要给你定罪。定罪的话，就要罗织很多罪名，哪个罪名比较大呢，就是这条，叛国就是一个比较能够成立的罪名。如果我光说一些攻击他们的言论的话，那定不上多大的罪。

要指挥这几个警司是要靠周恩来下命令的。

当时由周恩来亲自下命令的事情不多，他们是怕我们真跑出去了，知道的内部消息比较多，到外面散布也不好，反正是他也是怕，有这方面的因素。叶向真的父亲叶剑英是部队系统的，所以他要是通过别人的话，别人不听呀，就是部队可以抗命呀，只有周恩来说才管用。而且，后来是派公安部长于桑广州来，把叶向真和朱成昭接回了北京。

警司接到总理的指令以后呢，就在火车站拦截我们，没有拦截到。但是他们就同时给我们可能要到的地方，像地质局，广东省地质局，还有中南局，就是当时陶铸所在那个中南局，都发了通知，如果谁要是隐匿不报的话，就按反革命论

罪。那么这样就没办法了。就是说，我们实际是栽在张华府的姑夫手里，他给报了。这样我们刚从七桥山回来，他的电话就打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就回到他家坐下，喝点儿水什么的，就半个钟头的样子，就把我带走了。

他们就开了个吉普车，那时候还是嘎斯 69 呢，苏联的。他们来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啊，我还在屋子里，在人家住宅区，家属的小楼里，他一进来以后就问：“你是不是梅建明？”我说：“是啊。”他说：“你是地质学院来的吧？”我说：“是呀，是地质学院来的。”他说：“你到这儿干嘛来了？”我说：“我来玩儿来了。”他说：“那你们一块还有好几个呢？”我说：“是啊。”哎，我听有点儿不太对呀，怎么回事呀？我说：“你们哪儿的？”他们穿着便衣呀，他说：“我是警司的，”倒是挺痛快的。

“你们几个小子，”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几个小子闯的祸不小啊！让我们到处找你。”

我们大概是 7 月 10 号出发的吧，那就是 20 号，20 号过的杭州，大概是 21 或 22 号吧。这个时候，就是警司来找我们的时候已经到了月底了，我们去七桥山过了三天了，哎，差不多月底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哪儿也别去啦，就跟我们到警司走一趟吧。”我说：“那我不愿意去怎么办呢？”他说：“你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去我把你抓起来呀。”我说：“你凭什么抓我啊？”开玩笑啊，他说：“我这可是有上面的命令的。”我说：“谁的命令？”他说：“那是中央领导啊。”我说：“哪个中央领导啊？”我还问呢。他说：“总理下的命令，行了吧？”我有点儿不相信。他说：“不相信没关系，咱们到警司，我到时候把电话记录给你看看行不行？”我说：“算了，我也不要看电话记录，我也不跟你去。”他说：“那不行，你得去啊，你一定得去。唉，咱们好说，好说啊，你放心好啦，我们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就跟我去一趟就行了。”反正就这么连哄带劝呀，就这么着，噉哩噉喳就到警司去了。

当时反正还有几个人没到，他们还在街上逛呢，没有回到那儿。我是上午到的，接近中午就进了警司，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我们这几个人才给找齐了。找齐了以后就把我们拉到军区第四招待所，这个军区第四招待所是不对外的，所以，比较严密，保卫森严，就关在那儿，也不是关在那儿，就是住得好好的，好吃好住的，先安顿下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说不行，我还有好多东西呢，你看我光着

身儿跟你来了，我还有好多东西没取。他说：“没关系，派个车，拿去。”好，就派了个吉普车，两个参谋跟着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先到中南局把我们放在人家的那些背包给拿上。完了我说，不行，我在地质局还有东西呢，又开到地质局。一到地质局，看到那些认识的人，我就赶紧说：“哎，我们被抓起来了！警司把我们叫走了！”我一说，就那么两句话就完了。第二天，就惹乱了，那一帮子人跑到军区第四招待所去要人去了，要援救我们。我以为真是抓呢，后来看看还可以。他们就是要冲进去，外头拦着不让进去啊，它那儿有三道线，冲过第二道线就可以开枪了，我看很危险。第一道已经冲破了，堆在第二道了。那个警司的人赶快跟我说：“你们谁能把他们劝阻一下，冲过第二道就要开枪了，有命令的。”我一看，坏了！这事儿闹大了。我说：“我去。”出去以后我就跟他们说：“还可以，他们是要把我们接回北京，复课闹革命去。没什么恶意啊，我们没有给抓起来，没给抓起来。”好不容易把他们给劝开了。大概有上百个人，两辆卡车装来的。

在外面闹了有两个钟头吧，后来我出去，就先告诉他们，这次是怎么回事，我得如实告诉他们呀，周恩来通知了警司，让他们把我们找着，找着完了以后，等于桑来把我们送回北京去，不是抓起来的。噢，他们这就放心了。就是因为我在地质局说了那么一句话吗，我说：“我们给抓起来了！”惹了这么一通儿事。

在这个招待所一共住了八个人：华府、华清、金山、蒋良朴、朱成昭我们六个了，加上李尤江、叶向真一共八个人。八个人在那儿住了两天吧，住了两个晚上。

那个招待所大着呢，后面有防空洞，好玩儿得很。在它那儿逛逛也不错，哎，又有山又有水的，很不错的。我看比那白云山公园也不差，这些当官的挺会享受的，住这地方挺好。逛逛就用了一天，完了又住了一晚上。那天晚上，警司的谢处长就来了，告诉我们说：“于桑准备动身来广州。在这之前，你们还想上哪儿玩儿？”我们说，我们想去丛化。他说：“好，明天就送你们到丛化去。”这样就把我们拉到丛化去了。拉到丛化以后，又在丛化玩儿了三天。丛化那个地方就更大了，是个专门的疗养区。我们在军级干部的疗养所里，住了整整三天。到处去逛，什么天河瀑布，流花湖，什么洗温泉。什么翠溪老毛住的地方，都去看了。

在那儿什么也不想了，就是纯粹地玩儿，等到了北京再说了。

大概上面规定的是请我们回北京，主要是怕发生意外。再加上叶向真她家是军队的，他们这些人都是四野的，就是警司这帮人都是四野下来的，都跟叶家有一定的联系吧。跟当时叶剑英倒霉大有关系。

之所以我们后来被抓进去，也是他们逼的，叶剑英被逼急了就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有了这句话就开始抓人。早就想抓叶向真了，所以就沾了这个光。因为什么呢，要是真正找了广东省的那些头头的话，也可能可以过关。就是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呀，谁知道呢？要知道有这么一档事儿的话，早点儿打招呼，我去找那什么陈玉啊，这些老头儿，那肯定更好了。突然就给你弄起来了，以后再要出来他也给你带出来，你要买东西给你带上街，要逛动物园还给你送去，不花门票呢。就是那天，等呀等老抓不齐人怎么办？我说实在是闷死了，旁边就是动物园，我说，咱们去玩儿玩儿行不行？他们说，可以，可以。我带你们去，不用花钱。

我们也有点儿成心跟人家找茬儿啊。闲下来就是斗嘴，找着茬儿就给他找麻烦。他们也真耐心，那几个参谋态度好得不得了，你再怎么他们也不生气，没办法。本来想跟他激火一下，完了弄点儿什么笑话比较好，也弄不起来，没办法。这些人训练有素。结果，就在丛化玩儿完了以后，于桑就来了。于桑来了以后，我们是分期分批，意思就是说，不要那么多人都跟于桑回去了，就是叶向真、朱成昭两个主要的人跟于桑坐飞机回去，剩下的人区别对待，我呢，属于就是好像尽量不要给我放到这个集团之列，就给我单拿出来，另外还有我的两个同学给带出来，跟他们关系不大的。就是说什么呢？我说我要去广州，他们就一定要跟着来的，张华府是一定要来的，张华清是硬跟来的。所以，他们俩就单拉出来，通知我哥哥到广州来接我们。我大哥从北京来了，学校里通知他来接我，这样子我就等于是自己回去的，就跟这个没关系了。剩下的就是蒋良朴他们那几个，由警司派人给护送回去的。我呢，警司把我们三个交给我哥哥以后就算完了。我还又在广州玩儿了一天。因为，我们都是四几年就离开广州了，我大哥是1947年就离开的。还去拜访了朋友，那一天是非常紧张的，火车票是他们给我们买好的。用这一天时间到处去转，各家去应酬应酬，看看啊，因为我哥哥很难得去一趟广州，一直待在北京。

于桑到那儿去，我没见到，我还在丛化呢，先把朱成昭和叶向真接过来，跟

于桑汇合，然后于桑带着他们上飞机就走了。我没见到。

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但是谢富治这个部长就等于是挂名的吧，他是属于中央文革的成员，领导成员，于桑等于主持日常工作的，一般什么事都是他管。

朱叶回来了以后，就被告知于部长到了，把他们俩接去谈话。过了一会儿，就通知我们他们已经上飞机走了。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照玩儿，跑到小溪里面还划船呢。

最后走的时候还问：“这个地方你还有些什么东西想要的？”“荔枝最好，咱们要点儿，多来点儿行不行？”“行。”那个参谋赶快派人去，弄了一箱子，然后说：“你们坐到火车上使劲去吃吧，保证吃到北京还有一半。”头一天上树没吃够，你知道吗？主要是爬到树上吃没吃够，完了还要带什么？我说还要一些荔枝。那几个人特好，后来我到广州去，就愣没找着他们。这是最友好的阶段，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友好的阶段。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要什么，马上，只要他能办到的立刻给你办。

我当时觉得自己都变成首长了。他们早就买好了火车票，拿着车票上车还有车子送你去。在这之前有一天时间让我们自己走，爱上哪儿上哪儿。

其实我大哥他也自身不保，反动学术权威，也给批斗得鼻青脸肿的。那个教授啊，北京师范大学，本身就没几个教授，在那个时候，他呢，又是教授又是系主任，你想想那玩儿意！

在火车上以后就完全是我们四个人，就是我们三加上我哥哥，没有任何人在我们周围，完全让我们自己走。他们管送上车就拉倒，连包括我们学校的人，我们学校确实派了人来了，派了人是押解那几个。八个人里头，我们五个人走了，还有三个，押解他们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还分起来，还把我们分成几块儿。实际上这两个人是我要出来的，既然我是可以脱身的，我就硬把他们俩给捞出来了。那么就是说，我们都是属于自由回去的，剩下的那三个，捞不出来的，就属于押送回去的。总之，他把几个人解脱出来，可能是照顾我们家点儿家庭关系吧，就是尽量让我少在这个事情里头的介入程度，想把我给摆脱出来，于是我又带了俩。那三个倒霉了，那三个就得受管制了。

叶和朱倒是享受得挺好的，他们坐飞机回去的。我回去以后就没事儿了，他

们回去以后就等着接受批判呢。

在9月份的时候还闹了一回事儿。在8月下旬的时候回来以后，我们不甘寂寞想复辟，就是搞一个新东方红公社，把老东方红战士再组织起来呀，把支持我们的人组织起来，搞了一个新东方红公社与革委会抗争一下。我们去抢了电台，抢了广播台，还发表宣言。结果，没搞好，人还是少了点儿，他们还是厉害，他们人多呀，仗着中央文革的支持呀，就动员了大量的人，把我们几个又从电台里给轰出来了。轰出来以后就开始搞批斗了，那时候我也属于被批斗之列了。

就是把我們一个个的都弄到台上站着去啊，然后就说我们这些人如何如何反动啊，说我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准备叛国外逃了，这些都作为罪状列出来了。这个完了以后，中南海那儿发生事儿了。中央文革煽动那些造反派组织去揪刘少奇，有个揪刘火线之类的。我们当时就去看了一次热闹，看过热闹回来以后，曾经说过：可以假借揪刘这事儿啊，进中南海，要求面见总理，和总理谈一谈。把中央文革的一些事情向总理汇报一下，议论过这个事儿。结果后来呢，被他们曲解为什么冲中南海，说再不行就到揪刘火线去，假借揪刘也能冲进去。到后来就是一条罪状：冲中南海，谋害毛主席。这可是罪大了。（编者注：事出有因，可参阅何建勋的回忆录）

新东方红公社行动失败后再次“逃亡”

8月底我们不是闹了那么一个新东方红失败以后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的迹象，还是在搞运动，还是在批判我们这些人，不愿意挨整，就又跑出去的，所以我干脆就拉上张华府和张华清，又溜了。我说：“反正咱们还有点儿钱，卖报纸剩下的钱还有。”大概有500块钱。当时有500块钱就很有钱了。出去坐火车不要钱，我们很有办法，会爬的呀！就是怎么样从北京站什么地方进去，爬到哪儿的车厢里等着，车一开了，就没你的事儿了，你就走吧。查票最多把我们轰下车，再爬下一辆。

这样我们就到了山东青岛，我说，我先到我哥哥家去。张华清家呢就在山东，他的老家在山东的荣城。就是山东最边边上那个三角儿的地方。他就先回家了，我和张华府两个人到了青岛，我二哥在青岛化工学院。他那儿有房子，我们在青岛玩儿了一个礼拜。天天去游泳。以前在那个疗养区游，疗养区待遇很好的。结

果那个游泳场不让我们进，没那个证儿。不让我们进怎么办？我说，不要紧，咱们俩在外面先脱了衣服，咱们游一段，准能进去，从那网子底下钻进去呗，这是秘密通道。它那个拦鲨网不严，下面呢有一个缝儿，有一个地方可以从里面钻进去，所以潜水，潜一定深度能进来。就这么就钻到了游泳区里面，游泳区里面比较安全，外面有鲨鱼啊。所以我们只要游很少一段距离就可以了，下一点儿水就钻进去。进去以后呢，有淋浴啊，要不然你一身盐水，干了难受啊。在青岛要不就是逛逛水族馆，要不就是游游泳，青岛没什么别的，在那儿休息了一个礼拜。接着就到了那个倒三角，荣城去了。

当时为了好好逛逛沿海，就坐那个小船。从青岛到厘岛，中间停一个石岛，一般大连到上海的船都在石岛停一下，然后过了石岛到厘岛，完了上来以后荣城就很近了，坐了一小段公共汽车就到了。在那儿过了几天渔家生活，就是海边的渔民生活。我这个同学张华清的舅舅，是打鱼的，就住在海边。那我们就到海里头摇个小船，摇撻的那种小船，不挂帆的特别小。摇到海里面练练撒网打鱼。后来我发觉这小船不行，那网也太小了，很费劲，捞不上多少鱼。他就告诉我们，晚上啊，插鱼更好，那鱼插插鱼更好，在小海里。就是一个大海湾啊，缩进去还有一个像河流的入海口一样，大概淤积了一块比较大的平静的小海面，象个内海似的，叫它小海。这个小海里面呢，水很清很浅，晚上，特别是凌晨的时候，挂一盏汽灯，打气的那种灯，很亮的，挂在船头上。水面上那鱼在那儿游啊，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练着插。开始老插不着，后来就发现诀窍了，这个东西往水里一放，比如说拿个筷子往水里一放，它是弯着的，是一个折射问题。后来，就发现这个诀窍了，一个是鱼游着的时候有一个提前量，另外你还得考虑到那个折射。把那个提前量弄好了，啪！一插一个。大概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插将近 50 斤鱼，两筐，荆条筐。后来插的那个鱼都不太好吃了，一个个象棍子似的，谁知道那叫什么鱼呀？象赶面棍那样的，细长的，那鱼刺多极了，肉细的的不得了，倒是挺鲜美的，就是不好吃。

第二天我说，插鱼不过瘾，咱们换个样。后来发现海螃蟹更好，就换了个地方，发现大批的海螃蟹正在配对呢，一个摞一个啊，一插就一对儿，一插一对儿，特别棒！哎，那个带劲儿了，因为我特别爱吃螃蟹。不到半个钟头就是一桶，一个铁桶。海螃蟹很大个的，一会儿就插一桶，一桶得有 30、40 个。多着呢，就

卧在海底下面不动。开始我们插鱼，后来变成插螃蟹了，那比插鱼可来劲，又快又好。它不动，可是若一下插不着，惊动它，它就跑了。

在厘岛没有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气氛，那纯粹都是世外桃源了，哎，太舒服了，没有任何人干扰，空气也好，全是自然的。那带劲极了，天天可以插插鱼呀，抓抓螃蟹这些，挺好的。抓完了以后，后来就美餐，哎呀，有的吃得真好，有的那个螃蟹太肥美了。吃不完就扔了呗，我一个人那一顿饭大概吃了 20 只，就那么一边聊天一边吃，一边喝酒，那是我第一次喝了一斤白酒没有任何感觉，就大口全喝下去了，就着吃那螃蟹。从来没喝过这么多的，吃了三个钟头。

我们住在那边，当地的人也没有觉得我们奇怪。因为我们跟渔民在一起，他插鱼我也插鱼吗，没有什么特殊的。谁也不认识我们，只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听说是北京来的，还要问几句北京的情况，都很热情。我们穿戴虽不像那些乡，但也没人过问。那个时候运动还没深入到下面，还没影响那个地方。要是公社里面还有可能，公社里面可能有人去，但我们已经到村里了。所以，在那儿整整玩儿了一个星期，凡是水上的花样都玩儿够了，好了，又要走了。

我说，咱们换个地方吧，山东半岛从青岛走，绕啊绕，刚绕到尖上，北边的半拉还没游呢。我和张华府两个人又继续前进，张华清的家在那儿，他不想动了。我们就像串联似的，徒步走的，那的风光挺好，水也很清的，到处玩儿。后来走到一半以后走累了，看到有地质队的车子，好，一招手，我说我们是地质学院的，啊！本系统的，挺高兴的。他们问我们上哪儿，我说我们要到威海，他们说，给我们带到威海。到威海找了个小破旅店，哎，住宿很便宜的，一、两块钱。后来我们从威海到温泉塘，才三毛钱住一晚上。到威海玩儿了三天，那个小城啊，当时是土得不得了，和现在简直是没法比，现在的威海漂亮得不得了，干净极了。那个时候像个渔村差不多，土里土气的，房子都没有高的，两层楼就是高的了，就算是很好的房子了。我们就在威海市和海滩上玩儿一下，完了又继续走。威海到烟台之间有个温泉塘，我们是在地图上看的，那儿一定有温泉，就说我们到那儿洗温泉去吧，走到温泉塘就洗了个澡。哎呀，才发现那儿的温泉怎么个洗发儿？到那个河沟儿里头，挖泥挖一个坑，水很浅，先得自己挖一个坑，然后才可以坐到里面去洗。那个水是热的，很有点儿烫，大概也就是 50、60 度的样子。它是在河里的一个温泉，如果你距离调的好，那个水温正合适。

我们有卖报纸的钱，500块钱，那时候500块钱大富翁了，很有钱了！因为我家老头子一个月就挣到400多块钱，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干部了，老毛一个月也就拿500块钱。那个时候好象这400块钱老是用不完似的，哪像现在，兜里揣着好多票子，还要担心花光呢。那时候别说兜里有500了，就是兜里有100都挺牛气的，不怕。钱是由我管的呀，我是联络站的站长，所以联络站卖报纸多余的钱都是归我管的。其实都是大家给帮忙卖的，我不过就是组织了一下。我说500，实际上是750。反正陆陆续续花，花，花，花到最后还剩510块，全都给没收了！我被抓起来以后，给没收了。

到了烟台以后又玩儿了三天。到了烟台就不想走了，因为再走就没那边好看了，人口一多一繁华就不行了，就没有那个野劲儿了，干脆就坐公共汽车到了烟台。烟台也是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烟台也小得一点点儿，但是有些古老的建筑，像什么石头的钟楼啊，比威海还是强得多。在烟台也玩儿了三天，几个公园逛一逛，海里头游游泳。

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干嘛来的。我有的是介绍信，要住要什么的，开介绍信就行了，你要是吃，拿钱拿粮票就可以了，这都有。

我的介绍信？都是空白介绍信，有的是，恨不得我兜里都有个图章，随便带着，地质东方红的图章到处可以刻，我怕什么。就像现在的大老板似的，他公司的章他可以随便带出去，走到哪儿需要介绍信，在信纸上一扣就行了。当时我有各种各样的介绍信，那要摊出来，首都三司的介绍信，北京市革委会的介绍信我都有，还有我们学校院革委会的介绍信，还有红卫兵的介绍信，什么介绍信，五花八门的都有。口袋里都揣着呢。所以你说，我这儿随便编个什么，我那儿出去用的证件，我用的学生证搞个假名字，贴上照片，盖上钢印，用个假名字，我不用自己的名字，我那时候叫王峰。

改了假名人家就不认识我呀，乱编的名字，乱起的名字，山峰的峰。而且单位都换了，我搞了个中学生的学生证。乱七八糟的证件一大堆，什么证件都有。反正那个包里什么都有，我们那个包是很大的，单背带的地质包啊，不像咱们那横的，我们那是竖的，长的，便于放锄放锤子什么的。那家伙装容量挺大的，衣服塞得满满的。我没背大背包，大背包太沉了，就背那么一个包，什么都有了。走到哪儿都行了。人家看了我的样子也不知道我有钱。

象烟台这样的地方北京来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他们一看首都来的，挺客气。轮船一晚上就到，买个票才几块钱，便宜得很。我和张华府又窜到大连去了，我说，大连我有人在那儿。我的二哥，在我们离开青岛的时候告诉我，要想玩儿的话，大连好玩儿，到大连找他的一个同学，叫郑万凯，是大连医学院附属医院脑外科的主任。我二哥说：“你去找他吧。”我说：“行啊，只要他还没被关起来就行。”他说：“反正他那把刀，那些当官的都要用他的。”他是脑神经科的，这些当官的谁不怕死呀，他这一手儿，人家当官的还得保保他。所以什么大连市的市长、市委书记都跟他认识。他挨批判，但是活儿呢还是照干，没有让他住牛棚。我说，那好我们去大连。就这样我们到了大连医学院去了。

到了大连医学院第一次用了煤气，管道煤气，哎呀，我才知道这东西这么好！连我们北京那么好的四合院里头也得烧火呀，那是灶。我说这个好呀，一开开关，一点火儿就行了，用上了煤气。于是随便上街买点儿什么东西，回来都可以自己烧一烧，挺好的。在那儿自个儿做饭，还学会了几样。

因为我二哥这个同学很忙，他是主治医师，他老得去上班，特别是好多大夫都被打倒了，住了牛棚了，所以他工作量挺大的。反正我们俩呢，就是自己玩儿自己的，他也不管了，就是住他屋里就是了。他只要一下了班，晚上就陪我们玩儿。他也是乐得，还巴不得我们去呢，他也闷得很啊，连说话的对象都没有，怕说话说错了，我们不要紧呀，胡扯八道乱骂人都没关系的。所以，他去上他的班，我们玩儿我们的，完了我们晚上回来再一起玩儿。在他那儿玩打桥牌等，玩儿各种各样的扑克游戏，学了不少。除了咱们一般的40分下台，他比较高档一点儿，他打桥牌，或者玩儿那个赌的苏哈。

那个大夫在上班的时候有文革的气氛，但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放松。门关起来以后是个很封闭的环境啊！他工作回来，是很累。因为他是技术人员，所以，很多会议他可以不参加，只要有值班的话，比如说需要他抢救人啊，他是外科一把手手术刀啊，这个厉害。紧接着，我们才到那儿的第三天就爆发了武斗，刚玩儿了三天，正得意呢，开炮了。在大连两派打仗，开了迫击炮了。迫击炮还打得不准，该打人家对方的攻事没打着，打到民房里去了。结果炸伤了很多，也炸死了一些人。大概那一批炮弹下去死伤了20多个。后来这些死伤的就赶快被送到医院来，抢救呀。那个大夫就忙了，忙就没有人搬尸体，叫我们去帮

忙啊，他负责处理。就是点下一个我们赶快给运过去，抢救啊！我刚到那儿，第一件事情，他就指着一个说：“这个已经死了，送太平间。”我和张华府，我抬腿他抬胳膊，就这么提着过去了。

那做手术，一个接一个的，没人！别的大夫大部分都在搞运动呢，他算那儿值班的，他顾不过来呀，连个帮手都没有，我们就是管推呀。一个一个往里推，把人抬到推车那种床上，然后推到手术台，再给移上去，然后再把下一个人准备好，做下一个。就这样，他在那儿一个人抢救。还有两个护士，其它人都不在，都搞运动呢。所以，虽然他算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但在那儿还得值班，还得工作。但是他宁可要这个工作，也不愿意去参加那个运动。因为要去参加运动，他的风险就大多了，他要在这儿，他可以用他这把刀子，可以少受点儿冲击呀，还可以做点儿好事。所以上班是很忙的，他基本上从早上上班，到晚上6点，早上8点到晚上6点，中午也不能回来，所以，中午经常是我们两个人弄吃的。有的时候懒，出去玩儿了就不回来，在外面哪个饭馆里吃点儿海鲜之类的，也不错，那真便宜呀！现在都不敢去问津了，那个时候兜里有这些钞票，觉得大大的，不怕。

我们离开炮的地方很近，听得见的。那个开炮的声音不响，爆炸的那个声音比较响。我也没觉得害怕，就它第一响吓一跳以后，完了它再响的时候就到处去找，这到底怎么回事呀？后来人送来以后，送来的人才告诉我们那边武斗，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概在那种环境，反正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够亡命徒的，不怕这些事情，不觉得它有多可怕，他打他的。门关起来，门关起来还是个很封闭的环境啊。

武斗激烈不激烈，打得厉害不厉害，全在这两派的群众头头厉害不厉害，这两派群众头头，如果有一派厉害的话，他要动用了武器，对方必然会拿起武器。而有一方要是打的决心大，另一方必然也是防守的决心大，所以就打得很激烈。这个还不算厉害，其实这个光是些枪弹，我听到的和我看到的，最多到重机枪完了。我看到的就是那个54重机枪，这种程度的，带一个护板。最重的武器大概就是这样。

后来我们去了长春，住在长春地质学院的招待所。那时长春武斗，没看见重炮。轻机枪很多，就是两个脚的，但是最重的就是重机枪。学校里头也是工事，

地质楼都已经成了工事楼了。学校里有一个专门的地质楼，是过去伪满时期的皇宫啊，就是溥仪建立满洲国的时候的皇宫呀，叫地质宫。那个楼都搭成工事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劲头了，走吧，就想到哈尔滨去。结果还没到哈尔滨，中间有一站叫作双城。双城这个地方就开始拦截了。就是接到通知：北京来的红卫兵不让进哈尔滨。哈尔滨武斗厉害，怕北京人去煽风点火，闹得更凶。结果把北京来的人往回赶。我们是北京的，当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图，就是查一查证件，我们一亮北京的证件，坏啦，不让进去，就往回倒。把我们送上往回开的火车，往回送。结果这个火车开了没有三公里，长春火车站武斗，发生了爆炸事件。上了炸药了，把那个大概几个机车的车头给炸毁了。火车站瘫痪，结果回不去了，想不让我们进也得让我们进了。就想给我们再拉回去，拉回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从那条线，内蒙那条线进来，给送回北京去。结果呢，我们做了准备了，车还没停呢，进站还没停，减速的时候，我们一个个的就从窗子溜出去了，全跳车了。

这是在哈尔滨。铁道部命令他们车子走北线回来，结果我们还是到了哈尔滨。生怕不让我们下火车，给我们直接送回北京去，一个个的都钻窗子就出去了。一出去以后就打听，奔着哈军工去了。刚到哈军工，坦克，其实是假坦克啊。就是把那个解放牌汽车做装甲车，然后上面装了好多大喇叭，架着有机枪，口径比较大，象机关炮那样的。就在车上开，一边开一边广播。这是还没到哈军工的时候看到的，是哈一机的。因为哈军工旁边就是哈尔滨第一机械厂，哈尔滨第一机械厂是生产坦克的，它不是有装甲吗，所以就把哈军工的汽车一改造，就像一个坦克那样。结果那个车子应该很结实了，应该没法儿打了。另一派的拿燃烧瓶干它，提着燃烧瓶子，这都看到了。就是汽油，灌到瓶子里，然后点上火儿，晃啊扔啊。那个热闹，这个还好看。那个玩儿意说不定冷枪就打死了，他们这个不对群众的，就光是你的宣传车来我打你的，这派的宣传车来了，那派的就打他的。就只对着对方的人，所以你在旁边围观都没关系，你可以在旁边伸着头看都没事。哎，这个热闹，好看。这帮人就下来救火啊，挺好看的。

我们当对正好往哈军工去，在街上正好碰上这个事儿了，一边走一边就跟着看。一会儿，哈军工的车被打了，哈一机好象跟哈军工一拨儿的，就派了坦克出来援助。坦克里面不是消防弹吗，往上拽呀。我看他们挺过隐的，坦克都开出来

了。坦克好像不太怕烧。那边还扔呢，不断地扔。

没有部队，但是有没有化装了的部队就说不清了。你说哈一机里头，我怀疑肯定出来的入人里头有部队的，另外哈军工的学生可都是兵啊，那些学员都是军人。所以，我还没到哈军工呢，就已经看了一场热闹了。看完了这场热闹，等宣传车把火灭了又继续向市里开，那么我们就离开了，就到哈军工里面去找我的同学去了。就在这儿，看了最大的一场热闹，坦克也出动了。

到了哈军工以后，那同学多吗，101 考到那儿的人特别多，有吃有住的。白吃饭的，也不用交钱，只要到开饭时间坐那儿去。很难吃很难吃的，你知道吃什么呀？吃那个小米饭，（应为高粱米。张更正）特难吃，唉呀！苦得了不得。窝头都是好的，我希望吃窝头，棒子面都比那小米强，小米饭特别难吃，干巴蚩咧的，还有高粱饭，唉呀，一点儿也咽不下去。就是伙食太差，要不然我真愿意在哈尔滨多呆两天，也是坚持不住了，三天就想走了。到太阳岛上去玩儿了玩儿，哎，赶上了做水路两栖试验。大概也是哈一机的人在那儿搞呢。又能在水里开，它不是在水里跑的，它可以在水上漂着走，开得挺快。有点儿像汽垫船那个味道，轰，马力大得不得了。它有履带，一上了岸以后就可以跑，跑得很快，在那个沙滩上，跑得很快。它有炮塔，但是没装炮。就看他们在那儿做这个试验。后来想去看歼 8，联系了半天，没让去看。想看歼 8 试验，没看上，就看了这么一个坦克。在那儿呆了几天以后，实在没劲了。吃得太差，坚持不下去了。我就想哈军工的学生怎么过的呀？天天就是那个样子，吃的伙食那个差呀，真差劲啊！

学生中有很多高干子弟。有不少人是保送进的，但你成绩得达到优秀才行。保送有保送的条件，也不一定都是干部子弟，反正 101 中学保送的有非干部子弟去的。达到保送条件就可以去。武斗中没有看见死人，在那儿就看他们都互相打宣传车，那喇叭给砸得一塌糊涂，都瘪了还在响着。放火什么的都有，后来打死人了，那真刀真枪地干，我也没看见。我看的时候就是互相在搞宣传战，在破坏对方的宣传车。所以你在那儿旁边看热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哈尔滨城里的道里道外，都去逛了一次，都玩儿了，什么太阳岛，还有那个叫秋林公司吧，就是它那儿最大的百货公司也去逛了一逛。大连也有个秋林公司，也去逛了，反正是人家告诉我能玩儿的地方，我就都去了。

（编者注：以上内容《789 集中营》多所删节），张华府在看过《789 集中营》

这个部分后，说梅建明有些说法不是那么回事。哪有抬死人的事，说的玩呗。）

要说玩儿我是最有办法的，我整天游山玩水的。

在那儿实在没劲了，打个长途到家里，问问怎么样。结果，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干部给结合了，叫李贵。革委会主任是王大宾，副主任就是李贵，是个老干部。王大宾的话我不相信，李贵的话我还是挺相信的。李贵对我家里讲，说现在已经开始复课了，说让我家里把我叫回去，学点儿东西，以后也用的着的，别错过了机会；另外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你看，回来的时候都属于特殊待遇，是自己回来的吗，不会找我的麻烦。这样子，我一听就问了：“是王大宾说的还是谁说的？”家里告诉我王大宾来说过，李贵也来说过，我心想李贵说了不会骗我的。我就说：“咱们走吧，回去吧。”我还是挺愿意念书的，就回去了。走北线，那时候长春还不通呢，从齐齐哈尔那边绕过来。这样子就路过了安达，我们还指指点点的，说这可是大庆，咱们甬下去了，那个地方太远，没有交通不行。远远瞄了一眼，完了就从齐齐哈尔回去了。

到了北京，我就规规矩矩地到学校去上课去了，还真是要开始上课了，正在恢复班组，就是原来的班，同学还没到齐，再等两天，都发出通知去了。我是下午到的学校，大家见了我挺高兴的，问东问西的。因为我在那儿不管怎么样是个头面人物，还问问情况，在外头一些见闻啊，聊了一下午。

地院革委会的隔离审查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刚钻进被窝躺下，两个专案组的人就找到我头上了，说：“李贵要跟你谈点儿事儿。”我一听是李贵要找我，那就去吧，穿上衣服就跟他们走了。结果就给带到他们专门的一个地方——专案组所在地，原来是外国留学生住的宿舍。因为文化大革命外国留学生都走了，房子空出来了。我就住到那儿去了，以为李贵找我有什么事要密谈呢。结果一去，啪！四条大汉，我们学校四个工人，在那个屋里等着我呢。一进去就把我扣那儿了，对我宣布：现在对你进行隔离审查。就这么把我骗进去了。

完了以后就是给我规定：上厕所要报告。屋里没厕所，得跑到楼道里去，不是那种单元式的房子，那是集体宿舍，得跑到楼道里去。要报告，要有工人陪着，有看守陪着。你想想，四个人看我一个，那里总共四张床，我一个他们三是睡这

儿，门口外面再睡一个。

我就觉得他们没必要，我说：“老子不怕。你们要关我就关我，用不着人看，我不会跑的。有理走遍天下，你们要审查来审查吧，我没问题。”完了就开始来审查了。我们学校有朱成昭专案组，是由中央文革直接领导的，就是中央二办。中央二办直接领导，中央二办的负责人是黄永胜。由我们学校自己这个专案组来审查的时候，就跑来审问我，我就闹清楚了，我知道他们的目标要定我三条罪状：第一条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反动言论那部份；第二条，企图叛国外逃，这罪状就更加一等；第三条说我要冲中南海谋害毛主席。要谋害老毛啊！扣上这三条罪状。

那么好啦，我就成天跟他们唱对台戏，你问我什么我就跟你顶什么。就只第一条我承认，后两条怎么审怎么吵，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反正是大家对着干，我不怕你。好在那四个工人还挺明理的，没有动手打，没搞武斗。最后那几个工人跟我特好，我没烟抽了要烟，给我买烟，闷得发慌了，从家里偷偷带一副棋来，下棋，外头有一个站岗的，专案组的一来就告诉我们，把棋一卷就塞到被子后面去了。天天陪我在那儿玩儿。除了下棋，还有一个人喜欢摄影，此人一天到晚就跟我探讨照相技术，特有意思，主要是洗印的技术，有些特殊的情况怎么处理，底片不好了怎么办。晚上四个人一起的时候，就是要休息前，那基本就是9点就躺在床上了，到12点这三个钟头就是各讲各的故事。都讲各种各样的事，是见闻也好，是故事也好，说书也好。那三个工人挺好的，开始把我当成反革命，后来问了我两天以后，说：“看你这样也不像反革命啊。”我一天到晚跟专案组吵，专案组的人又趾高气扬的，对那个工人有点儿看不起的样子，我是被审查者对他们比较友好，比较客气，他们还觉得我比他们强多了呢，就跟我挺好的。没烟了帮我买烟，馋了以后帮我买好吃的，反正那个时候能买到的，他们就想办法帮我弄到。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宿舍抽屉被他们撬了，钱就全抄走了。后来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他们抄走了514块，就算给专案组没收了。没收了很多东西啊，大概200多斤的全国粮票，514块钱，还有布票，还有工业券，什么都有，全都给我抄走了。最后就退回我一个照相机，胶卷也给我用掉了，一大堆好柯达胶卷，最好的。当时，这都是人家从外面给我带进来的，国内哪儿买去？那时候比较特

殊，我们因为外面有朋友，老来，所以经常带些好东西，照相机是最早的傻瓜机，60年代的。这么小一点儿，很小，装彩色卷就照彩色的，当时没有彩色的我就照黑白的，揣在口袋里，拿出来就可以照，72张。我有一套放大机什么的，回来可以自己放大。那个时候这个相机也让他们给我玩儿坏了，可惜得很啊！

我被抓以后放回来又回到宿舍，才知道我的东西被抄过了。为这个事情，我提出来以后，他们就哼哼叽叽的，反正就是说他们都毕业了，也找不着了，谁搞坏的现在也弄不清楚了。

关于谋害主席的事，是由那么几件事引起来的。叶向真说：“当时开国的时候，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还曾经想过，在金水桥底下埋伏迫击炮，到检阅的时候可以用炮打到城楼上去。”就讲过这个事儿。于是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策划的。这叫欲加之罪吗，总是要想方设法栽到你头上。

审查期间就是有些人，审查的时候胡说八道！我被审查的时候，有关言论这部份都是别人的问题加到我头上，所以说我们这一拨联络站的，就没有受到冲击。包括我原来地质部联络站的那些人，如果受到审查，绝没有一条是从我那儿来的。反而他们的事儿都揽到我头上了，只要问到我的这些人，我都揽过来，都是我的事儿。因为什么？我已经是一身罪了，再揽几条还是这样，对不对？大家就都解脱了。但是有个别已经进了圈的人，圈内的人，就是属于核心圈的有些人，胡说八道！到了这种时候，在那种环境下给弄的，也情由可原，因为什么呢？不知道对我是不是优待是不是看家里关系呀？还是什么呀？我没有轮上吃药。那横路静二不就是给吃那药吃的，傻不楞瞪的什么都乱说。蒋良朴就被吃药，吃得乱说一气。

具体是什么药我就知道了。吃了以后人就糊涂了吗，糊涂了，问什么说什么，他一诱供，就照着他诱供的讲呗，乱讲一气。我没吃过，所以我是受到优待的。我关监牢住的也是单号，他们都是集体号，我是关单间的。可能算是对我特殊的优待。

学校里头有一个朱成昭专案组，当时专案组的组长是物探系的学生，雷存云，人还记得，这是专案组的正组长，副组长是教员，叫李思田。现在我们国家煤田方面很著名的一个教授，这是我们本系的老师，所以我认识。那大概过了两、三天吧。雷存云和李思田就来所谓的提审来了，让我交待我是怎么攻击无产阶

级司令部的，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条罪状，让我交待，怎么样叛国外逃的。当时主要就是问了这两条，第三条并没有说，但是也旁敲侧击地问过我有没有参加颐和园的黑会？有没有参加冲中南海的行动？这些问题里头我只有头一个，我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就是关于炮打中央文革的事，确确实实是我说的话，不要再去搞别人了。凡是受我的宣传所影响的同学，你们不要去抓他们，这个都是我说的。我不是说过，当时在我们学校“四人帮”安排了另一批人马吗，不是收集我们的言行吗。我不是有一次曾经刚讲完对形势的看法，回到宿舍里，就给我传单送进来了吗。当时那个战斗队叫丛中笑。我说：“他们写的那个传单，所记录的我的反动言论都是如实的，都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并不认为有错。至于要叛国外逃，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我到广州是去散心的，是去出去玩儿的。颐和园所谓的黑会，我没有参加。冲中南海的事情我没干过，我连中南海都没去过。府右街我都没去。”

这样，他们就认为我非常地顽固和恶劣。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这第一天还算客气的，第二次再来了就是拍桌子啦。那个雷存云是年轻人，他是大学生啊，所以跟我年纪差不多，所以拍桌子打板凳的，就吼。就是说我态度恶劣，不老实。我就说了，我就是态度非常好。我愿意交待我的真正的问题，但是没有的事情你要往我头上扣啊，那叫白搭。后来他就拍起桌子来了，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你嗓门大我也嗓门大，大家就对吼一气。吼完了以后，他们走了，这些工人说：“小伙子，你可真够劲儿啊！”我说：“怎么了？我从小就没受过这种欺负！这帮人算老几呀？骑到我头上来，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的，这还了得！我都火起来了，要不是从小修炼得好一点儿，我就得揍他几巴掌。”

颐和园的黑会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根本就没参与这件事儿。但是这个会可能议论了老毛啊，说如果能见到老毛，和老毛讲一讲中央文革的问题。如果说老毛是真正站在江青一边的话，那么我们想办法动员这帮老师，动员这帮老师干脆把他们废了。再一个是进了中南海，可以想办法把刘少奇救出来。这是后来传出来的。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这是我听到的，他们参加的人说，说了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是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颐和园这次黑会是被作为一条很重要的罪状。就是说，抓起来够枪毙的。他们以为我一定会参加这个会的。这些人也不看看时间，也不好好算一算，我会不会在那儿？

我呢，是不知道，没参与这个活动。所以我就说，没有这么回事儿。他们把

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罪状，要搞清楚，要证据确凿。问到我头上，我自然就不晓得了。

这次问话的结果就是我只认我自己的账，凡是我说过的那些言论，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群众啦”，什么“破坏老干部”啦，“应该给出路”啦，“不应该对红卫兵施加那种残酷的压力”啦，什么“搞逼供信不对”啦，“应该解放老干部”啦，这都是我的话。

我说：“过去丛笑里写的那些揭发我的反动言行，都是我说的他们说的一个字不差，但是有些人听了我的话，又去告诉别人，你们不要去抓他，那是我的事儿。”就是说我否认了到广州企图外逃这件事，另外黑会我也没参加，就这样子呢，雷存云就跳起来了，拍桌子打板凳地跟我对吵起来了。专案组的人走了以后，那几个工人好像挺同情我的，说：“看来你不像个坏人。”我说按照他们的观点是，最多也就给我一个反动学生。我就是想的多了点儿。我说：“我有好多想法，但这些想法也不好跟你们讲的，你们也不懂。”我对那些工人说：“我讲了以后你说我反动的話，到时候是不是真反动也不一定。”他们就说：“看样子你不像个反革命。”我说：“我是不是反革命以后再说吧。还没有定论呢”就这样，这几个人开始跟我话就多起来了，平常也就不闷了，我的日子好过得很呢，想吃点儿什么买点儿什么，我兜里有钱，叫他们给我去买一买。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会抽烟了，他们还给我推荐，说：“有一种新来的烤烟，那个烟叶特别好，你拿来卷了抽特别棒。”我说：“那买！”跑到前门给我去买回来。这几个人挺好心的。最后说：“买饭我给你早点儿去，排在前面给你买。”我说：“哪个菜好买哪个。”

我当时身上还有钱，毕竟在那个时候我们家算是很富有的了，所以平常身上也不缺钱花。我在那儿，过一段时间家里还可以给我送东西来。我叫那个工人往家里给我打个电话，见不到我人，能把钱送到专案组，专案组是不敢贪污的。哎，贪污过一次，最后一次，就是说送钱来，我已经被抓到监狱，按说他们不应该接了，专案组接了一次。我就跟工人拉好了关系，我日子过得挺好，在里面没受什么罪。最多就是专案组来了，3月份，大概是11号也不是17号。

大概是在三月初的时候，专案组最后提审我的时候，就说了：“你再不老实交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保护你了，你就得进监狱了。”我说：“进监狱就进监狱。反正你们跟我搞不清楚。”后面的话就没说了，因为当时反中央文革的时候

不都立过誓“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吗。我心想：“到监狱里就到监狱里，反正是跑不掉的。”

被捕入狱，进了“功德林”

这样就到了3月17号的或是11号我记不得了，是晚上7点钟，吃过晚饭以后过了一會兒。哇，外面的大喇叭就响起来了，放那个“东方红”，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就在这个嘈杂声中，我就听见有人来了。来了三个解放军，说是卫戍区的，拿了一张逮捕证，可是这个逮捕证呢，后来跟人家核对，小了点儿。像这么大一张小卡片。他进来就问：“谁是梅建明？”我说：“我是梅建明。”他说：“哪个梅？”我说：“一个木字旁一个每天的每”，他说：“那个建？”我说：“建设的建，明天的明，日月明。”他说：“好，没有错。那你签字吧。”我一看，哟！逮捕证嘿！我说：“在哪儿签？”我就找笔，他说：“不用，不用，这儿有。”他都准备好了，我就看了一眼，在签名的地方就签了，反正知道这是早晚的事情。

当时就是脑子连过都不过，上来就说：“哎”，我把手伸出来：“要不要拷啊？”我问他。

不是抓人都要拷起来吗，他说：“背过去吧，你在前面走。”两个当兵的把我挤在中间，就下楼。走到到门口的时候，噢，外面已经夹道“欢迎”了，人都挤在那儿，留出一条路来了什么“看反革命呀！”“抓的逮捕犯！”有人说：“打呀！”一说打就有人往上冲呀，幸亏有几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我那些铁哥们儿们，帮我撑着呢，没让那些人扑上来，就这样把我护送到那个车里去了。我谁也不认识，两个当兵的往旁边一站，我的视野也就是眼前那一点儿。就给弄到一个吉普车里，那个时候都是嘎斯69，苏联的嘎斯69。

我一点也不怕，一点儿都不带紧张的，就是别挨打，一听说有人要打，赶紧往前窜就进了汽车，所以没打着。这样车子就开了，开的时候我一路在想，看看这是给我送哪儿去呀？监狱还没呆过呢。一路看，看啊看，这是走到北太平庄了，我说，嘿，这地儿行，这是往城里开呢。后来又开，我说弄不好要进炮局了。我当时就记得一个是半步桥，一个是炮局，虽然知道功德林，但是不知道功德林在哪儿。待会儿到了北郊市场了，这地方我都认识，就离这儿没多远，到了北郊市场一拐弯进了一个地方，停下了。为了看看当地的环境，我就跟当兵的说：“我

要上厕所。”后来他看看附近也没有公共厕所，就说：“你就到墙根儿上去吧。”

他要去叫开门。就在那个时候我看看周围的环境，一看好，地形地物认准了，做好了标记，就被他们带进去了。

我得认认，我到底到哪儿了，活就活个明白，搞地质的就是有这个习惯。到一个你不太清楚的地方能找一下标志，做 AI 认迹。做好了认迹了就把我带进去了。进去以后，哎哟，带到一个屋子里以后呢，就说：“把衣服全脱了！”噫哩喀喳就把衣服脱了，脱完了就检查，兜里东西全部都给掏出来了，一点儿都不能隐藏。完了以后把皮带没收，眼镜没收，把松紧带给割断，抽掉。就是凡是有可能自杀的东西，全都给你搜走。所有的物品，钱，还有那些带的手绢呀什么的，全给你搜了去。还给你写了个清单，挺详细的清单，然后让你对一遍，签个字就行了。这样那些东西他就算给你收存起来了。糟糕，那个裤子没有皮带了，提不起来了，用那个钩子挂到皮带扣上，免过来一点儿，这样还可以坚持不掉。

这就开始了，说：“伸出手来！”这时候我才知道，在这里头要被拷起来，把两只手拷起来了。然后说：“低下头！”低下头，然后两个人就推我一转，一转就把我转晕了。

我数了大概 36 圈，不足 37 圈。他怕我认路还是怎么着？不知道，就是规矩吧，反正就是进去先把人给弄晕了，不让知道监狱里面的路，就让你晕晕呼呼的。你想 30 几圈转下来，人已经稀里糊涂的了，东倒西歪的，他们就架着我，拖着我往里走。过门坎儿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过的时候，他们一抻，就把我给拽过去了，他们两个人架着我一个，那么一拖就过去了。是跌跌撞撞地就这么一拖拖的，拖到一个中央大厅。中央大厅这儿有走道，走道都是放射状的，每个走道的两边都是牢房。这叫筒道，它就排了，这叫一筒、二筒、三筒……，一共有多少筒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住在 9 筒 17 号，大概是 17 号。我忘了，我是先进的 9 筒 8 号，后来转到 17 号，还是先进的 17 号又转到 8 号。就是后来我觉得离厕所近了。17 号靠近厕所，24 号对面是厕所。

走路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要低头才能进的小矮铁门，这个矮门是木头的，包了铁皮，着铁钉。这个门上有一个小小的观察孔，观察孔上蒙着一块布。看守可以掀开这块布来往里看，观察里面人的动静。这个口旁边上面一点儿，钉了个钉子，钉子上拴了条绳子，绳子上挂了个木头牌子，这个木头牌子从这个孔伸到屋

子里边。如果说犯人要有什么事情，要叫看守的话，就把这块牌子从那个孔里伸出来，啪啦，出来了，绳子掉在外面。我这么一扔，就出去了，搭啦到门下头，看守一路过，看见牌子在外面，就说明是犯人叫你有事。平常的时候牌子是放在屋子里面的，从观察孔里给塞进来。

铁门的高度大概在1米6到1米7的样子。这是很狭窄的一个小门，然后，门的上端有一个方方的通气孔，有点儿像我们卫生间风扇的那个孔。里面的房间呢，大概是两米多一点点，就我到那儿一伸手就好像差不多了。宽也差不多是两米，四平方吧，最多到五平方。这么一个房子，水泥地面，我进去的时候，墙还湿着呢，刚磨上的，那个墙还是软的，我一摠，很干净。水泥地面上放着一张木头床板，单人的那个木头床板，很简陋的，就那个板凳一支就在上面睡觉了，连把凳子都没有，就放在地上。床板上给的设备就是一条线毯，灰色的，线条粗了吧叽的，就跟再生毡子似的。两个瓷的那种碗，一双筷子，一个脸盆，屋里还有一个铁桶。那个铁桶就是咱们最早挑水用的铁桶，就是很重，真正的铁桶，不是后来的那种马口铁的铁桶，它那个才是真正的铁桶。

进筒道之前。到那个圆厅那儿，打开手拷，去掉了。那个手拷是我第一次领教，叫狗牙拷子，越摠越紧，活拷。到了里头才知道，这是一种活拷子，还有一种死拷子，我都领教过。给我带到那里以后，一个老看守就过来了，就给我讲监规了，说：“每天早上一吹哨就得起床，起了床，你就等着，门一开，你就得快速拿上你脸盆和桶，去放茅。”所谓放茅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天到晚关在那里头，所以呢拉屎撒尿全都得在屋子，就是那个铁桶。那么每天早上放一次茅，就是把你的这个桶倒掉，刷刷桶，打点儿水来，另外脸盆里装着水，洗脸刷牙，打回水来洗脸刷牙。

然后就开饭了，放完茅接着就是开饭。因为我们这种监狱都是关政治犯的，所以，不同牢房的人是见不了面的。就是说，每个屋里的人只能跟自己屋里的人见面，别人是见不到的。所以放茅也是轮着放，从1号开始，1号回来以后把1号锁上，2号开门去，2号回来3号开门……，就这么轮着，放茅这段时间也挺长的，因为有20几个号呢，每个号给个3分钟你看看多少？这茅就放过去了。完了就是打饭，打饭的情况和放茅的情况是一样的，开一个门，关一个门。

我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个屋子，除了那个出气孔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烟筒的出孔。就说明，这个地方生过火的。就是冬天生炉子的。那边是个大窗户，这个窗户上头是弧形的，挺宽的。窗户是玻璃的，涂了白漆，就是让我看不到外面。然后有铁丝网又有铁栏杆。在外面有铁栏杆，在里面有铁丝网。这种铁丝网不是毛扎扎的那种铁丝网，是那种圆的，编的那种圆环的铁丝网，但是太阳照上的话，还是多少能够有点儿亮。房间谈不上向阳，放射状，它不一定赶得上正东西还是正南北。

我说的第二个监狱，是从这儿又转到半步桥，住的是K字楼。有王八楼，有K字楼，都说的是楼的形状。我们那个楼就像老K的K字，所以叫它K字楼。功德林的房子都是平房。

我是一个人住一个屋子，有的屋子有两个人，有的屋子有三个人。三个人的屋子要比我的屋子大，我的屋子小，就一张单人床一放，就不够再放单人床的地方了，那就是我每天度步的地方。

下面就是说我在那儿见识到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房子的墙我进去的时候是新的，看样子这个墙做好了以后还没人住过，那么我是第一个了，这倒挺好。噢，对了，睡觉的床板脑袋顶上是一盏灯，这盏灯是缩在里面的，在房顶上面挖了个洞，下面是有铁丝网网住的，那个灯一天24小时都是亮的。因为看守他要监视你的行动啊，所以那个灯永远是亮的。这个墙壁呢，下面一段是水泥的，就是我说的那个新抹的墙。

因为我是空着身子被抓来的，当时抓我的时候屋子里还挺暖和，所以大衣也没有披上，就穿得很单薄，只穿了毛衣和线裤。那时候是3月份吧，还是冷的。第一天晚上睡觉，实在是够冷的。他给了一床被子。是一床黑色的棉被，黑土布的，里面是白土布的，外面是黑的。还给了一床毛毯。我去睡的时候被子还干净。肯定是用过的，但是不脏，拆洗过的。可是没有枕头，这可惨了，我心想这睡觉可怎么睡呀？这马上就要睡觉了，后来想想，算了，也甭垫了，本来那个毯子应该是搁在床板上，看看没有枕头了，只好把那个毛毯迭成枕头了，就这样盖上那个被子。那个被子非常的薄，而且很小，长度是够了，但是很窄，就是说你稍微一动，就要露缝了，它刚刚够把我裹住。

第一晚上就这么睡过来了。睡过去以后就觉得，怎么搞的，身上怎么这么痒啊？早上起来放完了茅，吃完早饭就开始寻摸起来了，怎么回事儿？把那个毛毯

翻起来看看，哎哟，臭虫！喔，不是，不认识啊，从小没见过臭虫什么样子啊。就看见有虫子，逮着一只。哎哟，那个玩儿意挺会躲的，一见亮，嗖地往床缝里一钻，我就再翻别处，哎，好不容易堵着了一个，给摁住了，捏起来，还不太容易弄碎它，使劲一挤一压，出现一股恶臭味儿，我心想这一定是臭虫了，没错了，味道非常难闻。捏死了一个以后沾在手上，挺难受的，顺手就往墙上一抹，哎哟，一条血印子。因为吃得饱饱的，都是血吗。哎，我心想，不错，用来记日子吧。今天是第一天，哇哈，一道儿。

可是后来那臭虫抓得多了，还是想往墙上抹着最方便，心想，我住在你这个号里头，我非得给你弄点儿什么标记不行！于是就抓了一个在墙上抹一下，抓了一个就在墙上抹一下。开始是在那个水泥面，水泥不太显着了，后来，白的地方我留着记日子啦，逮多了以后就抹在水泥墙上。没多久就是一片都是脏的，都是血。

熬了大概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以后啊，他喷了一次药，好啦，没臭虫了，结果虱子出来了。没有臭虫了有虱子啦。我这个人过敏，臭虫一咬就起一个大包，完了以后哎呀，痒得啊，简直难忍难熬。所以臭虫对我的威胁非常巨大。虱子很奇怪，虱子咬了我，我不觉得怎么痒。天天就从毛衣里往外挤虱子玩儿，逮着了就一挤，嘎叭儿一声，嘎叭儿一声。这很容易就联想到猴子抓虱子。

还有一个就是冷，屋子里没有火，而且有了烟筒的窟窿眼，它两个窟窿是对流的，本来生火可能是在那个简道里，中间通过烟道给提供点儿热量，结果现在，火也不生，烟筒孔也不堵，这就变成了穿堂风的通道了。到了第二年冬天他也不给装啊，我一直到68年才给转移到了半步桥。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

很冷啊，冷怎么办呢？我实在冷得没辙了，就把那个毯子裹在身上，天天那么裹着。后来毯子不够，再冷一点儿就把被子也裹上。

第一天上午吃完早饭以后，在抓臭虫之余，看守来检查来了。检查到我那儿，我就在那儿干坐着，他开开门进来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学习？”我说：“学什么？”“学什么？！毛选！语录！”“没有！”“嗯？你怎么能没有毛选和语录？”我说：“他们把我抓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让我拿呀！”呆会儿，他说：“好吧！你等着！”他就一锁门走了。呆会儿来了，一开门，送了两本上下册，毛主席著作选读啊，甲种本。没给我乙种本，甲种本是两本，还多看一本。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从

此以后，我就有书看了。

哎，这是好事啊，他送进来以后我还谢谢他呢，这一谢坏了“谢什么你？！反革命！好好念！”这样，每天除了吃饭的时间以外，就是学习，到点儿睡觉，到点儿起床。

放茅时，他要求你跑得很快，动作要求非常迅速，跑慢了就是一脚皮鞋。我当时不知道啊。因为经常大人说我毛里毛躁的，就是说不够稳重。所以我后来就总是让自己稳重一点儿，结果我就提着个桶，端着盆，慢慢悠悠地走，稳步向前。结果，他说：“快跑！”我还在那儿稳稳的，上来就是一脚！嘭！给我踹得没办法了，只好跑。放完茅了以后就让开饭了，我刷牙洗脸完了，就听着脚步声，很沉重的脚步声。完了就听着，咚！一声，大桶落地。是一个很大的木桶，里面全是窝头或者全是稀粥，另一个桶里全是菜。两个大桶，哗……沉重的脚步，哼哧哼哧的，咚！一声，一个大桶落地，待会儿，咚！又一个大桶落地，行，齐了。“开始打饭！”叫了，哗啦，1号门就响了，哗啦，哗啦，领教过一次就知道了，这个程序就是打饭，什么时候开门做好准备吧。这是第一天啊，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知道等着他开门吧。等到他开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干嘛呢，

我以为怎么着，是他给我送进来还是什么，结果一个人开了门就是说：“拿上碗！拿上筷子打饭！”这我才知道，赶快到脸盆里把饭碗拿出来，筷子拿出来，然后就去打饭。打完饭呢，就是两个窝头，一勺菜汤，就回来了。很快就消灭了，这个东西不够吃啊，幸亏我肚皮不大，还能吃得饱。完了以后又开门了，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啊？“拿着碗打水！”噢。是打开水。哎哟，饭后这点儿开水可是宝贝，后来才知道。你不是吃不饱吗？最后得把这个肚子填饱了。那么两个窝头，四两不到的粮食肯定是吃不饱的，一天两顿，要是三顿四两肯定够了，他一天两顿，还缺二两，靠什么？就靠这点儿水。

拿碗去打，拿个瓢去舀啊。洗澡、洗脚、洗脸、洗手、吃饭，轮到吃好的的时候还要舔盆子。其实大家都是拿脸盆打的，开始我是新来的我不知道啊。后来我听到有拿盆的声音，那拿碗的声音和拿盆的声音不一样的啊，我一听这个，好，我也拿盆儿。开始呢，我是把饭碗搁到盆儿里，然后端着盆去打，这样一舀，反正出去也溅到我的盆里，后来干脆碗不要了，咱就拿盆吧，就在盆里吃了。打开水的时候用盆太划算了，他那一舀子全进来了，那我可以喝好多水，那一碗水管

什么用呀。这都是经验，监狱里的经验。

馒头热菜都没有，就是两个窝窝头啊。要是有了馒头就是改善生活了。每逢过年过节，比如说每逢十一、五一，或者是每个月有那么一次馒头吃，每个月可能有两、三次的改善伙食。改善时候的菜呢，可能是鸡蛋汤，漂着蛋花儿的加一点儿菜叶子的汤儿，或者是有点儿肉末儿的汤。只有在过节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到肉块儿，肉块儿宽粉条。这就是在过阳历年或过春节的时候，这是在功德林啊。一般的改善是菜叶子里见点儿肉末儿。

最后从那里放出来的时候，有工资的人还要交伙食费，就是像叶选平、叶选宁他们都是已经工作的，他们有工资，我是学生我就免费了，他们还要交每个月5块钱的伙食费。

“那时候我不知道叶选平他们也在功德林？”抓我的时候是在学校里把我抓走的，单抓的。叶选平他们是跟我同一天抓的，同一天同一批。他要签署逮捕令的时候是一批人，我们算是一拨的。

我在里面的时候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与我同时抓了我们一个叫程希平的同学，他住在我斜对面，我也不知道，抓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在他前一部车走的，第二部车就是他。

我也想在监狱里能与他们联络一下。但是联络了也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那是我们同学，吹口哨对答啊，因为事先没有联系好暗号，不知道，没法儿传递，就是你吹几声口哨，我吹几声口哨，互相应答一下，还要趁看守不在。看守要逮着了，那就麻烦了。进去以后，为了想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我引体向上看了一下，给逮着了，拷了24小时。关了我两个月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审。第一次提审我才见到我的预审员，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这个专案组是属于中央办公厅二办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专案组的组长是黄永胜。

审我那些预审员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主审我的叫林克，是预审员里的头儿，这个人大概是个将军，是个少将还是中将？还有一个胖胖的，那个老头挺好的。就是说，那几个人喊得厉害的时候他老制止他们，岁数很大，头发也斑白了。这个人叫什么不知道，他经常制止他们，他也不说话，就在旁边听着，有时候在我周围转转圈，走走路，这个人可能级别高一点儿，大概就是抽查式地来监听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专案组全是军人，从开始逮捕我起就都是军人，见面的就都

是穿军装的军人。中央二办属于汪东兴管的，即中央办公厅第二办公室。当我知道是中央二办管我们的问题时，我就知道这事儿闹大了！落到中央办公厅手里的案子都是全国大案要案，否则也不这么来了。我觉得很好笑，说实在的。咱们小不啦子的，什么也不是，一个破学生，我想你们也够重视我的，够抬举我的，这玩儿意部长级待遇。就是觉得好笑，一点儿都不怕，很有意思！完了我就想啊，在预审前的这两个月里头有时候闲遐下来，耳朵听到放广播操，因为我们旁边是一个中学，当时还没有改成师大二附中，现在叫师大二附中了。它放广播，学生要做广播操，完了以后还放《红灯记》，放《智取威虎山》。那么人就很自然地对熟悉的东西就会引起共鸣，共鸣就会情不自禁，情不自禁就会跟着唱起来。那么在放《红灯记》的时候，李玉和有一个唱段，什么“狱警传……”，到最后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了，不知道在坐牢了，没意识到自个是囚犯，就跟着唱起来了：“要把牢底来坐穿…”这下坏了。那门口刚好看守经过，啪！门一响，链子一响，我想：“坏了！这回给逮着了。”因为我已经引体向上被拷了一次了，这次就准备好了。引体向上是活拷子，是24个小时，这次是死拷子，这次弄完了以后说：“好你个反革命！到现在还不老实！”给拷上了。哎，死拷子比活拷子舒服多了。死拷子是一个铁环儿，环儿的中间有一个销子，插到另一个环儿的一个缺口里面，这个插条有好几个档次，好几个窟窿眼，那么插得越多就越紧。没有给我插得很紧，就是拷上出不来就行了，挂个锁头一锁，拷得比较松，不觉得难受。活拷子是越挣扎越紧的，死拷子是它拷住了就是那么紧，不会松也不会紧。

他说我不老实，就把我拷上了，我唱样板戏最后一句歌词就是“要把牢底来坐穿”吗，这正好是我在坐牢，所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跟着人家样板戏唱，对不对？就像一放那个胡传魁“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我也很情不自禁的，因为我最喜欢这种花脸了，还有过去袁世海的唱，我都很熟的。因为我们一家子对文艺方面，多少都有点儿传统，家里又爱看京剧，所以我对京剧还是很理解的，特别是从小就灌输了，到现在这个角那个角的唱腔，我还可以说出很多来。所以很自然地，他放样板戏我也会学的，而且样板戏比过去的京剧好唱得多，它已经有歌曲的味道了，通俗了。

这样我又被拷了一次。也是24小时。第二天同一时间，看守过来给我打开手拷，“你老实点儿吧啊！你要再不老实我就给你背拷了！”这次我是正拷，背拷

是把手铐在背后。因为我没被拷过不知道，后来听人家被背拷过的人跟我讲，说背拷拷了以后吃饭怎么吃呢？打饭可以这样，端着盆可以这么走，对吧？完了可以跑回来，然后一蹲把菜给放下，然后转过头来，狗吃屎似地这么吃，趴在地上吃。有两个人就好办了，没拷的那个人就可以帮帮忙，一个人就最惨了。这是背拷。还有一种叫和平拷，就是说犯人挣扎的得越厉害的时候，或者是想治人的时候，给你这么拷着。我所知道的就这三种，和平拷我是没见过，我只是听人家见过的人说过，并没有见过这样被拷的人。

在里面还听说过有和平衣。和平衣就是穿上衣服打上气那种，就是怕人自杀。那个很难受的，憋死人，时间长了能把人憋死。好，这就是共产党监狱里的所谓的一些刑具。除此之外，这段时间我的经历就是我发现我的斜对门，老有个人轻轻地吹出嘶嘶的口哨，于是我就大声的吹了两声，对方就呼应，学鸟叫呀什么的，呼应了半天，最后才知道是我们同学。是出来以后，见了面了才知道。

可以喊话呀，喊话就听见了。另外，哪知道是不是一定位置的人呢？我引体向上不巧，被人查着了，被拷了 24 小时。他引体向上看到我了，他知道是我，我不知道是他。所以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实际上我们这个 9 筒里头，出来以后才知道，关了三个我们同学，还有一个蒋良朴也关进去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怎么一个都不知道？”他们都有办法看到我，而且他们都看到我了，我没见到他们。因为我是属于被监管得比较严的，好不容易看一次吧，还给逮着了。

这样熬了两个月，才提审。后来才知道，为什么要熬两个月呢？就是让你在这个安安静静的环境里先思索思索，然后使你的思想已经落后了，跟不上形势了，这时候他来提审你，反而是最有利的，最容易被攻破。另外关了一段时间以后，使你的恐惧心理不断增长。可是我发觉。对于我来说，这一点没用！因为我自己本来就不怕，很奇怪的，一般坐牢的不会这样。但是第一次预审以后，我倒是提了个问题。就是第一次预审的时候也不说多少话，就是问我文化大革命开始干什么？什么什么时间干什么？一直到中间干什么？后来干什么？一直到抓起来，这一段。就等于让我把这一段历史给叙述一遍。这样子，我就照着他问的一条一条说吧，我到了哪儿，到了哪儿哪儿，有谁谁做证，都说了。说完了以后呢，让我回来写材料。就这样又搁了我一个月。等于三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审问。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我们已经核对过你的材料了，也调查

过了，你确实实说的时间是对的。”把结果还告诉我了，还不错。说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样，第一次预审完了之后，我向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一个是我说我想要学习，我没有书看，他们借给我一本语录和毛选甲种本上下册。我说我要看的东西太多，能不能从学校我的书中把一些书拿过来？他们说：“这个可以。记下来。”完了我又说睡觉：它那个牢房里只有一条毯子和一条被子，连枕头都没有，我说我现在睡觉很困难。能不能给我把学校里睡觉的那一套东西拿来？褥子、被子、枕头。“可以。记下来。”噢，这个呢，就解决了。回去我就发现。等他第二次提审之前，东西就都送来了，这我生活就过得很好啦。完了第二次提审的时候，预审员就问我：“你的毛选合订本为什么与众不同？”我就说了，这是我父亲给我的，这种书就印发了一版，而且数量很少，都是给高级干部的。我父亲把它给了我。所以你看的就是这种样子的。它是最薄的纸，又白又薄的纸，印刷也比较好的。最后就落到我手里了，他们就觉得你怎么会有这么一套书？我说你不信可以去问，后来一问也落实了，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还挺细心的，看到毛选不一样还来问我。所以这个时候，有书看了了，我就觉得很好了。每天也不寂寞了，那个时候我真是苦心研读毛主席著作呀！一至四卷。除了毛选其它的不能看。在监狱里学毛选是一种不一样的心态。一个人就是在只有看毛选才能度日的情况下，他看起来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稳稳当当、慢慢的，而且不断地思索，就很容易钻得进去。我就发觉在这种环境下研究科学太厉害了，他没有任何的干扰，一门心思就钻研这个东西。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很认真很认真的，我觉得我那时候真是在一边看一边想，我老是在对照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结果我反思的结果认为，我非常的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我的行为没有错误。还特别有几篇文章，像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我那个时候有时间就研读党史，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就是从毛主席那些长篇的，什么论中国革命中的战略问题，还有什么抗日时期的游击战，还有《论持久战》之类的东西。这些文章看了以后就看注解，看注解就回忆我看过的东西。这就更深刻地对党史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呢，好好地重新学习也好，或者是复习也好弄明白。再有他的一些政论性文章，比如他的有关哲学的《矛盾论》啊，《实践论》啊，我就用这个来检查自己的言行，我发觉我完全是按照这个做的，我并没有错。这时候越看越觉得我是对的。

我也对我受到的冲击可以理解，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觉得挨点儿打挨点儿骂，这都是小事情，这些过激行为总是有的。我是理解别人这样对我，并不是我去搞别人。因为我从来没有对别人做过过激行为，甚至是包括抄家的话，是有令必须得抄，但是抄的话也尽量是文明点儿，就是尽量别欺负人家被抄家的人，或者说能不抄就不抄，能拖过去就拖过去，我不愿意干些这事儿。

当时毛选四卷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学习时他要求坐在指定的地方，就是床中间最前边的边缘上，面对着牢门。本来规定是盘腿坐，可是我不会盘腿，我坐不住啊，以后他也不管我了。能睡午觉，但不能随便睡觉。到时间了可以睡，不到时间不让睡觉。中午有一段时间是休息时间，一个钟头。如果坐在那儿睡着了，让他看见了就叫你：“学习！学习！”看守经常的走，不时地看，有巡视的。一般交接班的时候看。交接班都听得见，什么几号要送墨水，几号要送纸。就是看守在筒道里互相交待，说话可以听得见。他们有时也让我在外边散散步。大概是一个月洗一次澡，我们洗澡很困难的。他给你放出去，你就按照他的路线，跑到澡堂子里头，用最快的速度脱了衣服，跳到澡堂子里头5分钟。实际上根本没有5分钟就把你轰起来了，穿好衣服再回来。5分钟呢，你想想。在那里头穿得那么简单，只要把那钩一脱，呼就下去了。脱衣服的速度极快。他轰你的时候你就不能不起来了，不轰你的话你就在那里洗，轰你了你就起来。穿衣服慢了让他说两句就算了。没有淋浴，是热水，一个大池子。好象我洗的时候没觉得是脏的，也可能我们这些单号的人先用。功德林这边是一个月洗一次澡。放风的时间不定时，大概平均两个礼拜有一次。所谓放风就是开了门，让你在两个筒道之间的空地，三角形的空地跑圈，不停地跑或者做操，运动时间大约也是5分钟左右，然后回来关上门，再放下一个。所以每轮一圈都很长时间。

从院子里可以看到，种了很多蔬菜和瓜，开花的时候还挺漂亮。也许是心情的关系。因为我老看不到牢房外面。但是明显是在你的正前方有一个岗楼，木头架子搭的，上边有站岗的，监视着你，外面还有一个当兵的监视着你。你一停下来他就叫你：“跑！运动！”除此之外，可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突然叫你劳动。比如说那儿种的萝卜要拔了，让你去拔萝卜。这种事儿我是没挨上过，隔壁的人挨上过。我只劳动过一次。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出去晒被子。晒被子以后，还可以放你去拿回来。那个时候那个裤腰带的襻都已经松了，老得担心它掉了。我

在牢房里自己也经常锻炼，我老是用看守检查完交完班那个间隙锻炼，仰卧起坐我一次做 125 个，俯卧撑最后做到 75 个。衣服破了可以要针线，但是挺困难的。你把牌子扔出去，他问你要什么，说要针线，他就给你塞个针线包进来，里面有点儿线。线也不多。每个月可以发一封信，这个信的内容只能是要东西，他要检查的，钱，像什么邮票钱呀，都从你那个存档里扣。可以买牙膏，可以买肥皂。他告诉你，拿出样子。从来没有收到过信，只能往外发信。

比如你要一件衣服，要是家里给你送来了，你就知道那信收到了。我在那一年多里头，大概往家里发了有 7、8 封信，是全部没有回信。直到到了半步桥，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别人也被抓起来了。到了半步桥临放出去前，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姐姐，那个姐姐没被抓起来，她接到信了，给我送东西来了，送东西来的时候我已经放出去了，我已经进了另一个班里去了，进学习班之前。那个东西送进去又追出来。

问：在这个地方审问也多吗？

他就是把一个一个问题全订正完了以后，再返回头来，让你再重复一遍。就这么老反复，重说一遍他又提一串一串的，他研究完了再提一串一串的，等你回答完了以后，又让你重说一遍。一个礼拜左右提审一次吧，那个循环是非常密的，有两个月期间是一个礼拜一次，完了回来就得写你自己说的东西，完了他再存你的纪要。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完了以后可就稀稀拉拉了，不知道多长时间突然提审一次。那时候特别希望提审，提审可以走一段路，可以看，还可以有人跟你讲话。

在那里头那些看守都是把我们当成最坏的人，找到你的毛病就拳打脚踢，上皮带这都干过。我上次就讲过看报纸的事儿，我不是要看报纸吗，他把门弄开了以后问我看什么报，我听到隔壁在问，看守问那个坐牢的人，他看完了《人民日报》了，问他《北京日报》还看不看，那个人说要看，看守就给他塞进去了。我一听说有报纸，我就要求看报纸。结果他说：“你要看什么报？”我说：“看《人民日报》啊。”我想总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吧，他说：“《人民日报》是给人民看的，你算什么？”嘭！一脚就踹过来了！我不服气，不服气，他就抽了我一皮带。就这样的事情。他们是把我们当成真正的敌看待的。但是这个事情呢，提审了以后，我告诉了预审员，预审员说他们一通。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哎，这

预审员还能保护我呢。下次我还告状。

所以我就提出看报纸，预审员就交待给他们给我报纸看，于是就在我的门上也划了一个圈。划了一个圈以后就给我送报纸来看。结果有一次解放军大扫除，把那个圈给擦了，而且看守换人了，他们轮换的啊。又不给我报纸了，我又等了一个月的时间，再次提审，再跟预审员说。预审员说：“怎么搞的？上次不是跟他们打过招呼了，要给你报纸看，这他们不对。”当面把那个看守说了一顿。这预审员呢，我觉得挺讲道理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还行，可能他只把我当成政治犯对待，按政治犯对待不该拳打脚踢的。但是他在审讯的时候，可是当反革命审讯的，也有时候要拍拍桌子，瞪瞪眼睛，一旦他们对我过火了，那个老家伙就制止他们，很有意思的。反正在我的印象里。最坏的就是那个林克，凶得要命。

差不多是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到的半步桥，1969年的3、4月份，好像是过完节了，这个时候就说出所有功德林的政治犯都要转移到半步桥去，半步桥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功德林这边要进新的政治犯，我们这拨搞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给我们转移了，当时就是一个简道一个简地道轮流带，这个都是有讲究的，就是我坐的那一车里的人，没有一个我认识的。这个说明他们一定是有安排的。是在一个晚上。“拿好东西！快点儿！快点儿！”我拖上我的被子，拿上东西就跑过去了。那时候也不管什么了，反正当兵的都像路标似地站好了，一个一个的，那个路线，随着他就到了汽车上。

转狱，从功德林到了半步桥

他们是在一天晚上突然告诉我的。突然的，事先一点儿都不知道，就是吃完晚饭以后，正在歇着呢，歇一歇准备看书了，突然来说：“收拾东西，快点儿！”我就收拾了东西，就这样开了门，就上车了。上了一车人，呼呼就开车了，在这个车上我的位置非常不好，被挤在中间也不知道是哪儿，还想看看呢，还想找标记呢。从后面可以看，也看不太清楚，有一个高个儿挡着呢。下车了以后，听人家说，这是半步桥。这一群人里有人认识这地方的呀，半步桥，我才知道这是半步桥。我进了K字楼，K字楼是三层，几层几号，我也忘了，这个我记不得了。好像在三层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挤了一屋子的人，进来一看，数了数个，好家伙21个！多进来一个，又给轰出去一个。然后就给大家派好位置，你在这

里，你在这里……。它那间屋子呢，两边有两排木头像炕一样的、但是没有炕高，就离地面这么高的木头板。这边 10 个人，那边 10 个人。后来算一算距离，每个人大概有 40 公分的宽度。其实那个屋子里原来是住 10 个人的，让我们住 20 个人。每个人都侧卧，不能平躺。

这是住的大号，进去以后兴奋得不得了，因为终于有说话的对象了。在那里，尽管大家都不认识，但是见了面以后都很亲热，可见着人能说话了。不睡觉，就说，聊天。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因为见了的时候也没说不许说话，也没有人监规，已经晚上，看守给安排好。很奇怪，半步桥的看守全都是公安人员，带的是警察的标志，不是当兵的。所以那个老看守来了，给我们安排好了，点好位置以后就让我们铺床睡觉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说：“你们睡吧。”就关了灯了。

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说是半步桥，。进去以后过了好久才知道这是 K 字楼，是看守告诉我们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高兴了，好象被释放了一样，可有人说话了！可享受一定的自由了！ K 字楼一般都是关审查完等待处理的囚犯，已经审查完了。第二天，看守来了以后，就指定了一个号长。这个号长的年纪大概有个 30 或 40 岁吧。那里全部都是政治犯，各是各样的政治犯。一个大概是重庆钢厂的党委副书记，后来因为犯错误给调到《重庆日报》当副社长还是什么，叫刘沙。这老头子跑到北京来请愿来了，给抓起来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是西安的一个国民党时期的中校，后来被改编了以后在空军是个工程师，这个高级工程师好象叫徐坚。这个老头儿挺好的，上海人，学识很渊博。当时有 60 了。最老的是牛街清真寺的看门老头儿，叫刘正富，是 72 岁。他说：“73 是坎儿年。”他说：“我就要到坎儿年了，看我过的去过不去。”还有一个 69 或 70 的，老头叫侯天德是天津的。天津这个老头儿当年做过国民党时期天津市法院的书记官。当时陈伯达被捕的时候，他参加过审讯，他是当时的书记官。侯天德这个老头儿，关的时间挺长的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出去了。陈伯达不完蛋，他就别想出去，直到死。也没有理由枪毙，就是关着他，不让他出来就行了。我为什么对他很熟悉呢，因为他睡在我旁边，挨着的，因此学习的时候排座次也在我旁边。这个老头对我有点好处呢，就是他饭量非常小，岁数大了，吃不完那些东西，就把剩下吃不了的给我。我还挺感激他的。他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出来以后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大概 82 年死的。

陈伯达当时是“四人帮”的头儿，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肯定不会让这些人好好待着，一定会把他关起来堵住嘴，这些人知道得太多了。

再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号长了。号长是医疗器械研究所的，就在我们家旁边。可能是一个技术员加采购，这家伙挺油儿的，知道的也挺多的。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人太差劲，打小报告。他当号长时，我们这儿有点事，他都给反应到队长那儿去。我们经常挨他的整。所以我就搞了一次政变，就是故意惹事跟他打了一架，结果把他打了以后，所有的人都说是他惹了我。结果就把他的号长给撤了，让我当了。

我之所以能把那个号长打下去，让大家都支持我，是由于那个号长告发了几个人，人家恨他，所以他们支持我，另外还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当时都是属于地院东方红最得力的支持者，所以，我在那儿成了当然的领袖，他们都听我的，有那几个小伙子支持，连偷窝头的主意都是他们教给我的，告诉我说，你数数的时候数含糊点儿不就行了吗，多拿一次就多两。

我当了号长以后，从此本号太平！也给这号里带来一些利益：吃饭能多吃一点儿，我会偷窝头！当号长有点儿特权，就是打饭归号长打，号长还可以任命一个帮手，副号长，可以帮忙打菜。打饭的这个手就很重要，那个窝头靠自己拿，看守他不管，看守把大桶往那儿一敦，20个人你得拿40个窝头啊。两个手拿，一个手端着盆，一个手拿窝头。这一手抓是可以抓两个的，但是抓三个非常难。看守看你抓了头几个他就不看了，一般都是认为可靠的人才能当号长，但是他哪儿知道我数着1、2、2，我第二次再数2时就多了两窝头进来了。

所以它每回的总数老是不够，它的总数是一个桶的总数，我们又不在同一个桶拿，到我那儿我是左右桶都拿，我就不再理他了。偷完了以后，到那边的就不够，不够就补。补了三回，这个看守就不干了，预先就要查。就是说我们打饭他就来查，查着谁谁倒霉。刚好我们又不是头一个被查着的，他们前边的屋被查着了，我们屋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呢，那么我打的时候还偷，偷了进门以后，因为那个屋被查着的时候，还没到我们打呢，他刚打进去就查，查出以后就说，我们这边就听出来了，是查着了。那么我们就商量好，还偷不偷？那两个地铁的工人，有一个叫扬增辉的就说：“偷。怕什么？回来撞上再说。”我一想，对，20

个窝头搁那个巨萝里就高出来了，一进门，哐，一晃，哗，就下去好几个。所以，我就还照样偷，偷完了门一撞，接着那边的人，啪，就塞到被窝里了，配合得非常默契。因为我是在这一排进来的第五个，这俩刚好是一个挨着门边的，一个是隔了一个人，这俩就在这儿等着我，我一撞门，这俩啪！往被子里一装。最后就来数来了，一数还少两。我说：“唉呀！糟糕了，还少两。”“再拿两去！下回注意了！”那次偷的最黑！偷了6个！加两就8个，够黑的了40个窝头，加了8个就等于48个窝头。反正也不怕，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多吃点儿也好啊。

但是后来就不偷窝头了，因为不知道公安部哪个好心的副部长，临死前打了个报告给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在押人员，大部分可能将来还要重新工作，他们也不一定就是坏人。现在监狱里待遇太差，死亡率很高。希望生活待遇好一些。

我在功德林的时候就听到鞭打呀，哀嚎啊，后来有的人打死了又抬出去了，这些事都有，都听说过。我的邻居是个老头，这个老头儿毛选老是背不好，背不好就拿皮带抽，每回都抽他十几、二十几下，他都被打怕了。他背《愚公移山》的时候，背到那个地方永远出错，就绝对背不好，背不好就打。打呢，可能这个老头儿就死掉了。看守在那儿说说：“没气儿了，叫大夫来吧。”死掉了以后就抬走了。

里面的大夫还给检查身体呢。我被检查过两次。牢房里面有大夫，大夫是很人道的，来了以后就给你听听呀，弄弄啊，看看啊，检查身体。完了以后问问：“有臭虫没有啊？有虱子没有啊？”你要说有的话，他就给你打药。

出狱，从半步桥到“789集中营”

在半步桥被关了几个月，六九年六月又给我转到789。

转789之前，在半步桥监狱的一个学习班里住了三天。可能是等还没办好转移手续的人然后一同送789。到了“789”，彭宁说，他是当天从监狱的牢房给送来的。我们同一天来的共有三个人，算是789的第三班，所谓的“同案犯”有叶选平、叶选宁、邹家华、彭宁、程希平和石白河。另外还有清华和北航的两个学生。

天晓得为什么给我放到789？实际上等于借助这个地方，单给我们办了一

个班，我们不过是789的一个过客。在我的整个监狱经历中，789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

跟着我的案子来的还有我的两个同学，我们是同一个项目组。我的案子已经审查清楚了，按上面的意思，我属于应该到789来的人。我的两个同学虽然家里不是高干，但他们一直跟着我的案子走，所以也就跟着我到了789。他们两个真是冤枉，如果我的案子还要再审查，他们就得跟着继续坐牢。其实他们跟我的案子牵连也不大，但跟项目组抗争得比较利害。抓他们的时候事情就不大，白跟着蹲了很长时间的监狱。也可能怕他们出去以后乱说，我被限制在什么范围，他们便跟着被限定在什么范围。上面希望案情扩散的范围越小越好，到了后来，我就利用这个做审讯的挡箭牌了。

“789”有晚点名。晚点名的第一个项目是背诵毛主席语录，什么“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说我们是需要改造的人，似乎我们都是有问题，现在要改正错误。还有什么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呀，一天到晚翻来覆去背诵。背完语录队长开始训话，那个姓季的队长说：“啊，今天新来了个三班。啊！梅建明竟敢蔑视队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他都不说！啊，他爸爸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政协委员！”我一听点了我的名儿，挺高兴，我想怎么点到我头上来了？看来今天队长要发作，我也做好准备。结果雷声大，雨点儿小，他说了以后没人接他的话茬，没有了呼应他们，冷场了。他们只好说：“那，散会！”

散会后，郑京生跟我说：“哎，你今天够意思啊，跟这个季队长干上了。”我说：我知道他算老几呀？他是不是队长我都不知道，凭什么他过来就审问我？！郑京生说：“你小心点儿，季队长可记仇呢了”我说：管他呢，反正他拿我也没法子。郑京生问我：你爸爸是政协委员？我说是，他说：看来他还是不知道其它情况，他也不知到从哪儿打听来的？我的档案里没有我父亲的情况，我父亲要只是政协委员，说实在的，我也不够格儿到789来了。

到了789，我觉得环境很良好，大家都是干部子弟，谁是谁家的孩子也都知道。就是他本人不说，别人也都会告诉我。华川是个小不点儿，是张经武的孩子，他父亲跟我父亲是同事。

在789我还是挺爱争论的。记得有一次大家争论地名，我说有个地方叫湖州，叶选宁他们说绝对没有这个地名，我说：怎么没有？不信咱们查地图。他们

还说：就是没有湖州。叶选宁是个事儿头，在旁边起哄架秧子，经他一煽呼，彭宁他们都跟着说没有。我说有，他们说没有。说着说着激要急起来了，急起来就查地图。正好我们手里有本中国地图册，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的，挺详细。我一拿过来，哗，一翻，翻到浙江省，指着地图说：“这就是湖州！在太湖的南岸。”他们哈哈地大笑，说我们说的是胡扯八道的胡诌。把我气得呼呼的。他们一伙人冷嘲热讽，起哄架秧子全上来了，想整我一通。很多难听的话都讲出来了，越弄越急。这时候叶选平说话了，你们别瞎闹了，你们也不看看人。人家规规矩矩的，你们惹他干嘛？这下都安静了，这时候要是有人再点点火，就真要动手打起来了。他还说本来就有湖州这个地方，地图上都有嘛，这回可有人帮我说话了，叶选平讲了这个话以后，大家才没打起来，要不然，我真要跟他们动手了。后来叶选平还说他们：你们也不看看人，能开玩笑的，你们可以开玩笑，不能开玩笑的，你们就不要跟人家开玩笑。惹出事情的话，你们得负责任。叶选平确实有个老大哥的样子。

在789所有的思想改造都是针对自己的？没让我揭发父母。因为我父亲的案子属于中央一办管，保密级别更高吧。预审员也没再追来。所以我在789还是比较好蒙混过关的。在那儿学点儿什么东西，就让对照着检查。因为不能谈案情，我也没什么好讲的，不疼不痒地说几句就算了。三班十三个人里头，来自好多单位，相互也不认识，案情更是互不了解。就是跟我一个案子的人，实际上案情的关联也不很大，所以也没办法让我们互相揭发。从我们学校这个系统来说，要说反动言论的发源地，就是我、朱成昭、蒋良朴这几个人，我到了这个份儿还能揭发别人谁啊？只能别人揭发我了。

有一次为了唱一支民歌，让我做检讨，说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那次自由活动时间，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一首印度尼西亚民歌：“河的青蛙从哪里来？……哎呀，妈妈。”结果当天晚点名的时候，队长就说啊，三班有个人，竟敢唱黄色歌曲！不知道谁给我打的小报告，当时队长不在旁边，可能是二班的人报告的。队长训完话，接着就批判了我一通。第二天的学习会上，让我做检查。我只好说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没有改造好思想，这个歌儿是情不自禁唱的，以后不唱了。我想这就过关了，可有人批判我，让我深挖根源，说我没有挖到到根子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能挖到根子上，怎么个挖法儿？也不会挖。你让我

再多吃几碗忆苦饭，我也忘不了那支歌。

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就说我态度顽固恶劣、拒不认罪。这个帽子一直戴到我出去，戴就戴吧，我是豁出去了。

说到有人打报告的事，我刚来，郑京生就跟我说过，二班有的人老打小报告。他妈的，在那里头也勾心斗角。我们这个班也有人打小报告，究竟谁打的？大家都怀疑是清华和北航的两同学，到底是不是，最后也没搞清楚。反正每次我有点儿什么动静，那个季队长总能知道。

“7 8 9”劳动，拉车运东西，车挺好拉的。生活条件也很好，我们大学生还有些特权，可以买烟抽，常到里面的小卖部买点儿烟抽。对这点儿特权不能不用啊，本来被关了那么长时间，已经不抽烟了，这下又开始抽上了。抽的时候还说呢牙齿让烟熏黑了怎么办？马上有人说：抽完烟买支好点儿的牙膏，用劲儿刷刷就干净了，没事儿，抽。我又抽起烟来。在7 8 9，对饥饿的感觉，我跟别人也不一样。我本来属于饭量小的，在别人吃不饱的情况下，我也有点儿吃不饱，但没有感觉那么难受。功德林那么差的条件，我喝点儿开水，也觉得这顿饭算是吃过了，也有饱的感觉。半步桥，我就已经能吃饱了。到了7 8 9，我觉得已经很好了，觉得比我们学校食堂还棒。我也不怕了，什么放不放的，也不管了，他妈的就住在这儿啦！谁知道没多久给我放了。

到了7 8 9才和家里联系上。7 8 9规定，家人每月可以来探望一次。第一个月是我嫂子和我姐姐来看我，她们是家里仅有的没被抓起来的人了。她们给我送了些吃的，还有其它的生活用品。她们告诉我，我刚刚被抓起来时，母亲也被抓起来了。为什么抓她不知道，关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因为一直没收到家里的回信，我想母亲一定出了意外，是生是死都不知道。父亲是在我前被抓的。嫂子说，她现在按北京卫戍区的通知，到指定地方给父亲送东西。说明父亲还活着，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被关押了将近两年，才知道父母都被抓了，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是没办法了，听到这样的消息也就是听了，你能怎么办？早就知道逃不过去，谁也逃不过去，这叫在劫难逃。我还不算惨的呢，还有更惨的，父母都被整死了。知道我父亲还在世，还没被整死。我想，我父亲要死，他们会通知我的。

父亲的教诲——再谈我父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就比较紧张。但先整的是党内高层，没整到他头上。他只是关心社会上的动态。当时到处都是大字报，他不敢亲自去看，我就天天告诉他外面的消息。记得开始点名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说彭德怀是很了不起的，很能打仗。其它的话也没讲，总是说彭德怀这个人了不起。以后很久，他才跟我谈起彭德怀的(万言书)。

等我被关进监狱，才觉得父亲的很多劝告是正确的。可惜对他的劝告，我们都听不进去。回想六七年一月底二月初，朱成昭我们几个人两次在我家开会，讨论对文革的看法。本来我们就对中央文革有意见，叶向真又说，这两天她父亲刚跟中央文革的人发火儿，把手指拍断了。几个老师当面跟中央文革吵起来了。一听这个消息，我们认为中央上层之间的矛盾暴露了，而且已经公开化了。我们当然要和老师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开会的那天，我父亲被单位拉去批斗。我跟他讲了我们会开会的情况后，他说：“哪有你们这样搞的？弄不好要出问题的”。我说：“为我们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他说我们想问题太简单了，做这样的事情太不谨慎，“古人说，凡事不密则成害”。他提醒我们当心。我跟他辩论，说有理走遍天下。结果就像他说的：“机事不密祸先行”。刚亮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我们就都被抓进监狱了。当然，在那种环境下反对中央文革，早晚都要被关监狱的，可如果听了我父亲的劝告，我们的损失会少些。

想起我在地质部联络站的日子，我父亲总是问我：“能不能在可以允许的条件下，对那些老干部好一些？”我说，批斗何长工的时候，我给他送凳子坐，还私下里告诉他怎么过关。他说：“何部长可是老干部啦，你们对他要客气”。那时我父亲还没倒台，公开的身份是政协秘书长。文革前，一些民主党派的秘书长都是共产党员，我父亲等于是民主党派的共产党书记，他负责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

李维汉中共元老，曾经主持过中央工作，解放后一直担任统战部部长，但待遇上按中央最高领导的待遇。刚解放，中共中央办公厅看中我父亲这个笔杆子，想让他去当办公厅主任，李维汉不同意，他说：“我们党很不容易有一个专门做国民党高层统战工作的人，不能让他走”。如果父亲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他的党员身份就公开了，可能情况会好多了。当然到了文化大革命也会倒霉。但至少我的出身就能讲清楚了，我连自己的身份也说不清楚。那时候我们学校工作组还

专门问过我：“你父亲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拿着地质部党委的介绍信，怎么查都查不到他的档案？”我回答说不知道，这是很客气了。要是现在，我肯定说：“你们算老几呀？你们要到中组部去，不给你们打回来才怪呢。”一次湖北省到中组部调查我父亲，中组部的人说：“这是绝密。”我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啊。

从我们决定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之后，我父亲一再提醒我要小心。我不认为情况像他讲的那么严重，根本听不进他的意见，老是那句话有理走遍天下，跟谁辩论都不怕。那时还很担心周总理，对毛还有一定的信任感，觉得是中央文革欺骗了党中央、毛主席。后来我父亲的看法都应验了。可当时他对我讲话，真如同对牛弹琴。我们召开第二次会议前，我跟父亲说：“同学们要在家里聚一聚，讨论目前的形势。我父亲说：“你们当心点，不要做太过激的事情。”我又提出：“有个同学住在医院里，能不能用你的车子接他过来？当时王大宾因为住地下室的时间长了，有点儿瘫痪，正在住院治疗，叶向真会开车，我说让叶向真开车接王大宾。我父亲说：“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只要你们能把车开出去，再开回来，别出事就行。”那时车已经被封了，叶向真找了个司机，把车给弄得能开了，接来了王大宾。

父亲是支持我们的。我把我们的观点告诉他，他说：“你们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要缓和点。”我们说：“我们不怕坐牢”，他说：“唉，你们太年轻了，不懂得其中的厉害。”等开完会，大家都走了，我把会上提出了八大观点告诉了我父亲。他说：“你们这些话要是让人给汇报上去，就是很大的罪状。你们没做过地下工作，哪有像你们这样搞的？”当时我哪里听得进去这样的话？在广州给家里打长途电话时，知道父亲被抓了。早已有了这个准备，知道早晚要出这事。一旦证实了，到不觉得怎么紧张了。父亲不被抓起来倒奇怪了。

六七年二月份我们挨整以后，感觉落入低潮。父亲被关到监狱，只是在低潮里再加上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对于他被抓这点，我已经想到了，这是迟早的事。父亲被抓，我自己被抓，都是有精神准备的，都没感觉惊奇。我惊奇的是母亲也被抓起来了。我母亲跟这些事情是一点儿不沾边儿的，父亲绝对不让她知道自己做什么，从来没让她知道，这是工作规定。我想，母亲最多就是在单位里挨整，顶多是住住牛棚。谁想得到把她也抓起来了？从这点就能看出来，只要四人帮在台上，我们肯定没好日子过。我在监狱里锻炼身体，偷偷坚持做各种运动，

就是要支持等到这一天，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父亲被抓以后，我曾经有找周恩来的想法，把我父亲被抓的事情告诉他，请他救出我父亲。本来我有很多机会见周恩来，包括在广州期间，我还帮父亲的一个朋友递给周恩来一份材料。我能见周恩来时，父亲没出事，等父亲被抓了，我也没有见到周恩来的机会了。即便当时能见到周恩来，他也未必帮忙。后来才知道，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点了我父亲的名。是毛让抓我父亲的，周恩来签署的逮捕令。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又能怎么样呢？毛下了命令，周恩来怎么敢不执行？从广州回来想进中南海，还想找周恩来，希望他能保护我父亲。不管怎么说他跟我父亲也是老朋友啊！

说来我父亲是个老资格了。1923年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我父亲就跟着恽代英搞团的工作，二四年经贺唱介绍入团，25年经恽代英和沈泽民介绍转为共产党员。25年“五卅”运动中，我父亲是上海学生联席会议的总指挥，是上海工商联的学生代表，被喻为“五卅”运动的虎将。那时我父亲的名字叫梅电龙。1926年我父亲和另一个人介绍陆定入党，1927年我父亲到武汉，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政治教官，后来就随著名的“铁军”参加了二次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上校政治部主任，就是党代表。那个时候，我父亲跟国民党的上层已经有了很深的关系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我父亲上了蒋介石通缉的名单。随后他随叶挺的十一军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七十一团政委。起义军撤离南昌，在向广东潮汕转移的路上又参加了会昌战役和汤坑战役。十月初起义部队在广东流沙被打散，朱搏和周士第部孤立无援，被围困在一个叫三坝河的地方，最后他们上了井冈山，会同毛泽东部，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我父亲奉命经香港回到上海，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周恩来召见我父亲和夏曦，任命夏曦为新的浙江省委书记，任命我父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并部署在浙江发动武装起义，后暴动失败。当时康生好像是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他和我父亲因意见不一致，大概发生过争论。

一九二九年八月初，受周恩来委托，由李维汉直接交待，派我父亲到日本东京。日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在上海被捕，让我父亲通知日本共产党。还给日共带了一笔钱。我父亲改换姓名，装成留学生。到日本后，秘密联络点已经被破坏，我

父亲被捕。受到严刑拷打。在东京的中共特别支部廖承志他们，为了营救我父亲，在银座游行，被日本警察逮捕了一些人。我父亲带给日共的钱也被搜出来了，中间又出了叛徒。日本警方也查出他是“五卅运动”著名的共产党员。我父亲的身份暴露了。无论日特怎样逼供，父亲始终否认自己和东京特支的关系。他在东京监狱被关押了十六个月。一九三一年六月，陈云交给我母亲一笔钱，作为我父亲回国的旅费。我父亲接到这笔钱马上启程回国。

父亲回国后，陈云为我父亲恢复了党的关系。陈云认为我父亲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转为“灰色”的政治面目。于是我父亲表面上脱离共产党组织，作假象迷惑敌人。只保持跟潘汉年的单线联系，听候党的指示，专门做国民党高层的反蒋统战工作。从这个时候起，我父亲改名梅龚彬。

一九三三年底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发动反蒋政变，我父亲立刻赶赴福建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并设法和苏区中央联络，促成共产党和福建政府达成反蒋抗日协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反蒋活动，以十九路军为主，和蒋介石公开对抗。可惜共产党这边正在反围剿，又是王明左倾路线占上风，福建人民政府没能获得红军的支持，没有坚持住。蒋介石很快大兵压境，十九路军给打散了，头头儿都跑了，剩下的部队蒋介石给收编了。当时要是苏区跟十九路军两边合起来干的话，第五次围剿没准就围不起来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危害太大了。福建政府完蛋以后，我父亲转入地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父亲的身份一暴露，他负责的工作被破坏惨了，好多人被暴露了，几十年的工作几乎都白做了。据说，父亲解放前建立的一个电台，直到他去世后，还一直在工作呢。他的身份一公开，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国民党元老也很吃惊，觉得我父亲的“欺骗”性太大了。以至于台湾方面说，中共真正做统战工作的有两个人，公开的是李维汉，秘密的是梅龚彬。他们说父亲是个大特务。我父亲被抓进秦城监狱的理由，也是大特务。

国民党说他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共产党说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两个敌对的党，同时都说他是大特务。国民党抓他的部下，共产党抓他，也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会发生这样的怪事。

编者按：下面一段文字，有助读者更全面了解梅龚彬先生。文字来源于网络。

附：抗战三杰梅龚彬传奇

网上查得"梅龚彬"先生的简历如下,这个简历是直至目前的梅先生官方正式的简历。

梅龚彬(1900—197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 全国政协委员。字电龙, 别名剑文, 湖北黄梅人。五四时期,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团书记。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遭到通缉, 1929年在日本东京被捕。1931年回国, 1933年参与组织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曾先后担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编有《社会科学大辞典》。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团结了一些上层民主人士。1948年, 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冬, 陪同李济深由香港到解放区。1949年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 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先后当选为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75年8月1日病逝。

另一个是关于梅先生的真实传奇的一面, 颇可一读。梅龚彬这个名字, 以前听说的人很多, 但知其根底的人很少。汉语中有句话, 叫"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这句话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梅龚彬。在国民党右派眼里, 梅龚彬是灰色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眼里, 梅龚彬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民主派; 而在共产党眼里(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外), 梅龚彬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

抗日三杰中, 同高大孔武的宣侠父和英俊潇洒的陈希周相比, 梅龚彬是个风流倜傥的矮个子。见过梅龚彬的人都说梅龚彬服装很整洁, 头发梳理的也很整齐, 整天油亮亮的, 清瘦的脸上戴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梅龚彬的为人敦厚, 深沉, 诙谐, 做事谨慎, 对朋友从无疾言厉色。因而梅龚彬交游甚广。认识梅龚斌的朋友都说梅龚斌足智多谋, 才高八斗, 而且梅龚彬为人行侠仗义, 古道热肠, 见义勇为, 肯帮衬, 善守秘密, 是朋友中可以托妻寄子的那种。

梅龚彬原名叫梅电龙, 是湖北黄梅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 1921年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923年, 梅电龙加入国民党, 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 算是国民党创党时的元老。1924年梅电龙又经贺昌和施存统介绍加

入共青团，翌年又加入共产党，任上海徐家汇的第一任团书记和党书记。五卅运动时，梅电龙曾以全国学联负责人的身份参与领导工作。当时梅电龙名气很大，被誉为五卅运动的五虎将。

此间有一插曲，说是梅电龙追求唐棣华（后来成为黄克诚大将的老婆），到了发疯的程度。一次，梅电龙问唐棣华究竟爱不爱他？回答是“又爱又不爱。”唐棣华这样说，大概是开玩笑。但是，梅电龙从唐棣华屋里出来，坐上人力车，脑子里一直在研究这“又爱又不爱”是什么意思。下车时，梅电龙竟把随身带的一包团中央文件留在车上了。走了一段路梅电龙才想起那包文件，可是已经晚了。好在文件被一个朋友捡了去。可是，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传开来，便成就了一代文豪沈雁冰（茅盾《幻灭》中男主角的原型即是梅电龙）。可见，革命者，亦风流！

1926年底，二次北伐时，新郎官（新娘是龚品娟，梅电龙的结发夫人）梅电龙请缨，被任命为北伐铁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的政治部主任。

梅电龙所遇，都是后来的军政名人。第四军的军长先后是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和张发奎。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是十师二十八团团团长。武汉攻克后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下辖十师和二十四师。十师师长是蒋光鼐，二十四师副师长是蔡廷锴。四军下辖十二师和二十五师，十二师的师长是黄琪祥（后来第三党的领导人）。二十五师的师长是叶挺，政治部主任是李硕勋。独立十五师的师长为贺龙。

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梅电龙和郭沫若、杨翰笙、李一氓赶赴南昌，参加叶挺、朱德和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梅电龙又率部赶赴海陆丰参加彭湃领导的武装起义。然后梅电龙受周恩来派遣任浙江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就是在肃反运动中大名鼎鼎的夏曦），参与组织和发动浙东和浙西的农民暴动。

1929年，梅电龙受命到日本，在日本被捕，关了两年。

这两年，也是改变梅电龙命运的两年。

梅电龙在东京时，结识神州国光社的进步文人王礼锡和胡秋原。通过胡秋原，梅电龙认识了国民党民主派的领袖陈铭枢和李济深。回国后，梅电龙还认识了CC社的头面人物吴醒亚和陈立夫，以及张群、林森、吴开先、陶百川。

1932年，梅电龙正式改名为梅龚彬。表面上是大学教授，作家（灰色文化人），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福建事变。有军中“小孟尝”之称的前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广罗人才，梅龚彬和陈希周等中共党员便受潘汉年派遣，入幕陈铭枢。

1934年，闽变失败，潘汉年指示梅龚彬和陈希周随十九路军撤香港，做长期卧底国民党民主派的准备（接头人还有胡鄂公和助手老杨，老杨即朱挺，原名钱讷冰。以及九龙方面的开诊所的医生柯麟）。

1935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陈铭枢是名义上的中华民族抗日同盟宣传部的领导人，但实际上的负责人是梅龚彬！

梅龚彬感觉敏锐，深谋远虑，是中华民族抗日同盟活动的中心人物。梅龚彬在香港铜锣湾的寓所，实际上是中共抗日联合战线的一个地下机关。

西安事变后，抗日同盟解散。梅龚彬先后跟随陈铭枢、叶挺和李济深，并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委员。结识了众多的民众党派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李任仁（白崇禧的老师）、陈此生、杨东莼、林崇墉（林则徐的孙子）、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李章达，等等等等。

1947年梅龚彬又受潘汉年的指派，到香港协助李济深等人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不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梅龚彬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梅龚彬为文，长于政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梅龚彬亲自起草的。其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曾被冯玉祥将军称赞为：“有诸葛武侯文风”。

然而不清楚呀，李济深和冯玉祥，还有宋庆龄和陈铭枢，这些人精中的人精，在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早已在共产党的掌握中？

1948年，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得到了主要以香港为基地开展民主斗争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想方设法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当时的香港，国民党特务云集，港英当局倾向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大批的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去解放区，困难很大。

潘汉年、梅龚彬、廖承志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作了很大努

力，从1948年8月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分四批把民主人士从香港安全接送到解放区。

第一批接送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10余人。

第二批船上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等人。

第三批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翦伯赞、沈志远、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30余人。

第四批民主人士，有黄炎培、盛丕华等人。

梅龚彬是陪同李济深，在参加完一次国民党要员的宴会后，随第三批民主人士一起北上的。

当时国民党对这数百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突然离港，感到非常惊奇，只有自叹丧失民心、挽天乏术了，不得不承认其政治上的失败。

梅龚斌陪李济深等民主人士1948年12月25日从香港启程。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不久，梅龚斌到北京，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统战部，你作为中央统战部派往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个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从此，梅龚斌仍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1949年11月、1956年2月、1958年11月，中共党员梅龚彬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务委员兼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又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潘汉年冤案，梅龚彬受株连。1959年梅龚彬被隔离审查，过了八年铁窗生涯，劳改八年。

1975年3月，梅龚彬在医院病床上做五律诗《南冠愤》：

"旷时何所得？落笔实茫然。冷露迎霜起，寒灯伴月眠，久积南冠愤，而今又几年？"

1975年5月，梅龚彬被专案组强行送往江西宜春劳改。

1975年8月1日，梅龚彬在江西宜春去世（袁州）。

梅龚彬死前给夫人龚冰若的留言，是一首七言绝句：

"八年寒窗八年苦，到头还是病和死。冰若精神最可钦，革命到底不悔死！"

移居台北的老友胡秋原闻讯后，专程到北京梅龚彬家中，在梅龚彬的灵前行礼。等看完梅龚彬生前撰写的回忆录，胡秋原感到十分的惊愕和难以理解。惊愕的是与梅龚彬交往数十年，竟不知梅龚彬始终与中共保持着联络。难以理解的是梅龚彬一向为人敦厚谨慎，竟也在大陆解放后遭小人的诬陷！

后来，中共中央在给梅龚彬平反后的悼词中，认为梅龚彬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但官方对梅龚彬的称呼，依然是“民主人士梅龚彬先生”。

离开“7 8 9”回校

1969年9月份，学校派车到7 8 9来接我回校，说我的问题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我带着反革命帽子回校监督改造。来接我的还是专案组的雷存云等几个人，雷存云绷着个脸，李思田老师就客气：“哎呀，回来了。”

走的时候，宣布7 8 9给我做的结论。说我在7 8 9学习班期间，学习态度不端正，态度恶劣、顽固、拒不认罪，表现最坏。这个结论倒没说我太多的坏话，没说我反动，就说表现最坏，说我在学习班里是倒数第一名。这肯定来自季队长，自从我刚来的时候惹了他，他对我一直是这个印象。后来李思田也跟我这么说过。

我跟叶选宁他们是同一天走的。当时我们三班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其中就有彭宁。说彭宁还有问题没交待清楚，不让他走。彭宁跟我说：“哎呀，我他妈的倒霉了，剩我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当时好像北航和清华的人还没走。我说：你想要点儿什么？彭宁说，你出去看有什么好看的材料，给我拿点儿来。我回到学校以后，把当时印发的一些内部讲话，还有一些我认为有用的材料搜集了一批，又找了些小报，卷吧卷吧夹在自行车后面，骑着自行车，找到北苑少管所。因为我刚出去，队长还认识我，就让我进去看了彭宁一趟。

关押中，7 8 9的环境算是最好的了。回到学校，反而不如在7 8 9自在。为什么呢？虽然我回到学校以后，我可以回家，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学校整天把我当反革命监督着。有些革命师生，一天到晚恨不得批斗我一顿才痛快。我在班上要定期做检查，定期向大家汇报我的情况，等等。我只剩下一块挡箭牌，上面不许讲案情。至于我平常的些言论，一些胡说八道，有时候甚至是跟他们抬抬杠，吵一架，也要批斗我一顿，让我弯腰低头。对这些我已经司空见惯，

不在乎了。批斗完了，我原来那些好同学还对我说：“你可真够意思啊！好汉！好汉！”我听着这样的夸奖，什么补偿都有了。他们还骂那些极左的人：“那些人他妈的都是些马屁精，上面说什么他就拍马屁，借着整别人来抬高自己。”骂到痛快处，我听得也很舒服，肚子上的怨气也就消了。

一九六九年底，林彪下达一号手令，地院的人被疏散到全国各地，我们班到江西。在到江西之前，先要到北京怀柔县最北端的黄花城钼矿劳动。那儿的冬天很冷，我们在风雪中架电线杆。一根杆子五百多斤，四个人抬，杆子一头儿粗一头儿细，我每次都抬粗的那头儿。抬的时候要喊着号子，这样四个人脚步才能协调，我觉得我挺有力气。如果电线杆一次没竖直，还要把竖着的杆子抬起来摆正，只能两个人抬，这很少人抬得动，我能。干这个活儿的时候，我就去。我尽干那些重活儿，当地的工人对我评价倍儿高，说我的劳动态度最好。我跟工人们学了好多本事，比如绕铅丝，我可以缠得比别人紧，现在还很有用。

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候，身体不行。打一会儿篮球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心有余力不足，到了789很快恢复了。从789出来的时候，身体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别人都感到很奇怪。我的同学程希平，出来时眼睛还没直过来，斜着呢。大概每个人的神经安排不一样，程希平的毛病可能出在眼睛上了，我可能有潜在的毛病，只不过我不觉得罢了。就像四岁时我得过脑膜炎，考中学时检查身体的大夫指着我说，悄悄问我后面的同学：“他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他问我的同学，而不问我本人。要问变傻没变优，我也搞不清楚。小时候我的病挺多的，可能把病都生完了，身体后来就变好了。再加上我很爱好体育运动，是几项运动的等级运动员，我的身体是蛮棒的。正是这样，我在监狱里被关了那么长时间，也没闹出什么毛病，最后就是虚弱点儿，但很快就恢复了。我为什么说789的环境不错呢？就是因为我从那儿出来时，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对789学习班我并不怨什么，只是觉得季队长非常坏，恶劣之极！

还说我们在怀柔劳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我们到河里抓小鱼，我们用八磅的大铁锤抓小鱼，你们大概没听说过吧。怎么抓呢？冬天的河水半结着冰，小鱼一般都藏在河里的石头底下，找块周围有流动水的石头，用八磅的大铁锤震石头，石头的振动传到水里，把小鱼都给震昏了，小鱼漂起来，我们就往桶里装。有一次，我一个钟头打了一桶鱼。回来以后，架几块石头，放上块铁板，拣些树枝点

上火烤鱼。什么作料都没有，没有油，没有一丝姜，就放点儿盐，把鱼烤成干儿。要烤得糊一点儿，这样没腥味儿。很原始，吃起来挺香的。那个地方的梨也很便宜，一毛钱一斤，天天可以买梨吃。在黄花城劳动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说不坐火车，要走回学校。我负责带路，领了一拨儿人，走到一定的时间就留下一个人，交待好下一站什么地方再留人。最后走到底的只剩了几个人。我走路的本事比他们大多了，也证明我的体力很棒。

1969年12月9号到70年7月1号，我们又去江西劳动了七个月。在瑞金附近一个叫梨村的地方，909钻井队正在那儿找煤。中国南方没有大煤田，上面要打破中国南方无煤论，令地质队在江西找煤田。909钻井队是全国有名的红旗队，他们提出一年的任务半年完成，一年要完成两年的任务。我们被分配到这个钻井队劳动。钻井队把所有备用钻机都开动起来了，我们都上了钻机，因为备用钻机开起来以后人手不够，学生也当成了主力，都上了机台。备用钻机的零件都是七零八落的，有的是报废的，拼凑起来。没有铁塔就用木头搭，锯倒十七、八米的大树搭井架，顶端钉个铁钉，再用钢丝绳拴个滑车，然后就干起来了。人呢？机台上只配备几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其余的都是杂工。电工打钻，瓦工打钻，木工也打钻。人手还不够，就让妇女也上机打钻，会计呀，托儿所保育员呀，坑不哈痴的都上机台。最后把一些家庭妇女都拉上来了。

漫漫平反路

监督改造丹江劳动受欺负

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就算毕业了。我一毕业学校就说我带着帽子不能分配到单位去，就留在学校里继续监督改造，这样子就把我发配到湖北丹江五七地质队去了。学校带了个地质队。我就在那个地质队当工人。

当时李先念死气白列地非要把我们学校迁到湖北。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地质东方红冲击计委啊，抓李先念抓得最凶，李先念气起来非把地质学院赶出北京，不赶出北京绝不罢休。就是说非得给赶出去。当时一看湖北丹江不是地方，没法建校。然后去江陵，江陵也没法建校。这时候我一直在丹江的钻机上劳动，学校就拼命地寻找校址，只是在丹江招了一部分学生，在江陵招了一部分学生，那是些工农兵大学生。但是都不能办校。最后李先念就豁出去了，就硬性下命令，

给你们迁到武汉。这你没的说吧，交道也方便也是大城市。负责迁校的人于是到武汉又转了半天，说没有合适的地方。结果，李先念就火了，就命令武汉市提供地盘儿，你们挑！最后在华中工学院旁边，找了一块大概 1000 亩地左右，算是办学校。但是在这个圈里已经有一个无线电厂了，没办法，迁不走，就当非地吧。给它圈在里头算了。这样学校就固定在那儿重建了。

1973 年的时候我们丹江干不下去了，在我们原来老校长高原贵的号召之下，我们都跑回北京来了。就想回到北京重建地大了。结果李先念不干，1975 年还是把我们轰到武汉。我是没办法，反革命吗，首当其冲，必须第一批开赴武汉。于是我就被发配到武汉。

带着帽子当教员处处受制

1975 年的 9 月 5 号，我就作为第一批大队人马杀往武汉。到了武汉以后，当时学校没有呢，就借住教师进修学院。我是单身，都住教师进修学院。拖家带口的就住在华中农学院，然后武汉还有个地校，就给了我们了。这样就以三个地方作为根基，开始建那新校。我们去了那儿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接车，整天当搬运工。把北京运来的东西，装车，往那些地方拉。

这个时候就是工农兵学员要上课了，要上矿相，没有教员，我呢是学矿物的，于是就让我上课去了。武汉老停电，上课之前要开发电机发电，由于我当过钻工，所以柴油机、发电机我都熟得很啊，我都成了电工。先把发电机发动起来，电发好了以后，磨片室里把片磨好，然后就可以上课了。

在那儿的时候，除了要我定期汇报一下，出门要请假以外，基本上没人管我，上课就上课。矿相课就是专门研究不透明的矿物，在显微镜下研究不透明矿物。这个课可以说是我们矿藏学里的一个分支，矿藏学里就是矿床和矿相这两部份。矿藏是搞宏观的，矿相是搞微观的。在武汉没有人带学生实习，我就带学生实习。所以作为老师还是个老师，但是，定期要受学生的批判。我发现那些学生跟我出去都挺高兴的，实际上也不愿意批判我，因此我觉得也无所谓，除了得对付那些与我闹别扭的和极左教员，我跟大家处得都挺好。虽然我还带着帽子。

这样我就基本上进入了教学，离开了丹江以后就脱离了那个一般的劳动。后来到了 1979 年，这期间闹了很多事情。

我在学校一个是搞基建，把那个新校址建起来。在这个期间我既搞教学又搞

基建。教学任务没了就搞基建，就这么来回折腾。最后那个宿舍区盖起来了，我们搬了家就都迁到现在武汉地大的校园里头了，在那儿给我安排了住集体宿舍。照样上课，那个时候上课带实习，基本上很少有劳动，除了打扫卫生，一切正常，和其它教员们一样地工作。也不批判，可是，我只发生活费的，我没有工资的。

一直到 1979 年，一个月给我 20 块的生活费，在丹江的时候每个月还给发 30 块钱的补助，后来迁校到了武汉以后，每个月就 20 块钱的生活费。我说简直就是只够吃饭！还得靠家里养。我的零花钱全是家里给的。好我在武汉有亲戚，所以只要有空我就串门去。人家那儿都好吃好招待的，学校吃得很赖，但是我总有地方吃好吃的。我在那儿过的还可以。我是湖北人啊，武汉市有我的很多亲戚，所以到处有家可去。武汉大学和武汉研究院的一些老先生，院长级的都是我父亲的学生，或者是他在中大当校长的时候的教授，所以这些人那都很认我。到他们家串门去，都好吃好招待的，每个星期都能找地方去吃饭。而且这些人特别希望我去，去了以后可以听见好些新消息，对不对？咱们这些人到处串、到处听、到处说。又经常回北京，动不动就是探亲假，回北京。

那时候我也很艰苦，一个月 20 块钱。就自得其乐吧，我觉得还能过。我不是说了吗？你要是觉得它不苦也就不苦。我想的也多，我就想好的不就完了吗？

克服不高兴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一件事使你懊恼了，赶快，你找一件使你感兴趣的事情先去做一做。比如现在有时候，我算题算得晕了、累了，我赶快把计算机打开，弄个什么挖地雷的游戏啊，换换脑子，几分钟以后我又回来了，又接着弄。还有就是我写东西的时候，写了一半写不下去了，我也这么干。只要我喜欢干的事，我干上以后很快就忘了那些烦恼。还有些时候做些事儿挺窝囊的，好多事情弄得我不高兴时，就想办法弄一点儿滑稽点儿的录相带看一看，也给自己找点儿高兴事儿！我说有些狗屁东西实在是不值得看，但是它能逗你一笑，也可以利用。那香港片子说实在的，没什么价值，但是有时候你实在不高兴了，拿来看看也无妨，弄两个笑话逗你乐一乐。我就认为，一个人你别自找难受，干嘛陷在里面不出来，自个儿救自个儿，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也有救不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人到了那儿就出不来了，你就要发泄一下儿，发泄完了能救的时候赶快，自个儿救自个儿。就别再接着烦下去了。

我这个反革命帽子带上去以后之所以长期不能摘，是因为上面没解决问题。

因为我是中央办公厅办的案，必须由中央办公厅来解决，或者由相当的能解决中央办公厅问题的人来解决。这是学校根本管不着的，他也不能过问案情。作为学校来说，他认为得等上面的意见，我呢，就认为我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得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啊，工资总得发给我吧！我就要求，但一直没解决啊。到了武汉以后，原院长高元贵当院长的时候，就把我叫去了。叫去了就问我，到底怎么解决的？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在丹江怎么受欺负，他们怎么怎么整我。他说：“你这个结论不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我以前处理过这个事情啊，工资是要发的呀！我跟他们说说。”于是就给我发了工资，也被派回教研室了，1976年我就正式回教研室了。

那时候高元贵在台上，他给我解决问题没多久，地质部就逼他退休了。那高元贵可是个好人。后来我去他家拜访他，跟他聊天。老头儿就跟我说：“我后来跟政治部主任王良说你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这是中央办的事情得要中央解决。我说，我负责行不行？这才解决。”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受欺负，有很多歧视我的地方，比如说我没有证件，我要临时出去得开介绍信；此外收发室牌上写出来有我的汇款，或者有我的挂号信，我得拿证件来取，我没有啊。就需要办公室开个证明来，就这么欺负我。我只好到办公室，找办公室主任，就为我这个事儿，他也是不厌其烦，所以那办公室主任都怕我了，“哎，开条子吧，快开。”就这样，他就哼哼叽叽地，不愿意开也没办法，还得给开。我说：“你不开，我揪你找高元贵去。”找院长，就这么干。这个办公室主任对我最头疼，因为老找他。有点儿事儿就得找他，就是他本来可以少做很多事情的，结果麻烦都弄到他头上来了。他老得开个条子盖个章，开个条子盖个章。本来他手里那个章很难拿出来，很难开的，得要系里开一个证明，然后再换他那个院里的证明，院办的证明。我去找他，他就不得不开，不行我就带他找院长去，你不能不给我开。就这么欺负我！

有一次我去拿一个什么东西，闹起来了。我说：“我老到你这儿来领，都开了多少次证明了，你该认识我这个人了吧？认识我这个名字了吧？我这个反革命臭名昭著，全地质学院谁不认识我啊？你还这么样跟我过不去干嘛？你给我不就完了，我签了字不就完了！反正最后也得我签字！”结果他就不给，他说：“那除非你找一个保人来，给你代领。”我一拍桌子“他妈的！我就不找了！今天你给

不给！你不给我我就揍你！”火气大着呢。刚好我们那政治部主任王良进来了，我拽起他：“王良，你给我领。他不给我。”我拽着他胸口。你给我领！”王良：“给他吧，给他吧。”这个时候那个人就说：“我得登记是谁领的啊？那完了你签字？”他就生怕他负责任，特认真。王良就不肯签这个字。后来旁边来了一个老师，他是物理教研室的，跟我一起劳动过，他了解我这个人。为了赶紧把事情摆平，他就说：“我签，我签。”他就代我领了。我说：“下次你别多管闲事儿，我今天就要跟他们找茬儿呢，又让你给破坏了。”这是1973年回北京以后的事。

到了1976年，还没发工作证，直到1979年平反以后才发的工作证。

这样，1976年高元贵给我补发了工资，把我以前克扣的那些工资补发了，我应该是46块钱，以前欠我的26块钱全都给我补发齐了。但是，野外补助没给我。地质队那个老坏蛋他死扣着，他不签字就不给我。算了，我也不不要了，当时我占了一条，你永远欠着我的。不管什么时候，你总欠着我呢。

到了1976年以后基本上就算一个正常教员了，也不批斗了。教研室的人，说实在的都跟我关系挺好，因为我尽帮大家啊。无论谁有什么困难我都帮谁。还有几个难对付的，教研室里来了几个新的工作人员，有毕业分配来的，有时候跟教研室闹矛盾，管不了他们。可是这些人跟我关系都特好，教研室主任实在没办法了就求我，我呢，只要一说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所以，我在武汉有一帮小兄弟，都是那帮年轻的。要在武汉闹事，搞个什么活动的话，那一呼百应。我小兄弟还有小兄弟呢，他们都是那种哥们儿型的，拉帮结派的，惹了一个呢一帮人就上来了。所以，在武汉的时候，我在那儿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抑制他们，不让他们去打架。其实我在那儿成了一个稳定因素，可是他们那帮政治部的王良等，他不知道我这个作用，还在拼命地想整我。这个他傻了。

那个时候我就要求解决问题呀，我该分配工作了。我要求落实政策。学校就给我想了个招儿，把我分配到湖北省地质局，给我放到野外队去，然后限定时间，过期就取消分配资格，你自个儿就成了无业游民了。还这么说我呢，我就一气之下跑到北京来了，找陈云。

上北京找陈云

陈云跟我母亲算是同乡，所以都很熟了。因为我母亲的关系，陈云跟我父亲也很熟，在中央一起的时间也很长啊。所以我父亲平反的问题就是找的陈云。

你想想，三保险啦，这主席点的名，总理签的字，什么手续都是合格的。你要想平反多难呐！就这样，我们去找陈云，陈云就说：“给我一点时间”，那时候陈云还没有上台呢，他已经把档案都调来看过了。他说：“这个我看过了。”我父亲的罪状就是叛徒特务，叛徒就是日本被捕的时候，特务就是跟国民党这些人，陈立夫、陈果夫，其实这些都是中央授意去搞的吗，他本来就是干特务工作的。对这两条，陈云说：“这都是很好说清楚的。”对当时中央怎么决议，他都知道，特务一条不存在。叛徒这一条，怎么衡量呢？就看后果。就算你承认是共产党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在后面——就是看看他所在的组织受到没受到危害，如果说他当时要是真叛变的话，那你说咱们中央不是全惨啦。他就在中央呆着吗。找陈云的时候是我跟着我母亲一起去找的，我母亲联系好了以后，我陪着我母亲去的，老太太不管怎么说，这点儿老面子人家要给的呀。找邓颖超，邓颖超也得管。但是邓颖超知道总理签了字，这事就不要找她了。最好找陈云。那么陈云见了以后，就是把咱们接进去以后，咱们把这个情况一说。陈云很耐心，这陈云真沉得住气：你们先说吧，说够了再讲。我们说完了以后，他就说，“我已经看过全部档案材料了，没什么事情。但是你得给我点儿时间，大概给我半年时间吧。因为现在中组部处理的事太多。我呢，跟胡耀邦讲一下，”当时胡耀邦是组织部长啊，“我让他派专人来复审你的问题。很快就会查清楚，但是要到平反开追悼会还要有一段时间。”他说得很准，半年以后开追悼会。他早就想好了，才来答复你。他什么事都老谋深算，都已经想好了。同时我提出了我的问题，我就说：“陈伯伯，我文化大革命给关了几年，出来了以后还带着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到现在也没解决。我们学校要把我处理掉啊，你看怎么办？”哦？他就问我：“怎么回事啊？”这事他不知道的，这是临时提出来的。我在学校里一天到晚去学校闹啊，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早倒台多久了，我的问题不就是反“四人帮”吗，完全应该给我平反。可是学校说：“这个是中央管的，我们管不了。”就这么推。后来，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嫌我们这些人天天去闹去，讨厌了。就说我给你们分配工作，我看你们怎么办？

当时我们就是挂着反革命帽子，在学校里呆着不走。什么时候平反，什么时候解决，什么时候安排工作。我们当时一个月只拿 20 块钱生活费呀，挺苦的。这样的呢，他要给我安排工作， 给我在湖北省就地处理，发配到地质队去就完

了。那我哪儿干啊，我不平反是回不了北京的。所以我就是坚决不同意他这点，他给我限期，大概在8月底呀，要是不去报到的话，取消分配资格，你就到社会吧。若不去就好像被开除公职一样，不管你了。那我不急了，跑到北京来告状来了，找了陈云。陈云当时听了这个情况以后，就说：“现在是不是陈丕显同志是湖北省的书记呀？”我说：“是”。“那这样行不行？我给他写个条子，由他来给你说说话。管用吗？”我说：“这肯定管用呀！”陈云噙、噙、噙就写了，说：“梅建明是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现在问题还没解决。他是我的老朋友梅龚彬的儿子，现在在地质学院念书，他们学校要把他处理了。你看看怎么协助他一下，帮他落实政策。”就写了这么一个条子，还给我看看，“这样写行不行？”我哪儿能说不行啊。他说：“好了，我由内线给他，很快的，他明天就拿到了。”

我从北京回到武汉去，我是跑回来的呀，所以不敢呆长了，还惦记着那边的事，还有工作呢。我又赶快跑回去。刚回去我们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跑来找我，因为在搬家的时候跟他在一块儿，因为他是“516”，也在劳改，跟我一起也是干活的。他挨了几次整，吃了几次亏，我那时候尽安慰他，所以他特记着这个。后来临走的时候还把儿子托给我照管了一段呢。他跑来，笑咪咪地说：“嘿，你本事真大啊，上面一下给你下文了。”我说：“下什么文了？”他说：“陈云的手令！陈云的手令到学校了，党委开会讨论，他们告诉我了。说把王良吓了一跳。”王良对我最恨了，老苛我，老想整我，老想把我赶下去。这下子，这手令下来把他吓坏了。

后来闹误会了，他知道惹了我了没好处，就想挽回一点儿，缓和一点儿。他主要怕什么呢？就是我借着这个，有支特了，他反正也不敢再整我了，怕我召集一些人去打他，他特别害怕。我回学校也没碰见他，要是碰见他，看看他到底什么面目？结果他认错人了，暴露了一回。就是有一个同学叫严宽的，他长得像我，也带了个眼镜。他把他错认为我了，就把他请到办公室里头，好吃好喝的就连连道歉呀，严宽也不说话，让他暴露下去。结果回来给我学，唉呀，那副丑态。我听听，也就算了，我也不找你麻烦了。就饶了你，算了。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挺好对付的，你对我客气点儿，你敬我一分，绝对的我敬你十分。但是你要惹我一下子，我可不饶你。

听说地质学院党组开会讨论的时候，就把陈云这个条子拿了出来。党组会

上把那个政治部主任给骂了一顿：“你干嘛惹这些人啊，你不是吃饱了撑的！你看！你怎么交待吧！你赶快去找人家赔礼道歉去吧。”他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处理。”“不能处理你就搁在那儿吧，你别惹他呀！你惹他干嘛？你要给他发配了，那这个事就闹大了。你看，这不是惹出麻烦来了？咱们地质学院自建校以来，中央首长谁来过东西啊？不就是刘少奇提过一次字吗。”也是接见的时候给学校提过一次字，什么“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哪个同志有过这种批示的？你看，你惹的吧。”就把他骂了一顿。

当时陈云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就有这么大能耐。当时他也就是说没有复出就是了，老毛给他搁一边也就搁一边了，就等于把他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关，就是在家里。他说话说得很少，而且什么事情都深思熟虑了以后。那些人都要来面授机宜的，都要找他。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习仲勋在，习仲勋被解放以后出任广东省的书记，来辞行的，面授机宜，来请教请教，看看陈云同志有什么指示啊，他是来谈这个的。正好碰上，碰上我们也在那儿听着，他客客气气地向陈云同志请教来了。给他面授了几句，把他打发走了，又接着谈我们的。还把我们这个当成重要的事情，把他那个都不当回事。这就够给面子的，他认这个情。完了就说：“现在你看我都受限制，不然我还想让你帮我做几样东西吃呢。”我妈妈特会做饭。以前这些人到我们家开会，我妈妈给他们弄吃的，做几个小菜，他还记得呢。他说：“你看我现在连炊事员都是固定的，有专门的保卫措施，很不方便，不然我叫你来帮我做几个小菜，我还想尝尝。”

后来学校把我的行李呀什么的，本来我已经占了一个独屋了，一个单间，在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行李给我搬到一个屋去了。回来我就骂起来了。我当时就到我们系办公室主任那儿，我说：“你再不给我安排好了，我揍你！”他说：“啊，好，好，我赶快给你安排。”就找了比较好的，那种两室一厅的那种房子，给了我一间。这样我就算了。

地质大学现在还在武汉呢，北京和武汉，北京留了个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后来就升级为地质大学的北京分部。武汉叫武汉分部。大家不能成为一个学校，而是两个地方合起来称为一个大学。这边是以研究生占多数，那边是以本科生占多数。

落实政策回北京

到了 1979 年我平反了以后，就要力争落实政策了。这个时候我刚摘帽子，就得要求按照真正的落实政策，你得让我回来啊，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啊。当时控制我们学校的是地质部派去的工作组，所以必须由工作组说了算。当时我以为回北京只要院里的头儿，院长点头就行。我要回去必须有几条，北京得欢迎我来。北京这边研究生部得欢迎我来，那么我就找了北京这边儿矿藏的头儿，朱上庆老教授，朱教授说：“非常欢迎你来，这边没有搞矿相研究的，我去给你申请。”北京当时院里的头儿叫王红珍，是现在民进中央的副主席。当时她跟我哥哥是同事，都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经常在一起开会的。那么我就找了王红珍了，王红真说：“没问题。我到武汉在院务会上给你提。”可是没想到，北京也是一样，院长也提，院务会也觉得应该回北京，地质部这个工作组就是不批。我不知道卡在这儿了。

怎么老回不来呀？老是说有希望有希望，三次院务会都过去了，还回不来！后来我才打听出来了，还是那个孙庆伟给我报的信儿，说：“最大的障碍是部里，你得在部里找关系才能回来。”我一听在部里找关系，好。我就想，何长工下去了，孙大光当部长。孙大光刚好在第四战区，国民党抗日的时候，给我父当交通的。我说这就好办了。得先找一个熟悉他的人，当时老头子已经去世了，得找一个在世的。夏衍，这不是现成的吗？正好地质部要演一个什么有关地质的电影，要请夏衍吃饭。夏衍在这之前知道这事儿，我爱人跟他吹了吹风儿，说了两地分居的事儿，夏衍说：“这应该调回来呀。落实政策也应该回来的。”夏衍跟我父亲多熟啊，我都没说话，问的时候我爱人就那么提了一句，他问，问题出在哪儿？我说在地矿部。他说，地矿部好办，刚好孙大光要请我吃饭，我跟他说一下。完了以后说要写材料来，我就哗、哗，信手写了一个前因后果，他就交给了孙大光。孙大光说：“他是不是那个造反派呀？”“唉，受四人帮迫害的，陈云都给他写条子了。”他说：“哦？他是谁呀？”“他爸爸是梅龚斌呀。”他说：“哎哟！这可得帮忙。”他就知道了，这么个关系，赶快，亲自写了手令，整整写了一页纸，送到学校。很快呀，就通知我可以办手续回北京。这是 1981 年的事。

回去以后，我们系党总支书记就跑来说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呀，你可以办手续回北京了。”我说：“哎，人事的还没找我呢，你来找我来了。”他说：“嗨，你不知道你的来头有多大？孙大光亲自给你写了个手令，一张纸写得满满的，我

看了，那我是不能不放啊。”你看，多快呀！什么都不用我办，就是说，人家谁离校还要交接，什么你欠了什么东西，我什么都不用办，只要到干部部去拿一个通知单、报到单就行了。拿了那个就到北京来，往北京这边的人事一丢就行了。剩下的事全有人给你办。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儿，你要离开之前学校设备科要检查你东西还了没还？

后来我的自由度大极了，大到什么程度呢？特别是那个陈云的批示下来以后，会可以不参加，课也可以不上，什么也不干。因为他们不是抢占我的宿舍吗，那我闹脾气了，我不干了。凡是你系里安排我的活儿我都不干。我跑出去帮人家别的系去搞钎头实验去了，到处游山玩水，人家是请我去，我是做客。我帮人家带学生，你不是正缺人力呢吗？我还就不跟你干了，我给人家带学生去，照样什么补助都有，人家待遇还好，我是做客的。那时候精神状态极好，好得不得了。成心就气我们系的那些人。

后来，那个安静中啊，我们骂他，安是个明白人，他当时正好那一段不在位，不在学校里，他在北京这边办事儿呢。办公室主任那个李银征，傻蛋！小子左吧，想表现表现，惹到我头上了，最后让我臭骂他一顿不说，最后大家都骂他。他说：“你看，没人干活了！”本来是多好的一个一等劳力，我是万能的呀，什么课都能讲，干活能干，体力又好，出野外那第一号。有一年带学生在湖南实习，湖南地质队有一个副总工程师呀，特黑，想给我们规定区域大大的，就是让我们填图啊，工作范围给得大大的，其实谁干得了啊？那么大，累死了。那么我们这个队长就想了一招儿，说请他来，咱们一起踏勘一次。因为我是跑得最快的人，所以让我带路。他说，他豁出去了，呼哧呼哧地也得跟着，队长、总工，还有地质组的那个组长哪里能跑。最后我把他那个地质组长遛得，最后那个总工跑不动了，我们那个队长也不行了，但是都撑着呢，岁数也大了点儿。三个点儿没跑完，就已经累趴下了。他支持撑着说：“再跑，再跑吧。”把那个总工累得撂那儿了，说那个地质队长：“你有劲儿，他跟他跑。”继续跑，没办法，又跑了三个点儿，他也趴下了。他不是趴下了，还能走的动，呼哧带喘地说：“咱们慢点儿，咱们慢点儿，不行了，我在这个队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跑得过我呢，今天我得认栽了。”我印象中他挺年轻的，比我大不了几岁，按说他应该比我能跑的，他练了多少年了！我主要是占身体棒啊！

露一手，修电视

所以我是这么个人物，系里不知道哄着点儿，你说两句好话，我什么都给你干。那他们就会拍马屁。

在武汉刚迁校的时候，毛主席去世，大家要看电视，就是看在北京开的追悼会。当时各个点儿都发了电视，北京运来的。电视发下来以后，有的在运输中出了毛病。有一台电视送给我们住在教师进修学院得那帮人，然后就是打开，没有图像，再打开，还是没有图像，怎么也没有，调不出来。于是物探老师就去检测，我呢，路过旁边，我就在那儿冷眼看，看看，他们那仪表什么都是全的，电工什么都有啊，一测，我一看，因为我懂电视呀，这个电视没毛病。我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说：“这个电视机一点儿毛病没有，让我上去两下子可能就有图像了。”不过我也有点儿冒险有点儿吹，不过我知道他测的那几点都是正常的，电视机没坏，而且其它方面我观察，也没问题。我不是跟我旁边的一样，也是劳改的，但是他没有被抓起来，是学校给戴的帽子，不是中央专案组给戴的帽子，是学校专案组给戴的帽子。他就说了：“你们这些笨蛋，还是学物理的呢，学电工的呢，对付个电视机都对付不了。我给你们推荐个能人，两下子给你搞好。”他就去替我吹去了，哎呀，我一想坏了！万一我判断得不对怎么办？我还心里有点儿没底儿，我不过是有点儿吹牛了，说实在的，我就看，还是看的不够全。如果大家看不上这个电视的话，院里面负责这个事儿的人，他要挨骂的呀。他赶快就问：“谁呀？谁？”那个人就推荐我，我说我不行，他说来，来。我还不想弄，我怕万一真说了大话了。他们死气白列好劝歹劝地就把我给劝过去了，劝过去以后，一看是电视机那个换频道的旋钮掉了。我说，有钳子没有？拿了钳子一拧，啪，啪两下，正好碰上了武汉台，着了。图像出来了。声音出来了，哗！好啦！我还没丢脸就是了。结果那个人就逮着我了，说咱们电视机来了尽是坏的，说有的是电压不稳定还直晃悠，图像也摇摇晃晃地滚动。

他们就说，行了，你这几天什么事儿也别干了，就给我们修电视。于是到处好吃好招待的，他如果要我修电视，白吃白喝的。到那儿去给人家修，一看电视机摇晃，他告诉我毛病，我先得了解好，完了我带什么，除了电工那套仪表以外，我估计是电压低，调高一点儿，就挺好的。然后我再假模假式的说，不，不行，不能就这样，还得再调试一下，把一些小毛病不断地调得更理想一点儿，图像更

集中一点儿，再除除尘，磨磨蹭蹭的，那其实就都是闹着玩儿了，其实机器早就已经好了。不是在那儿可以歇着吗，喝茶，茶水都是好茶叶泡的。哎，那几天是享受，三个点儿，每个点儿修那么两台，一台弄一天。一天过去了，这一天过得这舒服！我说我在那儿是挺好用的，万能。他就不会用，那个管宣传的就懂，那个家伙，宣传部的部长，说话客气着呢，给我哄得挺高兴，就给他干活呗。再加上学物理的那个人：“你小子哪儿学来的？”我说，我北京无线电俱乐部出来的，他说：“喔，说实在的，我都查遍了，电视机我没少搞，搞了多少年，我自己都装了一台。哎，没毛病呀，我就是搞不出来，真想不到是那儿，你怎么就想到了是那儿呢？”我说，我也是修电视机得到的，你不先看看它外面少了什么东西？它能拧的旋钮都没有了，那还不是可能是它的问题了，可能在北京的时候它就丢了，也可能路上丢的，就是说它还没到位的时候丢的。那么就是说它都是对着北京的台啊。到这儿你不转转它能行吗？武汉和北京的频率不一样啊。他说：“哎，聪明！聪明！”我说：“你的水平比我高，你的经验比我少，就愿意死读书。”后来他又把我拉到他家去，请我吃饭，请教：“还有什么没搞到？”那是特别认真的一个学究儿！人家教授！人家是电工的教授。

我一直到后来还在保着这台电视啊，千万别让它再出毛病，就是出了毛病赶快给它修好，只要是在追悼会那天，让大家看到了，你的任务才能算完成。他说：“这些天我就求你了别的地儿坏了你也得赶紧去弄好。”没坏的，哪儿那么快？几天就会坏的？放电视那天就是我开机，我在旁边坐着，不让大家动，还有人保镖的，就是不让大家摸，不看的时候就锁起来，晚上看电视给打开，有个木头箱子。

那时候，在这几个点儿，大家也都认识我，本来是认为我是一个反革命还有点儿怕的人，但是一看这些以后都不怕了，包括我们教研室的人。

对话拾遗

（编者按：记录原稿中还有一些关于 789 或与案件有关的对话，有些内容已经整理到正文里了，有些删除了，觉得有一定史料价值的就留下来了。）

问：“你们这个班都是大学的吧？”（789 学习班三班）。只有石白河一个人是高三的。

问：“怎么决定你是上这个地方？”，这个阿弥陀佛了，天晓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上我进这个班，我只能猜想，我们是属于一个案子的，是同一个专案组。我们这些入基本上是同一天被抓，同一天出来的。

问：“你跟程希平？”我跟程希平是同学。

问：“他父亲也是？”，不是，他是绕上了，没地搁了，石白河也是塞过来的，就是说，要不是我的关系，他们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能带他们出来的人才放出来，要不然就仍然在里面。我们是听说有一个对可教育好子女的讲话，有个讲话以后呢，那肯定就是属于这一列的话，他们专案组里头一定要赶快筛选，我的问题已经审查完了，也没有什么需要再进一步审查的了，就赶快按照这个讲话来处理了，那么我就应该进这个学习班来。他们两个虽然不够格，但是他们两个是属于我这个案子里面的，因此就给带来了。如果我要不在这里头，如果说我的问题还需要再审查的话，他们就得跟着在里头待着。其实他们进去没什么事，他们进去实在是冤枉的，他们是白进去。如果真是把他们放在那儿，就等于是象我的陪绑一样。更何况他的案子跟我牵扯的相当的小啊，是因为别人。有参加颐和园那个黑会的人。他受那些人的牵连为多，他们跟我打的交道还少，但是也是说话比较过硬，专案组抗争的比较厉害，这样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呢，就随着我走。

问：“颐和园黑会的入有没有到 789 的？”，没有，那些人后来被整的很惨，象蒋良朴他们最后被吃迷幻药。我不是说咱们看过电影《追捕》里的横路静二，吃了药的入最后都变成呆滞了。这种恍恍乎乎的情况下进行审讯，让你交待，结果后来都一个个的乱交待，胡扯八道。等不吃药了，醒过来以后又满口否认。就这样子的，越这样越要重来，就是一定敲死你，就是让你不得翻身。

我之所以能出来的话，第一我没有那个关于第三条，谋害主席的事情。一点儿边都沾不着了，实在弄不着我了，那我就属于完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没有什么大案，最后思想反动点儿。

问：“你就是纯粹是攻击中央文革？”对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子是跟他们对立的，那么儿子也对立，这也很正常，这不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问：“但是你觉得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孩子上这个学习班？”本来 789 就是为了这帮子可教育好的高于子女所准备的，而且框框划的是比较高的这个班，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没人管了，有的是属于没人管了，家里头大人抓起来，孩子

没入管了，那进来。而正因为有这么一个班，我呢也属于这个之列，所以我就被送到这个班里头来了。另两个是陪绑，那个是实在是没办法了。他要把他跟我隔离开的话，又怕有什么意外发生，干脆随着我走还安全一点儿。

另外整个这个案情他希望扩散圈越小越好，你在这个圈里怎么扩散都没关系，因为这里边的人知道的事儿也都差不多了，就是高层的一些内幕的活动，他们父母多少都知道的很清楚。我们议论无非就是怕我们说出一些内幕的事情，在这堆人里面怎么说也没关系。放到社会上一说的话，它再一传影响面就大了。你光在这个圈子，那很限制的。所以我出来的时候，特别交待的就是说：案情不准散布。就是因为有些人是本来没有参与这些事的，因为进了这个专案组，他也得被审查一番，因此不知道的事儿也就知道了。知道了的话，就怕他们乱说，怕他们乱说那就只好跟着我走了。我被限制在什么范围，他们也被限制在什么范围。

问：“所以你怎么看 789 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吧，你把这些人放在社会上没人管，他不是更糟糕了。要么就变坏，变成打砸抢的，小偷流氓；要么就是变成无家可归没入管，受冻挨饿。你在这里至少还有可饭吃，还有人管理你，有吃有穿，行了。这不比你在社会上游荡要强多了。另外，你在社会不定碰到谁呢，就文化大革命我被关的期间正是武斗的高峰啊，这玩儿意要是白挨长一上枪，你不就是白完蛋了吗。这样说起来，是一种保护措施。我不说别的，咱们从效果上讲，是个保护措施。但是人家提出了这个保护措施，作为四人帮来讲，他必须要从思想上还得折磨你。于是在这个学习班里头，仍然要进行互相的斗争。他们还等于调动群众，在这里头让你们互相揭发，互相打仗。好在我们这个班里头，怎么讲呢？第一，这 13 个人里头，分了好多个单位，各自的院校，互不认识，谁也不了解，案情谁也不熟悉。就算我们都是同一个案子里的人，我们还是各个方面的。案子里套案子还不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进计算机的时代，不是有根目录还有子目录吗？子子目录吗？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可能算一个大子目录，下面，就是案子里还有好多子子目录，所以互相也挨不到一起。所以，你在这里头呢，互相谁揭发谁呀？狗屁！谁也揭发不了谁，就包括我和蔡新平、石白河，我跟他们也是实际上在东方红里头，他不是在我的直接统辖下的，就是我管理的这个子目录并没有他们，他是另外的一个子目录。只有到我的一个子目录里才能管到他，但是他们不在我这个子目录里，我只是管他们的头儿了，

我不能管到程希平，所以我跟他们很少联系。因此呢，还是弄不到一起。就是我跟他，还是不够熟悉吧。没办法来互相揭发，而且作为我们学校的人来说，只有别人揭发我的份儿，我还能揭发谁呀？对不对？我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要说反动言论的发源地吗，我，朱成昭、蒋良朴就这几个了吗。

所以我呢，在那个会上，最多做点儿象征性的检讨，哎，大概是过去你受过苦啦，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啦，就这两句还可以说一说，至于实质内容我也检查不出什么来，我觉得没错。在那里头，有一次做了点儿检查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说我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呢？有一次在自由活动时间我就情不自禁的哼起一首歌儿，“河里青蛙哪里来，哎呀，妈妈。”结果晚上开会点名的时候，集合起来就说：“啊，三班有个人，竟然唱黄色歌曲！”不知道谁给我打的小报告，这可是没队长在旁边的，可能是二班的人。后来就批判一通，完了以后就完了。第二天白天的学习会上，让我做检查。我只好我啊，我受那个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改造好。学了这首歌儿吗，我情不自禁的唱的，我以后不唱就是了，过关了。

问：“你是不是应该揭发父母？”在这个里头完全是针对自己的，没有让我写揭发父母的，因为我父亲是属于中央一办的。所以那个预审员没找到这儿来，他没找到这儿来，别人就不能干涉到他的专案组。

问：“在 789 劳动改造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自己拉车？”拉车就是我们采完了东西，也是自己拉车回来，人套在那个车上，人架轱，我们在的时候也拉呀，也拉那个车。那个车还挺好拉的，

问：“你是学校接的吧？”对，学校派车来接的。学校派车来了，还是那个雷存云和那个他妈的专案组的人，他们又来了。

问：“为什么聂荣臻、罗瑞卿的孩子没到 789？因为他们也有问题了。”噢，对。这里面被招进来的人呢，可能是有重点的，就属于中办里头的，一个是无家可归的，就是高级干部的女儿无家可归的，那没办法要弄进来。一种是属于重大案件的，牵连面比较广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女儿。我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进这个，而是进的别的学习班。那不能说他们的父亲地位不够啊，那就是可能牵连面不大，就没有进这个学习班，或者是没有到那个地步，无家可归吧。象罗瑞卿的孩子罗雨，他们怎么说呢？罗雨这个人可能在运动中啊，比较老实一点儿，挨整也就挨整吧，没有做什么天大的事儿，你也就不好这么整他，学校里整他就够了。他也

是大学生了，能够自己料理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要象傅亮啊，郑京生这类的，他们就属于北京市委高级领导层的子女。这帮子人要在外面的话，弄不好要结成个团伙，他们就是家长关系都是很密切的，子女也是很密切的，有的孩子年纪有小，正好是闹事的阶段，你还不如给他们管起来呢。他们要说案情没什么大的，没什么大不了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这几个人来讲，就等于借这个地方单办了个学习班，我们并不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就是我们都比他们大很多了，不属于无家可归的。本来设立这个学习班，应该就是说，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子女给弄起来就完了，但是有了这么个学习班的环境，有些重要的属于政治犯的子女，也放进来了。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用不着进这个班的，跟他们毫不相干，在案情上。我们完全说就我们这几个人，就我们子目录里的人，搞一下子也就算了。预审员给我们开个班，训导训导，来个一个星期，被我们放过去就完了，给非要把我们弄几个月，就是借这个地方。他们也就省事儿了。

问：“华川他们说，他们曾经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为什么给他们关在这儿？因为他们认为别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那儿。”

对，外面的人是不知道，除了家里人知道以外，这个学习班也是保密的，要不然干嘛用代号啊。凡是咱们中国所有保密的都是用代号的。

问：“有的人说这个是陈伯达的想法，你知道吗？”

那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一是晚到早走，我在那儿只是一个过客。在整个经历中，在这里是非常少，只不过我在关押期间里头，这对我是一个最好的环境了。因为我回到学校里头反而不如这儿了，为什么呢？虽然我在学校里头以后，我可以回家有更多的自由，但是我在学校的环境里头呢，学校整天把我当反革命监督着，有些革命学生呢，一天到晚就恨不得要批斗我一顿。要我在班上定期做检查，定期向大家汇报我的这个情况，等等吧。反正我除了一条挡箭牌，不许讲案情以外，至于我平常的这些言论，胡说八道的话，最多是跟他们抬抬杠吧，了不起吵一架。他们了不起就是把我批斗一顿，让我低头弯腰，无非这样而已，这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也不在乎。

问：“你戴反革命的帽子到什么时候？”

戴反革命的帽子是这样子，我就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学校去了。以后学

校就赶上林彪的一号通令，就是战备疏散。一疏散我们都应该都地质队劳动去，于是就把我们散到了全国各地。我这个班被散到了江西。在去江西前由于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先在北京郊区怀柔县最北端的一个叫黄花城，旁边有一个钼矿，叫北京怀柔有色矿，到那个地方去劳动，寒冬腊月的时候。大概已经11月份了吧，很冷啊，生火的时候，开始取暖了。在那儿呢在风雪中给人扛电线杆儿，架电线，当了一段电线工，架线工。

问：“你说你后来去江西？去了多长时间？”在江西整个劳动，就是从那个年底一直到第二年的7月1号。12月9号到的，12月初的出发了，一路上走了好长时间。

问：“是70年还是69年？”69年12月初出发的，出发以后是先到的南昌，坐火车从北京到南昌，在南昌休息了一下子，然后又从南昌坐长途汽车到瑞金，从瑞金又修整的几天，然后给我送到了余都县，然后再给送到梨村。梨村这个地方有一个地质队的分队，有一台钻机在打煤田。

问：“你说要进中南海告诉毛刘的事情？”

不是告诉他刘的事情，是借揪刘，然后进中南海，进了中南海见到总理或者主席呢，要说是谈中央文革的问题。想借这个名义可以进去吗，进去以后，作为代表进去以后实际是谈中央文革的问题，向上面揭发中央文革让我们去搞这些总理副总理的事儿。因为我们后来始终没有跟总理对上话，就被整下去了，就被堵了嘴了。这种议论过的，但是后来我就说了，这揪刘火线去不得，他们冲中南海没有好下场的，肯定你冲中南海又落下一个罪名。我们本来就罪名够多的了，你还去加一个干什么？不要去了，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话，到时候说不清的，对吧？再说咱们本心又不愿意揪刘，对不对？你借这个名义到时候事搞不好，弄坏了。所以我反对的，就没去。揪刘那个前线，他们都派了人都摆了桌子盯了摊儿的，旗号都打出去了，我就没去，我就反对，最后给撤了，没去。

问：“有多少人去啊？”

那人很多，在府右街那条街上差不多都是，那路边都坐满了，都是一家一个门面是的，围起来好多椅子摆在那儿，打上横幅弄个桌椅就算火线了。还有些地方还有锣还有鼓呢。当初这个事儿我就没有参与，但是后来审查的时候呢，有三大问题：第一条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条就

说我们要叛国外逃。因为叛国外逃呢，我是很关键的人物，就是说我们可能利用的关系，都是由我联络的。广东那边的以及境外的入，比如哪个有钱的资本家了，或者什么，因为我父亲做这方面统战工作的，有些朋友在外面。甚至真要派出去的话，我的日子是很好过的。那到了台湾，到了美国，都有一些有地位的朋友帮忙的。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去，我出去干嘛？到后来，有些大老板，改革开放以后，说给你个公司出来干干，你愿意不愿意？我都不愿意走。他照顾不过来嘛，财产太大，我父亲的一些老朋友。我不离开这儿，在北京待的挺好的，我干嘛要出去？所以这第二条罪状里头呢，整了我很久，那就一直追着不放了，但是呢，我确实确实没有问题，最后也讲得清楚。第三条，纯粹是冤枉我，我根本没有参与。

这样子，我在那儿审查的时候，除了第一条以外，其它一律不认帐。那么这样子就警告我了，到了11月份的时候，在那儿差不多关了一个月，11月的时候中央二办就派了卫戍区的入来抓我了。学校里的一个月等于白待，根本什么他们也没弄出来。

第三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专题

目录明细

一、	“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120
	编者按	
	(一)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二) 聂树人对高安郑事件的叙述	
	(三) 地院《东方红报》刊登的与此专题有关的部分文章题目汇编	
	(四) 地院革委会整理的“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大事记	
	(五) 高元贵院长的生平简介和追悼会、追思会的活动照片	
	(六) 安静中的生平简介、追悼会悼词	
二、	周永璋两次被抓专题	181
	编者按	
	(一) 周永璋在 1967 年 9 月第一次被抓	
	(二) 周永璋在 1968 年 8 月第二次被抓	
	(三) 周永璋的自述	
	(四) 王秀允(周永璋夫人): 回忆周永璋	
三、	王大宾专题 —— 王大宾庭审记录	213
	编者按	
	(一)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二)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三) 法庭出示的证据与我的辩护	
	(四) 陈云说: “怎么只判天派? 地派也要判?”	
四、	揪彭德怀专题	226
	(一) 揪彭德怀回京的具体行动过程	
	(二) 是谁下的决定和指示, 让地院东方红去揪彭德怀	
五、	朱成昭专题 —— 朱成昭的八大观点	256
	编者按	
	(一) 梅建明和张华府对“叶朱反革命集团”一案回忆	
	(二) 王大宾对“叶朱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回忆	
	(三) 《东方红报》对朱成昭的批判文章	
	(四) 朱成昭的检查与交代	

六、 杨雨忠跳楼自杀专题 274

编者按

- (一) 张振庭对此事的回忆
- (二) 李海荣对此事的回忆
- (三) 聂树人对此事的回忆
- (四) 王大宾对此事
- (五) 蔡新平对此事的调查材料

七、 二进地质部专题 287

编者按

- (一) 1966年10月13日地院《东方红报》第三期对二进地质部情况的叙述
- (二) 李颖对二进地质部的点滴回忆
- (三) 何长工部长、孔丹在其回忆录中谈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
- (四) 地院斗批改兵团对当时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七天全过程的记录摘要
- (五) “天翻地覆”上发表的对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事件的叙述
- (六) “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一文中有关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情况的叙述
- (七)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时珍贵的历史照片

编者按：地院文革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重要人物，其中的一部分已在本书的第二篇中介绍了，此处不再重述。这里把地院一些更为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列为专题，做一梳理和详细介绍。本来列出更多的专题，苦于缺乏史料，最终定了七个专题，分别是：“高安郑专题”、“周永璋专题”、“王大宾专题”、“揪彭德怀专题”、“朱成昭专题”、“杨雨忠专题”、“二进地质部专题”。

一、“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编者按：

1，所谓的“高安郑”，指的是地院原院长、党委书记高元贵；地院原党委委员、团委书记安静中；地院地质系革委会副主任、原岩石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员郑伯让三人。1968年5月执行清理阶级队伍，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领导的地院革委会将上述三人定性为地院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全院组织揭发、批斗、批判（详见1968年5月23日《东方红报》137期）。根据院革委会提供的当年史料得知：这个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由三股反革命势力组成（详见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148期及本专题中的史料），涉及面很广，涉及的地院师生人数很多，在地院所产生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在地院的文革史上是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事件，故特列为专题，以便专门对这一事件进行梳理。

2，根据现有的文革史料证实：在地院东方红总部和地院革委会的某些人指挥领导下，从1967年1月31日《东方红报》第4期起，直至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148期为止，组织发表了大量揭发、讨伐、批判地院东方红内部的蔡派、红二团、高元贵、郑伯让、陶世龙、江祖如等人的文章。院革委会副主任李贵还发表了署名的“高元贵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文章。1968年6月20日院革委会成立了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414联办，编写了“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1967年6月—1968年3月），并限量印刷发给有关同志，提供考虑问题的线索和思路，以有利于批判。

1968年8月1日《东方红报》第146—147期发表了院革委会通过的对此事件的总结报告，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148期又发表了院革委会常委任云堂代表院革委会在全院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3，在2011年12月，聂树人出版的文革回忆录《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一书中，聂树人对此事写道：“因此，地质学院的‘打倒高安郑’运动，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对于错误方面，我应该承担责任。”（详见第571页及本专题史料）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打倒“高安郑”运动又与“蔡派”、“二团”有关？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头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很显然：地院文革中把高安郑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地院革委会炮制的一起冤假错案；同时它又是地院东方红内部朱派和蔡派派性斗争的最后血腥拼搏的集中体现；也是奉旨闹革命的造反派执政后，既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又开启了自己犯错误，去整了无辜的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的典型案例！即开始进入“轮到革命小将犯错误的时期”。这也是地院文革中极左势力整人的典型案例！

4，根据2015年10月出版的《王大宾回忆录》一书，在1967年4月3日——1968年8月25日，地院东方红执政的一年又四个多月时间里，王大宾二次因身体不好，外出疗养。第一次是1967年7月15日起，去北京小汤山医院治病疗养，此次共计近二个多月。第二次是1967年10月10日，去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县汤岗子疗养院住院疗养，直到1968年1月25日才回到北京。此次共计三个多月。（也就是说1968年2月起至1968年8月25日是王大宾在院主持革委会工作时间）王大宾两次住院期间，都把院革委会主任全权委托给聂树人和李贵。这在王大宾回忆录和聂树人回忆录中都有同样的叙述。也就是说，在王养病期间，院革委会组织的“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反击地院内部的‘二月逆流’”、“打倒高安郑”、“九四事件”、“二次抓周永璋”等活动，主要是由聂树人、李贵具体组织策划的。当然王大宾在这段时间要负领导责任。

5，根据已有的文革史料分析，“打倒高安郑”运动的重要起因之一，是东方红内部的朱派与蔡派的派性斗争的延续和发展。自“二进地质部”东方红内部产生朱派和蔡派以来（详见本书“二进地质部”专题），朱派便将蔡派人员排挤在核心组之外；到1967年4月成立革委会时，蔡派人员又再次被排挤在革委会之外。以后相继发生了“九四事件”、“抓周永璋事件”，等事件双方不断摩擦、派性斗争不停升级。一派在台上，一派在野，双方互相攻击，斗争不断。

1967年7、8月，高元贵、王焕被院革委会以老干部身份三结合参加地院革委会常委工作，在这之后，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老师认同了一些蔡派对地院革委会的不同意见和认识，于是院革委会有人便将高安郑江四人认定为蔡派的黑后台，并逐步无限上纲到：他们是颠覆革委会的反动势力……。最后“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此诞生了。

6, 下面列出已有的有关史料, 但有些内容, 在其他章节如, “周永璋专题”、“九四事件”都已陈述, 此处就不再重复。

(一)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东方红的战友们, 革命的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 我院革委会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 带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 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进攻。在揪出了周守成、聂克、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右派翻案集团之后, 又揪出了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大搞“四右”活动, 阴谋复辟资本主义, 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反革命集团。在揪出走资派周、聂, 叶朱叛国集团之后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是我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穷追猛打, 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三股反革命势力的合流。一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 打着“受害者”“革命干部”的旗号, 由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组成。他们向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夺权。其主要成员有, 高元贵、吕禄生、刘普仑、池际尚、马杏垣、曹添、赵XX、翟XX、程XX等。二是以安静中、郑伯让直接操纵的, 打着“老造反派”旗号网罗的一批顽固地为反动路线翻案的老保、老右倾, 利用他们混入东方红内部的身分, 勾结社会上的“二流派”和反动势力, 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主要成员有: 安静中、郑伯让、叶德隆、纪群、江X X及其打手周永璋、

蔡新平等。三是以陶世龙、沈孝宇、王鸿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股反动势力的合流，有它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反革命的政治目的。

高元贵，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我院头号走资派，“四右”的总代表。为了夺回已失去的“天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必然地要伙同他昔日所包庇纵容的难兄难弟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过汪精卫青年团的吕禄生，反动组织“大刀会”的成员，三反分子刘普仑，大叛徒池际尚，反动学术权威马杏垣，地质系走资派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曹添，勘探系修正主义分子赵XX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程XX等，结成反革命复辟小集团。

但是，高元贵们也很懂得，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他再明目张胆地伙同这批乌龟王八，打出旗号，进行反夺权，是成不了大业的，阴谋会立即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揭穿。于是就勾结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所谓“造反”历史的安静中、郑伯让及其所操纵的反革命阶级报复集团《黑二团》的几个小丑，作为他们的得力干将和打手，企图逃脱过去十七年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罪责。掩盖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隐蔽罪恶家史，漏网大右派，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和积极推行者安静中，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伯让，凭着他们长期阶级斗争的反革命嗅觉，在运动初期，就钻进了造反派的队伍。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伙同陈XX、颜XX、叶德隆，王XX、纪群、刘XX、周永璋、蔡新平等入猖狂地反对和颠覆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安静中、郑伯让之流，为了在院系革命委员会里安插他的代言人，就必然要指使《黑二团》的几个小丑，利用某些群众的右倾思想，为高元贵进入院革委会，为郑伯让进入地质系分会大喊大叫，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合安静中等大造舆论。以高元贵为代表的和以安静中、郑伯让为代表的这两股反动势力，就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高安郑之流又怎样和陶世龙、沈孝宇、王鸿这股右派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陶世龙、沈孝宇、王鸿等右派分子不甘

心他们的失败，时时企图翻案复辟。有谁敢替他们翻案呢？他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各派势力中，找到了高安郑一小撮；而高安郑之流也保证上台后为陶沈翻案。条件是他们继续为高安郑之流卖力，控制教务部门和水文系大权，成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支别动队。

一个要翻案，一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要替他翻案，于是反动的翻案目的，就把他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策划于密室，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请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打气，狼狈为奸的。安静中曾对陶世龙说：“整沈孝宇的材料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有那么回事，但不一定是右派言论，到运动后期打不成右派。王XX也始终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陶世龙连忙将安静中这些话转告沈孝宇，同时对他说：“我是‘大批站’方面的秘密成员，是通过清华和他们联系的。朱成昭虽然倒了，‘大批站’这股势力如不能胜利，你还是翻不过来。你要等待时机，要顶住，不要躺下去，要干起来，还要注意不要再被抓住辫子来打我们的人。”从安静中、陶世龙的自白里，我们不难看出：安静中既然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自然就要为沈孝宇翻案了。而陶世龙、沈孝宇也必然要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后期被安静中、郑伯让之流所控制的为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操纵的“大批站”的胜利上。正因为在地院有“大批站”这个右倾分裂组织的存在和社会上反动组织“清华红教工”的支持，陶沈翻案气焰更加嚣张。连篇累牍地一个接着一个上书，大刮翻案妖风，其猖狂程度达到了极点。甚至极右分子张文澜也在去年写信给曹添，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曹添的身上。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主要是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组成，他们在校内网罗一批叛徒、特务，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校外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的操纵下结合的一个反革命的集团。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帅是我校头号的走资派、三反分子高元贵，黑高参是吕禄生和曹添，黑干将是安静中、郑伯让、刘普仑等，而刘普仑又是高元贵的心腹——情报员和材料管理员。各系都有他们的代理人，黑打手是《二团》的几个小丑和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人。

(二)

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进行着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复辟活动。

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焦点是政权的问题。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是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和政治目的。

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开始，那时由陶世龙、沈孝宇、安静中、王XX策划成立的“六·二〇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向当时东方红总部夺权的计划之一，但在李贵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下，阴谋没有得逞。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由谁掌权的问题。安静中说：“革委会要由高元贵所代表的思想掌权”，我们说：高元贵的思想是一整套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由它掌权就等于我院文化大革命前功尽弃，革委会绝不能用这种思想来掌权，只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权”。高元贵说：“革委会要为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平反，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我们说：“不行！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是我院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不能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红色政权，绝不能落在他们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在政权问题上斗争的实质和问题的所在。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企图颠覆红色政权呢？他们阴谋夺权想通过三个途径。

一是否定院革委会的革命性，把革委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打成朱成昭分子，胡说革委会是被朱成昭控制。于是，安静中就提出：“革委会应该改组，而且必须彻底改组。”

怎么改组呢？高元贵指出：“要翻一翻东方红的历史，要为过去受朱成昭打击和压制的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平反，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所谓“彻底改组革委会”，说穿了，就是在“思想上要由高元贵所代表的思想掌权”，在组织上，要由高元贵、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掌权。

为了达到这个“彻底改组”的目的，他们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挖空心思地、恶毒地攻击革命的领导干部李贵和王焕等同志，攻击革命小将王大宾和聂树人等同志。妄图否定我院红色政权是革命三结合的产物。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阴谋夺权的第二途径是：在革命队伍内部拉山头，搞分裂，

企图通过分裂后，来夺取政权。他们多次想打旗号、拉队伍。“七一串联会”和“大批站”的成立及其后期在组织上的不断完善，成为“我院的第二个总部”，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搞分裂，企图夺权的铁证。为了搞分裂，他们恶毒地歪曲“七评”中有关分裂的论述和周总理七·二九对中国科学院两派讲话的精神，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为了搞分裂，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四处串联，组织队伍。他们大造反革命的舆论，施展反革命的手法，为夺权做了许多准备。

首先，他们从方向、路线上全盘否定院革命委员会。安静中说：“我院革委会成立时，就是‘先天不足’，是朱派掌权，被朱成昭分子所操纵；革委会成立后，是‘后天失调’，被关、王、戚所操纵”。他们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八个字，将我院革委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全盘加以否定。高元贵也恶毒攻击“我院革委会的成立是结党营私”“我院革委会的对内政策是被朱成昭思想体系所左右的。对外政策同样是宗派主义的。总之，对内对外政策都是朱成昭的流毒”。而江XX更恶毒、更露骨地咒骂“我院革委会是执行着一条反革命的路线”。他们就是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制造反革命舆论，蒙蔽一部分群众，组织他们的队伍。

为了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为了更多地拉拢一部分群众，高元贵叫“安静中要以干部的身份参加大批站的工作”，叫“教员、干部要多出头露面，以消除群众的戒心”，叫“王XX在原教辅部门去活动，组织队伍”，而他自己也跑去找王鸿祯等这些乌龟王八，做工作，让他们支持“大批站”反对革委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结党营私，网罗党羽的不是革委会而是高元贵他们自己。

在高安郑之流的精心策划下，“大批站”的核心组经过了改组，安静中、王XX、江XX、周永璋、蔡新平等都成了核心组的成员，郑伯让是个高参——顾问。除核心组外，还成立了宣传组、组织组、外联组、内务组、材料组、“大批站”广播台、“地院东方红报”编辑部、大字报编委会等等。革委会有的机构，他们都要有，岂不充分暴露了《大批站》是个分裂组织的狰狞面目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站”的成立是在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的直接操纵下，社会上的“二流派”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高、安、郑在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又出了许多鬼主意。玩弄许多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高、安、郑叫他们“要争夺

批朱的主动权”，“要加强调查和收集革委会成员的材料，上报给领导，要抓住各种机会进行辩论”。叫他们“对外宣传时，要表现出不拉队伍，不搞分裂。应在内部开展合法斗争，坚持打“二团”的旗号，这样对以后拉队伍是有好处的。”

“大批站”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黑旨意下开展活动的。在去年师大事件之后，陶世龙对沈孝宇说：“学校成立了革委会，拉队伍不好办了，现在是在革委会内部夺权，革委会内部有力量，主要以高元贵、田X X、叶德隆为代表。如果工作做的好，可以掌握部分力量，地质系现在是可以拿到手的力量，这个系控制住了，别的就好办了”。这段话，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高、安、郑之流所强调的“开展合法斗争”，实际上是企图通过里应外合，一到时机成熟，搞“宫廷政变”的阴谋手段吗？这也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常说的“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公开拉队伍”的本来面目和反革命策略。

当高、安、郑之流阴谋夺权的前两个途径被揭穿之后，他们又采取了夺权的第三途径。就是利用整党的机会，篡夺党权，然后再夺政、财、文大权，利用教改等机会，恢复旧班子。他们否认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排挤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员参加整党建党领导工作，设置重重障碍，打击、刁难非党的优秀造反派的头头入党。叫嚷非党群众无权过问整党建党工作，他们专横跋扈地把革委会撇在一边，悠然自得提出要“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整顿”。企图实现他们自下而上夺取党权、进而全面复辟的狼子野心。为了争夺党权，安静中和郑伯让还专门研究了争夺地质系党权的问题。高元贵还叫于XX回勘探系，叫教师按原支部组织起来。纪群、郑伯让也在地质系策划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2 2 1”比例的人选方案，组织地质系的核心组。他们卖命地向我们争夺党权，正象江XX所说的那样“别的权可以不要，党权一定要，打破了头也一定要”。别的权，真的不想要吗？不！他们的策略是先夺党权，再夺其他权。但是，这个阴谋也破产了。

利用各种机会，恢复旧班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也是他们的重要手段。

早在去年二月份高元贵就找曹添，叫他去找党员系主任动员他们赶快“亮相”，和高元贵站在一起与周聂作斗争。这是高元贵想拉起旧班子的第一个步骤。去年四月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盖子时，高元贵找吕禄生、刘普仑、曹添密谋策划了一场打周聂保高的丑剧。吕禄生会前积极地找王X X、马杏垣、纪群、曹添、程X X、翟X X等做了研究。在会上，吕禄生开了头炮，给高元

贵定了调子。说什么：“周守成执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旧高教部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更黑的黑线”，“高元贵在执行六十条中是有抵制的”，“六四年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以后，高元贵的态度是积极的”等等，为高歌功颂德，为高元贵进人革委会制造舆论。曹添也积极地做了发言的准备。刘普仑还为高元贵保存材料，并为他摘录了厚厚的一本，说明高元贵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以教改作为幌子，组织旧班子。高元贵以讨论教改方案为名，把陶世龙、曹添、马杏垣、程XX等组织起来，而郑伯让，就把叛徒池际尚，历史反革命王XX拉入系教改小组，让他们编写教改的大事记，为高元贵树碑立传。

许多铁的事实说明了，高安郑之流为了颠覆院革委会，夺取领导权，手法是极毒辣的，有机必乘，无孔不入。

高安郑之流的野心，不仅仅是为颠覆我院革命委员会。更大的阴谋是想颠覆市革命委员会，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

今年三月份，全市刮起了一股倒谢妖风，为“二月逆流”翻案。我院高安郑之流及其打手——“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积极地配合和参与了这场反革命的活动。

他们在群众中广泛地散布：“谢富治停职反省了，因为考虑影响，才让他出来接见外宾”等谣言。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连续贴出《十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等大毒草，恶毒攻击、诽谤谢副总理。明明谢副总理在去年七月底来过我院，还做了重要的指示。而“一月风暴”在《十个为什么》里，颠倒黑白地问道：“为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不来我院，而周、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主子，奴才们都从不间断地出入我院，对我院表示极大的‘关怀’，和‘爱护’呢？”在这里，岂不是说，谢副总理就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主子和成员吗？高、安、郑之流反谢副总理的罪责抵赖是抵赖不了的。

当郑XX炮打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贴出之后，激起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恨，地质公社的革命小将揪斗了郑XX，这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拍手称赞。可是，高安郑之流和“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其鸣冤叫屈。安静中要写信给中央，说什么“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把一个仅仅写了《十二个为什么》的普通教员拿来揪斗”，二团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揪斗郑XX是“反革命的报复事件”。

并贴出大幅标语，“坚决要求革委会 立即释放郑XX, 为郑XX平反，并公开向郑XX同志赔礼道歉。”他们的主子高元贵也赤膊上阵。为郑XX鸣冤叫屈。从安静中这一封信，“二团”的一张声明，一条标语和高元贵的话里，就充分地暴露出他们“二流派”的反动面目，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倒谢活动，企图颠覆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责难逃！

东方红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质就是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他们是代表国民党、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是国民党分子或是要为他的老子翻案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小丑。经过两个多月以来的搏斗，我们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在组织上摧垮了他们，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教导我们：“……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对这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只有坚决镇压，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他们的言论自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得到保护，新生的红色政权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现在，我院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和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让我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阶级敌人，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让它遗臭万年！

打倒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68 年 8 月 8 日《东方红报》148 期）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东方红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院革委会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带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进攻。在揪出了周守成、袁克、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右派翻案集团之后，又揪出了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大搞“四右”活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反革命集团。在揪出走资派周、袁，叶朱叛国集团之后，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是我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穷追猛打，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股反革命势力的合流。一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打着“受害者”“革命干部”的旗号，由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组成。他们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伙同陈××、颜××、叶德隆，王××、纪群、刘××、周永璋、蔡新平等入猖狂地反对和颠覆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安静中、郑伯让之流，为了在院系革命委员会里安插他的代言人，就必然要指使《黑二团》的几个小丑，利用某些群众的右倾思想，为高元贵进入院革委会，为郑伯让进入地质系分会大喊大叫，一而再，再而三地结合安静中等大造舆论。以高元贵为代表的和以安静中、郑伯让为代表的这两股反动势力，就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高安郑之流又怎样和陶世龙、沈孝宇、王鸿这股右派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陶世龙、沈孝宇、王鸿等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时企图翻案复辟。有谁敢替他们翻案呢？他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各派势力中，找到了高安郑一小撮；而高安郑之流也保证上台后为陶沈翻案。条件是他们继续为高安郑之流卖力，控制教务部门和水文系大权，成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支别动队。

一个要翻案，一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要替他翻案，于是反动的翻案目的，就把他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策划于密室，干着反革命的

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复辟活动。

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焦点是政权的问题。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是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和政治目的。

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开始，那时由陶世龙、沈孝宇、安静中、王××策划成立的“六·二〇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向当时东方红总部夺权的计划之一，但在李贵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下，阴谋没有得逞。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由谁掌权的问题。安静中说：“革委会要由高元贵所代表的思想掌权”，我们说：高元贵的思想是一整套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由它掌权就等于我院文化大革命前功尽弃，革委会决不能用这种思想来掌权，只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来掌权，只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来掌权”。高元贵说：“革委会要由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反，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我们说：“不行！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是我院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不能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红色政权，绝不能落在他们的

(二) 聂树人对“高安郑事件”的叙述

编者按：聂树人2011年12月出版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一书中，第三十一章打倒“高安郑”。转引如下：

对“打倒高安郑”的反思

在“打倒高安郑”的事件中，我和王大宾、李贵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左谁右的问题。

“二团”对革委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和下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颠覆革委会”也有些言过其实。

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打倒高安郑”，都是毛泽东体制下的政治

运动。无论是王大宾当权，还是我当权，都离不开一个“左”字。

我的最大错误是，以正统自居，以多数自居，以革委会自居。对于学校以前积累下来的问题，对于“蔡派”的不满意见，未能正确对待。一听到他们的不同说法，就认为是“别有用心”，是攻击，是大逆不道，是颠覆革委会。因此，当权之后，对他们采取了压制、打击的态度。对于站在我们一边的众多战斗队的大字报、文章，我是支持的，赞同的。对于他们对“二团”的批判，对于“打倒高安邦”的行动，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团”说我们是“王关戚的走卒”，是“朱成昭的二套班子”，或者，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并没有深入的思考。

根本问题是，革委会的成立就意味着，你代表的是整个地质学院，也包括“蔡派”在内，而不能只代表多数派。对于少数派的意见，那怕是不正确的意见，你也只能容忍，只能引导，而不能压制，以至打击。

因此，地质学院的“打倒高安邦”运动，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对于错误的方面，我应该承担责任。

（三）地院《东方红报》刊登的与此专题有关的部分文章题目汇编：

- 1, 1967年1月31日《东方红报》第10期,
社论：“迎头痛击托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红色尖兵评论员：“把东方红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 2, 1968年1月26日《东方红报》第114期
海燕战斗队 化学教研室：“化学教研室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怎样揭开的？”
- 3, 1968年3月27日《东方红报》第125、126期
214战斗队、海燕战斗队：“颠覆革委会的宣言书”

——评“二团”的“两论”

4, 1968年5月9日《东方红报》第135期

齐学政：“驳反动的‘还权论’”

5, 1968年5月16日《东方红报》第136期

本报讯：“千军万马齐动员 万炮猛轰高元贵”

木工厂、印刷厂等革命职工：“炮打高元贵的严正声明”

----68年5月11日

批陶战斗队：“高元贵和反动杂家陶世龙”

扫落叶：“从大右派王鸿祯看高元贵”

齐学政：“红色政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左翼为基础”

——二驳反动的‘还权论’

6, 1968年5月23日《东方红报》第137期

社论：“乘胜前进 砸烂高家黑店”

本报讯：“打、打、打、坚决打倒高元贵”

李贵：“高元贵是反革命两面派”

红色尖兵临时党支部：“捏死小爬虫安静中”

斗批组“东方前哨”：“放手发动群众 狠狠打击敌人”

——谈清理阶级队伍

7, 1968年5月30日《东方红报》第138期

红色尖兵煤田支队：“痛斥安静中的反革命罪行”

剥皮狗：“安静中高升的‘秘诀’”

反逆流：“安静中大反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矿物反逆流、区域反逆流、普地反逆流、11652同心干、山鹰等战斗队：

“彻底揭开地质系阶级斗争的盖子”

8, 1968年6月6日《东方红报》第139期

社论：“把讨高伐安斗争进行到底”

“征腐败”战斗队：“把安静中的右派嘴脸揪出来示众”

红哨兵：“安静中为什么要上诉？”

彻底批臭高氏大毒草《原理》

卫三红：“《原理》是射向三面红旗的毒箭”

反逆流：“决不允许高元贵为彭德怀翻案”

追穷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吹鼓手”

9, 1968年6月13日《东方红报》第140期

地质分会“专揪郑伯让”战斗队：“斩断高安伸进我系的黑手——郑伯让”

10, 1968年7月25日《东方红报》第145期

“挥斥方遒”大批判组、六三〇炮团：“彻底揭发高周聂吕安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11, 1968年8月1日《东方红报》第146、147期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7月26日全体会议通告：

“高家黑店的覆灭与红色政权的新胜利”

——关于革委会与高家黑店斗争的总结

12, 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14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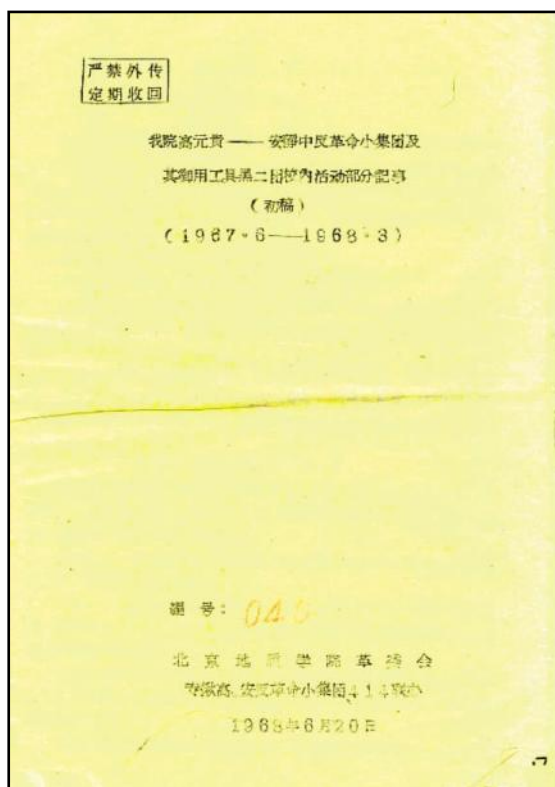
任云堂代表院革委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四）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大事记

徐小青 录入

《昨天》编者按：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从编号看，估计当时印数有限，保存下来的应该更少。其中记录的内容，不管是当事人的交代，还是有关人士的“情报”，难免会有断章取义的文字，捕风捉影的信息，但至少所提到的一些时间、地点、人物及相关背景，还有当时那些大字报或文章的标题、标语口号及行文用语等等，都可以给回忆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们提供参考。



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

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

1967.6月——1968.3.

编号：040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 414 联办

1968年6月20日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前言

这份材料仅根据高元贵、郑雪禾等知情人的揭发、交代材料，和《二团》们部分大字报中摘录汇编而成的，不是一份完整的大事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院“二流”派在校内活动的情况，此材料需要随着阶级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

地加以核实，补充和修改。希望有关工作的同志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编这份材料的目的是：

1. 为了揭露我院“二月逆流”的反动面目。
2. 为了给有关同志提供考虑问题的线索和思路。

由于时间的仓促，在取材、编写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批评改正。

我们希望通过同志们的工作，将来能够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补充新材料，加入革命师生员工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的史事，编写出我院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来。

.....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 414 联办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内容提要

在院革委会的领导下，全院开展了第二次整风，掀起批朱高潮。但我院“二月逆流派”，以为时机已到，借批朱和整风的机会，打着“反朱”的旗号，把矛头指向革委会。

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企图把它成为常设的机构。阴谋拉队伍，搞分裂，和革委会分庭抗礼。

“七一串联会”是谁发起的？是学生？还是干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最先是由高、安、吕、郑之流策划的，只不过通过学生的口，由学生出面组织起来的而已。

“七一串联会”的纲领，就是把要求批朱的群众组织起来，走清华 414 的道路，分裂革委会。他们歪曲“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根据。

但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真面目，被那些在“七一串联会”上扬言要把东方红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人无遗的暴露了出来。

△1967年6月某日

△殷维侯到八.八战斗队找高元贵，通知他晚上到安静中家座谈。

座谈会在东三楼 216 莫宣学家召开。有高元贵、安静中、莫宣学、毕先梅、殷维侯等人参加。进行了很投机的交谈，并分别亮明了观点。

高元贵说：安静中造反最早，为什么不能进入革委会？而黄振群在反干扰期间，出了很大力，为什么能进入革委会？

安静中说了以下内容：

1, 打击王焕。他说：“何长工早就想撤高元贵的职，王焕是何长工在地质学院安下的钉子。”

2. 污蔑打击李贵、王大宾。他说：“李贵是同意陶世龙的 6.20 革命委员会”“王大宾是摇摆不定，玩弄两面手法。”

3. 安问高是否认识聂元梓，想通过聂元梓与中央文革取得联系。

4. 安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受了戚本禹的骗，没有拉队伍。现在要等待战机，抓什么战机，现在还不敢说。”

从高、安这次谈话中不难看出，早在 66 年（录入者注：应为“67 年”）6 月，高、安通过《二团》勾结成了反革命集团。攻击革委会主要成员，搞分裂、拉队伍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

△ 1967 年 6 月 29 日

△下午在教一楼岩石教研室，郑伯让、刘肇昌出面召开地质系部分教师、干部会。有郑伯让、刘肇昌、邓晋福、刘文华、阮天健，万天丰、吴瑞棠、梁定益、林秀伦等人参加。会议要求把几个战斗队串联起来，发起一个公开的“形势串联会”。

会上，郑伯让用“七评”中有关分裂主义的论述，作为理论依据，说明召开“形势串联会”不是搞分裂（按：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人提出次日（6.30）即可公开召开，但刘肇昌说：“选择‘七一’开更好。可以打出《七一整风串联会》的旗号，和清华 414 一样。”还说：“清华有个 414，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个《七一整风串联会》。”

△晚上，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里，由于众主持会议，讨论有关“二团”贴了朱成昭的材料所引起的争论问题。有蔡新平、梁定益、邓晋福、邓雪禾、探工分会誓死卫东、赤二支、呐喊、暴动等二十多人参加。

蔡新平坚持要到外面去刷大标语和公布有关朱成昭材料的大字报。他说：“到时大家注意看，可能寿命不长”（按：中央文革有指示不让公布，革委会坚决执行，而“二团”们却公开对抗中央，但又心虚的怕大字报公布后寿命不长）。

1967 年 6 月 30 日

△晚上，在全院召开揭发朱成昭大会之后，陈学敏、江祖如、梁定益、邓晋福、郑雪禾、余九乡、于众、蔡新平、赤二支、誓死卫东、呐喊等二十多人在物探楼二层一个教室开会。讨论朱成昭的性质问题和应采取的态度。

郑雪禾说：“办法有二：一是把调子提高，看总部的态度。打在朱成昭身上，疼在他们的心上。另一个办法是：看看。让群众对现状不满，再激发群众起来斗争。”江祖如说：“只有采取第一种办法。”

会上，同意了余九乡的建议：成立《七一整风串联会》，并确定由赤二支、

研究生造反队、誓死卫东、暴动、红岩、湘江等十个战斗队作为发起单位。推陈学敏出面组织，马上起草《七一整风串联会》的通告和公告。

会议“公告”，后来由地质部一兵团打印并散发。

一九六七年七月内容提要

在光辉的伟大的“七一”日子里，高、安、郑之流打出了“七一”串联会的分裂旗号。这是对“七一”的极大污辱。简直玷污了“七一”这个光辉的节日。

在整个七月份，“二流”派们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高元贵黑手操纵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着炮轰革命委员会的旗号，恶毒地攻击革命委员会，制造保朱有功、反朱有罪的谬论，蒙蔽和欺骗群众。

地质系旧总支的一些干部突然地也活跃起来了，高元贵和安静中同“二团”的联系也频繁起来了，扬言要为安、周、蔡平反；“二流”派的头面人物高、安之流都公开登台表演，叫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宣称“反对革委会，捕捉战机，现在看是没有条件”。而高安的小喽啰蔡新平、肖体修也大造舆论，说什么“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指革委会）的矛盾”“革委会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真是反动透顶，猖狂已极！

“二流”派为了取得外援，积极支持地质部一兵团，想通过高元贵和聂元梓挂上勾，搜罗了一批院革委会的校外反对派，疯狂不可一世。

自谢副总理指示“不要再搞什么串联会”之后，“二流”派们虽然旗号不打，但贼心不死，阴魂不散，仍想伺机再起。

△ 1967年7月1日

△上午教四楼101室，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

△高元贵在《七一整风串联会》上讲话，谈了整风的几个有力条件，并表示同意彻底整风。

△晚上，《七一整风串联会》召开讨论发表“公报”的会议。

高元贵参加并发表意见：

- ① 口号不能提的过高。以免脱离群众。
- ② 对广播台不能说成与邹家尤的工作队一样，说是白色恐怖。

△ 1967年7月3日

△在教二楼召开《七一整风串联会》骨干分子会议。

有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郑雪禾、万天丰、陈学敏、吉让寿、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孙司权等人。

会议主要内容是统一思想，研究今后怎么干？

蔡新平说：地院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指革委会）。

高元贵提出：在批朱问题上，要搞合法斗争。

会议还通过了支持地质部一兵团的声明；宣读了革委会向中央汇报整风情况的一份简报。在这文件中提出了“批朱防蔡”的口号。

△ 1967年7月上旬

△一天晚上，在教二楼301召开串联会，有三十多个战斗队签到。会上，主要是江祖如发言，对“二团”作了一个全面的介绍。目的是要大家对“二团”有个正确的看法。消除对“二团”的戒心。散会时，按战斗队发给由“二团”整理的有关朱成昭的材料。

△郑伯让背着地质分会，在纪群家召开地质系原党员干部会。有纪群、任端芳、关侠、郑伯让、刘肇昌、叶俊林、刘文华、郭铁英、张本仁等人参加。主要讨论对革委会的估计和整风的问题。

郑伯让说：“整风能否整好，主要靠发动群众。系里辅导员都不愿意做工作，你们要回去做党员工作，要大家动起来。”

叶俊林说：“有些造反派头头私心杂念比咱们重。”

郑伯让还说：“要看到这场斗争是长期激烈的。可能以后整党上会暴露出来。我们要多做工作。”

△高元贵到安静中家（东三楼214室）谈了以下内容：

① 安静中谈了他要高元贵帮助接聂元梓关系的用意：一是了解中央文革对聂元梓到底是什么态度，二是与肖力接上关系。蔡新平和肖力的联系断了，听说肖力常到新北大去。高元贵劝安不要和北大联系，因为我院群众对北大有很大气愤。如与聂元梓联系，在地院即将脱离群众。

② 安静中说，不拉队伍是受了戚本禹的骗。（据高元贵交代，安静中去年十月份还说过：单独拉队伍，在去年十月（1966年）或今年二月整风时是可以实现的”）

③ 安静中还说：“反对革委会，要捕捉战机，现在看不是没有条件。”

（按：高、安的这次谈话，充分地暴露出颠覆革委会，拉队伍、搞分裂的丑恶嘴脸。）

△七月十天左右，陈学敏要起草《告全院东方红革命战士书》，到高元贵宿舍（学12—104）征求意见。

△ 1967年7月中旬

△安静中在马路上对高元贵说：他要给革委会李贵、王大宾一封公开信。

△在教二楼801开会。主要是各系学生，教员有梁定益、邓晋福、毕先梅、冯文珍、郑雪禾等参加。陈学敏提出召开全院《七一整风串联会》炮轰革命委员

会。经过讨论，决定召开会议。

讨论过程中，郑雪禾认为：二月整风反朱，结果受压，这次炮轰解决不了问题。梁定益批评郑雪禾，说她的意见是消极的。毕先梅说：过去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现在组织起来就好办了。

△在大饭厅前，召开了第一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

会上莫宣学、毕先梅、王暄堂、15632《风雷激》发言，主要论点是：在对敌斗争方面是包庇朱成昭，在干部使用方面，执行了“任人唯亲”的政策。

地质系旧总支、系办干部在东三楼王葆瑜家开会。请高元贵谈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任端芳、关侠、纪群、王葆瑜、王觉生、池际尚、杨光荣、陈安民、邓兆仑等几个辅导员参加。

高说：“在批朱过程中，势必要对地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检查一番，历史问题清楚了，自然而然要涉及权的问题，探工分会把朱成昭分子给撤了，你们地质系要撤朱成昭分子是很容易的。”

△ 1967年7月18日

△在大饭厅里。召开第二次炮轰革命委员会的《七一整风串联会》，高元贵、安静中都亮了相。

会上，安静中念了他给李贵、王大宾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王大来讲了话。高元贵也亮了相。

高元贵说：“要翻一翻东方红的历史，要为过去受朱成昭打击和压制的人平反（即为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平反）。”煽动地说，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晚上，在教二楼310，召开形势串联会。

陈学敏主持会议，主要是“二团”成员和地质系的教师、干部参加。有高元贵、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叶德隆、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周永璋、郑雪禾、蔡新平、殷维侯、肖体修等二十多人。

主要研究：对总部《关于地质部形势的声明》和第二天六个分会及东方红广播台联合召开的“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誓师大会”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高元贵建议：争取在第二天会上发言。次日，“二团”方面强行冲上讲台，抢坏了话筒。

蔡新平提出“现在对我院这个政权（指革委会）怎么看”的问题，让大家讨论。

肖体修说：“我看这个政权已经臭了，应该进行二次革命。”

△ 1967年7月下旬

△在7.18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表态和7.20《新东方红公社成立宣言》出

笼之后，高元贵带着书面意见到安静中家，谈他对当前校内形势的看法，王暄堂、周永璋也在场。

高说：“主要锋芒，应该对准朱成昭《新东方红公社》集团。把八.八战斗队与红色尖兵作为争取团结的对象，对朱成昭在革委会里的代理人，点名过多，宋云是工人，是听别人指挥的，不应点宋云的名。”还说：“革委会已出公告，准备结合王焕，你、我两人进入革委会，要同心合力……”

后来因为旧市团委有人来找安静中，搜集旧市团委的材料，高就离开了安家。

△一天，曹添在高元贵屋谈到夜里十点钟，走时见到安静中、江祖如、殷维侯、周永璋、吉让寿到高元贵屋。高元贵对曹添说：“周永璋、蔡新平我不太熟，找我最多的是吉让寿，他是二团决策人”。

△高元贵在串联会上公开亮相后不久，高元贵和郑伯让坐在学九楼路边交谈，高元贵说：“我在七一串联会上讲话后，估计可能受围攻，也可能推迟半年进入革委会。”郑伯让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于1964年11月在高教部开会反对高教60条的发言，已经抄来，存在岩石教研室。”

△在我院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大会的那天晚上，高元贵和万天丰谈了半个多小时，万天丰说：“我认为你进入革委会，不如不进入革委会好。”高元贵说：“进入不进入，各有利弊，进入革委会，同学们起码不能随便揪斗我。”（按：从此看出，高元贵进入革委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合法地位，从事反革命活动。）万天丰说：“你不进入，他们也不能随便揪斗你，斗争了你，看他们怎样向上级交待。”

△7.28. 11622《永向前》一篇“关于我院干部问题的严正声明”中，高喊高元贵、安静中应进入革委会，攻击王焕同志是见风使舵的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内容提要

“二流派”们猖狂反对院革委会的言行，被小爬虫关锋、林杰之流看上了，直接支持了他们。下达黑指示，企图利用朱成昭的问题，达到颠覆我院革委会的目的。

为了迎合形势的需要，成立了《七一串联会》的变种《大批判联络站》，其活动更加猖獗露骨。这个组织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公开支持。清华反革命组织《红教工》也派来了联络员，并成立了“杀朱兵团”（实际上是颠覆地院革委会兵团），红旗杂志社赵易亚式人物周英、李惠让多次接见，并提出要革委会成员的情况介绍，为《大批站》出了不少鬼点子、坏主意。高元贵、安静中更是洋洋得意，出谋划策。为了组织上的统一和斗争的需要，高元贵建议安静中

亲自出马，想法进入大批站。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叫王大来把探工系、水文系组织起来，结成第三势力。在高、安、郑精心策划和积极活动下，各系相应的组织相继成立，建立了宣传组、外联组、大字报编委会等，真是万事具备。可有大干一场之势。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出笼，是高、安、郑之流精心炮制的产物，它得到了社会上“二月逆流”派的大力支持，代为印刷、散发。“联合声明”就是“颠覆红色政权的联合纲领”。声明的发表充分地暴露出反革委会、颠覆红色政权的狼子野心，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猛醒过来。宣告了他们的灭亡之日即将到来。

△ 1967. 8. 2.

△晚上，在数二楼 428 室召开地质系一些师生形势串联会，讨论校内外形势，研究怎么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刘肇昌、万天丰、叶德隆、郑伯让、邓晋福、李明哲、刘文华、毕先梅、王宝瑜、吴瑞棠、梁定益、郭铁英、闻立峰、阮天健、骆庭川、王珍如、叶俊林等参加。

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 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校内运动必须与社会上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关门搞斗批改；朱成昭的问题也要联系到社会上问题一起考虑。

(2) 校内两派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干下去；今年一月份来，我院究竟立了什么功？

(3) 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拉队伍，应在内部斗争。“分裂”只能是错误者对正确者而言。正确者向错误者的决裂斗争决不是什么“分裂”，对分裂一反对，二不怕（这段有关分裂的论述，是莫宣学讲的，他和 6.29 郑伯让在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上的发言完全一样，莫是郑的传声筒）。

△ 1967. 8. 3.

△上午，在化学楼 117 室，召开地质系部分师生形势串联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刘文华、王珍如、阮天健、骆庭川、郭铁英、林秀伦等参加。

(1) 由李振海传达田春林找关锋谈我院情况后关锋的指示。

1) 在地院批朱符合大方向，阻力来自于革委会。

2) 杨雨中怎么还在革委会里工作。

3) 要两位与朱斗争坚决的人陪他去东北。

(2) 说：“朱派整了王大宾的材料，并传在适当的时机要抛出来。”

(3) 说：“革委会搞了一个调查朱成昭的七人小组，只有一人是彻底整风派，其它都是‘朱派’，还有死保朱的，为朱开脱罪状。”扬言“对此要密切注视和采

取相应措施。”

△ 1967. 8. 4.

△在教二楼 310 开会。

由王振东传达关锋的指示。

杨淑荣说：“我和李明哲同去红旗杂志社，这次去的态度与过去不一样，比较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精神与关锋的指示是一致的。在我院批判朱成昭是符合斗争的大方向”。

李明哲说：“他们提出，当前形势要我们注意揪军内一小撮，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步是搞彭、陆、罗、杨；第二步是搞刘、邓、陶；现在是揪军内一小撮”（找的是周英、李惠让）。

△晚上，地质系部分教员在化学楼 117 召开串联会，讨论形势。

由莫宣学主持会议。有郑伯让、叶德隆、刘文华、王宝瑜、郑雪禾、吴瑞棠、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王珍如、阮天健、曲一华、于崇文、林秀伦等人参加。首先，由郑雪禾传达了上述的内容。莫宣学引导大家讨论校内外的形势。他提出：“现在校内外这场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两条路线斗争？还是派性斗争？”看法并不一致。

于崇文传达 7.29 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的讲话内容，歪曲为可以成立两个总部。

郑雪禾批评郑伯让“现在不大敢出面抓工作”，郑伯让表示基本接受这意见。出来抓工作。

△ 1967. 8. 7.

△召开地质系《大批站》成立大会。

由李振海传达下列内容：

（1）传达周总理 7.29、7.30 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国科学院代表的讲话。传达的目的是将其歪曲，为搞分裂提供理论“依据”。

（2）传达关锋指示：你们学校批朱是不违背大方向的。朱是有背景的。你们怎么连个朱成昭也对付不了。你们要追他的根……这个根源在革委会，应当发动群众，杨雨中不行，我不要，我要与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不要怕乱嘛！乱才能乱出个好局面。

（3）传达林杰的意见：朱成昭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你们要注意他们的行动。“七一”串联会旗帜是鲜明的，造反有理嘛！主席的部署是早就搞好了的，现在是搞军内。朱成昭的要害是反对中央文革，要抓他与刘邓的联系。杨雨中这个人家庭出身如何？社会关系？你们要追朱成昭与一些人乱七八糟的关系，不是生活问题，而是追政治问题。

△杨淑荣和李明哲去找周英。因关锋要两个人去东北，他（她）们就去反映情况。不让朱×和黄××去东北，周英答应给反映上去，并问“这两个人怎么保朱？”杨说不出来。周问听说还建议让你和蔡新平一起去？……周问聂元梓和聂树人有无亲属关系，还要谈革委会常委的情况，杨、李汇报了。周英说：“你们应该有个简报。成立××组，我们都看的是革委会一边的材料。你们搞了一定送一份来……”当时李贵让他们与院专案组一块搞，周英说：“他们保朱，你们才是真正的反朱。你们怎么能与他们一起搞呢？”回校后就分开搞了。周英还说：“他们要抓后台就来抓我，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嘛！”

△ 1967.8. 上旬

△月初《大批站》成立后的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高元贵找安静中，到莫宣学家。在场的还有江祖如、王暄堂、万天丰，吴瑞棠、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等人，是个研究今后怎么干的决策性的会议。

安静中和“二团”对大批站排斥二团参加不满。二团提出要联络十几个战斗队自己干。要和北航联系，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反对革委会和大批站。

高元贵说：“不能反对大批站，这是一道线”。并叫安静中亲自出马领导，想法进入大批站，还叫王暄堂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

会上决定让江祖如帮助二团着手写声明（即后来的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

在谈到今后怎么干时，蔡新平说：“我们联络一些战斗队，大约在十个以上，发表一个声明。一方面反对革委会，另一方面反对大批站。大批站是机会主义的，对外要有分析和选择性的联合。准备联合北航红旗。如果事情失败，就将十几个战斗队拉到一个地质生产队去进行生产劳动。到哪个生产队，与地质部一兵团联系决定。”

安静中表示：按这种办法做，可能是一条出路。

会前，高元贵在王暄堂家（东三楼 315）部分干部、教师会上谈了话，他用“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来回答有人提出的“是否是夺权的问题”。还说：大批站就是第二个总部。参加会的有纪群、任端芳、王宝瑜、叶俊林、池际尚、江祖如、邓兆伦、陈安民、万天丰等。

△在教二楼三层召开会议。

陈学敏主持会议，他说：现在主要是揭发、批判朱成昭。下一步提出改组革委会。

还有人提出要成立《大批站》广播台。没取得统一的意见。

△当各系纷纷成立大批站时，高元贵在原院办对王暄堂说：你把机关干部组织起来，成立机关大批站。王暄堂答，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大，不行，“最好你（指高元贵）领头来干”，高认为他不是老造反派，没有本钱。

△8.8.勘探系大批站成立。

△8.9. 地质学院大批站成立，并发表公告。

△“大批判联络站”成立后，周英、林杰、红旗杂志记者问过陈学敏他们五次，问他们对外政策怎样？十分关心“大批站”的建立。

△ 1967. 8. 中旬

△地质系《大批站》教员在教八楼 120（地化教研室）召开形势串联会。

会上，于崇文介绍地化教研室讨论形势的情况。郑伯让谈了几点意见（内容不详）。

刘肇昌念了《大批站》搞的革委会委员对朱成昭问题态度的上报材料。

莫宣学说：“二团最近要发表一个声明，安静中和郑伯让都看过。调子比较高。院里提到小资产阶级掌权，校外否定两大派，肯定北航。可能会有反应。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有个思想准备。”

△清华《红教工》派往我院的联络员，反革命分子来普炎，清华批刘邓陶战团的同学到北翼楼二层找周永璋、蔡新平，由蔡新平介绍他们如何同“朱派”作斗争的和受压制的情况，革委会是朱派的，对外政策是不对的等等。

△一天，来普炎到安静中家，见有六、七个人正在看联合声明的底稿，提到王大宾对朱成昭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

△一天，江祖如、周永璋、蔡新平到清华甲所介绍我院的情况。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于 8.17 出笼之后，在学 12 楼 217 室召开各系《大批站》代表会。

会上，对《联合声明》发表了不同程度的看法。

散会时，江祖如对郑雪禾说：探工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不要革命了。

△8.17.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的这一天，安静中对高元贵说：“原稿棱角太多，我给他们抹掉一些棱角”，表明安静中对这个声明不仅看过，还修改过。

△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出笼前，在化学楼召开的地质系部分教师的会议上，郑伯让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看过了，认为调子太高，先给教员打个招呼”。

在这次会上，还研究了各教研室批朱的任务。

△十五个战斗队发表后，在教二楼三层（？）东头开了一次会。

周永璋在会上说：“三军对地院东方红很有意见”。还说：“三军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态度是非常支持的”。

△8.11.地院大批站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要求革委会必须按关锋所提出的条件，派和朱成昭划清界限的人去东北。

△《湘江》《一月风暴》等战斗队，按照关锋给大批站的指示的调子，写了许多大字报，大叫“批朱的阻力来自于革委会”、“批朱阻力的根源来自于革委会”、

“批朱完全符合大方向”等等。

8月中旬，高元贵与颜慰萱在城里汽车站下公共汽车时碰上，他们站在马路旁边谈了十几分钟，高元贵首先问了一下勘探的一般情况，并问翟裕生与赵鹏大的情况。颜告诉了高元贵，颜说，她是支持大批站的，勘探系有许多人同情大批站，怎么办好。高元贵说：“可以组织起来。你不要怕，我不是在‘七一串联会’上公开讲过话？我这样年纪都不怕，你们怕什么？”

△ 1967. 8. 20.

△在教八楼 308 室（原通知在 228，后移到 308）召开由地质系部分师生参加的讨论校内外形势和拉不拉队伍的一次重要会议。

有二团全体成员，安静中、王暄堂、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叶德隆、刘肇昌、吴瑞棠、梁定益、莫宣学、万天丰、李振海、张赓祥、张台甫、于众、李明哲、杨淑荣、呐喊、小小老百姓等卅多人。

蔡新平主持会议。

周永璋说：“蒯大富最近同我谈，叫拉出来干，有一百人就可以，他们可以支持我们。还提出叫我们安广播台，供应我们广播器材。昨晚从大会堂回来，叫我同乘他的车，开到校门口，我准备下车了，老蒯说：开进去。到学九楼十字路口才下车。这就表示老蒯公开支持我们。我们究竟怎么干？请大家讨论讨论形势。”

殷维侯说：“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我们的想法调子不提高些，引不起反应，没有意思。提高些是准备让他们跳一跳。”

周永璋说：“这个声明的价值，就在于对外路线的看法。要没有这一条，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从中央最近的态度看来，对北航是树的，我们提一句有好处。”

关于拉不拉队伍，有两种看法：

(1) 地质东方红虽是一个组织，但没有生气，半死不活。有两个组织，就有矛盾。有斗争，有发展，分出来有好处。

(2) 分出来要扣上一个分裂的帽子，搞得最好也不过是清华 414 那样，僵在那里也是被动。再说广大东方红战士不愿分裂，能出来干的没有几个人。

周永璋、蔡新平主张，趋向于拉出来干，周永璋说：只要我们旗帜鲜明，斗争得力，群众是会过来的。殷维侯认为：“前途不妙，最多搞成个清华 414 最了不得。”郑伯让说：“不要打什么旗号，先干起来再说。”王暄堂也自报奋勇地说：“我可管资料，守电话。”

安静中表示同意蔡新平的意见，但具体内容上说得很含糊。有人追问他到底同意不同意拉队伍，他不表态。

△ 1967. 8. 下旬。

△在 8.20.左右，清华托德坚、来晋炎到官道公社找王大来，向他讲了当时

我院的情况，并带去联合声明及一些大字报的油印材料，鼓动王大来回地院干。

△清华来晋炎找蔡新平，问蔡有什么需要支持的，蔡让他们帮助印朱成昭的材料。这材料印好后送安静中家，并给上报了一份。

△清华在大操场开大会，王大来、蔡新平、孙司权、周永璋，还有一个女同学（大概是万慧祥）都去参加了。

△由陈学敏召集会议，除本院《大批站》各系代表外，还邀请了机院、体院、财经、锻造几个院校的代表，调查对地院对外政策上的意见。

△ 1967. 8. 21.

△上午十点钟，在教八楼 308 开骨干碰头会。蔡新平根据 8.20.讨论的情况，提出初步意见“不拉队伍，先干起来”，“成立宣传组和外联组”。

宣传组由蔡新平、殷维侯、莫宣学负责，外联组由周永璋负责。

参加《大批站》工作的主要成员有郑伯让、江祖如、莫宣学、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毕先梅、梁定益、吴瑞棠、万天丰等。其中多数是委员和战斗队长。

会上，江祖如向郑雪禾提出，要在化学楼借房子，还想安电话。

△ 1967. 8. 25.

△地质系大批站发表“关于我院大批判的严正声明”提出：革委会在对待大批判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必须在批朱同时认真检查。

△安静中亲自为机关《八一八》起草了一个“关于形势的声明”，这声明拒不承认院革委会是红色政权，声明认为“大批站”的成立是必要的。“要坚决支持大批站的一切革命行动”。有人不同意贴出去，安说：“声明不管写的行不行，现在我院干部就是私字多，不敢出来说话，你们能出来说话就好。”

△ 1967. 8. 26.

△晚上，在教八楼 114 讨论形势。

陈学敏主持会议，有王大来、江祖如、梁定益、李振海、汤鸣皋、陈凤英、杨淑荣、于众、曹敏九等廿多人参加。

王大来说：“回来后了解些情况，与王大宾也谈过几次。我们学校的错误主要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外要除‘三害’（聂、蒯、韩），对内包庇朱成昭，把同志当成敌人。”

有人让王大来留下来，王提出两个办法：（1）造反不走了，但这个办法是站不住脚的，就像上次戚本禹让回去一样，只好走。（2）让王大宾通过市革委会留下来，是可能的。

为了加强对校外形势发展的了解，陈学敏叫郑雪禾在《大批站》内搞个“动态报”（郑也为这事到北航了解了情况）。

△ 1967. 8. 29.

△下午，在教八楼一层地化教研室办公室开会。成立《大批站》大字报编委会。研究各单位联系组织落实和其它宣传工作。

会议由毕先梅主持。有郑伯让、骆庭川、丰茂森、万天丰、朱有光、王顺金和七、八个学生参加。

△晚上，在学 12 楼 217，由陈学敏主持，有万天丰、王顺金等廿多人参加，准备第二天市革委会李冠英召开座谈会时，如何分析形势的问题。

△ 1967. 8. 30.

△上午（？）在教二楼 408 室，主要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

△ 1967. 8. 31.

△地质系旧总支干部组成的《经风雨》战斗队，贴出“为什么干部条件最好的学校反而落后了？”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是执行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最根本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在作怪。

△八月底，王大来回校，高元贵和王大来在学 12—104 谈了一下午。王大来要高元贵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高说：“我主张对外走第三条道路，坚决跳出北京两大派的圈子。革委会成立，是朱派压着蔡派成立的。革委会只有叶德隆一个人是蔡派，严格地说：是结党营私。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对内提得过高，点名也过多，对外则提得不够。”在这里高元贵恶毒地攻击院革委会，同时又叫王大来拉队伍，他说：“你不是对探工与水文很有影响吗？你最好把探工和水文另行组织起来，另搞一套调子，要看群众的接受水平。”

一九六七年九月内容提要

九月，是“二流”派最疯狂的一月，也是他们开始破产的一月。把院革委会污蔑为“关、王庙第二套班子”的“二流”们，把王力、关锋、林杰的垮台之日，看成是他们妄图搞垮革委会的大好时机，就兴风作浪，四处活动，企图配合师大反革命事件，一举推倒我院红色政权。

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无数次的黑会都在研究着对付革命委员会的策略，大字报矛头也一直对准我院红色政权。《大批站》领导核心进行了改组，广播台也叫了起来，小报也差点出笼。社会上“二流”派对其的支持更加公开和大胆，答应给予广播器材、纸张等物质上的大力支持。高元贵到处游说，煽风点火，王大来也三顾地院，与高、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赤膊上阵，亲临指挥。想当时“二流”派们，笑得多欢，跳得又多高，简直不可一世，真有点天下即是他们的了的劲头。

中央文革对“师大事件”的表态，宣告了“二流”派们黄粱美梦的破产，迎

头痛击了这股逆流。他们有的不干了，可有的还硬着头皮充“好汉”。这时，安静中急忙为小喽啰们鼓气，说什么要正确理解中央首长讲话。王大来见势不妙也溜回官道，待机再来。这只能暴露他们心中的空虚，根本不能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

具有几十年反革命经验的高元贵，总结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只有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于是，从九月七日以后，“二流”们按照高元贵的这一授意，积极地串联，组织队伍，勘探系教员数次形势串联会的召开就是一例。安静中也亲临串联会做起报告来了，大胆地介绍了自己是《大批站》的核心成员之一。

高元贵对《大批站》的关心和支持，博得了“二流”派们的欢欣和赞扬，于是院内“结合高元贵”的呼声四起，大肆攻击我院革委会是执行了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的干部路线。说什么“我院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还把革委会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当时矛盾的核心和实质，企图引导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革委会，而不是阶级敌人。提出这种看法的就是原政治部干部安静中、吕禄生之流，其用心何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67年9月1日

△晚上，在教二楼三层东头一个办公室，有安静中、王大来、郑伯让、陈学敏、周永璋、蔡新平、郑雪禾等二十多人，研究下步工作，决定9月2日召开《大批站》全体大会，让郑雪禾在会上作校外形势报告。

△ 1967年9月2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内部形势讨论会。安静中、江祖如等参加。

安静中告诉郑雪禾：“学九楼前《警告林杰》的大字报是昨晚清华团派来贴的，这张大字报上月在北大就出现了。”又说：“周英被抄家，关锋可能有问题。”

郑雪禾介绍了校外形势。

江祖如谈校内问题。他说：“我院革委会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路线”。

晚上，在大饭厅开大会。由杨淑荣介绍朱成昭的材料。江祖如、蔡新平谈校内、外形势。传达当天下午清华鲍长康对北京形势的分析报告。

△晚上，王大来在安静中家（东三楼201室）谈探工系的情况，后因东北某小学教员陈闯要见王大来，把郑伯让、王暄堂、江祖如、莫暄学、杨淑荣、蔡新平和二团的其它成员都叫到安静中家，曹敏九也在场。

陈闯问：“这都是你们的人吗？你们的后台还有没有人？一个组织核心很重要！”安答：“我就是最大的后台。”陈说：“蔡新平我是相信的，安静中我也知道，地院的情况我了解，蔡派有希望。现在师大同学已经动起来了，我给他们教员点

了火，还不敢动。今天来找王大来了解地院的情况。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决战。你们应该把队伍组织起来”，又劝王大来留下来干，说：“我可以到市革委会去替你说一下。”

过一、二天，杨淑荣告诉郑雪禾：“陈闯在师大托人带信说叫我们快把队伍组织起来。”

△ 1967年9月4日

△上午，由陈学敏主持，在学十二楼二层开会。

有周永璋、万天丰和地质系各教研室的人参加。研究批朱和当晚《大批站》广播台广播的问题。

周永璋说：“广播器材、机子都有了。安装准备要地质部一兵团的人来帮忙。”

陈学敏说：“前几天地质部 516 头头，参加三军党委扩大会，三军等负责人说：‘你们还和地质东方红搞得那么紧，地质东方红越来越右了。’头头说：‘没有呀！我们和《大批站》搞在一起。’三军等负责人说：‘那好。’”

会上，还做了分工。

△晚上，《大批站》邀集了不少外单位召开批朱大会，介绍朱成昭的材料。《大批站》广播台开始广播。

《大批站》广播台是九月初在教七楼三层一个大教室里开会决定的，通过陈学敏向地质仪器厂，孙司权、吴瑞棠向矿院借来喇叭。宣传工作由地质系教师负责。具体由梁定益、牛定杰组织，并由他们写广播台成立宣言。

当晚，在王暄堂家（东三楼 315 室）开会。有郑伯让、莫宣学、邓晋福、王暄堂、郑雪禾，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九点多，《大批站》广播台被砸后，在安静中家开会，决定由殷维侯、莫宣学起草大字报控诉。

这天晚上，清华来晋炎来地院。

△程光华到高元贵屋（学 12—104），高指着楼上说：“这上头相当第二个总部”，“十五个战斗队的声明，大批站宣言我都看过”。

△ 1967年9月5日

△在教七楼 307 室召开“9.4 事件”控诉大会。

由梁定益、万天丰、肖体修控诉他们被打的经过。

丰茂森提出：“现在我们应该成立革命造反总部。”

会议认为：“9.4 事件是个反革命报复事件。”

△《机关八一八》贴出“关于我院目前形势的分析和紧急倡议”，有意回避我院阶级斗争的实质，并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提出：“革委会不能紧跟中央精神，在干部问题上有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东方红内部分歧，矛盾的核心和实质是革

委会中的某些人和革命群众在对待和解决朱成昭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问题的性质是如何彻底肃清其流毒。矛盾的实质是院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继续，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批判朱成昭和斗争大方向完全一致，阻力来自于革委会。”这些看法，安静中并不同意，并极力反对。他认为革委会快完蛋了，在这时贴出这张大字报，“不就要起到原政治部那篇大字报（即 66 年 8 月政治部保工作队的大字报）的作用了吗？”

△ 1967 年 9 月 6 日

△上午，高元贵到地史教研室对王鸿楨、何成舟、朱志敏等近十人说：“现在必须从两大派的圈子里跳出来，才是出路”，“革委会的对内政策是被朱成昭思想体系所左右，派性占上风。对外政策同样是宗派主义，干扰主席战略部署。总之，对内对外都是朱成昭的流毒，都是派性控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肯定的。”

又说：“大批站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方式方法有问题，如设电台，有些冒进，但既已冒进就应坚持，不能后退，否则更将陷于被动。大批站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高还煽动说：“9.4 事件就是聂树人怂恿的，就是他主持的。”

△上午十点左右，在学九楼前十字路口开控诉大会。

这时王大来从清华回来对郑雪禾、李振海说：“老蒯和韩爱晶商量好了，准备跟王大宾摊牌，最后争取他。要是他不过来，我们就跟他干了。”又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不行，要赶紧组织起来。”建议马上开会讨论，决定由李振海、郑雪禾分别通知《大批站》和《二团》方面人员，于下午一点在化学楼 407 开会。

郑在东三楼 219 室找到安静中（安一个人在李明哲屋里）。安说：“现在我要冷静地考虑些问题，为什么那天专门打我们二团和地质系的人？”并表示下午不去开会了。

△中午会议由陈学敏主持，有王大来、曹敏九、李振海、莫宣学、丰茂森、林名章、江祖如，二团（周、蔡没去）及地质系部分学生参加。

丰茂森积极主张拉队伍，要在“组织上独立起来”。江祖如和二团出于他们反革命的策略表示不同意，但没谈出多少道理来。因为意见不一致，就推丰茂森和呐喊先起草一个对形势的声明。

九月初这期间，安静中对拉队伍一事没有明确表态。有一次安静中把郑雪禾拉到莫宣学家，单独对郑说：“要看老郑（指郑伯让）的意见。现在干的都是地质系的力量呀！”

△晚饭后，周永璋被抓。北航闻讯来了解情况，由郑雪禾带到安静中家。安说：“周永璋不是 5.16 分子”，并托北航代寻周的下落。

夜十二点，北航派人到郑雪禾家，告明周永璋在钢院附中。

莫宣学对郑雪禾说：“安静中、郑伯让他们准备9月7日下午去三军，有车。”

△晚上，九点左右，二团吉让寿在平安里把高元贵叫到解放军报社去，在接待室里的还有蔡新平、肖体修、殷维侯等，他们要求见肖力，被拒绝了。高元贵为二团打气说道：“被打就有理了。”二团对高元贵说：（1）15个战斗队声明是机院东方红给印6000份。（2）周永璋不是5.16。（3）准备到机院去住。

高曾对吉让寿说：“能团结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的问题。”给黑二团出谋划策。

△《大批站》许多战斗队纷纷发表“9.4事件”声明，声明要点是：“9.4事件是阶级报复，是地院资本主义复辟的铁证”，“是革委会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暴露”，“是白色恐怖”，“是血腥镇压的事件”。

△ 1967年9月7日

△上午，王大来、田春林在北航与韩爱晶、蒯大富同往电影学院后院，和“天派”头头一起开会，在场的蒯、韩、井岗山、田东等都叫田春林干起来，表示支持他，王大来也批评田春林“胆小，怕事”，鼓动他大胆地干起来。

△晚上，在西一楼213室，王大来召集王喧堂、江祖如、郑伯让等人研究形势。

郑伯让说：“学校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对我们很有利，我们要抓紧这个有利形势，发动群众。首先，要争取王大宾。让他出声明支持大批站，站到大批站这边来，然后发动各个系，各个战斗队宣布加入大批站，这样就能打开局面，形势一下子就可以扭转过来。”

唐咸正说：“王大宾工作由我做。”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召开《大批站》大会，介绍周永璋情况。说明：周永璋不是5.16分子，抓周永璋是聂树人对周的打击报复。搞政治陷害的具体表现。

△上午，北航来人联系，到北航介绍情况，安静中问：“能不能在你们那里借到一间房子，开个会或者有什么事避避。”北航人走后安对郑雪禾说：“像我们这些人，他们可能要拿来斗的。”

下午，江祖如、刘肇昌、郑雪禾到北航动态组介绍情况（原先安静中研究是派郑伯让、江祖如、郑雪禾三人去），北航方面的人有：殷立新和学生一人。

江祖如作了全面介绍，要点：

（1）总部对朱是右倾的，在地院反朱有罪，保朱有功。

（2）介绍革委会里每个成员的情况，多为“朱成昭的代理人”。江说：“所以，我们要夺权，现在正组织队伍，准备接班”。

(3) 详细介绍了周永璋、蔡新平和二团的情况，指出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干部多数站在二团、大批站一边。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干部、教师的政治面目和所担任的工作，说明政治上是可靠的。

△下午。清华派车，王大来、安静中、莫宣学和清华《红教工》来晋炎同去三军海直《红联总》诬告革委会。

△在教八楼四层西头化学实验室开会。《大批站》各战斗队派人参加，有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郑雪禾、莫宣学、丰茂森、二团。

主要研究《大批站》的组织形式问题，有两种意见。

(1) 王大来、牛定杰、丰茂森、赵国柱主张另成立一个兵团。称“东方红公社××兵团”，并认为这样“旗帜鲜明，可以争取群众”，“大批站名称本身就决定没有权力。只是一种召集机构，长此下去就成为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2) 安静中、江祖如、余九乡当时不同意另成立一个兵团。

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暂定继续用《大批站》。决定由王大来、牛定杰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周景芳问题的声明（宣言）晚上讨论通过。次日清晨公布。

会上，汤鸣皋表示要写大标语和大字报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会前介绍了校外形势，说什么“谭厚兰不行了，我们学校也和师大差不多”。会议中途，郑伯让参加会议，并把会议归纳成四点：

(1) 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松劲消极。

(2) 全国形势如何看？校内斗争摆在什么地位？

(3) 校外斗争是什么性质，是一般原则分歧还是两条路线斗争？

(4) 要加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

△晚上，在教七楼 307 开大会，宣读起草的声明（宣言）并征求意见。

声明（宣言）的要点是：对革委会进行评价，对外政策是搞派性斗争，实用主义，是受黑手操纵的，犯了路线错误。我院革委会是周景芳一手炮制的派性产物，包庇朱成昭，搞反动路线式的压制反朱派，有先天不足，革委会已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

后来，因王大宾同志打电话叫陈学敏到大会会堂开会，陈听到中央首长批评“蔡新平是极左派”，叫他们朱成昭的事不要再管了去搞大批判，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汤鸣皋制止了声明（宣言）的发表。

散会前，闻立峰讲了他上学部，有个常委跟他说：“我们支持地院大批站是三军的意思。”

△中午，在教七楼二层，由陈学敏出面召集大批站骨干分子会，研究“师大公开干上了，我们要不要公开干？”的问题。郑伯让在会上公开煽动说：“目前这样大好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办？”

△由安静中直接操纵的《机关八一八》战斗队，贴出“快快跟上中央精神，大胆结合使用干部”的大字报，攻击革委会的干部路线是“宗派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文章说：“随着内部矛盾的激化，使用干部问题上宗派主义严重发展，最突出的是唯我观点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由地质分会委员刘文华操纵的《劲松》战斗队也出大字报，高叫“革委会执行的是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朱成昭的张海涛式的干部路线，把持有不同观点的革命干部高元贵、安静中等推于革委会之外。”

△ 1967年9月8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由陈学敏传达江青同志9.7讲话。根据安静中的“旨意”删掉了“蔡新平是极左派”这一重要的内容。

听过传达，许多人泄了气，安静中主动为之打气，他说：“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心，……”王大来也发了言。

因为有人不太想干了，《湘江》在陈学敏宿舍贴了张大字报，批评“太右了，胆小。不想干”。

这阶段，还准备由梁定益、牛定杰、丰茂森等负责办《地院东方红》小报，于9.7发刊。由机院、矿院供给纸张，后来没办成。

△晚上，在郑伯让家（眷六楼）开会。

有郑伯让、安静中、江祖如、王大来、莫宣学、蔡新平、杨淑荣、李振海、余九乡、陈学敏、吴瑞棠、刘肇昌、曹敏九、郑雪禾等参加。

会上，全文传达了9.7江青同志的讲话。

改组了《大批站》的核心组。

核心成员有：陈学敏、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李振海。开始有郑伯让，江祖如说：“把郑伯让换成李振海，请老郑当高参”。后来加一名吴瑞棠，作为教师代表。陈学敏说：“郑老师也算一个吧！”会后，郑伯让说：“今天开得很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地质系《经风雨》发表“严正声明”。警告革委会的负责人，声明说：“革委会的要员们，你们在黑手的操纵下，为刘邓干了不少坏事，只要你们迷途知返，反戈一击，将功赎罪，革命群众是欢迎的。不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机关八一八》也叫嚷“革委会必须下决心斩断魔爪，揪出黑手”。

就在师大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们要革委会向“樊立跃学习”。

△ 1967年9月9日

△下午三点，在学十二楼216召开大批站核心组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

△ 1967年9月10日

△上午，在教七楼307室，介绍周永璋被抓后和出来的经过，指出聂树人在

这事上有重大的责任。

△中午，勘探系余九乡、陈钟惠、翟裕生、颜慰萱、翁成敏等，在“一月风暴”屋里开串联会，会上余九乡谈了形势和意见，并研究分工串联各教研室的人。

会前，找高元贵参加会，高说：“我是常委，谈不合适，叫余九乡、陈学敏谈吧。”

△9月10日左右，革委会决定听取大批站的意见，高元贵事先向陈学敏通风报信。后因会议改期召开，高又借去大批站摸底为名，找陈学敏，提出“最好派一个人和我经常联系，以便及时交换意见”的要求。大批站派杨淑荣为联络员。

△ 1967年9月11日

自9.6周永璋被中学红卫兵抓走又被抢回来之后，《大批站》《二团》不断发表声明，刷大标语，攻击聂树人同志。9.11《二团》贴出“9.6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政治陷害案”大字报，集中地体现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

《二团》说：“为了挽救朱成昭的垂死命运，为了掩护真正的5.16分子，尤其是他们的聂头头，为了……为了打击地院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9月6日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陷害事件。”

△9.11聂树人同志在大会上对9.6周永璋被抓一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大批站》把矛头更是对准聂树人，大书特书。《红岩》《红心向党》一天出两、三篇大字报，一方面要“请教聂树人”，大谈“聂树人的爱和憎”，说：“身为常委的聂树人，倚仗权势，目无党纪国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践踏六六通令”等，另一方面大谈特谈干部问题，说什么“我们干部的阶级阵线已经基本清楚”“结合和使用干部的阻力首先来自革委会，高元贵、安静中、王焕、王暄堂等同志实践证明他们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的，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大节是好的”，言下之意，高、安应该立即结合，立即上台，聂树人应该下台。

△ 1967年9月14日

△在教七楼212，由余九乡组织勘探系部分教师串联会，有安静中、陈学敏、黄民智、颜慰萱、丰淑庄、卫冰洁、翟裕生、赵鹏大、郭群海、胡旺亮、杨栋、董镇、冉宗培、吕中文、陶继文、翁成敏、程永长、夏卫华、章金统、陈钟惠、赵永芳、霍承禹等参加。

安静中在会上发言，他说：

(1) 我要是想当官，放弃斗争就当上了官，恰恰是革委会中的某些人当上了官。

(2) 大肆吹捧、赞扬二团、周永璋、蔡新平。

(3) 革委会在朱成昭的问题上只讲反思想，回避他的活动。

(4) 介绍了大批站的组织机构。

会后，余九乡说：“咱们组织起来干，怎么样？”

△在 9.7—9.14 之间，勘探系还开了一次大批站小组会，有翁成敏、黄民智、丰淑庄、余九乡、黄凯生、颜慰萱参加，研究当时的形势和教员提出的有关问题。

△高元贵通过濮长萱把安静中叫到 12 楼 104 高元贵宿舍，了解周永璋是否 5.16 的问题。

安静中说：“周在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最香，他参加过政法兵团刘富元反谢副总理的会，但周无多大责任。”

高建议对外联系要谨慎些，并谈了他对十五个战斗队的看法。

△9 月 15 日以后，高元贵在教八楼见到陈学敏，鼓动他拉队伍。高说：“革委会成员对大批站有不同看法，要团结群众，有力量才能解决两派联合问题。”

后来王暄堂也谈了类似的话，不仅鼓动拉队伍，还挑拨革委会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 1967 年 9 月下旬

△九月底，由郑雪禾主持召开地质系教员座谈形势，会上有人提出：国庆后大批站再拉起来干。

△在教八楼 407 室，讨论《大批站》的存亡问题，有 20 多人参加，有两种意见：

(1) 继续存在下去，成为召集大家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的一个机构。

(2) 这样等于俱乐部，解散算了，将来有必要再重打旗号。

国庆节前，陈学敏写了解散声明，后来被烧掉。提出由陈学敏、蔡新平考虑写个摆成绩的总结，并讨论通过。没写成。

△9 月 20 日左右的一天晚上，在教八楼召开大批站骨干会，高元贵找陈学敏，对他说：革委会对大批站有两种看法：一是以王大宾、张海涛为代表，认为还属人民内部矛盾；一是以聂树人、黄振群为代表，认为已走到敌我矛盾的边沿。你们要团结群众，没有群众就解决不了革委会的问题。高元贵一方面挑拨革委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鼓动大批站反对革委会，分裂革委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份内容提要

这个月的材料我们收集不多，就从十月下旬这两件事来看，高、安、郑之流，在《大批站》受形势所迫，解散之后，还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没间断过阴谋拉队伍搞分裂的活动。

安静中亲自出面召开座谈会了解各系师生中的情况，是桩反革命的调查活动。

高元贵的特派员颜维宣也参加了这个会，他们对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思想上是两派的现状感到高兴。他们攻击革命小将掌权是不行的，慢慢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在他们看来，到头来“权”还得给安静中。真是反动透顶。

高元贵这阶段也积极找安静中了解动态，并凭借他多年的反革命经验，指挥他的同伙“要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高、安的问题”。郑伯让“只要有 500 人就可以”这句话，彻底暴露了右倾分裂主义的真面目。

这个月“二流派”活动的特点是：在不利的形势下，头面人物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窥测方向，研究对付革委会的策略。

△ 1967 年 10 月下旬

△十月底，安静中亲自召开会议，地点学 12 楼陈学敏宿舍，有陈学敏、余九乡、李振海、殷维侯、杨淑荣、曾婉娥、颜维萱、郑雪禾等人参加。

安静中说：“大批站解散后。没有在一起碰过头，今天大家来谈谈情况。地质系的教员现在很忙。今天不一定来了。”

颜维萱说：“勘探系表面上是一派，实际上思想不一致。”

陈学敏说：“现在革委会内部在审干，有委员心里空虚。”

殷维侯说：“革委会就是不结合安静中，我们还要提，有什么理由不结合？”

郑雪禾劝道：“别提了，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些年青人也是不行的，慢慢的还得靠领导干部起作用。”

△十月中旬或下旬，高元贵为了解动态要安静中到学 12—104 谈话，郑伯让说：“我去吧”（从这不难看出郑是个什么角色）。当高元贵谈到，他对吉让寿说“你们能团结大多数群众，才能解决革委会问题”时，郑伯让说：“只要有 500 人就可以！”当高元贵谈到“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如梁定益）要少出头”时，郑伯让说：“我们（指他和岩石的人）不怕，我们是整风反右时的积极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内容提要

196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革委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发表之后，高、安、郑之流认为时机已到，又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四处活动，为篡夺党权而奔忙。

这阶段，高元贵抓勘探系，一贯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路线的高元贵确已开始主动到《暴动》《大喊大叫》学生住房里登门拜访了，鼓动他们把同观点的人“串联起来干”。高元贵这种“敢于革命”的精神，蒙住了部分群众，为之大喊大叫，顿时地院出现了上十条类似“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的大标语。

郑伯让抓地质系，企图用 2:2:1 方案和恢复原支部的方针把党权夺到手。当时地质系要求召开党员大会，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的呼声最高，甚至扬言要“冲破阻力，自行串联”，地质系成为院整党问题的斗争焦点。

安静中这段时间住在医院里和《二团》的几个小丑开会讨论校内的形势，研究对付革委会的办法。他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弄虚作假，刚出院就召集人研究要搞什么“大批判”，但由于一贯热衷于的就是如何颠覆革委会，搞垮革委会，因此，大批判不仅搞不起来，就连一点迹象也表现不出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二团）兴趣不大，搞不起来呀！”

△ 1967 年 11 月上旬

△11 月 10 日，郑伯让、纪群、刘肇昌、王葆瑜、邓兆伦在纪群家开黑会，确定了地质系临时总支筹备组。提出了教员:学生:干部 2:2:1 的方案，郑伯让是这次黑会的主谋，他说：“正式党员这一条一卡，我们这派的人就可以保证进入筹备组。”还提出“党员大会后，按原支部讨论酝酿”。

△11 月 11 日，地质系郑伯让、纪群等对地质分会实行突然袭击，召开全系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筹建临时支部，用事先酝酿好的五人名单上报分会。

△ 1967 年 11 月中旬

△在教学楼 12—104 高元贵宿舍，高元贵和安静中、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谈了一个晚上。

高元贵说：“革委会不突出政治，不能大力落实毛主席视察华中、华东的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不是院教革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的错误。校内大联合的问题，恐怕一时解决不了。蔡新平不要在外搞调查，回校搞政治活动。还谈了对十五个战斗队联合声明的看法。

安、江等认为：王大宾到东北去不是养病，而是去开会。

△地院临时党委成立，没有高元贵，于 11 月 17 日《长征》贴出大标语：“高元贵错误要批判，高元贵工作要支持”、“高元贵是敢想、敢说、敢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比王焕强”、“高元贵应进入临时党委”，表示支持高元贵。11 月 16 日《暴动》《解放》等战斗队也贴大标语呼应：“高元贵是受之无愧的当然的临时党委委员”“彻底解放高元贵”“高元贵是革命干部、必须靠前站”“谁要把高元贵当作派性的牺牲品，谁就决无好下场”等等。

△ 1967 年 11 月下旬

△建立临时党委时，有一天，江祖如跑到学 12—104 高元贵宿舍，对高说：“临时党委已上报，革委会不批准。”

△11 月 30（录入者注：疑为 20 之误）日下午，高元贵走进“暴动”“大喊大叫”房间（学 12—103）说：“当邻居这么久，还不知咱们是同一观点的，以

后咱们多谈谈，你们为什么这么多日子都沉默了？”当学生表示已失去心情时，高说：“像我们这么老的人还努力去干，你们年青就没了劲头……”“勘探系咱们观点的人不少，地质系也不少，你们应串联起来。”

△11月24日，高元贵叫田春林到他房间(学12—103)，鼓动田春林拉队伍，对田说：“你除了在红代会工作外，要多到下面去，谁有群众，谁就胜利。”意思就是让田拉队伍和聂树人对抗。

△从11月22—11月24日短短的两三天时间里，地质系部分党员贴出了《大声疾呼》、《同声疾呼》、《坚决支持》等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恢复党组织生活，筹建各级党的临时机构问题。提出了“地质系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阻力来自于分会常委和极左思潮”，扬言“分会常委如再置广大党员群众意见而不顾，我们将自行串联”“把高元贵排挤在临时党委之外，是小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必须坚决抵制”。

△ 1967年11月

△一天下午五点多，郑雪禾、陈莹到医院看望安静中，见到蔡新平、肖体修、杨淑荣、张钦文在打扑克（他们是中午去医院的）。

安静中对郑雪禾说：“这次革委会对陈学敏的处理很客气，没拿出来搞，过去我们搞了什么，革委会都知道，我们是怀疑他的（指陈学敏）。”

从医院出来后，陈莹告诉郑雪禾：“听他们（二团）讲，还在医院开会哪。”

△安静中出院不久，蔡新平叫郑雪禾到安静中家研究大批判的问题。

安静中说：“昨天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感到应该搞些大批判和学校斗批改，但我们过去这方面的资料没有准备，搞起来比他们难。他们（兵团）兴趣不大。”

郑表示同意，提出：“咱们这边同学也可以下教研室吧！”

后因二团学生不感兴趣，没搞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成立标志着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对高、吕、安、郑之流夺取党权斗争的胜利，是毛主席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高、吕、安、郑之流恨之入骨，疯狂地进行着临死前的挣扎，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在全院掀起了一个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同志，实为否认“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逆流，其声势之大，是自9月份以来所空前未有的。

这场斗争完全是在高、吕、安、郑的直接策划下展开的。

高元贵叫勘探系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整顿，明确指出：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而安静中感到过去斗争“右”了，颇有大有干一场的决心。郑伯让在地质

系 2:2:1 的阴谋破产之后，又玩弄出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核心组的新阴谋。

翻开《二团》在这阶段的大字报，不难看出：大字报里所写的基调，都是高、安之流给定的，如：我院存在着一股极左思潮呀、形左实右呀等等

和过去一样，每到斗争激烈阶段，《二团》总是要花笔墨为高老夫子大喊大叫，大书特书的，这阶段也不例外。

△ 1967 年 12 月 1 日

△11622《永向前》贴出“谁说批高没有派性”一文，实为高元贵代言，高元贵、安静中十一月中旬对殷维侯说：“复课闹革命不是教改部的错误，而是聂树人”，作者说：“为什么是聂树人把复课引入歧途，偏要把高元贵当替死鬼？为什么教育革命深入不下去，却把最大的阻力的桂冠送给高元贵呢？”高元贵：“我坚持 64 年以后，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而作者也说：“为什么批高的文章大多是空空洞洞？为什么许多批高勇士，无视高元贵在关键时刻敢于抵制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一贯受黑线打击的事实，而对高元贵全盘否定呢？”

△ 1967 年 12 月 3 日

△二团孙司权到高元贵家（城内）了解我院建立中共地院核心组的问题，高详细地给予介绍，并在中挑拨革委会成员间的关系，散布对聂树人的不满情绪。他说：“校内 12. 2 的广播是聂树人搞的。”“你们问题是脱离群众，所以没有力量。”“蔡新平要真理，不要群众，是错误的，说严重一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

△晚上，高元贵主动到学 12—103 和于众、余九乡【谈】核心小组成立的情况，攻击李贵和聂树人同志。他说：“通告怎么搞出来的，这还不是由李贵、聂树人一手操纵的，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随他们的意见决定的。”

△这天曹添也拜访了高元贵，谈有关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事。高元贵说：“以聂树人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要抵制，我给大批站的人打气，原他们都泄气了，现在又干起来了”，还说：“今天给你漏了底了，要是《暴动》《二团》和安静中揭我，我就完了。”

在整党问题上，高说：“整党这问题很重要，要组织力量抵制，我专门找叶德隆谈了一个下午，叫他回去和老郑商量。”

△ 1967 年 12 月 4 日

△高元贵问《暴动》成员，“你们现在准备干什么”，回答是“抓住核心小组的问题，把聂树人搞臭”，“串联起来一起出它一批大字报”。高元贵说：“串联起来就好了，都集中这个问题，一干就有声势了。”还说：“你们了解不了解聂树人与林杰有何关系，林杰给了他们什么指示，难道我们学院连一个 5. 16 分子也没有？我有怀疑。”言下之意，聂树人可能是 5. 16 分子。

当《暴动》成员向高元贵提出：“你是不是发表公开声明，领着我们干”时，

高说：“这个不行，我是革委会常委，哪能公开领导你们反革委会！”“目前他们的力量还很强。革委会控制了他们的基本群众，《红色尖兵》还很得势。”还说：“目前的问题是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战斗队为代表的极左思潮，这是需要批判的。”污蔑、攻击革命小将，并将矛头指向命小将。

△ 1967年12月5日

△《永向前》、《大喊大叫》、《暴动》等战斗队，在高元贵多次工作之后，连续不断地对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成立发表声明。声明说：“由聂树人一手策划建立的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是完全非法的，是聂树人篡党阴谋的大暴露”，“聂树人是地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聂树人是依靠阴谋手段上台的，并采用了一系列赫鲁晓夫式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高元贵说：在整党问题上的极“左”思潮要抵制，而《暴动》说：在整党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聂树人为代表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批判”，《永向前》也大叫“我们决心同野心家聂树人和极左思潮浴血奋战到底。”

△ 1967年12月7日

△早晨七点刚起床，高元贵就到学 12—103 对于众说：“昨晚常委会决定今天下午或晚上开队长会议，研究当前运动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昨晚通知你们已来不及了，因而一早来找你们。你们前几次会议都准备不好，这次要很好地准备一下。你是不是把其它人也叫来，到我屋里去商量商量。”

这天，早饭前和整个中午在高元贵屋召开有关人员（江祖如、蔡新平、余九乡等）的会议，研究对策，破坏全院战斗队长会。

高元贵说：“你们这几天出的大字报声明不错，声势不小……，看来以后你们要串联起来。”还露骨地说“现在是争取党权的问题”，并表示同意安静中曾说过的“过去战略上是左的，在战术上是右的”说法。

△ 67年12月上旬

△在郑伯让、刘肇昌的提议下，郑伯让、刘肇昌、纪群、毕先梅、王葆瑜、叶俊林、莫宣学、顾锡瑞、江祖如、林秀伦、邓兆仑等又在纪群家策划篡夺党权。他们认为，恢复组织生活的条件已成熟，可以建立临时支部，要批判当前的极左思潮。郑伯让说：“不要按专业或年级划分支部，我们这边党员是多数，有不少支部是由我们这边的人组成”，江祖如说：“别的权可以不要，党权一定要，打破头也一定要”。

△ 12月11日《红旗展》战斗队和12月13日《在险峰》等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都明确地提到要夺党权的问题。作者否定中共地院核心组的性质，认为“它是极左思潮和形左实右做法的集中表现，是带着浓重的‘私’字和强烈的派性，为个人或小组夺党权的突出表现”，还说：“聂树人挑起这场斗争的实质并

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不要掌握党权的问题，而是为他个人争党权，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其目的是想通过搞臭聂树人，否定中共地院核心小组的性质，为他们进一步夺党权制造舆论。

△ 1967年12月19日

△高元贵到学12—103对《暴动》成员说：“现在革委会是靠物探一年级、红色尖兵、山鹰、海燕等十几个极左派跳裸体舞，根本没有发动起群众来。”“你们应该到物探系老师那儿去，让他们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加以整顿。”再次攻击革命小将，并策划恢复旧支部夺取党权的阴谋。

△ 1967年12月中旬

△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成立之后，高元贵一方面鼓动《暴动》《大喊大叫》等把矛头对准聂树人，另一方面直接插手各系，积极活动，争夺党权。

在勘探系，找余九乡，叫他学习一年级用起来造反的办法，成立整党领导小组，和颜维萱、余九乡都详细地研究过如何争夺勘探系教师和学生中党的领导权的问题。

△革委会内部开展“斗私批修”，高元贵找叶德隆商量对策，商量结果是在台上亮明观点，并检查退休的思想。

△地质系在大饭厅针对整党问题开辩论会，散会后郑伯让、纪群、刘文华、曹添等人在东饭厅前树下交谈，高元贵上前说：“我建议地质分会‘斗私批修’半个月”，郑伯让说：“革委会首先拿出样子来，革委会要有诚意。”

△12月20日晚上，在莫宣学家（东三楼216）召开地质系旧总支部分人员会，郑伯让看到2:2:1方案已破产，在会上又定了调子，摆出中共地质系核心小组由分会中正式党员组成，想以此达到他夺取党权的目的。

△ 1967年12月下旬

△地质分会委员刘肇昌在南翼楼105召开战斗队长会，汇报各教研室大批判的情况，有郑伯让、刘肇昌、莫宣学、梁定益、万天丰、郭铁英、沈今川等参加。

郑伯让说：“听说聂树人去东北看王大宾，也可能去开会。据传闻‘地派’过去还开过不少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

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发表，对“二流”派判处了死刑。高元贵凭着他反革命的嗅觉，开始布置其同伙退却隐藏起来。叫他们要注意在表面上改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就是“要举双手拥护革委会”“要支持革委会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管他打的是‘迂回战’还是‘边沿战’，都应支持”。于是《二团》也

奉旨贴出“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的大字报，内容不外乎还是影射、讽刺，同时也表露出对这学习班的怀疑和不信任。

高元贵利用《二团》的“整风”机会，再次提醒他们“不要脱离群众”，否则“人家就把你打成反革命”。这就是高元贵“谁有群众，谁就胜利”的实质。

△ 1968. 1.

△元旦社论发表后，高元贵让王暄堂转告安静中“你们要转变对革委会的态度，大批站后期的做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谁反对革委会，就是反革命，革委会不能一切都错了，对的你们要举双手拥护，错的，应许你们提意见。”

安静中出院后，找高元贵，他说：“谁反革委会就是反革命，不至于这样厉害吧！”还说：“我亲自去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指空军）征求对十五个战斗队声明的意见，他们认为：提的过低（指小资产阶级掌权）。没有无产阶级气魄。”并攻击王大宾说：“大批站是王大宾搞起来的，王大宾×月×日住医院时，曾叫一个亲朱分子整康老材料。王大宾不敢整我，整我，就全盘说出来。”

△革委会开办第一期常委学习班，高元贵对余九乡说：“你们要支持这次学习班，这是李一民同志在常委会提出来的，通过时，好不容易。你们出大字报，说是阴谋，我极不同意，这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解决内部两大派思潮的联合，事情要慢慢地解决。这一学习方案，我认为是打迂回战，或者是边沿战。”余九乡不同意这看法。安静中出院后，对高说：“常委的学习班是别有用心的，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表态不如不表态更好。”

△安静中出院后，余九乡对高元贵说，《二团》在安静中家进行整风。高元贵给他打献计，他说：“你们整风的结果，可以公布出来，借以争取群众。大批站虽然长期不活动，但还没有公开声明取消。我的意见可以由几个人出面公开声明解散，这样有利于解决大联合问题。到底由哪几个人，由你们（指安静中、《二团》）去商量。不能只由《二团》与《一月风暴》出面，因为成立时，除物探系外，各系都成立了。像《赤二支》这样的战斗队，无论如何要争取团结，不能只由《二团》和你少数人裸体跳舞。你们如脱离了群众，人家就把你们打成了反革命！”高元贵再次指使《二团》要注意争取群众，扩大队伍。

△在高元贵“要支持革委会开办的第一期学习班”的旨意下，《二团》于元月十天左右也出大字报“祝贺院革委会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召开”。但认为：“这次学习班是回避了以聂树人、东方红报，东方红广播台为代表的和以发表《联合声明》的十五个战斗队等为代表的在地院尖锐对立的两大派。是否能解决地院文化大革命问题，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不能不表示怀疑。”这和高元贵所说的“这次学习班是打迂回战，打边沿战”何等一致。还说“有些人表面上也装出要克服派性，要大联合的姿态，而实质上死抱着派性不放”，“希望革委会负责

同志和我们一道警惕在办学习班的同时，被派性控制了。如果人为地加深两派的分歧那就大错特错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至三月

今年二月初，社会上右倾翻案浪潮迅速升温，杨余傅之流以为时机已到，便四处活动，煽阴风，点鬼火，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极力煽动右倾翻案妖风，拼凑队伍，蠢蠢欲动，妄图实现其篡权的罪恶目的。

我院的“二流”派也紧步社会上“二流”派的后尘，唯恐有些落后，又拉起了破旗，贼心不死，妄图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短短的二个月里，他们跳得最高。由于他们反动的立场，克制不住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的仇恨，所以在倒谢运动中，他们是积极参与者，并写出了语言恶毒矛头指向谢副总理的“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等大字报。另就是极力破坏市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和我院毛着积极分子大会的胜利召开。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次可以大捞油水，达到分裂颠覆革委会的罪恶目的，孰不知是鸡蛋碰石头，只不过是更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市革命委员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师大造反兵团”要求参加学习班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后不久，我院《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于二月中旬也写出“关于要求参加北京市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中央首长的一封信”，恶毒地攻击革委会，又无耻地吹捧自己，信中说：“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出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去年一月风暴以后，一步步地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成为王、关、林、周景芳反党集团的忠实打手……”还说：“由于革委会某些人对蔡派采取高压政策，致使地院思想上严重分裂并导致运动的冷冷清清。一年多来的历史证明，不解决朱派蔡派的团结问题，不揪出黑手，不打倒派性，地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吹捧自己是“……在十分困难环境下，坚持了内部合法斗争，这就给北京市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不拉队伍、又坚持原则的典型”。

△当革委会决定《二团》派二人参加市学习班之后，《二团》《一月风暴》又发表“关于参加市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声明”，声称“……院革委会某些负责人，伙同反革命黑手，长期压制打击‘蔡派’，在参加学习班的问题上又表现出来了。他们再次压制‘蔡派’战士，而市学习班只有二名，这是一个倒退。他又为破坏市学习班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坚决反对……”

△二月底，周永璋等以《小小老百姓》《锷未残》为名，写了一张“也致中共地院核心组”的大字报，恶毒攻击王大宾同志，质问“……王大宾同志与朱成

昭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追随朱成昭收集整理康老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交待了没有？王大宾在关、王、林、周、潘、吴操纵下干了哪些勾当？交待没有？认识怎样？……”

△ 1968. 3. 2.

△晚上，在东三楼 214 室安静中家，由安静中谈市学习班的情况。有二团全体，张台甫、余九乡、江祖如、邓兆伦、刘文华、郑雪禾等十七、八人。

安说：“王焕是核心组长，高元贵是核心组成员，高的态度倾向我们。”“李钟奇说了，师大造反兵团的事，他们不表态，师大的问题是由中央掌握的。”还造谣说：“有人讲新北大说谢富治停职反省了，因为考虑影响，还让他出来接见。”

当安静中谈到“王大宾对蔡新平讲，叫他回去一定给周永璋讲，不能反谢副总理”时。

蔡新平说：“谢富治有什么不能反，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法学院的工作组也是他派的。”

刘文华说：“谢富治反正有问题。”

郑雪禾说：“对戚本禹、周景芳这些说法，至少也是个认识问题。”

刘文华说：“我看不至于吧。”

（在这之前，安静中已到黄占秋住处向机关有关成员介绍了学习班的情况）。

△ 1968. 3. 4.—3. 5.

△在市学习班，聂元梓召开第一次反谢副总理的串联会之前，《二团》方面在校内大造舆论，大量地转抄有关戚本禹的大字报，批判戚本禹的“三.五”讲话，目的是要把院革委会说成是关、王、戚的第二套班子。主要有：

1. “看戚本禹怎样参与关王庙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转抄于总队野战兵团）。

2. “戚本禹破坏我所和学部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傲霜雪转抄于学部近代史所）。

3. “十个为什么”（一月风暴）。

其中第十问，明确地把院革委会和王、关、戚、林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不来我院，而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主子、奴才们却不间断地出入我院，对我院表示极大的‘关怀’‘爱护’”。在这里恶毒地影射了谢副总理，真是罪该万死！

4. “戚本禹的‘三.五’讲话”（二团）。

其主要意思无非是革委会有戚本禹的忠实追随者，是受王、关，戚操纵的。

5. 地质系“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大标语“斩断戚本禹伸进地院的黑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关王庙在地院的流毒。”

（录入者注：原件此处有缺页或掉字）

争不批判，却把斗争锋芒指向不同意见的高元贵同志，不在全院发动群众斩断黑手，围剿派性，打倒反动的无政府主义等等。”用这一系列问题说明我院革委会是“站在关王庙反动路线一边”，说明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包括对待革委会这个问题，也就是反对和捍卫革委会的根本的政治内容、态度问题上，立场完全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

△《一月风暴》写出大字报，要“……我院某些负责人必须交出你们所整理的三军党委黑材料，彻底检查在三军问题上严重立场错误，特别是林副主席、周总理公开支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后，你们与‘冲派’的秘密往来”。

△ 1968. 3. 11.

△传达李钟奇副司令员的指示，市学习班接近尾声，有几个学校出大字报，表示反对。这时安静中说：“原来新北大是抵制学习班的，开始不愿来，现在聂元梓说‘既来了，就由不得你’（指谢副总理）。”

△ 3月10日左右

蔡新平给肖力同志写信，谈二月逆流的问题。他说：

“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我认为主流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确有一股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造反派的逆流存在，想搞反夺权，谭震林就是代表。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引导下斗争的。但阶级敌人插手，他们利用这个反右的机会，又从左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挑动小将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志，主要想搞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老师和几个副总理，他们的用意很明显，也很恶毒，就是想孤立周总理，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军队搞乱，他们的矛头最终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

“余秋里同志当时是有错误的，但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些单位的小将搞过了头，走向了反面。应当正视这个错误，当时戚本禹把几个保余、保陈毅同志、反对搞副总理的组织（新北大公社，石油大庆、一外扛旗）打成保守组织是完全别有用心，这几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站队就是站对了。当时以师大井冈山为首的一些组织，谭厚兰等同志反谭震林是对的，但搞过了头，他们后来受这个反党集团的操纵，反几个副总理、搞陈毅同志就站错了队，她在这个问题上应作自我批评。”

△ 1968. 3. 15.

△市学习班召开倒谢形势串联会，余九乡在大会上发言。他说：“我院革委会是戚本禹派周景芳来，搞的一派的革委会”，“是追随关、王、戚、林的忠实打

手”，攻击市学习班是“以派性代替一切，是戚本禹在我院搞的那一套的翻版”，还说“我院极左思潮严重”，“聂树人搞了一个自己批准自己入党的手续和不要预备期的极左的建党路线”。

△高元贵见余九乡在市学习班第二次倒谢串联会上发言，就对安静中说：“不能介入，谁介入就要犯错误”，想救安静中、《二团》一命。安静中说：“聂元梓的后台是三军，聂元梓曾说先不点名（指谢富治），等一揭再揭再说，到底怎样，将来看吧。”

△ 1968. 3. 16.

△《二团》《火星报》编辑部贴出“革委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再论究竟是谁反对革委会”的大字报，再次把矛头对准院革委会和王大宾、聂树人等同志。如：“……革委会中的某些负责人在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操纵下，充当了干扰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可悲角色……他们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丝毫不能代表革委会的革命大方向。……奇怪的是我院革委会中某些关王戚林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路线的积极追随者，至今仍不悔改……在我们什么以‘斗私批修’为纲，什么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统统被置之度外（录入者注：此处语句不通，原文如此）。我院运动仍按聂主任的‘战略部署’进行。”

△ 1968. 3. 17

△化学教研室《红心向党》在转抄文汇报 3. 14 社论和清华井冈山关于陈里宁的材料时，陈莹对郑雪禾说：“赵国柱说，这次他们准备拉出来干了，叫我们做好思想准备”，还说：“兵团的人讲，王大宾是朱成昭的第二套班子，是三军里有人说的。”

△晚上在安静中家策划明天（即 3 月 18 日）冲会场即策划破坏我院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子大会。

△ 1968. 3. 18.

△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开幕。

大会召开前，《一月风暴》贴出“为什么？为什么？”的大字报，攻击谢副总理，煽动“倒谢”妖风。《春风化雨》贴出“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我前进——为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阴谋而战”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我院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文中写道：“……我院首届学习毛着积代会就要召开，同志们千万别忘记了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朱贼分子们，他们会跳起来为‘二流’翻案，别忘了有脱离两条路线斗争把大会引向歧途的危险；别忘了有人任其派性发作，给革命的东方红战士扣上一顶大帽子；别忘了那些自身派性十足的人在对不同意见实行‘派性派诈’（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二团》贴出大标语，企图破坏我院首届积代会的召开。

1. 评选会大搞派性，不突出政治，掩盖两条路线斗争，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

2. 揪出朱成昭集团的变色龙，扫出关王庙的小爬虫。

3. 是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盖子的时候了。

4. 必须批判我院所谓首届毛着积代会的资产阶级方向！

△下午二点半，二团在北翼楼 303 讨论形势，由周永璋主持会议，有《二团》（除殷维侯之外），余九乡、张台甫、李振海、郑雪禾等廿多人讨论形势和拉队伍的问题。

蔡新平说：“王大宾和聂树人是矛盾的，聂树人要夺王大宾的权”，还说：“聂树入已经被我们搞臭了，现在要搞王大宾”，“把矛头对准聂树入，对王大宾不点名，提揪变色龙”。周永璋说：“提揪朱成昭的变色龙。”

对要不要组织起来、打旗号的问题，意见不一致。

有的说：就用《大批站》、《红二团》，反正过去已经打出去了。但又怕打出《红二团》的旗号，中间群众有戒心。有人提用“东方红红二团”，有的认为：“东方红不要了，地质东方红在外面已经臭了，人家还要揍你哪。”

最后决定：先让二团把打旗号的宣言准备起来，起什么名称，看形势再打出去。

蔡新平说：“等革委会成立一周年那天，把它打出去。”周永璋支持了这个意见。

余九乡提出“对我院毛着学习积极分子大会要表态，要批判它的资产阶级方向。”

在讨论如何解决我院问题时，周永璋说：“我看要解决地质学院问题，非来几场大武斗不可。”有的说：“来几场武斗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靠外力来冲，看行不行。”

赵国柱在台上念了王、关、戚、林、周黑手插入我院的调查材料，并说：“王大宾说，自去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我院就没有与外面联系了。据了解到今年二月还有联系，王大宾还参加过青岛会议，为关、王翻案。”

△晚上，叶德隆对郑雪禾说：“看来有些材料（指攻击谢副总理）还比较过硬”，“你们要是出去，还可以写点报导，介绍各校的情况，让大家了解外面的情况。脱离当前阶级斗争，在这里开积极分子大会是不行的，我就不愿意当代表，这样自由些”。还说：“他们这些同学（指《二团》）不容易呀，条件很艰难，坚持着干。”

△晚上，《红心向党》贴出炮打谢副总理的《十二个为什么》的大毒草过后，陈莹转告郑雪禾说：“王暄堂讲，谢富治的问题真够严重的呀”，“吉让寿讲，你

们这张大字报贴得太快了，应该看准了再贴出去。不过贴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讲，这下子可能把你打成个特务，因为从你的出身和爱人华侨”，“安静中说：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说对毛主席的热爱。”

△ 1968年3月20日

△在北翼楼303，周永璋主持二团召开形势讨论会。

会前，安静中对郑雪禾说：“他们（指二团）不要我们参加，你去吧”，还说：“聂元梓说过，运动发展到现在，再搞不能针对人，这话看来是对的。”

会上，周永璋说：“现在这时再犯几个错误就不行了，还是谨慎些好”，“关于老谢问题，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坏人挑动的，一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挥手，一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据了解这次他们是开了会的，三军×××上学部，去了一趟后才搞起来的，现在我们就先看看，不要动了。”

肖体修：“我们过去有个缺点，跟老师接触得多，跟同学接触得少，老师顾虑多，什么也不敢动，我们不能老怕犯错误而不敢动，犯了错误可以吸取教训，可以改嘛。”

△ 1968年3月22日

△上午，在王喧堂家（东三楼315）召开形势讨论会。

有郑伯让、江祖如、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参加。

会刚开始，因地质公社要揪斗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郑雪禾，郑先离开了会场。

蔡新平说：肖力问你们的造反精神哪去了。你们对二月逆流怎么看法？回去写信告诉我。蔡说当时他没把这事看得很重，信稿写好了，在日记本中未发出。说到这里，郑伯让说：咳！这可误了大事了。

当谈到谢富治时，江祖如跳起来说：“他妈的，单凭这一条（指陈里宁事件）就够了（指打倒谢富治）。”

△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审查。

△地院“二团”几个人竟把地院一派反击翻案妖风的大好形势，描写成是“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安静中给中央文革首长未写完的信中），为疯狂地炮打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小丑鸣冤叫屈，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1968年3月24日

△3月22日，反革命小丑郑雪禾被隔离之后，我院“二流”派慌了手脚，并为她鸣冤叫屈，连续发布许多严正声明。《一月风暴，秋收暴动，傲霜雪》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3.22事件的主谋、策划者一直把矛头指向和刘、邓、陶、何、周、聂、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做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混进革命队伍的

蠢贼、败类。（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2）他们打着反击“二月逆流”的旗号，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大搞翻案、阴谋之实。（录入者注：原文如此）

1162.3《漫天大雪》和1162.2《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严正声明，基本内容、精神同上。

△ 1968.3.25.

△《红二团》发表“关于3.22反革命阶级报复的严正声明”要点如下：

1. 强烈要求驻院解放军和革委会严肃处理。
2. 所谓《二团》炮打谢副总理纯属无耻污蔑和造谣。
3. 材料我们的确整得有，那就是至今仍潜伏在革委会的追随王、关、戚之流，不悔改的反动分子、反革命罪行材料。这类材料，过去整，现在整，将来还要整。

△《红二团》贴出口号声明

共五条：（录入者注：原文没有1至3条）

4. 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击退右倾翻案风。谁妄图从右的和极左方面为“二月逆流”翻案决没好下场。

5. 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捍卫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的革命性和纯洁性战斗到底。

△ 1968.3.26.

△《二团、一月风暴、11622无产阶级革命派》贴出标语口号：

“坚决要求革委会立即释放郑雪禾，为郑雪禾彻底平反，并公开向郑雪禾同志赔礼道歉！”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6年7月30日《昨天》第73期）

（五）高元贵院长的生平简介和追悼会与追思会的活动照片

1，高元贵院长的生平简介：



高元贵，山东邹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大学肄业。曾任冀鲁豫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冀南区委民运部部长、财经委员会主任，冀南行署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建筑工程部兰州总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08年3月，高元贵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20世纪20年代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主编共产党地下活动刊物，和邓光镇（1910年-1939年3月）组织“进步书籍贩卖部”，秘密售卖上海寄来的进步书籍。1927年11月，和王幼平、邓光镇等组织学生进行罢课斗争，遭到军阀张宗昌镇压，被开除学籍。期间高元贵在山东新城兵工厂以办夜校，办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做过工运工作。

1928年8月，高元贵被团山东省委派到矿区开展工作，成立了共青团淄川（洪山）矿区支部，高元贵任书记。

1936年高元贵从中国大学肄业，是“一二·九”中国大学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冠县和鲁西北抗战史上，“七大闺女，七大女婿”的佳话广为流传。其中就有“齐涛—高元贵”夫妇。民主革命时期，高元贵历任山东省冠县县委民运部长，鲁西北地委民运部长，鲁西区党委民运部副部

长，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联合总会主任，冀南区党委民运部长兼财委主任、行署副主任。

高元贵任冀鲁豫行署副主任时期，夫人齐涛是县妇救会主任（建国后任北京医院党委书记）。当时，万里是冀鲁豫二地委副书记。高元贵后任武汉物资接管处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元贵历任中原临时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中南财委秘书长兼统计局副局长，中南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建筑工业部兰州总公司经理兼党委副书记，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国家地质总局顾问，地质部顾问。1983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离休。1993年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从事教育

高元贵同志 1958 年调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到 1976 年离校时已年近七旬，任期长达 18 年。18 个春秋年华，高元贵献身教育、虚心学习、积极探索、勇于改革、无私奉献，带领全院师生员工步入了北京地质学院的辉煌时期。之后，高元贵又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经历了十年浩劫。

在学校外迁的最困难时期。高元贵虽身处逆境，却能与大家风雨同舟、肩担道义、不畏风险、据理力争，终于使上级批准在武汉市建校，为学校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2 年 11 月，在北京地质学院庆祝建校 40 周年的大会上，当 84 岁的高元贵出现在大会主席台上时，全场数千名师生员工和校友起立欢呼鼓掌长达五六分钟之久。表达了大家对他为学校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和衷心感激；也表达了他在地大人心中的崇高威望和人们对他高尚品德的无比敬重。在场的来宾和记者无不为之感动。地质矿产部领导指出，高元贵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是地质院校校长中的楷模。

就在北京地质学院校庆后不久，1993 年 2 月 21 日，85 岁高龄的高元贵院长与世长辞。3 月 3 日，地质矿产部的各级领导和学校数千名师生到八宝山为他送行，各地的校友纷纷发来唁电、送来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高院长走了，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共铸辉煌的历史、一个敬业勤奋的身影、一曲诲人不倦的佳话，更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身教言传，用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塑造出一位人民公仆的崇高形象，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地质工作者。

办学理念

高元贵特别强调学习苏联要注意结合中国实际，不可盲目照搬，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基础上，要结合中国地质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进行教学改革。20世纪60年代前期，高元贵领导全校教师结合中国实际对学校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等都进行了改革，组织教师编写出了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专业课程教材。

学校教学

高元贵在由革命者向教育家的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积极探索、大胆改革。1958年他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后，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要彻底地实行教学改革”的意见，经过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作出了《关于教学改革的某些主要问题的原则决定》。随后，学校对培养目标、学制、专业设置等都进行了改革。高元贵还着力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他亲自组织领导了建立《综合地质基础》课程的工作，并为这门课讲了第一节课——序论。他强调要加强学生的“三基”训练，非常重视抓好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这两个校外实践性教学环节，使之成为学校各教学环节中的重头戏。他大力提倡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少而精”，在教学方法上搞“启发式”，反对“填鸭式”，提倡“因材施教”，全面推进了学校教学领域的改革。

培养人才

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人才，高元贵十分重视遵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高元贵把德育放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首位，十分重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特别是哲学的教育。他也非常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在智育方面，他强调要按照教学和学习自身的规律办事。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的大环境中，他号召学生要认真读书，并为之创造安静的环境，保证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坐下来刻苦钻研，真是难能可贵。

体育

高元贵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学校里学生和教职工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高校运动会上北京地质学院名列前茅，登山攀岩更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特色项

目，还向国家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优秀运动员。高元贵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是高元贵的优良工作作风。身为一校之长，没有半点架子，与全院师生员工平等相处、坦诚相见、同甘共苦、共同奋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师生员工的良师益友。高元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重视做好教师队伍尤其是老教师的工作。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进步，在业务上创造条件让他们出成果，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十年浩劫和迁校的风风雨雨中，他更与教职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犯过错误的师生，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教育和帮助他们，并且认真给他们落实政策。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品德，更增加了对他的尊敬和热爱。

人格魅力

“刻苦钻研、实事求是、艰苦朴素、严肃活泼”是高元贵领导北京地质学院时期为学校确定的校风，北京地质学院也正是以这种优良的校风闻名于北京市的高校之林。他自己身体力行，带领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员工实践着这种优良的作风。

在工作中，在关系北京地质学院发展和师生员工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高元贵敢于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在学习上，他带领师生员工刻苦钻研，努力掌握地质知识；在生活上，高元贵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他的品德和人格魅力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地质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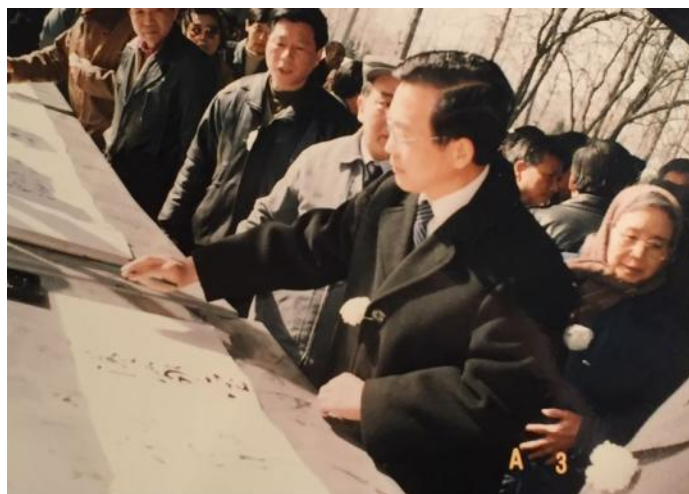
（编者注：该文由高元贵院长之子高晓力 2018 年 3 月 29 日提供的材料编辑而成）

2, 追悼会与追思会活动照片



1993年3月21日高元贵院长去世，温家宝、朱训等参加追悼会





2018年3月14日在八宝山参加纪念高元贵院长诞辰110周年
参加人员：左起 张绍宗、任建新、莫宣学、濮长萱、高晓力、童隆裴、
张运钧、牛彩茹、叶大年、刘玉发、王北宁、蔡新平、朱德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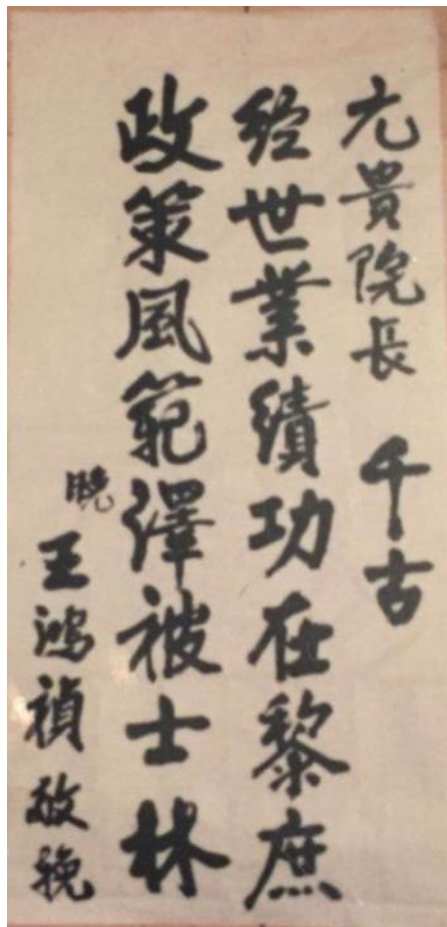


2018年3月24日在中国地质大学纪念高元贵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有，左起：地大党委王书记、高晓力（高元贵最小的儿子）、叶大年（中科院院士）、赵鹏大（前任校长）、翟裕生（前任校长）、莫学宣（院士、前任研究生院院长）、蔡新平、邓军（地大校长）



（六）安静中生平简介、追悼会悼词：

1，安静中生平简介：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原党委副书记、校级调研员，中国地质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研究员安静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7月15日0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安静中同志193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52年9月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学习，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6月毕业留校工作。历任助教、团总支书记、校团委副书记、书记、勘探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院党委委员；1983年起，相继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工会主席、机关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副书记、校级调研员，为党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

安静中同志用自己的实践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立下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后，自觉服从党的需要，既做教学工作，又做青年团的工作，不久，又专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他又红又专，品学兼优，在担任团委书记期间，他根据党的教育方针，结合地质专业的特点，在院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人生观教育、专业教育、劳动教育和艰苦朴素教育，抓先进班典型，在首都和全国高校产生很大影响。这

方面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得到国家教育部、中共北京市委和上级团组织的肯定，广为宣传并予以推广。

“十年动乱”中，安静中同志深受迫害，七十年代恢复工作后，担任勘探系党总支的领导工作。这期间，在迁校这个直接关系到北京地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他在积极向上级反映不同意见的同时坚决执行上级决定，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并身先士卒，举家南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全系教师、干部搬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领导水平。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排干扰和阻力，切实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增强了党的威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在恢复北京办学的艰苦过程中，他满怀热爱母校的赤子之情，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主持地科院研究生部工作期间，他积极贯彻上级指示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打开了联合办学的新局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正式成立后，安静中同志以极大热情和责任感做好领导上安排给他的每一项工作。在任校工会主席期间，既注意做好关心职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充分发挥工会党和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又积极配合校党委成功地召开了首届“双代会”，为学校的民主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任校党委副书记期间，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坚持抓好宣传教育工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理顺关系。重建政治思想工作秩序，组织干部队伍，以极大的精力，关心、培养、爱护年轻干部。并特别注意花大力气进行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引导和教育广大党员和青年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中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1992年，安静中同志主动提出退居二线，但仍以一个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关心学校的发展，自觉地做工作。认真履行校级调研员和中国地质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职责，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以发展地质教育事业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建设。通过组织、宣传、谈话，通过撰写报告和主编文集，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1994年，由他主编的《江山作证》一书，是一部弘扬我校优良校风的宝贵文献，也是他留给学校的一份精神财富。长期以来，他时常抱病工作，但

仍积极参加部教育司组织的专题研讨工作，直到他发病住院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为筹备地质教育工作会议而辛劳着。

安静中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勤奋工作的一生。他以老院长高元贵同志为榜样，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无私无愧无悔地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他政治目光敏锐，有较高的理论政策和思想水平。他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困难重重或身处逆境，仍然坚持党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他倾听群众意见，干部教师把他做为知心朋友，学生们称他是良师益友。他待人真挚热情为人正派，坦诚，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委屈得失，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宽广胸怀。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和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安静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不愧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好榜样。他的去世是地质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工作成绩、高尚品德和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2，追悼会悼词：

安静中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勤奋工作的一生。他以老院长高元贵同志为榜样，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无私无愧无悔地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政治目光敏锐，有较高的理论政策和思想水平。他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困难重重或身处逆境，仍然坚持党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意见，干部教师把他做为知心朋友，学生们称他是良师益友。他待人真挚热情为人正派，坦诚，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委屈得失，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宽广胸怀。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和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安静中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不愧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好榜样。他的去世是地质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他的工作成绩、高尚品德和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二、周永璋两次被抓专题



编者按：

周永璋（1943～2015），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 11632 班。文革初期参加反工作组的造反运动，曾被工作队打成学生中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他参与了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的建立，当时他就已经是学生中的预备共产党员，而且是党支部委员，这在造反派红卫兵中是极少的。

当年北京高校有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司令部：1966年 8 月 27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 月 5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9 月 6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三司基本是由各高校中受压的少数派组成，加入的条件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工作队。三司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起，具体串联并主持筹建者就是周永璋。三司的首届领导班子也称总勤务部，周永璋是总勤务员。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永璋与叶剑英同乘一辆吉普车，叶剑英开玩笑称他是三司司令。以后因与地院学生领袖朱成昭发生意见分歧，周永璋成为朱成昭的反对派“蔡派”骨干成员，一直处于受批判打击的极少数地位，基本被边缘化——这也使他后来免掉了被定为“三种人”的厄运。周永璋先生已于 2015 年因病在天津去世。周永璋在文化革命中二次被抓，受到了无辜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审查，这在地院的学生中也是少有的。下面就这二次被抓，进行介绍，尽可能还原当年的场景。（上图为周永璋先生的遗像）

（一）周永璋在 1967 年 9 月第一次被抓：

1，第一次被抓的详细过程：

在聂树人回忆录《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第 88 页—93 页“捉放周永璋”，有对此事的详细叙述。

“大约在 8 月中旬，从“师大井冈山”传过来消息，说周永璋也是“5·16”

成员——在“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的笔记本子上有周永璋的名字。

对于周永璋的“反总理”，我的心里早就有数。早在1966年9月，“三司”成立不久，周永璋就因当面指责周总理（说周总理“和稀泥”）而受到“三司”其他工作人员的斥责，周总理也不得不小心行事。记得，在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大会上，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会后一两天，一位中央工作人员突然送来了一封信，是周恩来写给“三司”的，具体内容是解释或更正他在“三司”大会上的一句讲话。这句话好像与“你们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有关。《首都红卫兵》在报导周总理的讲话时，我已根据总理的来信，对这句话作了修改。

周永璋之被迫离开“三司”司令部工作岗位，与他对周总理的不恭态度（当然，他还有爱出风头的毛病）而引致三司其他成员不满很有关系。周永璋虽然不在“三司”机关工作了，但是，他毕竟曾经是个人物，在社会上有较大的活动面，认识的人多。以反对周恩来为主旨的张 Jian 旗一伙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在周恩来问题上栽过跟头的人。从周永璋爱出风头这一点上说，他参与张 Jian 旗们的一些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乱轰乱打的“炮打司令部”，我从来都是反对的。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与英雄有关，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什么英雄。当时，我把那些乱轰乱打的英雄们都视为“犯上作乱者”！在我看来，为着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无端“乱轰乱打”，那是流氓无赖的作派，是无耻的行径，与革命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一个青年学生，对上面的事情了解多少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当“老一辈”投身革命时，我们还没有出生。另一方面，在文革以前我所看到的是，不要说反对上层的某一个人，就是对人家提点意见，说点不满的话，也会被视为叛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很想成为英雄的人，因为乱轰乱打，而被严厉批评或被送进监狱。

面对文革初期纷纭的政治环境，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当英雄！

周永璋上了“5·16”的名单，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当时，“师大井冈山”就是按照那个名单抓人并扭送公安部的。从“师大井冈山”传话的口气上看，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如果真是这样，让外校人将周永璋抓走，我们“地质东方红”就太没有面子了。我与李贵相商后，立即派人到师大去了解情况。可是，派去的人回来说，人家不接待他们。追问原因，他们估计的情况是，

人家不了解他们，怕走漏了风声。如果王大宾或我出面，人家就可能提供详细情况。

当时，王大宾在小汤山疗养，于是，我带着两三个人到了师大，拜访了“师大井冈山”的第二把手董联猛。此时，在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中，“师大井冈山”已经彻底倒向地派，我的到来受到了师大同行热情接待。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抓“5·16”的进展情况，并将李芳的笔记本拿出来让我们看。在一页上写有六七个人的名字，内中果然有“周永璋”三个字。师大专案人员讲，其他人（分属好几个学校）有的已经抓了，有的还在追查中。周永璋是地质学院的，他们还没有抓，“最好由你们自己抓”。他们所谓的“抓”，根据我的理解，就是先把人控制（隔离）起来，进行初步审讯和调查，只要参加过“5·16”的组织活动（例如参加过他们的会议等），就立即送公安部处理。

显然，师大同行是希望我们采取行动，不想让“地质东方红”难堪。

我回到学校后，立即将情况与李贵进行了沟通。我们觉得，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要采取行动。如果让外校人抓走，一方面是我们脸上没有面子，另一方面，人家最后很可能要将他送进公安部。那种地方，只要进去了，弄出来就难了！周永璋虽属“蔡派”头头之一，老跟我们做对，但是，他毕竟和我们共过战壕。在事关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落井下石。

当时商定，由我组织人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并保持与师大同行的联系。因为事关校内两派，这件事要秘密进行，而且绝对不要将这件事与两派之争联系起来，更不能使两派的纠纷加深。

在此后的两三天中，我总拿不定主意。心想，最好是先找周永璋谈一谈，向他说明利害，希望他如实告诉我，为什么他的名字出现在李芳的笔记本子上。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这时，周永璋肯定也闻到了风声，东藏西躲，好几天不见人影。事实上，他应该比我们更敏感些，因为在李芳笔记本上写有名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被斗了，被抓了，他之被抓只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估计，他的内心里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出于校内的派性之争，我们抓住他，一定会整死他。

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突然在东饭厅门口看到了周永璋。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他不进饭厅了，立即掉转头往东跑去。我赶快

追了上去，大声叫他，他却根本不回头。我估摸着我一个人是追不上他的，就立即跑进了东饭厅，招唤勘探系的几个同学协助我去追。东饭厅是勘探系的食堂，我对几个正在吃饭的同学简单说明情况，他们立即放下饭碗，就朝东边追了过去。

经过路人的指点，跑在前面的同学很快就知道了周永璋的去向：进了教一楼。

大家立即包围了教一楼，我和其他人进楼去搜寻。最后，好像是在二楼或三楼的一间厕所中找到了周。

追搜周永璋的学生，都是“朱派”的人，对整治周永璋早就跃跃欲试。这时，更是来了劲儿。一方面是怕他逃跑，另一方面，也为了出气，有人不知从何地找来一条绳子，将周的双手从背后绑了个结实。

到了这时候，我才想到下一步该如何处置。以前，我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几个勘探系的同学在和我商量这个问题时，我们的一致看法是，不要把周永璋关在学校里，而是转移到校外。如果关在校内，“蔡派”们就很可能将这事与两派之争联系起来，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与革委会作对，以为我们是借抓“5·16”为名进行报复。关在校外，因为有社会上抓“5·16”的大气候，“蔡派”们一下子也不明周永璋问题的真相，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有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说，可以把周永璋关在城内某中学内，那里他人熟地熟，不会有差错。

在得了他“万无一失”的保证后，我立即给车库打了个电话，要来了一辆三开门的吉普车，将周永璋从楼内押了出来，往车上推。这时，周永璋不再反抗。在周永璋被推上车的一霎那，他对我说：

“聂树人，你不要胡来！”

“放心，我不会胡来！你自己的事情你心里最明白，一切取决于你！”

除周永璋外，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学生上了车。

车门一关，车子就开走了。

从我的内心说，绝对没有报复的一丝用意，更没有从这个问题上捞取政治资本的半点想法（对我说来，从这个问题上又能捞到什么政治资本呢！），因此，自认为光明正大，一心为公为他人。但是，现在想来，我并没有那么高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私心杂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何事情上，“地质东方红”都要走在前面，不能落后；社会上“抓5·16”已经形成一个潮流，如果因跟不上形势

而出了差错，受到上面的批评，必然也会受到校内师生的指责，面子上不好过。一句话：图虚荣！

从周永璋被抓到被放，中间可能有十多天。周永璋究竟被关在何地，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地方。周永璋被送出校门后，我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李贵，以后的事请他处置，因为学校的“专案工作”一直都是他负责的。

当然，我还是随时掌握情况的。据说，周永璋一直不承认他是“5·16成员”，与“5·16活动”无关。我们原本就不想整他，对他的口供，我们故且信之；我们也不去师大或公安部了解情况、收集相关资料，更不去审问其他“5·16成员”，要他们交代周永璋与他们的往来和关系。

对于李芳笔记本子上“周永璋”三个字，如果有人追问起来，我们准备的“解释”是：那是李芳自己写的，她可能是想将周永璋列为发展对象，而周永璋本人不一定知道。

我曾问过周永璋的生活问题。我记得的情况是，有同学曾对我说，开始一两天，周永璋拒吃窝头。后来，饿极了，也就吃了。我问：

“那你们吃什么？”

“我们吃窝头，也吃馒头。就是不给周永璋吃馒头，整整他！”

窝头咸菜，是家常便饭。在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生活就是如此。

“也不要太过份了！”我说。

“蔡派”的头儿之一被抓，这对“蔡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但是，当时社会上正处在抓“5·16”的高潮中，加之周永璋的“反总理”言行地院的人们以前也有所闻，再加上“蔡派”在学校原本就很臭，周永璋之被抓并没有在校内引起大的震动，更没有人因此而对革委会、对我有什么指责。

或者，“蔡派”的人们对周永璋的“清白”也没有充分的信心，大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蔡派”中，最仗义最有头脑最有本事的还是蔡新平。他组织人经过几天的探寻，大约一星期后终于发现了周永璋的“踪迹”；或者，抓押和看守周永璋的学生中，有口风不牢的人，将关押地点透露给了“蔡派”也说不定。可能是在8月底或9月初，蔡新平带着几个人到了关周永璋的那个学校，因为看管的学生少，他们就控制了局面，将周永璋解救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蔡新平还以看守学生的名义给我打电话，说蔡新平他们已经知道并来到了关押周永璋的地方，要求释放周永璋，问我怎么办？

前文已经说到，我们原本就没有要把周永璋往死里整的意思，因此，抓了他以后，也就没有再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我们只要抓了他，这就够了！据此，谁都无权指责我，对“反对周总理”的“5·16分子”“无动于衷”！他自己跑了，他被人解救出去了，那只是我们工作不严密的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现在，正好有个台阶可下。因此，我也不去辨别打电话者是谁，就说：

“这个事，拖长了我们也有些被动。你们不管了，他们要弄走就叫他走吧！”

这大约是晚上半夜发生的事。第二天，蔡新平为解救周永璋写出了一张大字报，我才知道了蔡新平冒充看守学生的真相。

我对此保持沉默，学校里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任何反响。

我后来的分析是，周永璋当然知道自己屁股上有多少屎，蔡新平也并不坚信周永璋就是“清白”的。他假冒他人名义给我打电话，一方面是想让我出丑，另一方面也是想摸摸我对此的态度，他也怕我认起真来，追究他的责任——当时可正处在打击“5·16”的风头上”

2，“大批判联络站”就此事发表的声明：

一个政治阴谋的破产

最高指示：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地院东方红战士周永璋同志已于9月10日凌晨安全脱险，胜利返校。朱成昭、聂树人之流的政治迫害阴谋彻底破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段的胜利，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周永璋同志是中共预备党员，贫农出身，我院最早起来造反而被反动路线打成了“革命命”的革命小将之一，前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被反革命右

派分子朱成昭用极其卑鄙的政治迫害手段排挤出三司领导岗位。由于周永璋同志一直坚持与朱成昭一小撮人作坚决斗争，朱成昭势力对他恨之入骨，一直加以打击迫害，必欲置死地而后快。

最近，在“5.16”反革命集团及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之流被揭露后，朱成昭势力及他们的黑后台日没途穷，狗急跳墙，干脆撕掉了假面具，赤裸裸地用法西斯手段镇压坚决反朱的革命东方红战士，妄图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他们在9月4日一手策划了法西斯镇压流血事件后，紧接着在9月6日，由聂树人(常委)亲自指挥，贼喊捉贼，诬陷周永璋同志为“反革命5.16分子”，毒打后进行非法绑架，并在全校进行非法抄家，制造白色恐怖。当晚，他们私设刑堂，把周蒙上眼睛，耳朵灌满浆糊，嘴里堵上破布，头、肩裹着布(使血流不到衣服上)进行严刑拷打和逼供信。周永璋同志英勇不屈，进行了三天四夜绝食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的东方红战士对聂树人之流的政治迫害阴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无情斗争，向总理办公室、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汇报了情况。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9月10日凌晨宣布朱、聂之流的逮捕是非法的，指示他们释放周永璋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次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6”迫害周永璋事件发生在广大革命的东方红战士与伸向地质东方红的黑手的斗争，即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地院的斗争及其尖锐的时候，其阴险的政治目的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搅乱阶级阵线，镇压革命派，包庇黑手及真正的516分子，混水摸鱼。96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这只黑手和受他操纵的我院东方红内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因而也就加快了他们走向死亡的速度。“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自作聪明、耍弄阴谋的人都逃脱不了这个下场。但是敌人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他们无时无刻在伺机向革命派进行猖狂反扑。有迹象表明，9.4和9.6两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一小撮暴徒及其幕后的黑手，还在蠢蠢欲动，企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呼吁广大东方红和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呼吁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坚决维护执行“六六通令”和北京市革委会“九九通告”，坚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我们也严正警告那些混蛋：我们严阵以待，有来犯者坚决回击之。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斩妖剑，斩断刘邓司令部伸向地质东方红的黑手。

头可断，血可流，地质东方红永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任何人休想使地质东方红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9.10

3, 钱佩娟老师就此事写的回忆录:

地院革委会的某些人，主要是聂树人，他诬陷周永璋是“516”，他在学校发现周永璋后，亲自布置人把周永璋突然抓起来，为掩人耳目，先把周永璋转移到钢院，为了不让周听出审问他的人是谁，给周永璋戴头套，在周的耳朵中灌了浆糊，这是很残酷的做法，影响了周的听力。后又把周永璋转移到市三中（平安里租家街）。某日晚上，殷维侯用自行车带我，我坐在车后架上，满城转，找不到周永璋。我当晚去地矿部借用红线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周永璋是三司最早的负责人，陪同中央领导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很了解他（有照片为证）。总理办公室的人说：知道了，赶快找到他。后来是由谢富治打电话要聂树人放人。

编者注：钱佩娟老师是江祖如老师的夫人。周永璋第一次被抓，她亲自参与了营救工作。周永璋第二次被抓，因绝食身体十分虚弱，后来住在钱佩娟老师家中，直到康复。

（二）周永璋在 1968 年 8 月第二次被抓：

1,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二团”严正声明：

关于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残余势力残酷迫害 周永璋等同志的紧急严正声明

地院一小撮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竟然狗胆包天，公开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7.28 最新指示，残酷地镇压革命的东方红反朱战

士。继去年 9.4，9.10 和今年 3.22，6.22 等一系列打、砸、抢、抄、抓的反革命事件后，于 8 月 10 日起，又开始对我红二团等战士进行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8 月 10 日中午，一小撮坏蛋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诬蔑周永璋同志是反周总理、反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分子。将周永璋同志绑架到聂树人之流私设的地院监狱中进行非人的迫害。周永璋同志为了抗议这一小撮朱成昭分子的法西斯罪行，被迫宣布绝食（详见后面周永璋狱中遗书）至今已四、五天了，生命垂危。

8 月 13 日深夜，在一小撮朱成昭分子策动下，一群打手突然袭击红二团战士宿舍，将红二团战士吉让寿、肖体修、孙司权抓去残酷毒打，孙司权同志被打的尤其惨酷，至今下落不明，其他红二团战士人身安全毫无保证，随时有被绑架毒打的可能。

为此，我红二团特发表紧急严正声明如下：

1，革委会负责人王大宾、聂树人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孙司权同志，维护六、六通令。老老实实贯彻执行毛主席 7.28 最新指示，如果继续对主席最新指示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其结果将是很不美妙的。

2，谢副总理最近对我院指示：朱成昭势力现在仍在活动。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我院最近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对反朱战士的残酷迫害事件的政治背景。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随时准备痛击朱成昭势力的猖狂反扑。

3，聂树人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谢副总理在 7.28 向主席汇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家伙阴谋篡夺地院革委会领导权。他实际上长期以来和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紧密勾结、相互包庇，立自己的山头。在王关戚操纵下搞成一个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中心。在社会上到处伸手，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外单位新生的红色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反朱派，甚至打击与也持有不同意见的“第三势力”。聂树人反动的“多中心论”必须彻底批判！

4，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与地院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高、周、聂之流，与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紧密勾结，互相呼应，在地院大刮右倾翻案风，阴谋分裂革命队伍，分裂革命委员会，他们是地院“四右”的真正代表，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我红二团战士长期以来与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与一小撮混进革委会的朱成昭的代理人的斗争，与王关戚反革命中心的斗争，正是从根本上保卫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我红二团战士将一如既往。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维护党的政策法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及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我们恳切地奉告王大宾同志，必须认清地院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分清敌我，如果继续认敌为友，视友为敌，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甚至对毛主席最新指示阴奉阳违，继续助纣为孽，参与对我红二团战士的残暴迫害，那势必将会犯更大的错误，滑到危险的边缘。

6，聂树人之流操纵一小撮朱成昭残余势力对我反朱战士进行的残酷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将一大批反工作队的骨干又打成了反革命，围攻、毒打、囚禁、抄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发生活费，不发布票，不让应届毕业生毕业……。这一切暴行决不表明他们的强大，恰恰相反，这只能表明他们政治上的极度虚弱，他们见不得阳光，他们害怕革命群众揭露他们的阴谋，说明事实真相。但是，真理是掩盖不住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必将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朱成昭反革命残余势力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京地质学院 红二团 1968年8月15日

（编者注：上述声明是根据当时的油印小报录入。）

2，周永璋狱中的信：

周永璋狱中的信

（此信由周永璋同志绝食中在群众帮助下由狱中传出）

我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句话

1，我11日起绝食，发表了声明，条件是：指控我是炮打总理和谢副总理，请当广大东方红战士面和卫戍区首长面前公布材料，当面对质，本人申辩，否则立即释放，为此绝食。

第二天王大宾来了封强硬的信。

2，到现在为止，已近绝食四天，实在是五天没有吃什么饭，看样子朱成昭残余势力要向我下毒手了，死后只望中央或有关领导机关，对我详细认真审查，作出

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我生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是我忠愿，望对我的党籍问题作出正确处理，外请对一手策划抓我，参与迫害我的任云堂、饶明鑫等进行审查。

并望由于我的死引起首长对地质学院朱成昭残余势力的重视，关心地院，解决地院的问题。

3，我患有肝炎，至今不愈，死后望送科学院解剖，许能对人民作出最后一点贡献，如有报酬，请捐我老贫农的父母亲，尽了作儿子最后之孝。

4，父母亲都是老贫农，旧社会苦水泡到解放，望有关单位作好思想工作，不能叫他们太伤心，以致寻死。

5，我是不会寻思自杀的，我要斗争到停止呼吸的最后一分钟。

6，打倒朱成昭！彻底打倒朱成昭残余死党反动势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翻身时不远了！前赴后继，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彻底的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

生为毛主席的红小兵，

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

(1968年)8月14日

周永璋

(编者注：上文根据当时的油印稿录入)

3，油印稿原件照片（部分）

关于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残余势力残酷迫害
周永璋同志的紧急严正声明

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二团

最高指示

地院一小撮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竟然狗胆包天，公开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7.28最新指示，残酷镇压革命的东方红反朱战士。继去年9.4, 9.9和今年3.22, 6.22廿一系列打砸抢揪抓的假革命事件后，于8月10日，又开始对我红二团战士进行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8月10日中午，一小撮坏蛋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诬蔑周永璋同志是反周总理反谢付总理的反革命份子，将周永璋同志御架到聂树人之流私设的地院监狱中进行非人迫害。周永璋同志为了抗拒这一小撮朱成昭分子的法西斯暴行，被迫绝食（详见后面周永璋狱中遗信）至今已四五天，生命垂危。

8月13日深夜，在一小撮成昭份子策动下，一群打手突然袭击红二团战士宿舍，将红二团战士江寿育体体、孙司权抓去残酷毒打。孙司权同志被打得尤其惨烈，昏下落不明，其他红二团战士人身安全毫无保证，随时有被绑架毒打可能。

为此，我红二团特发表紧急严正声明如下：

1. 革委会负责人王大宾、王月人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周永璋同志释放孙司权同志，维护六六通令，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7.28最新指示，如果继续对主席最新指示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搞鬼，其结果将是很不美妙的。

2. 谢付总理最近对我院指示：成昭势力现在仍在活动。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我院最近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对反朱战士的残酷迫害事件的政治背景。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随时准备痛击朱成昭势力的猖狂反扑。

3. 聂树人是—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谢付总理在7.28向主席汇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家伙阴谋篡夺地院革委会领导权，他实际上长期以来和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紧密勾结，相互包庇，立自己的山头。在王成威操纵下搞成—个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

最高指示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周永璋同志狱中 信

此信由周永璋同志绝食中在群众帮助下由狱中传出。

我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句话

1. 我14日起绝食，发表了声明。条件是：指证我是砲打总理和谢付总理。请当广大东方红战士面和卫成区首长面前公布材料。当面对质，本人申辩。否则立即释放，为此绝食。

第二天王大夫来了封强硬的信。

2. 到现在为止已绝食四天，实在是五天没有吃什么饭。看样子朱成昭残余势力要向我下毒手了。死后只望中央或有关领导机关，对我详细认真审查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我为毛主席的红小鬼，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作为毛主席的好党员是我心愿。望对我的党籍问题作出正确处理。外请对手策划抓我爹的迫害我的任云莹、饶明、霍村进行审查。

并望由于我的死引起首长对地质学院朱成昭残余势力的重视，关心地院，解决地院的问题。

3. 我患有肝炎，至今不愈。死后望送科学院解剖，许能对人民作出最后一贡献。如有报酬，请捐我老贫农的父母亲，尽了我儿子最后之孝。

4. 父母都是老贫农，旧社会洪水泡到解放，望有关单位作好

编者按：在同一时间里，地院革委会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抓了不少师生进行审查。直到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进驻地院革委会后，在军宣队调查后，包括周永璋等人才逐步得以解放和平反。

（三）周永璋的自述：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8年2月28日《昨天》第107期上。

《昨天》编者按：这是周永璋在1985年7月27日（当时全国正开展整党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写给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的个人自述材料复印留存的底稿。原件上明显的错字，如郑维山错写成曾维山，杨成武错写成杨成伍，转录时均已直接改正

这份材料因为是写给中央组织部为自己文革中的经历作说明和辩护的，因此难免会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或言不由衷的问题，也会有记忆不清的问题。但因周永璋当时的身份和经历，仍可以作为研究那段历史的参考。个别地方略加了注释。

一、文革初期

66年5月中，从院党委布置下来批三家村，我具体组织领导3年级停课批判活动。当时我是年级团分总支书记。

66年6月初，人民日报登出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学院全停下了课，大量大字报矛头指向院党委和各级党的领导。我站出来保了院党委，把矛头指向了反党委的群众。6月13日，为地院大乱而痛心！挥泪迎接了地质部派进地院领导文革的工作队。

6月中旬，开始出现不少对工作队意见的大字报，我找工作队党委汇报年级党支部对党员发展工作的问题时，工作队党委负责人亮底，告诉我地院文革就是要打倒高元贵（地院原党委书记兼院长），现任党委书记王焕64年才从部队下来，没有问题，那是何长工部长要他来夺高元贵的权的。工作队准备让他进工作队党委……看了几天大字报，越比较越觉得高元贵是我党的好干部，资格老，人格正派，水平高，党性强，当时认为保卫党的好干部就是保卫党。我和全院90%的师生、干部、工人一样，地质部有偏见，不公道。地质部派工作组不能领导地院的文化革命。希望中央另换工作组。为此，地院不少干部、师生上访国务院，汇报地院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

6月20日，地院几千师生要求工作队党委派车送代表上访国务院，请求中央另派工作组领导地院文化革命。

先是游行，由我们年级地化二班部分同学自行组织，找我拟定了几个口号（因为那时标语口号要经组织批准已成习惯，我是年级主要负责人）。

游行队伍开始十几个同学，我没有参加。我从饭堂走向宿舍的路上，与游行队伍相遇，队伍不知怎么把我围在中间，一个个找我要求发言，有忆苦思甜的，

有要与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请党考验的。最后向工作队提出正式要求，要求派年级代表上访。要求中央另派工作队。我半途回宿舍了。派代表、上访情况不了解了。这就是文革初期地院发生的6·20事件。

以后（6月25日），薄副总理批示，反工作队就是反党。我被打成了学生中第一号反革命，我自己坚信我是在保卫党，一直拒绝检查。

66年8月底，总理到清华表态，对工作队有意见不是反革命。工作队有错误应该检查（大概意思）。

工作队拒绝承认错误，各院校少数派纷纷成立反工作队群众组织。工作队也组织起老红卫兵（即后来的老保组织，当时是绝对多数派）。

我找到各系挨整的学生，共12人左右，开了串联会，成立东方红大队。可是第一次会上就发生了一个别同学（团员）：“他妈的，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另一个同学（非团员）：“他妈的，团员也都是修正主义的。”这两个同学互相又吵起架来。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是党员，我特别反感，觉得这帮乌合之众，非走向反面。与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车。会后再没有理会东方红大队。以后他们搞的东方红公社的事，我整天忙于收集工作队材料上访告状，因工作队整我使我出了名，师生总认为我是东方红公社的头头。有事总找我。其实我在东方红公社组织里什么也不是。后来他们让我负责对上联系。他们认为我名声大的缘故。

证明人：关霞，原地质系总支副书记，现地院研究生部党委组织部长

江祖如，原年级党支部书记，现研究生部公司经理

朱中一，现地院研究生部博士生，研究生

二、我在三司始末

66年8月中旬，首都大专院校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总部¹（一司），我院保工作队的老红卫兵参加了一司。以中国人民大学一派组织串联准备成立首都红卫兵司令部²（二司），我与他们联系，我不想参加二司，考虑成立一个全由少数派组成的组织。报告到周总理，周总理表态支持。着手串联了十几个院校组织，于9月6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叫首都红卫兵总司令部³（三司）。明确了为联络机构，各校派出代表，选举产生三司勤务组，我被选为组长，清华唐晋被选为副组长，勤务组还有张广彩（政法），张文才（邮电），高升（工大），仇大明（林院），崔俭（农机）。总理给三司配了刘志坚、郑维山当辅导员。准备好了一排平房，并安了五部电话给当办公室。同时派出一个汽车班解放军（一辆卡车，

¹ 此处应为“司令部”。

² 此处应为“总部”。

³ 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三辆吉普，三辆摩托），归三司使用。总理联络员宋皋长驻劳动人民文化宫，与一、二、三司联系。

三司自成立至10月初，三司及各下属组织均为少数派。中央支持各群众组织，政治上不表态。三司下属组织这阶段主要为生存而斗。三司主要起下情上达、上情下传的作用。下属群众组织基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特别讲政策，争取群众。

具体活动主要有：

9月25日，组织总理接见三司及下属组织负责人座谈会。9月26日，总理接见三司全体成员讲话。

戏专组织演《沙家浜》，其中出身不好的同志多，戏校老红卫兵要砸演出场，三司派出保卫人员，未发生事情。

（原戏校黄玉、麦家华证明）

地院二进地质部，吃不上饭，三司派人送过一车面包。（证明人朱中一，安静中（地科院研究生部主任））

帮助组织筹备了首都批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0月6日），由市委调拨交通工具，周荣鑫委托我协助组织，并在会上致了开幕词。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地院发生东方红组织要平分使用广播台，两边斗起来相持不下。接总理电话让回去处理一下。我带着刘志坚的联络员老王一起回到地院。中央文革戚本禹、关锋一会儿也去了。我和老王就又马上回了文化宫，未去过问。

三司全体人员大量工作主要用于潮水般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派上访人员，代接材料等。少数带有证物的要找总理，找主席，由我挂电话直接联系。

这期间，三司由我主持工作，从未开过勤务组正式会议。忙于事务，疲于奔命。多靠坐上汽车走在路上睡一会儿觉。（上图：周永璋在向周恩来作请示汇报。）



这期间，三司组织从未搞过任何打砸抢。从未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的材料。从未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⁴，对少数派很有利。看出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三司各下属组织开始大乱。极左派露头。大整内部右倾头头和群众。

10月6日大会上，总理宣布三司……等全国各省的代表组织是左派组织，中央支持这些组织⁵。当晚，朱成昭、蒯大富即把三司变成了指挥机关。他们组成了三司领导小组，让我主持日常工作，任办公室主任。我反对将联络性质的组织搞成指挥机关，自始除中央找我外，对三司采取一律不管的态度。自己给老三司组织头头打招呼：我准备离开三司，你们只能搞本校的运动，不能听别人指挥。介入社会太复杂。要犯错误。（证明人：戏校黄玉，麦家华，机院负责人，农机负责人，政法兵团负责人等。）

10月18日，毛主席、刘少奇、总理等接见红卫兵，总理叫我去，参加了维持秩序。证明人：杨成武，邱世涛（江苏南通市组织部）。配合总理、杨成武处理好口号事件⁶。

第二天，朱、蒯召集三司会议，提出不少极左口号：踢开党中央，由中央文革主持中央工作，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要先解放北京城，后解放全中国，等等。会上决定准备开100万人大会，让我向中央借天安门城楼用。我偷偷出去打电话告诉总理那儿，周总理不在，周荣鑫说他找总理去，让我回到会场上去。不到半个小时，张春桥、关锋来了，批评了他们，大会也告吹了⁷。我第二天也就被他们开除出三司了。

三司大乱，下属组织抢了三司大印，谢富治又给他们刻了个新印。我也不理会这些事。回江苏老家去了。

年底听说就在我离京的当天晚上，总理接见，全北京到处找我，会上总理，当时还有江青都讲话，批评了朱、蒯，让他们找到我回三司主持工作⁸（杨淑蓉告诉我的，杨现在武汉地院岩石教研室），我没有当回事。我是下决心不干了。

⁴ 此处所指应是《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公开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

⁵ 此说不准确。1966年10月6日的大会是中央宣布了有关平反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由张春桥宣读），周恩来讲话中讲了：“过去各级领导或者一些工作组对革命同志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受压迫之类，这些事情，宣布一律平反。”

⁶ 指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之前为一条口号引起的突发事件。据当年造反派大事记记载：“在这次接见前，陶铸和他的忠实打手熊复一手制造了‘口号事件’，他们把十六日发的‘标语口号’作废，另发一个‘呼喊口号’，把原来口号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字砍掉，并删去其他四个革命口号。首都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发现了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来进行斗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事件，晨五时，在毛主席身边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号，并增添了一个新的战斗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无编印单位，1969年9月，第465—466页。

⁷ 此说存疑。据当时被朱成昭派驻三司主持工作的田春林回忆，此事他毫无印象。

⁸ 未见到这方面讲话资料。

证明人：

唐晋，清华大学教员

张文才，原邮电学院学生

邱世涛，江苏南通市委组织部

吉让寿，无锡地质研究所

1985.7.27

(四) 王秀允 (周永璋夫人)：回忆周永璋

回忆周永璋

王秀允

目 录：

- 一， 周永璋简介
- 二， 三司的筹建与成立
- 三， 中央首长的几次主要接见
- 四， 筹备和召开 1966 年 10 月 6 号的誓师大会
- 五， 周永璋的几点回忆
- 六， 三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
- 七， 周永璋离开三司的原因
- 八， 关于串联
- 九， 关于聂树人抓周永璋

一、周永璋简介

简历:

1943年8月10日出生于江苏如皋市江安镇。

1963年7月考入北京地质学院。

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2月分配四川省地质局甘孜九龙县406地质队。

1975年7月调宣化河北地质学院，教数学地质

1976年7月调河北地院地震台任负责人，后转任地院地质博物馆负责人

1979年7月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师从池际尚、邓晋福教授，任研究生部学生会主席。

1982年12月研究生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冶金部天津冶金地质研究院。高级地质工程师。

1985年加入中国地质协会

1990年中国金属学会聘为岩矿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5年中国宝石协会会员

2003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

2007年12月初脑卒中，右偏瘫，语言中枢受损。

2015年4月15日在天津因病去世

主要经历:

1957年-1963年就读于江苏省如皋中学。学习成绩优秀，酷爱长跑、足球运动。国家长跑二级运动员。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11632班，一年级担任地质系63级团总支书记，二年级上学期入党，年级党支部委员，基干民兵连连长。66年6月因反工作队被打成头号反革命学生。66年8月串联组织地院东方红战斗队，串联组织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都三司），任总负责人。1966年10月20日被朱成昭夺权后离开三司。1968年12月毕业分配，地质部负责人指令学校，周永璋不能在留在北京，不能在地质部系统分配。他自己联系分在天津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除尽职尽责完成好自己本职工作外，2002-2003年期间获两项非职务新型实用专利（香烟分子筛-CN1376433；纳米海泡石凹凸棒石环保洗衣粉-CN1446893）。2003年退休后推进纳米分子筛专利的开

发应用。2007年中风后不得不停止了工作。

主要工作成果：

在天津冶金研究院工作期间，曾多次评为院先进工作者和模范党员；曾获天津科委“21世纪青年科学基金”，入选《21世纪人才库工程》；

工作期间主要从事超基性岩、玄武岩、前寒武纪岩系等有关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其中对铬铁矿、橄榄石、海泡石、凹凸棒石等矿物材料的工艺和经济应用研究获多项成果。先后在各种专业杂志期刊发表30余篇论文。多篇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发表专著《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一书获地质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河北大麻坪玄武岩成因研究中否定了前人“玄武岩包体堆积说”，用新的研究成果指导找矿，使宝石级橄榄石矿储量增加了400倍。曾获得国家纳米材料新型实用专利两项。

二、三司的筹建与成立

1966年8月中旬，在白色恐怖黑云压城的背景下，周永璋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由他发起，与赵国柱、邱世涛、吉让寿等同学一起串联起了北京高校十几个少数派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克服了生活、交通、联络方式的困难，还顶着巨大压力孤军作战。因为他们起初没有得到过任何个人和政治组织，包括地院东方红的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永璋有幸见到了总理的联络员宋皋，并向他汇报了联络情况和成立三司的意图和想法，希望宋皋能转达给总理。没几天，宋皋向周永璋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要求以文件的形式拿出一个报告给总理。终于有一天，周永璋接到了周总理秘书长周荣鑫打来的电话，说总理同意成立三司。

按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向三司筹备组提供了一排平房，位于筒子河边，原为游船码头、院内工作人员和游客的休息室、小卖部。有5-6间房子和一个大厅，有很多桌子和长条椅子。

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中，周永璋多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集十几个院校的少数派负责人开会，建立筹备组。在筹建过程中，66年9月1日周永璋参加了周总理接见首都大、中学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总理与代表们合影留念。当时参加接见的领导还有陶铸、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郑维山、周荣鑫、杨奇清等。



周总理和首都大学中学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合影

第二排右起第二周永璋



放大后前排中间周永璋

1966年9月4号，周永璋组织筹备组再次召开会议，检查筹备工作完成情

况，讨论由宣传组起草的三司成立宣言初稿，大家补充修改后定稿。会上确定在9月6号召开成立大会。9月5号再次召开筹备会议，与会的各校组织代表一致同意三司核心组负责人由周永璋担任。会上还确定三司为联络机构。

1966年9月6号在大会召开前，周永璋利用早晨的时间又召集筹备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在成立大会上除按原计划的程序外，再补充一项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大会上午10点开始，周永璋主持，王大宾代表地院东方红致开幕词，朱成昭没有参加。聂树人印刷会议材料后赶到会场。大会在进行中时，中央首长来到大会会场。有刘志坚、郑维山、杨成武、周荣鑫、戚本禹、杨奇清。刘志坚代表总理宣布，让郑维山、杨成武、刘志坚等做三司的辅导员，杨奇清做三司顾问。

会议后，三司就正式在筒子河边的平房安家了，负责红卫兵辅导工作的解放军给办公室安装了5部电话，派出一个解放军汽车班，配备一辆卡车、三辆吉普车和三辆摩托车。

这里要说的是，关于三司的办公地点，一开始并没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地方，当时一司和二司都已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各占住了一个大殿，周永璋就天天往这里跑，总理联络员宋皋也是在这里遇到的。周永璋也希望三司也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安营扎寨。在得知总理同意成立三司后，周永璋就不断的争取，开始找刘志坚，刘志坚总说有困难。周永璋就找周荣鑫，周荣鑫向总理反映，总理知道后表态：三个司令部一视同仁。这样刘志坚就和周永璋商量，说大殿肯定没有合适的了，周永璋其实已经看中了筒子河边这排平房，就提出来我们不要大殿，我们就要在这平房里。汇报给总理后还得到了总理的表扬：红卫兵要向当年红军学习，艰苦朴素，这很好。

三司成立至十月初，下属各组织均为少数派。在各单位政治压力都很大。三司起联络作用，即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这是在三司成立时就明确了，他就是一个联络机构，它的组织作用在开始并不明显。三司成立后各校造反派组织正式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选举产生了三司勤务组，周永璋作为北地东方红的代表被选为勤务组组长。清华大学的唐晋被选为副组长。勤务组成员还有政法学院的张广彩、邮电学院的张文才、北京工业大学的高升、北京林学院的仇大明、农机学院的崔俭。这段时间三司一直由周永璋主持工作。

三、三司成立后中央首长的几次主要接见

1、1966年9月17日

刘志坚、谢富治、郑维山、杨奇清等领导来劳动人民文化宫分别看望1、2、3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据周永璋回忆，首长们都很平易近人，谈个人参加革命的经历和体会，勉励大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让代表们敞开谈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最后首长们表示有些问题要向总理反映请示。首长们在三司座谈时间最长。

2、1966年9月25日的接见

周总理接见三司及下属组织的负责人，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议室。从晚十点一直持续到凌晨2点。接见时间、地点都总理联络员宋皋负责安排组织。参加的同学代表有30多人，在这次座谈中周总理作出了很多具体的指导意见，包括对地质东方红。朱成昭、聂树人均没有参加。这是为第二天的接见三司的大会做准备。

3、1966年9月26号下午

周总理在工人体育馆接见三司全体红卫兵成员并做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周永璋及三司联络各成员共同筹备和组织的。周永璋支持会议。参加接见的还有郑维山、王任重、周荣鑫、杨奇清等。会上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总理说不要怕少数、认为对的就坚持。三司从整理接见受到极大鼓舞。



周总理做重要讲话时的照片

后排右边第一人周永璋，总理后面做记录的是聂树人。

这次大会后，周永璋还单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王任重也在场。留下了一张照片。



周永璋向总理请示汇报工作，后面的的是王任重

周永璋几次回忆说，总理记忆特别好，第二次见面就能叫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苏北人，还说“咱们还是老乡哩”。还曾告诉周永璋，有急事找周荣鑫和我联系。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周永璋多次通过周荣鑫反映和请示工作，总理总能很快掌握情况。

4、1966年9月27日

周永璋收到一封周总理的亲笔信，总理用毛笔写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全文如下：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同志们，战士们：

我昨天在你们总（司令）部所领导的各院校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有一句话讲的不完全，现在更正和补充如下：“你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

一个时候”，以下应该接着讲：“如果在辩论和时间中经过你们自己和别人的证明确实是错了，或者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部分是对的，你们就应该把对的言行矜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理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凡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对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错的。所以林彪同志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就是你们应该念念不忘的。

以上这段话，希望你们用适当的方法在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宣布一下。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七日

5、1966年9月30日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召集首都三个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地点在人民日报社会议室。周永璋代表三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

陈伯达、江青、王力先后发言。中心意思是当前运动阻力很大，特别是批判工作队错误路线的阻力极大。下一步急需极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后来周永璋讲，这是他第一次听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福建口音很重，他的话很难听懂，江青不时给他翻译。

四、筹备召开1966年10月6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大会地点定于北京工人体育场，规格10万人。

10月1日周永璋以三司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节后按中央文革座谈会的要求精神，召集三司核心联络组会议，会上一致决定要召开一个全市性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周永璋为筹备会议的总负责人。

会上决定先向中央文革打报告，请示召开这个会议。报告由宋皋转给总理。随后周永璋详细向周荣鑫同志详细做了汇报。几天后，周荣鑫传达了周总理指示“同意召开这次会议，并要求三司要广泛邀请各地造反派组织及外地驻京的革命群众参加”。周永璋理解，这是要广泛发动群众，声势一定要大。

为筹备这次大会，把三司工作人员分成几个组，包括秘书组、组织组、保卫组、宣传组，等等。秘书组负责大会的总筹及会场安排，负责向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陶铸、王任重、中央文革成员、北京军区、北京市委及公安部等部门和要人发请柬；组织组负责参加会议的各群众组织团体的联系，负责会场的安排、制印和发放入场券等；保卫组负责会场安全秩序；宣传组负责编写大会的发言稿、审查群众大会代表的发言稿、宣传报道口号等。

周总理在10月6号大会上做了长篇报告，江青也做了重要指示。大会由政法学院的三司代表主持，周永璋是大会执行主席并至开幕词，王大宾代表地质东方红发言，朱成昭没有参加会议。出席大会的首长还有陈伯达、王任重、康生、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周荣鑫、吴德、郑维山、谢镗忠、雍文涛、穆欣、丁国瑜等。这是一次很隆重和声势浩大的大会。



周总理、陈伯达、江青、陶铸、康生在主席台



江青讲话



杨成武、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郑维山等在主席台

五、周永璋的几点回忆

三司成立后，中央有关领导多次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关心和看望，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问题。和总理办公室的联络也很通畅。周总理让周荣鑫做他与三司的

联络员，很多事情、事件情况都是通过周荣鑫向总理反映的。

在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最困难的阶段是绝食事件发生后（实际上是学校老保控制的食堂不给饭吃），是周永璋及时向总理反映，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准备的面包食品送到学生中。

在地院发生两派抢广播站发生激烈冲突的关键时刻，是周永璋及时向秘书长周荣鑫反映，总理知道后派关锋、戚本禹来地院处理，避免了更大的武斗，支持了东方红。

据周永璋回忆，三司成立后很多时候忙于接待外地上京告状和反映当地情况的群众和组织，重要情况都及时向上反映，便于中央掌握和及时处理。

还据周永璋回忆，他同肖力有两次接触，其中一次是肖力到地院找他，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六、周永璋三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活动

据周永璋回忆在1966年9月15日、1966年10月1日、1966年10月18日，三次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活动。



在天安门城楼上，1966年10月1日，康生后面露出一个带帽的头的就是周永璋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的照片，1966年9月30日夜，第三排右数第三位周永璋

1966年10月18号是周永璋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一次是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指示，三司的任务是担任接见活动中的维持秩序。当天在接见活动中，周永璋在负责维持秩序的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叫周永璋上了中央首长检阅的指挥车，叶剑英元帅还开玩笑说，“你就是三司司令啊！”

七、周永璋离开三司的原因

1、1966年10月6日大会后，全国政治形势明朗，中央领导都支持三司了。周总理是最早支持三司的，三司工作主要都是直接向总理汇报，总理通过周荣鑫直接指示，和中央文革联系不多。10月6号大会后，中央文革支持的态度变得非常鲜明了。这时朱成昭对三司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以前基本不过问三司的事，成立大会他明知道也不参加，几次三司重要大会也不参加。但10月6日的当晚朱成昭、蒯大富到三司来召集会议，目的是改变三司建立时制定的为联络机构的宗旨，要把三司变成指挥机关。当即他们改组了三司领导机构，让各高校参加三司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作为核心组成员，核心组负责人就是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清华以井冈山为代表，负责人也不再是唐伟，而改成了蒯大富。朱成昭让周永璋负责日常工作，任办公室主任。周永璋反对将原联络性质的组织机构变成指挥机关，因而产生了分歧。

2、10月18日，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领导接见红卫兵活动，周荣鑫同志按总理指示精神，让三司参加维持秩序。当时负责检阅指挥的杨成武将军让周永璋上了随从毛主席接见的叶剑英元帅的指挥车，（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使他大大风光了一把，这个引起了朱成昭的极大嫉妒。而且在检阅前还向周总理反

映了发现“口号改动”问题，并配合总理处理了“口号事件”。这些好像让朱成昭感到周永璋还在以“司令”自居。

第二天，即10月9日，朱成昭召集三司会议，提出不少极左口号，踢开党中央（刘少奇的司令部？），由中央文革主持工作，认为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要先解决北京城，后解放全中国等等。会上他们决定要召开100万人的大会，让周永璋向中央借天安门城楼用。周永璋心里不同意这样做，于是背着他们出去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总理当时不在，周荣鑫说他马上去找总理，让周永璋回到会场去。不到半小时，张春桥、关锋来了并批评了他们。于是朱成昭、蒯大富策划的百万人大大会告吹。

第二天，周永璋就被他们开除三司。以后朱成昭就派田春林作为他的代表到三司来工作，取代了周永璋。从这以后三司也就开始乱了，随后发生了政法大学刘富元等抢夺三司大印的事件。

周永璋和朱成昭不是一股道上的人，思想观念差别太大，他们排除异己是很自然的，周永璋拱手相让也就顺其自然了。

3、周永璋多次说过，他急流勇退是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太复杂，中央明确支持三司后加入的单位和人员成分复杂，全国各地都来找三司，他感到也驾驭不了，坚持下去会出问题。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无比英明。所以以后的运动中，如抓“516”、“清三种人”、“整党”等都还算是轻松的。假如不退，还乱蹦乱跳，鉴于三司的巨大影响和局势的诡变多端，出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聂树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以为自己爬山了三司和地院革委会的高位，自鸣得意，风光一时，权力在手，紧跟四人帮，甚至借靠四人帮的权势，夹私报复，到处整人。结果坐牢、蹲监狱、挨批挨斗……，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既是历史的替罪羊，也是自己的罪有应得。周永璋在当学生干部和整个文革中，从没有整过任何人，也没有斗过任何老干部和教师，这是他一辈子心安的大事，终能平静的见马克思去。

4、身体原因。在串联和筹建成立三司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身体极度透支，精力和健康都消耗到极限，没有力量再坚持下去，何况和他们又有了很大的分歧。

八、关于串联

大概在1966年11月中旬，有十几个人和周永璋一起开始离开北京外出串联。

我记得有赵国柱、孟繁华、邱世涛、吉让寿、陈铭和我，其他还有外校的几个，我不太认识，现在也记不起名字了。

第一站到南京，去过南京大学参观看大字报。很巧，在南大人流如织、来往穿梭的大道上，偶遇我一位高中同学，她也在看大字报，我猛一抬头，我两都惊呆了。啊，竟还有这么巧的事，地球变得这么小。兴奋了好一阵子。

我们还一起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沿长江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一直和陈铭在一起，和其他人都分开了。天渐渐暗下来了，突然周永璋从对面走来，衣服湿漉漉的，活像个落汤鸡。我呀的一声，他说我差点见不到你们了。我问这么回事，他说跳到长江你去游泳去了，水流太急，一下子就把他冲了好远，怎么游也游不回来。最后用尽全身力气向江边靠，借助一堆废铁才爬山岸。被水往下冲走一千多米，爬上来后沿江边又走回来了。我和他开玩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淹死你我们谁都不知道，你就成了千古之谜了”。这大概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使然。

在南京呆了几天也记不清了，后乘汽车去扬州，住扬州农学院，周永璋曾了解过这个学校运动开展情况，但没有介入。我和陈铭几次去扬州市里参观，被这里秀丽风景和浓厚人文气质所吸引，大开眼界，很喜欢这个地方。

从扬州到南通，转换轮船去上海。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排队参观过江南造船厂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还到过赵国柱家，国柱还领他两个外甥女来师大玩。

串联这几十天，我印象中周永璋这伙人没有介入各地运动，没有像地质东方红的一些人那样到各地去当救世主。

从上海回北京的途中，我和陈铭从高碑店站下车，步行三天回到学校。当时是为了练铁脚板，健康工作五十年。想想特单纯幼稚。

第二次串联是去东北朝阳，我印象中有周永璋、张世雄、陈铭和我，共不到十人。是他们那边邀请去的，但没有介入运动。

九，关于聂树人抓周永璋

1967年9月1日，聂树人为打击报复持不同政见者，为捞取自己向上爬的资本，以不可告人的目的，亲自策划指挥了抓周永璋事件。

他亲自找勘探系朱派的几位铁杆，亲自现场指挥将周永璋五花大绑，双手被

紧紧靠后捆起，扔到车上。抓他时，为了不让他知道是谁在指挥殴打，就给他耳朵鼻子灌浆糊再戴上头套。他挖空心思的不敢把周永璋放在学校，怕不同政见的师生起来反抗，而是偷偷地将他关在校外。

在关押期间，聂树人不断做指示和听取汇报。看守人员轮流拷问，逼供、殴打。不让休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后来怕出人命，给个凉窝窝头，不给菜。看守的人故意当着他的面大吃大喝，就这样折磨了他十几天。周永璋干脆就用绝食来抗议他们的法西斯暴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下子就瘦下了十几斤。要不是老师和同学们千方百计寻找相救，找到了关押他的地方将他解救出来，还不知聂树人要迫害他多久，后果难以想象。

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关押周永璋的勘探系几大员，也都 70 多岁的人了，你们有没有过良心的自责？这种事，我相信你们是不会不记得的，但你们是不敢向你们后辈讲述的，因为太缺德了，太可耻了。你们将背负良心的十字架走进坟墓。最卑鄙的是聂树人，据说他还在写的回忆录中洋洋得意讲述自己是如何抓周永璋的，但对周永璋的残酷的迫害只字不提，还说是为了保护周永璋不被外校来抓，真是无廉耻的小人。不仅是周永璋，聂树人在地院掌权的一年多时间里，被他关押迫害的老师同学还有好多，有的老师都被逼自杀了。几十年了，大家对文革都有反思，唯独聂树人对老周，对我，没有过一句的道歉。不但没有道歉，反而对文革，对他干的坏事都洋洋得意，以地派二把手自居，不知羞耻，都写在书封面上了，特别自我欣赏，美的不行。文革要真的就那样搞下去，让聂树人这样的野心家上台了掌权，那绝对就是个伪君子加法西斯，迫害狂，地院不知有多少人要倒霉。

老天有眼，终于让这个干尽坏事的家伙得到了报应。他后来被批斗、被隔离审查，蹲大牢，都是罪有应得。别人可能有冤枉，但对聂树人是应得的惩罚。古人云“德不配位，必有殃灾；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聂树人，我奉劝你下一辈子投胎能做个好人吧。不过也难，干了这么多坏事而又一点不忏悔的人，怎么能够投个好胎呢？

周永璋已逝世两年多了，我把这些往事回忆写出来对他是个交代，以此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2018 年元月 31 日

三、王大宾专题——王大宾庭审记录

编者按：

王大宾，四川德昌县人，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 1961 年入学学生。文革期间，曾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王大宾在其 2015 年 10 月出版的《王大宾回忆录》一书中，全面地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此处就不再重述。有关他参与的“奉旨揪彭德怀”、“打倒高安邦反革命集团”等重大事件，已在本书的第三篇中有专题介绍，此处也同样不再重述。本专题重点就 1983 年法院对其不公正、不公平的判决做一介绍。

1971 年 3 月 9 日，王大宾被从成都抓回北京，关押在地院，进行有关“五一六”的审查。关押审查长达四年之久，最后以“五一六”罪名不能成立释放。

1978 年 4 月 29 日，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武汉市公安局正式逮捕王大宾。在对王大宾的审判过程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决定：“按人民内部矛盾”判决。但在上报中央审批时，1983 年 8 月 18 日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修改判决，指控“王大宾在 1966 年 12 月至 1968 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王大宾被认定的主要“罪行”，就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得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力二年。

很显然，王大宾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个判决是极不公正、极不公平的，没有法治，也违背客观事实。王大宾及地院学生是奉旨去揪彭德怀的，且对中央文革要求揪彭德怀一事，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的。这些在本书第三篇“揪彭德怀专题”已有叙述，此处就不再重述。

在此，将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大宾的起诉书、武汉市中级法院判决书、本人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陈云的批示逐一引述如下：

（一）起诉书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

(83)武檢二字第 32 號

被告人王大賓。男。四十二歲。漢族。四川省德昌縣人。

原系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之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後為該組織總負責人。並任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反革命一案，由湖北省公安局依法逮捕。現在押。

被告人王大賓反革命一案，經武漢市公安局偵察終結。於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移送本院審查起訴。現查明。被告人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他幹部，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等犯罪活動。其主要犯罪事實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賓在重慶時，得知“東方紅公社”總部電話傳達的戚本禹關於要將彭德懷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後，王立即帶領北京地質學院在重慶的部分學生，趕到成都。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同志挾持到北京地質學院。同時，對彭德懷同志的住處非法進行抄查。將彭德懷同志多年保存的珍貴資料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並運到北京地質學院。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賓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旨意，積極策劃批鬥彭德懷同志。成立了以地質學院物探系為主的“鬥彭聯絡站”。捏造誣陷彭德懷“陰謀政變”、“裡通外國”的材料，廣為散發。並派人與北京航空學院聯合對彭德懷同志進行批鬥，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王大賓於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還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多次對原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聶克、教授馮景蘭、楊遵儀等人進行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四月十日，王大賓先後主持策劃並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總部和革委會的名義發表了聲明。誣衊“余秋里充當了資本主義

復辟逆流的先鋒人物”、“何長工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煽動“炮轟余秋里”、“打倒譚震林”、“打倒何長工”等領導人。

被告人王大賓所犯上述罪行，有大量的證人證言和書證證實，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關於適用法律的規定，本院確認，被告人王大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應追究刑事責任，特依法提起公訴。

此致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章〉)

檢察員 胡文濤

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

(二) 判决书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市法(83)刑初字第96號

公訴人：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胡文濤。

被告人王大賓，男，現年四十二歲，四川省德昌縣人，漢族，“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北京地質學院學生，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質局成都修配廠工作。現在押。

辯護人：武漢市法律顧問處律師 孫先義、姚啟超。

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王大賓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湖北省武漢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胡文濤、代理檢察員周忠武 出庭支持公訴，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對本案進行了公開

審理，查明被告人王大賓犯罪事實如下：

被告人王大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賓在重慶得知“東方紅公社”總部電話傳達戚本禹關於要將彭德懷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後，立即帶領在重慶的北京地質學院的部分學生趕到成都，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將住在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挾持到四川省地質局，並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押到北京。同時，非法抄查了彭德懷的住處，將彭德懷多年保存的珍貴資料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並運到北京地質學院。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王大賓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旨意，積極策劃批鬥彭德懷，成立了以地質學院物探系為主的“鬥彭聯絡站”，並與北京航空學院聯合對彭德懷進行批鬥，誣陷彭德懷是“陰謀政變”、“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分子”，使彭德懷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日，被告人王大賓先後主持策劃並分別以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總部和革委會的名義發表了聲明，誣衊“余秋里充當了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先鋒人物”，“何長工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煽動“炮轟余秋里”、“打倒譚震林”、“打倒何長工”等領導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間，被告人王大賓還以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等罪名，對原地質學院黨委副書記聶克、教授馮景蘭、楊遵儀等人進行人身迫害。

被告人王大賓的上述犯罪事實，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審查了與本案直接有關的證據，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完全屬實，被告人王大賓當庭供認全部罪行，表示悔改。

本庭確認，被告人王大賓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參與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陰謀活動，以及誣陷迫害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根據被告人王大賓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並考慮到被告人王大賓的認罪表現，特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五十二條、第六十四條、第五十九條的規定，判處被告人王大賓有期徒刑九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刑期自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至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止）。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上訴於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

審判長：成厚勝 人民陪審員：陳昌堯 人民陪審員：蔡金保

本件與原本核對無異

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章〉）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書記員 曹永萍

（三）實錄法庭出示的證據與我（王大賓）的辯護

1983年8月18日武漢中院對我的庭審，我（王大賓）作了要點記錄，亦轉錄下面留存，留予歷史明鑒。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庭審記錄（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上午8時開庭）

參加者：審判長、二位陪審員、檢察院二位公訴人、書記員、二位律師及省市有關領導，地院代表總計約五十人。

審判長問：籍貫、年齡、民族，曾任何職務？

被告答：四川德昌縣，42歲，漢族。曾任小學少先隊大隊長，初中任學生會學習宣傳部長，高中三年任班長，大學五年任班長、團支書、系團總支委員。文革初期66年8月8日“地質學院東方紅大隊”成立，8月17日“東方紅公社”建立，朱成昭（革幹之子）同學任一把手，我為二把手。1967年3月5日始，我任一把手。“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1967年4月3日任北京地質學院革命委員會主任，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

常委。

檢察院公訴人：宣讀起訴書……。法庭調查。

審判長問：起訴書指控你參與彭回京是否有此事？

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對揪彭的，並向中央報告過我們不同意揪彭的意見。

審判長宣佈：由法庭宣讀證言如下：

(1) 戚本禹供詞：……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說彭是修正主義頭子，在成都不老實，決定要揪彭回京。根據中央的決定與上面指示，我派閻長貴當面給地院朱成昭傳達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2) 閻長貴證言（閻是江青秘書，中央文革辦事組成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文革辦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質學院東方紅的朱成昭傳達中央的指示，叫他負責揪彭德懷回京。我給地院東方紅負責人朱成昭打過電話，在地質部找到朱成昭，當面向朱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3) 朱成昭證言：中央文革指示，閻長貴叫我們地院東方紅負責將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聯絡站和在南充的聯絡站打電話，下達中央揪彭指示。後來王大賓到成都了，曾給王通過電話叫王揪彭，因王不執行，後又派胡樂成坐飛機去成都揪彭。

(4) 費安琪（重慶地院東方紅聯絡站負責人）證言：總部朱成昭給我，南充聯絡站電話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電話。十二月十五日東方紅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賓由武漢到重慶，得到我傳達的指示後，就帶地院在渝的部分學生（除了辦紅衛兵展覽的人之外），於十八日到成都，張家聲等同往。

(5) 王大來（幹部，地院東方紅公社負責人之一）證言：我們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說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盡辦法不惜代價，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當地批鬥後也要揪回京。我們從南充於16日趕到成都，在成都聯絡站負責人錢新、鄭文卿我們同去與彭長談話後，到底揪不揪這是件大事，我們作不了決定，要等公社主要負責人之一王大賓到成都後，由王大賓作決定。王大賓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們向他作了彙報。決定打電話給朱成昭，要朱向黨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彙報我們認為上面黨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瞭解彭總一年來的工作、思想情況，彭是擁護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對劉少奇的。現在揪彭，上面判斷可能有誤，所以我們決定暫不執行揪彭的指示。王大賓派我

和鄭文卿次日立即坐飛機回京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彙報。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罵了一頓。後來，過幾天朱成昭派公社負責人之一胡樂成坐飛機專程去成都揪彭。

(6) 費安琪證言：12月22日胡坐飛機到成都，傳達上面指示，堅決揪彭回京。在地質局開會，王大賓參加了會議。決定23日揪彭回京。23日上午七點，發現彭已被北京航空學院駐成都地質學院聯絡站的人，奉韓愛晶的指示於23日凌晨將彭揪到成都地院。胡樂成、王大賓等人，胡帶隊去成都地院與北航學生談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邊談判，張華清等同學從彭所在的屋裡將彭擁出來，坐上車就到了地質局。12月27日傍晚回到北京火車站，北京衛戍區拿上面指示來，要把彭交衛戍區。指令拿到火車上給王大賓了，朱成昭不同意交衛戍區，當晚就到了地院。

審判長問：以上證言是不是真實的？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說明一點，27日到北京站後，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後，我是和谷萬才首長商量過，要堅決執行上面的命令。周總理給我和谷首長的指令，“把反黨分子彭德懷交衛戍區”（說明：在講到周總理對揪彭的指示時，審判長打斷我的回答，要求我迴避提及周總理對揪彭的指示，包括胡樂成到成都時傳達的周總理的指示）。是別人（指：朱成昭）趕到車站，不同意交衛戍區的。所以當晚到了地院，次日才由衛戍區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漢回四川，是生病後回家治病，在重慶得到傳達的朱成昭電話內容的。18日上午到成都，聽了有關彙報，看了他們同彭總的談話長篇回憶記錄後，我動搖、猶豫過，決定暫不同意執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電話請示，和派王大來、鄭文卿次日下午乘飛機回京向毛主席、黨中央面呈我們的看法的，是去請示彙報。後來朱派胡來成都傳達上面指示後才揪的。關於費安琪說，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實，我沒有去。胡雖也是公社負責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負責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總回京一事，由我承擔主要責任。

法庭出示證據：我筆記本記有朱成昭電話指示（是別人在我的筆記本上抄的指示）。

答：這是我的工作筆記本。

出示證據，還有“18日派王、鄭乘飛機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彙報”的我的筆

記。

(7) 綦魅英(彭的秘書)證言: 12月20日北航學生x x和成都地院紅成x x等學生,以找彭瞭解劉少奇等人問題為藉口,到了彭總住處,23日凌晨他們把彭揪到成都地院。7點北京地院學生譚保華、盧慶生等人瞭解到彭已被別人揪去成都地院,他們和王大賓就去成地,在屋子裡揪彭總擁上汽車到了地質局。鄭文卿等人12月16、17、18日曾到彭住處與彭談過話。23日彭被北航揪走後,北地學生盧、譚等抄查了彭總的東西,王大賓去後,還翻看了一些書籍材料和看過我的筆記。抄查的東西裝在兩個皮箱中,他們帶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單給我,我把清單交給了解放軍成都軍區後勤部了。

被告說:我要說明一點,抄查東西時,我到場時已收拾完畢,兩個皮箱已鎖好,錢新給我看了清單。二份清單,錢和綦秘書都簽了字。我問綦,清單是否準確,他說已寫清楚。我並沒有看過什麼材料的事。

審判長問:1967年7月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鬥彭?

被告答:有。中央文革辦公室給地院有電話指示。還送來批判材料幾份。

法庭出示證據:中央文革電話指示:(‘與北航聯合批鬥彭,不要軍事院校參加,要文鬥,不要武鬥,但也不要太限制群眾,要批鬥時與北京衛戍區傅司令員聯繫要人。’)

(1) 賈振遠(常委)證言: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禮堂召開各大專院校、機關部門負責人參加的要“立即掀起對劉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動員會。7月16日晚王主持常委會,貫徹執行15日會議精神,對劉鄧陶彭羅陸楊一小撮開展大批判。會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組和領導班子。

(2) 侯力平(常委)證言:大批判,物探系x x班為主成立了批鬥彭聯絡站。

(3) 李貴(副主任)證言:革委會貫徹執行過中央15日會議精神和有關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法庭念:7月16日常委會記錄和有關參加會議人員名單。

念:7月28日東方紅報大批判文章,“誣彭總裡通外國” “軍事政變”等

話。

王大賓：15日中宣部禮堂會議後，我主持過常委會，祇研究貫徹執行一事，是說的大批判，並沒有研究過要批鬥誰的事。中央文革辦公室電話指示批鬥彭，我沒接到電話，是別人向我傳達的。我沒有參加過關於研究批鬥彭總的會議，也沒有參加北航召開的批鬥大會。當時，我身體很不好，工作已交給別人，然後我就去小湯山治病去了。“東方紅”報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寫的，我也沒有叫別人寫過，其稿件，我也沒審查過。但，我是革委會主任，在地院出現的問題，我都應負領導人應負的責任。

審判長：地院把聶克當走資派批鬥，把楊遵義、馮景蘭當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鬥，有無此事？

答：有此事。但我需說明一點，是在1966年6月地質部派的以鄒家尤副部長為首的工作隊，將地院原黨委書記高元貴等領導幹部打成走資派，正式宣佈罷了官，聶克副書記，楊、馮教授當反動學術權威批判。我們保高元貴等領導人，認為地院黨委是延安，不是西安，工作隊執行了打擊一大片的資反路線，就幾進地質部，要鄒作檢討。聶克等人當時被保工作隊的鬥批改兵團遊街批鬥，我們東方紅公社未參與。後來，我們掌權後，我當革委會主任，在審查幹部，清理階級隊伍中錯誤地批鬥過聶克，系裡批判過楊、馮二教授。但，革委會都未給他們定案，作為群眾運動，揭發批判，當時是搞過的。但，革委會派出大量人力四處調查，歷經半年時間，查清了工作隊強加在聶克頭上的最大罪狀——參與其父殺害一位地下黨幹部問題，我們的結論是聶克不但無罪，而是有功，因此地下黨幹部已投降日偽成為漢奸了。因此，1968年的六月，我們決定要解放結合聶克，報告已送北京市革委，後來軍宣隊領導學院，我們的願望未實現。楊、馮等人的事，當時保工作隊的一些紅衛兵抄了他們的家，抄出有的人家有國民黨黨徽、黨證、變天賬等東西，他們在教工之家舉辦了展覽會，此事，地院的人都是清楚的，另外他們都是有海外關係，是英、美上學回來的。因此，我當革委會主任後，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曾審查過一些人的問題。

法庭摘錄念1967年5月一次常委會記錄：王大賓發言說：

“清理階級隊伍，要穩准狠，不要放過了真正的壞人……不要心慈手軟。走

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批判。”東方紅報說，“聶克走資派還很猖狂”。

證言：

(1) 賈振遠證言：革委會曾開會決定要批判走資派和資反權威。

(2) 秦玉林（幹部、辦公室工作人員）某月某日在大飯廳開大會批鬥聶、馮、楊，要他們在會上自報姓名，“走資派聶克”“反動學術權威楊、馮，，。批判完後，從主席臺上押下來時，有學生跑過去推打人。這就是王大賓這樣在迫害 幹部。

王答：我從來未打過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打人。

審判長問：地院有沒有發表過聲明打倒譚震林，炮轟余秋里，打倒何長工的事？

王答：確有其事，這些都是錯誤的。是“批二月逆流”時，表態性質的。這原因大家都是清楚的。

法庭念：1967年4月10日“東方紅”公社作戰部會議記錄和出席會議人員名單

（王、楊、李、夏、陸、張、賈、柴、黃、田等人出席）節錄念：公社總部“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譚，炮轟資本主義復辟急先鋒余”的聲明。王參加並主持了會議。聲明說：“從上到下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余充當先鋒。”

法庭出示：1967年4月20日革委會《東方紅》總部《關於地質部文化革命的聲明》其中一段：“何長工在地質戰線17年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打倒三反分子何長工”。

王答：確有此事。這是錯誤的。說明一點，當時總理指示地質部是先行官，要抓革命促生產，叫戚本禹過問地質部運動，儘快成立新的領導班子，好抓革命促生產。戚給地質部有信件，並要我們支持礦伏兆、李四光等站出來成立領導班子。因此，我們表態。聲明中，按當時慣例，提了“打倒何長工”。這還因為，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上面點了李范五、汪鋒、何長工三人的名，說何是三反份子。因此，革委會聲明中用了此話。

審判長宣佈：法庭調查完畢，開始法庭辯論。被告有什麼話說？

答：揪彭總回京是事實，主要由我承擔責任。我現在認識到，這是犯罪行為，黨和人民的功臣彭總，是一心為老百姓利益奮鬥的老師，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但當時，我參與揪他回京，我很對不起他老人家，一直心裡內疚，痛悔不已。我已作了對不起黨和人民，對不起彭總的事了，黨怎樣處理，我都沒有意見，

我要把黨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服從黨的決定，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地院工作中許多左的錯誤，使一些人受到了錯誤的打擊，我向他們表示道歉，對不起他們，因我是革委會主任，所以革委會的錯誤，由我負主要責任。具體的問題，我不必多說了，你們已為我指定了武漢市法律顧問處主要負責人、武漢市有威望的律師當我的辯護人，我就沒啥說的了。

律師姚啟超辯護：尊敬的庭長，陪審員，我們是王的辯護人，我們查閱了有關起訴指控被告的檔案材料，證人、證言、證據，我們兩次會見了被告，聽取了他的陳述，我們的辯護如下：首先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還在65年底，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大毒草，矛頭直指彭總。後來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劃迫害彭總的，罪魁禍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總是上面的指示。這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個環節的組成部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王大賓祇是一個執行者，而且在執行中他曾有過動搖猶豫，不同意執行，請示過，並派王大來、鄭文卿坐飛機回京請示、彙報的情節；第三，王大賓應當同韓愛晶在揪、批彭總的問題上有原則的重要的區別，這點，我們也要提請法庭注意。（姚律師摘要念韓的判決書有關韓迫害彭的部分）說：“可見，7月19日北航開小會批鬥彭總，是韓首先帶頭拳打腳踢彭總，彭被打倒在地，然後其他打手又打，頭撞地，揪起來又打，將彭肋骨打斷三根、頭部也重傷；7月26日韓主持在北航召開聯合批鬥彭總大會，地院是有人參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賓都沒有參與。反革命分子韓愛晶是殘酷直接傷害到彭總的，是在當時也是不允許的，情節是惡劣的。再次提請法庭注意，這是王和韓的原則的重要區別。”

“批二月逆流”問題，審判林江都不起訴，王是個學生，我不必要說了。王大賓是一個窮學生，一貫表現很好，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罪，而且覺悟較早，有痛改前非的表現，實踐證明，王從大學畢業分配後並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在彭總問題上早有痛悔表現，他很內疚，感到對不起彭總老人家，在公安機關審查期間，他如實交待了自己的問題，態度是誠懇的，是好的。因此，我們提請法庭，從輕處理。

檢察院周忠武發言：（先聲討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個組成部分。王大賓紅衛兵串聯到武漢，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體本來很

不好，有病在身，可是當他在重慶聯絡站接到叫揪彭的指示後，就放棄回家養病看望母親的打算，便積極行動帶領在重慶的學生於12月18日趕到成都參與揪彭。於12月27日將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認不諱。我們認為，王參與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們要區別罪責的大小和情節，我們同意律師的辯護意見：請法庭考慮，王是一個學生，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罪，請法庭酌情處理。

審判長宣佈：法庭辯論結束，被告有何陳述？

被告王答：尊敬的審判長、陪審員、檢察員和律師：

首先感謝您們在今天的法庭上，對起訴書對我指控的幾件事進行了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查證，對我一貫良好的表現的確認，周檢察員同意律師為我所進行的辯護並請法庭從輕處理的意見。我還要在此感謝在我收到起訴書之後，法庭的有關領導曾耐心、認真地聽了我長達二個多小時的傾訴和看法，我出生在一個大山區貧苦農家，是黨和毛主席使我母子翻身解放，從初中起就用助學金哺養我上學，把我培養教育成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黨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聽黨聽毛主席的話，是我家的宗旨，我知恩必報，信仰馬克思，崇拜毛主席，時刻準備著聽從黨和毛主席的召喚，為實現全人類解放，為共產主義偉大理想而獻身。我立志要成為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紅色地質專家，為祖國尋找豐富的礦藏。為反修防修，我必然回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積極投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初期，我犯了許多錯誤，有的錯誤是嚴重的，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很早我就深感內疚和痛悔。起訴書把我這個十六年前跟著黨中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犯錯誤的紅衛兵頭頭說成是反革命，把黨內路線鬥爭刑事化處理，是適用法律不當。對我的傾訴，法院有關領導和律師都耐心、認真地聽了我的意見。這個問題，我們不爭論，爭也無用，是上面的事。對我的問題的處理，在法院權力的範圍內，你們已經盡力了。我再次表示感謝。黨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已辜負了黨和人民的哺育，現在仍然聽黨的話，如何處理我的問題，我都服從。在有生之年，我要盡全力為黨為人民做一點有益的事，以彌補點在文革中我的過失。我的話完了。

審判長宣佈：休庭。

十多分鐘後又宣佈複庭。宣讀判決書後，宣佈審判結束。

十點過幾分結束全部審判。

法庭上沒有提供聶克、楊、馮等人的證詞。

（四） 陳雲說：

“怎麼祇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

1982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先後審判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

對已在看守所關押四年多的我，負責處理我的問題的湖北方面內查外調，正如前面所述吳德的說法：“材料就是當年的那些，沒有新的。”過往中央且已定我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現在又沒有找到新的證據罪行，實在不好對我定罪判刑。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廳七處周處長和負責我專案的徐科長對我說，他們剛從北京回來專門去為我事。他們對我說，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許多錯誤，有的錯誤是嚴重的，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和聶、蒯、韓不一樣，你安心等待結論，不用急。一直等不到。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專案人員，又通知我，他們到北京找中央彙報請示後，回到武漢告訴我：“對你的問題，有人說：怎麼祇判天派？地派也要判！”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陳雲。他們做我的工作，要我顧全大局，要我理解不能不對我也進行審判。他們還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且保證量刑時會區別對待的。

當時的我能說什麼呢？

這就是政治。

（編者注：上述史料引自《王大賓回忆录》一书）

四、揪彭德怀专题

彭德怀，一位功勋卓著、曾经的国防部长，共和国的元帅。却在文革期间，在中央文革的指令下，被地院东方红的红卫兵从四川揪到北京，并进行批斗。当时此事轰动了全国。这也是地院文革，乃至全国文革的一件重大事件。对此事，社会上众说纷纭，传说也是十分离奇……。作为地院东方红的当事者有责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说出历史的真相。

以下由当事人分二个部分来陈述：①揪彭德怀回京的具体行动过程；

②是谁下的决定和指示，让地院东方红去揪彭德怀。

第一部分：揪彭德怀回京的具体行动过程

一、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陈永迪

聂树人在《“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一文里说：“市场上，描述‘抓彭德怀’的具体过程有许多版本，却没有‘地质东方红’红卫兵的版本。据此可知，书市中关于‘抓彭德怀’的绘声绘色的文字会含有多少水分！”。

我作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抓彭德怀行动”的参与者，愿意提供这一“版本”中我所了解的内容。

◇ 王大宾遇到突然情况

当时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学生。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去到“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联络站设在市中

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文革前的重庆市政协办公楼）里。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很热情地招呼我。我和王都是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的四川老乡，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成都来，王大宾立即表示有要事和我谈。

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王大宾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问我：“听说彭德怀在成都，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有没有可能藏在军区大院？”我母亲在成都军区作军医，我们家就一直住军区大院。王大宾向我提出这样问题，当然因为彭德怀是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很自然会想到他在成都会住我所熟悉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成都军区机关已经开展‘四大’，大院内战斗队林立，抄家之风盛行。军区主要机关分布在北较场和西较场，还有一些直属单位分布在成都各地，这么大的范围要藏个把人不难。但是，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要安全保密地藏起来很难，除非军区领导对他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可是司令员黄新庭、政委郭林祥已经被批斗了，主要罪状是紧跟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保彭德怀这样的‘死老虎’，彭德怀如果还藏在军区大院，早就被机关的战斗队抓出来了。”

王大宾将我介绍的情况详细记录在本子上。还告诉我，说他10月下旬和十多位同学到外地串联，准备先到韶山和井冈山，然后沿红军长征的路线步行。可是他在火车上生病了，只好在武汉下车，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上大学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母亲知道他生病了，一定要他回老家德昌养病，于是他买了船票回四川。不想遇到这么一个突然情况，要他在四川抓彭德怀。

那么，彭德怀怎么到四川的？到底谁要把他揪回北京？

◇ 中央指示的由来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总指挥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本来彭德怀是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彭德怀于当年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在他行

前的11月10日，由毛泽东亲自布置江青组织炮制的影射彭德怀搞翻案的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此文后来被视为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一到成都就忙于工作的彭德怀是在12月4日才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自己一耳光（王春才《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但他不知道，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到这篇文章时又说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在前往贵州六盘水的路上，车到四川大足县被西南局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名义召回成都。传达会很快变成了批判会，会上，有人指责他“到处放毒”、“收买人心”、“小恩小惠”、“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翻案”等等。彭德怀说明、检讨，3次不能过关。继而，又追问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要彭德怀交代“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问题。会后，西南局书记处指示，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报告批彭的情况，并将这一简报在党内各级组织传达。（参见《彭德怀全传》电子版：五、梦断三线（8））李井泉的小报告一箭双雕：既证明他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又表示他已经和彭德怀划清了界限。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又对北航红旗的负责人韩爱晶说：“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他。要把他抓回北京，打倒在地。这是首长的指示，已经毛主席同意。”（参见《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香港书作坊2007年7月电子版）

当年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其所著的《王力反思录》中提到将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的，书中这样写道：“我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730页）

这就有了朱成昭接指示后给北地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的联络站打电话，传达

中央揪彭的指示的事。

◇ 王大宾决定暂不揪彭

王大宾到了重庆联络站才知道中央指示，于是决定：在渝的同学除办展览的留下，其余全部到成都集中。同时又通知在成都联络站的同学，抓紧时间了解彭德怀的下落，准备行动。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会议室。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新、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向王大宾详细汇报了几天来的进展。正在众人为寻找彭德怀而绞尽脑汁时，郑文卿巧遇彭德怀在街上看大字报。据郑文卿介绍：他和另外一位同学根据彭是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专门到三线建委办公地门外守候。守到天黑，看见一老一少从三线建委大院出来，年老的有点像彭德怀，于是紧随其后。这两位一路走一路看大字报，捡传单。因为天黑看不清人的面目，郑文卿跟得很近听到了老者的咳嗽声，由此判断老者感冒了，可能会到药店买药。于是他抢先来到附近的药店。这一老一少果然进来买药，郑文卿在灯光下清清楚楚辨认出这位咳嗽的老者就是彭德怀。

郑文卿回来一汇报，钱新、王大来等人很高兴，决定找彭谈话。第二天来到彭总住地，彭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总很希望与红卫兵交流。话题范围很广，从他当放牛娃开始谈到领导平江起义，再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师的过程，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历次重大战役的情况。话题的重点主要围绕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彭总反复强调他不反毛主席，说他和毛主席的争论是建设速度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毛主席的话不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我们注意到，彭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谈到文化大革命，彭说：他拥护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非常必要，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辨明是非，非常正确。他不怕群众，不怕红卫兵。此前，西南局保卫部的领导劝他到内江躲一躲，他坚决不去，他说，那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还说庐山会议后长期闲居在京郊吴家花园，盼望为人民作点事。谈话的气氛友好，我们的人还不断起身给彭总的杯子里掺水。谈到大串联，彭总对着地图给我们的人指长征串联的路应该怎样走，路上要注意什么事。谈话结束时，彭总把大家送到门口，并表示欢迎再

来。钱辛将谈话记录交给王大宾看，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下同），都说印象非常好。‘老头子’畅所欲言，对自己的功过认识很清楚，是个很直爽的人。

是否揪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反对揪彭占主流，王大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最早加入北地东方红的教师之一）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老头子’是革命功臣。刚到四川一年，表现很好。最重要的是‘老头子’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防止共产党脱离群众很有必要，中国有希望，过去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可以解决了……‘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不仅支持红卫兵而且理解红卫兵的过火行为。他还强调：你们要注意政策，要团结多数。”王大来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是老账了。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讲的是实际情况嘛，高指标、浮夸风就是不对，亩产万斤是吹牛，下面的人欺骗毛主席，‘老头子’讲的才是真话。在‘老头子’面前我们没有批判能力。”

听到这里，王大宾有感而发，他说：“1958年高一，我当班长带领全班同学种试验田，挖地3尺，积肥十万斤，誓要小麦亩产上万斤。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一亩地播了60斤种子，结果收了不到200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大哭一场。”

经过一番辩论，双方都认可由王大宾作最后决定。王大宾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办事。‘老头子’又没有什么新问题，他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红卫兵运动。可能党中央和毛主席还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又不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不忙去抓。”

会上决定暂不执行中央指示，派王大来、郑文卿立即飞回北京汇报，重点讲明彭德怀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点，东方红总部派“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飞到成都。胡乐成身着军大衣，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架势，一到会议室就开骂：“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他还传达周总理给朱成昭的三点指示：“一，为

了确保安全，彭德怀同志回北京不能坐飞机只能坐火车；二，要和成都军区一起护送，途中要确保安全，随时向中央报告；三，不要在成都开批斗大会。”

胡乐成自恃有尚方宝剑，对众人嗤之以鼻，也不把王大宾放在眼里。他宣布：“中央首长说：王大宾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被彭德怀征服了。”

胡的宣布使会场炸了锅，场面一时混乱。

王大宾站起来反驳：“我是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地院的老保也尊重我的人格，轮不到你来骂我们是饭桶。我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没有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没有执行的理由，这有什么错？你是钦差大臣，这事我不管了，你自己办好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去了。”

在场的师生大部分支持王大宾，对胡乐成的骄横极为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此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出面相劝，他说：“这是大事，千万不得有半点差错，万一出点什么事，你王大宾是没法向中央和总理交代的。”

刘老师的提醒使大家冷静下来，揪彭是中央的决定，不办不行。既然胡乐成是专门来办这个事的，就由他负总责，我们配合他安全地把彭总护送回北京。为了落实总理的三点指示，当时还决定由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立即去成都军区联系护送事宜；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和地院同学一起去成都铁路局联系回北京的专列。

下午，谭保华等人回话：成都军区已得到总理指示，决定由军区的一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院学生联系，成都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回北京。铁路局也同意：安排专列送彭回北京，地院的学生可以同车前往。王大宾准备事办完就回老家德昌养病。

◇ 揪彭中的波折

12月23日凌晨约3点。我正在睡梦中，感到有人在耳边喊：“快！起来！去抓彭德怀！”听说抓彭德怀，我像弹簧一样跳了起来，这时房间已灯火通明，旁边的几位同学也都兴奋地爬了起来。

天漆黑，寒风嗖嗖。一辆“嘎斯51”苏式卡车在路上疾驰，凭直觉判断车子正往城里开，不到20分钟停在了一条小胡同。我观察周围的建筑，很快认出这条街是永兴巷，永兴巷长不足200米，北东南西走向，街的西边可以看见位

于署袜街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栋由英国人建于1901年的很有特色的西式建筑，在一片低矮瓦房的胡同里鹤立鸡群。永兴巷7号是西南局三线建委办公的地方。

进永兴巷7号的大门往东大约30米还有一道小门，里面是占地约一亩的小院，大树的遮掩使小院显得很幽静。靠北有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只见小平房客厅的大门洞开，昏暗的灯光照着一个人的身影，走过去才发现那人正在用手绢擦眼泪。我猜是一位三线建委的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客厅里空空荡荡，客厅东侧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兼卧室，卧室里摆着一张普通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张部队营房里常见的硬板床，我特别注意墙角放着一只箱子。除了正在伤心啜泣的綦秘书，房里不见有其他人，我问他：

“彭德怀在哪里？”

“人已经被你们抓走了！”

“被谁抓走了！抓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道！”

我很吃惊，彭德怀被谁抓走了？除了我们北地东方红谁还会把他抓走？此前，彭德怀已被我们东方红的人盯上了，每天晚饭后他和警卫员景希珍准时出门，彭戴着大口罩，一边走一边看大字报，有时候还要伸手抢漫天飞舞的传单。行走的路线也很固定，从永兴巷到春熙路，沿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原路返回。可以说彭德怀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凭着御封的“左派”名声和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没有那个红卫兵组织敢向我们挑战。

就在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有消息灵通者报告：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了。

我们赶紧乘车向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进发，到了地院天已大亮。车开到一栋教学楼前，听说彭德怀就在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楼里挤满了人，大家都想看看大名鼎鼎的元帅。我好不容易挤到二楼楼梯口就再也无法前进了，楼道里乱哄哄的，人们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喊“揪出”“打倒”“炮轰”“火烧”之类的口号，实际上大多数人的心情是好奇，对彭德怀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下一步怎么办？把彭德怀关在寒冷的大教室显然不合适，北地东方红的人主张把他拉到地质局去，那里是我们的地盘。又听说王大宾、胡乐成正在和北航红旗的

人谈判……

不知什么时候嘈杂的楼道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说彭德怀出来了，我的视线扫过去，看见一间教室的门被打开，楼道里的人群开始向两边闪开，谭保华等人先从教室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紧跟其后的是彭德怀。此前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身着元帅服的照片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彭德怀是方脸，厚厚的嘴唇憨厚而耿直，下塌的眼角略带疲惫，身着黑色呢子大衣，个头没有我想像的高大，神情平静。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个年代常见的被红卫兵抓住时的惊恐状。我曾经见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红卫兵抓住时的情景，“李政委”（李井泉同时担任成都军区政委，他喜欢亲信称他“李政委”，就像蒋某人喜欢黄埔生称他为“校长”一样）满头白发，两眼通红，举步维艰，背驼成弯弓，下垂的双臂筛糠般抖动，脸上写满恐惧，往日的霸气早已飞到九霄云外，打小报告的精明也无影无踪。可这位为民请命心中无愧的彭大将军不一样，腰板挺直，面无惧色，气度不凡。他，毕竟是统帅过百万大军身经百战的元帅。

我们将彭总带到大楼外，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辆华沙牌轿车。轿车前有一辆宣传车开道、轿车后紧跟几辆装满人的卡车，浩浩荡荡向四川省地质局进发。车到成都地质学院大门时，遇到一小群不明身份的学生的阻拦，估计是北航红旗的支持者。他们人数太少势单力薄，抵不住我们的冲击，很快让出了通道。不久，队伍安全到达了地质局。

北航的韩爱晶低估了揪彭的难度，他只派出了区区五个人就想把彭德怀抓回北京。这五人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以为抓彭德怀很简单，五个对一个带上飞机了事。韩爱晶也不知道，同一项任务又派给了北地东方红，中央文革坐山观虎斗。相比较王大宾安排更周密，我们集中了北地东方红在四川的所有力量来完成抓彭任务。王大宾一面和北航的领头人谈判，一面又派人在成都地院寻找彭的下落。谭保华首先发现彭关在教室里，紧跟着我们的大部队就赶到，将该教学楼围了个水泄不通，北航的几个人那里守得住。只有将彭拱手交出。此时，王大宾和胡乐成与北航红旗的人正在另一个神秘的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有人悄悄地向他们报告大功告成：彭已被转移到地质局了。王、胡大喜，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人纠缠了，起身不辞而别。

彭德怀被我们转移到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这里曾是地质局某局长的

办公兼休息的套间。彭住里屋，学生住外屋，每间房的面积大约20平方。里屋有床和沙发，外屋的地上铺干稻草代床。四川的冬天潮湿而寒冷，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还专门给彭德怀住的屋子端来了火盆。考虑到彭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不能吃大锅饭，专门给他开小灶。彭德怀到地质局机关后，成都军区就派部队守卫，一般人是不能进办公楼的。

◇ 元帅和红卫兵坦诚交谈

12月24日上午，我挤进了那间办公室的外屋。大家席地而坐，围着彭德怀向他提各种问题，气氛轻松，没有什么人跳出来采取“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问他多大年纪，彭德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今年楼拾八，比李井泉大十一岁。”（湖南音将6念成“楼”，彭德怀1898年生。）

有人问他怕不怕红卫兵，彭德怀说：“我不怕红卫兵，我愿意和红卫兵交朋友。”那个年代的当权派没有不怕红卫兵的，红卫兵被视为洪水猛兽，彭德怀不怕。

他接着说：“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闹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你们也有缺点，不注意团结人，打击面过宽。当年在井冈山的红军也犯过打击面过宽的错误，红军曾经把中农当作革命的对象，烧过他们的房子。”

我愕然，这可是第一次听说。井冈山是我们心中的革命圣地，红军一贯纪律严明，居然还烧中农的房子！

还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上街看大字报、捡传单。

他说：“‘五·一六通知’后，西南局停了我的文件阅读权，只有从街上的大字报和传单中了解运动情况。”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分析街头信息的深度，虽然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但能准确地指出运动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

说到文革，话匣子打开，有同学说：“我们的邻居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经不起工作队的批斗跳楼了。地院同学怕我们院长高元贵出事，不少同学给他鼓劲：地院的大多数师生都是信任你的，千万不要出钢铁学院高芸生的事……”彭德怀听了说：“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其中一条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的，要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当有同学说到地院党委副书记周某某生活作风不正派，搞婚外恋，文革开始

后，这些事揭发出来，大家叫他“周八戒”。彭总听了后尖锐地批评了某些干部的恶劣作风。话题又扯到“猪八戒”身上，彭德怀说：“‘猪八戒’是天蓬元帅，还有点本事，除妖降魔是有功的，缺点嘛，好色！一见漂亮的妖精就迈不开步了。在信仰上不坚定，一遇到困难就发牢骚，想分东西回他老婆的高老庄，还有点小私心，大耳朵里攒私房钱……”彭总幽默风趣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王大宾和他说得最多，王大宾的老家在攀枝花铁矿的附近，彭德怀去视察过攀西地区，对那里的发展很感兴趣。

当探工系的同学说到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击一大片，以高元贵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为由罢了他的官，长工出身的院党常委、保卫处长李贵去中南海上书，6月20日学生在学院内游行支持李贵，彭总插话：“看来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大老粗。”

我们也向彭德怀提庐山会议的事，他只是反复强调他不反对毛主席。他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100%正确，也是99%是正确的。”

现在看来，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回答这样高度敏感的问题确有难度，他不愿意重复自己的观点，这会遭到红卫兵的反击；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因为他没错。只有一条可以强调，写那封给他带来灾难的信的初衷不是反对毛主席。

后来，有人又问朝鲜战争的事，听说他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平等对待金日成。彭德怀说：“志愿军和金日成的关系很好，完全平等，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双方也有些分歧，例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掌握在谁手里，金日成主张火车一过鸭绿江调度权归朝鲜，我们主张过了鸭绿江也要归志愿军统一调度，分段调度会贻误战机，给志愿军的补给造成困难。”后来金日成也同意了彭的意见。实际上，我听了彭的解释就觉得有道理，这是战争的规律决定的，那里是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嘛。

彭德怀还说：“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三个多月，非常疲惫。后勤补给很困难，前线战士吃不上饭，伤员送不下来，弹药接济不上，急需休整。我请示毛主席要求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同意。但是，金日成和苏联顾问非常不满。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的，他们主张趁热打铁。我坚决不同意。后来，毛主席提出志愿军守在汉江以北，金日成带他的部队打到南方去。”金日成也不是傻瓜，孤军深入的事干不得，最后被迫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很遗憾当时没有详细记录，由于年代久远，他还讲过很多话都记不清了。我们还向他提过一些有关军内各山头派系的问题，就这样漫无边际地闲谈，突出的印象是：彭德怀的记忆力极好。近七十岁的老人对往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

彭德怀生活朴素作风廉洁是有名的。1959年庐山会议将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材料外，拿着显微镜也找不到腐化堕落的事，于是给他扣了一顶帽子——“伪君子”。对他的生活习惯我们也充满好奇，当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在地质局机关食堂遇到一个穿便服的人，见他端了一碗清汤面正往办公楼走，他说彭总胃不好，平常就吃碗面条，生活很简单，彭德怀生活艰苦朴素的美名果然名不虚传。

◇ 揪彭专列进京

回北京的专列定于12月25日下午从成都火车站出发。专列是挂在去北京的34次快车尾部的一节软卧，供彭德怀和护送的部队乘坐，软卧前面又挂了两节车厢供地院师生乘坐。为了确保安全，出发前谭保华去火车站派出所，称：有首长去北京，请准时打开首长专用通道。首长的车到时按三声喇叭，请派出所所长亲自打开大门。

考虑到车过秦岭气温骤降，开车前谭保华还专门试了暖气，发现暖气管没有接通，立即要求铁路局派工人修复才出发。

成都军区用专车，在带队的谷参谋长和一个排战士的护送下，直接将彭总送进专列车厢。

有一个人不想上车，他，就是王大宾。我听见他给军区带队的谷参谋长说：“彭总就交给你了，你保护他回京，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回家看老母亲。”谷参谋长坚持要王大宾一同回京，说：“总理知道你在成都，我们还是一起护送彭总回北京，地院的学生都听你的。”谷参谋长已经知道胡乐成骂王大宾右倾的事，怕没有王大宾在路上管不住那帮人。王大宾心里明白，真要出个什么事，他也不好向总理交代，于是在谷参谋长的再三劝说下，很不情愿地上了专列。

那时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联。我也很想挤进专列，虽然红卫兵坐车不要钱，但是坐专列的滋味一定更好。可惜车厢里人满为患，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

进去，坐专列的美梦只好作罢。

后来，王大宾告诉我一路上护送彭总回北京的情况：火车走了两天两夜，一路上学生们对彭总很照顾，只要路过大站就有人下车去给彭总买好吃的，北地东方红到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乘这趟车回京，他们主动提出给彭总表演节目，大家和彭总在车上相处和谐。

1 2月27日下午5点专列到北京站。此时，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已经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个卫戍区的大信封，上面写着：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王大宾打开信给谷看：“奉总理指示，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谷和王按照总理指示，正要把彭德怀交给卫戍区时，朱成昭赶到站台，不同意将彭交卫戍区，要将彭带到地院。谷和王坚持要按总理指示办，朱看了总理的指示说：李钟奇的“钟”字写成了“中”，双方争执不下。李和朱都向上面打了电话，后来戚本禹决定：为了不影响北京站的正常运行，火车开到西直门火车站。北地的几辆大客车接学生回校，小轿车送彭到北地。到地院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大食堂给彭总作了一碗鸡蛋面，在北地办公楼的一个套间（外面有沙发，里面有床铺）安排彭总休息。过了3个小时，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把彭总接走。

27日晚回到地院后，王大宾见了朱成昭很不高兴。王大宾叫钱新当面将成都带来的一个皮箱和清单交给朱成昭，里面有彭总写给中央的申诉信，要求他转交中央。

◇ 朱成昭与王大宾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与工程地质系三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朱的父亲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是他父亲的战友，时任上海市建工总局局长。此人性格刚烈，吃软不吃硬。在揪彭问题上开始很强硬，王大宾在成都决定暂不揪彭并打电话通知他时，他在电话里把王大宾大大地指责了一番，随后，派出钦差大臣胡乐成强行揪彭。在北京站和李钟奇对着干，不把彭带回地院誓不罢休。王大宾把彭总的申诉材料交给他请他转交中央，他看了材料后的第三天，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他向王大宾表示：你是对的！显然是彭总的材料改变了他。

其实，1966年底，文革正在如火如荼的燃烧时，朱成昭的态度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他们私下里议论中央文革极左，对打倒老干部不满。后来，发展成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八大观点。江青和戚本禹曾警告他，要他“悬崖勒马”。可是他绝不认错，朱和叶向真双双跑到广州，准备从香港出国。1967年3月4日北地东方红的一把手换成王大宾。朱成昭后来被抓进监狱关到文革结束。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五年级学生，当时是北地东方红二把手。王大宾性格温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各派人马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在揪彭过程中，他主持正义反对揪彭。1966年12月27日把彭总接到地院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彭总，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批斗彭总的策划或活动。1970年全国清查“516”时，王大宾成了“516”分子，其中一条罪状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1981年，王大宾作被审，其中的第一条罪状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真是欲加之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67年4月2日，王大宾担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他已经对文革表示出厌倦，多次向北京市革委会打报告，表示担任北地革委会主任室是服从上级的安排，条件是不影响他的毕业分配，他愿意分配到大西南或大西北的广阔天地从事地质工作。

朱成昭已经去世。王大宾健在，王大宾创办的都江堰市探矿机械厂生产红火，他已经把厂交给儿子，自己安度晚年。

◇ 批斗会上再见彭总

再见到彭总已是半年后。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央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立即掀起对刘少奇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动员会”，同时下发了有关中央文件，点了刘少奇等人的名。彭德怀自然又成了“刘少奇一小撮”。

7月18日，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聂树人到小汤山医院看望王大宾。聂向王大宾传达了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革委会的电话指示：“你们地院要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队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天地两派要联合。”聂树人还说：“有关批判材

料，中央文革已派人送到地院。看了材料后，革委会常委和政治部、东方红报的人都反映强烈，有人公开说彭德怀被整是冤枉的，地院这么多人同情彭，怎么批？”

王大宾的意见是：“只能应付一下。去年12月我就反对揪彭，这次再不参与，中央文革会老账新账一起算。你们商量怎样应付，不要叫人抓住把柄。”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比天气更热的是人们的头脑，武斗像瘟疫已传遍全国。此时在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〇”事件。已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7月25日，地院大字报区的墙上贴出一张海报：7月26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大操场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张闻天”。

7月26日下午，我怀着再见彭总的心情来到北航。

北航的操场人头攒动，打着红旗的各路人马在飞扬的尘土中鱼贯而入，操场的草坪已被踏成癞子的脑袋。记不清几点批斗大会开场了，只听喇叭里传出一声高喊：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张闻天揪出来！这时，人群像潮水般向主席台涌去，我被裹挟其中随波逐流。终于，被挤到主席台前，可以清楚地看见被批斗者的面目了。彭和张挂着牌子，各被两名大汉架成“喷气式”，彭头上仅剩的几根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下垂的脸皮布满老年斑，神情委顿，与在成都初次见面相比判若两人。7月18日，在北航召开过批彭小会，会上彭德怀已遭到毒打，肋骨被打断。此后，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必被打。在打人者长长的队伍中还有一位显赫的将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李钟奇受周恩来之命护送彭德怀到批斗会场，本应维护彭德怀的安全。周总理智者千虑却有一失，他没有想到李钟奇是假公济私的小人。1958年中央召开军委扩大会批“教条主义”，军委训练总监部被批为“教条主义大本营”（1958年军委扩大会前，军委下属五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叶剑英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李钟奇是该部下属的计划与监察部副部长，他在会上遭到彭德怀痛批，会后被贬。李钟奇将军记得古训：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到十年，彭德怀终于落入李钟奇手中了，这千载难逢的报复机遇哪有不用之理。

批斗会在密锣紧鼓地进行，发言者个个慷慨激昂。押在台上的老人已风烛残年，他，曾经是统帅百万大军的元帅，被伟大领袖诗赞：“谁敢横枪勒马”的彭大将军。心中的反差如此强烈，台上的激愤已引不起我的共鸣……我悄悄地退出

会场，那闪着银光的白发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几天后，在地院的大字报区遇见王大宾，他告诉我，聂树人已向他汇报了7月26日批斗彭德怀的情况。聂树人说：他妈的！北航学生把彭德怀打成重伤了，违背了中央文革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地院革委会为了应付，只从物探系分会派了少部分学生去会场，我们地院革委会，各系分会的头头都没有去。

王大宾还说：打伤彭总这么严重的事，我要聂树人立即向中央和总理报告，太没有人性了，批判就批判，为什么打人。

几十年后的反思

我们为什么被彭德怀征服？

1959年“反右倾”时，我还是一名中学生，只听说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诽谤大跃进”，攻击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文革中读到了信的原文，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他不就是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嘛，这和我及周围人的经历相符。1958年我读高一，那年月晚上炼钢，白天睡觉，课是不上的。把凡是沾铁的东西，什么锅啊、铲哪、剪刀菜刀之类全往炉子里扔，炼出一堆废铁坨坨，然后敲锣打鼓去报喜。事后曾想，好好的东西把它烧成废铁，这玩意儿有啥用？唯一的功劳大概是在实现1070万吨钢的账本上再加一笔数字（1958年毛提出，当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钢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被点醒了。

在毛和彭之间，我们的理念和现实开始打架。理念上我们拥护毛主席，现实中我们同情彭德怀。那年月我们都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是正确的。因此就应该恨彭德怀。可是真见到彭德怀，了解到他的思想，却不仅不恨，反而被他征服了。彭总是埋在沙土中的金子，拨开沙土会发现它闪闪发光。我们被真理的光芒征服了。

我们大多数同学对彭总是尊重和爱护的，这也得到彭总身边人的认可。1967年5月的一天，我和谭保华在成都军区北校场。路见一位军人，瘦高的个头，挺拔的身板，显然是向我们走来。当他快走到我们面前时，突然立正向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正感到惊奇时，一双热情的手已经伸过来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感激。这个向谭保华敬礼的威武的军人就是我在五个月前四川地质局食堂见过的那位给彭总送清汤面的人，谭保华告诉我：他是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

彭德怀为什么支持文革和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高当局为了发动群众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有选择有导向地揭露黑暗面，社会上出现了短暂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氛围，表面上群众可以“自由”发言了。当年，由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四川大量揭露李井泉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中的劣迹，李井泉的作为已经不是彭德怀在当年那封信中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狂热”了，而是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59年后彭总被边缘化，有话不能讲，有理没法说。现在，红卫兵事实上站在彭总一边说了他想说的话，讲了他想讲的理，因此，他支持红卫兵运动。彭总一生追求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的幸福奋斗终身的誓言，他痛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揭露了大量过去不可能揭露的贪官污吏的罪行，只有揭露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相信文革有涤荡污泥浊水的能力，文革会使我们的干部队伍更纯洁，所以他认为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甚至误认为中国从此有希望了。

可惜，1974年，彭德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辞世远行了。

（编者注：此文曾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八期。在此该文略有补充）

二、谭保华：北京地院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谭保华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蓉联络站的负责人钱新、陈银根说：“院总部王大宾、杨雨忠指示，中央文革让我们把彭德怀抓到北京去。王大来也从南充回到成都。抓彭一事由王大来主持进行。他安排郑文卿、张华清等人拿着彭的照片去探彭的住址。郑在大街上巧遇彭在看大字报，就尾随记住了他的住址。王大来、钱新、张华清、郑文卿、陈宝堂等人去他家与彭说了

三次话。住蓉联络站设在四川省地质局里。在联络站的会上，王大来说：彭讲：“毛主席的话不能说 100%正确，也是 99%是正确的。”说明彭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不忙去抓”，先向中央文革汇报请示一下再说。钱新等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于是，王大来迅速飞回北京向总部和中央文革汇报。据说受到了中央文革（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 99%是正确的，就是说有 1%是不正确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王大来急忙返回蓉城。胡乐成也为此事坐飞机自京赶来。王大宾也从武汉赶至蓉城。在联络站会上，王大宾说：“周总理指示，为了保证彭德怀的绝对安全，只能坐火车回京，不准坐飞机。”据了解，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派了五个人来蓉，打算抓了彭坐飞机回京。所以，会上决定：第二天中午去抓。由王大来、陈宝堂等坐川地（四川省地质局）派的汽车去彭的住处。但去晚了，彭刚被北航红旗的人和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的人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闻讯后，钱新立即与谭保华商量，带领联络站的蒋光宇、孙信诚、翟裕生、崔清和、张洪彬、吴冲龙、张世和、陆庆生、蒋牧歌、龚千生、陈锡义等人，以及川地的许彬、缪玉昆等人，召集了北地东方红在蓉人员及川地《红色造反团》的人员大约五、六十人坐川地的宣传车、及华沙牌小卧车及《红色堡垒》宣传车赶往成都地质学院。下了车，大家就分头打探搜寻他们可能藏押彭德怀的地点。很快，就找到了成地《解大》占领的一座教学楼，一层楼道里用砖砌了工事，连楼梯口都封了。我们一窝蜂冲了进去，正好是中午吃饭时节，楼内没有什么人。我们在二层一间大教室里竟然见到了没人看守的彭德怀！教室里有几张宽大的长条形实验桌，彭站在桌边，戴着黑色呢料制服帽，平静地看着我们的举动！谭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彭总”，并说：“我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奉中央文革的指示，请您到北京去一趟。”彭说：“去哪儿都行”。他的目光深邃，穿过北面窗户遥望天边，他身高不会超过一米七，嘴唇紧闭着，下唇向前努得更长些，他老了，但元帅的威风不减当年。他随身只带了一个长约五十公分的黑色人造革双耳手提旅行包。我们怕成地的杭卫兵来，就赶紧请彭总下楼上了川地的华沙车。连同宣传车，立即向院门冲去。在院门附近被成地的红卫兵阻止，双方僵持，推拉叫嚷，差点了武斗。因为我们人多，强行冲出院门，赶往川地。

到了川地，把主楼封住，请彭总住在左翼三层，十二月天冷了，派人给彭总端来了火盆。从一层楼门就派人把住，左翼楼梯不准通行，严禁任何人打扰彭总。派川地的人专门伺候彭总的食宿。

王大宾、钱新等召集联络站的人商议如何联系火车等问题，决定：由谭保华与成都军区联系，请军区出面安排火车及安保事宜。谭找了军区，作战部长汤野接见了，细致地考虑了安保事项。彭在川地住了两天。

经过军区首长的安排，十二月二十五日傍晚，安排在一列去北京的快车尾部单挂一节软卧，送彭德怀去北京。并商定：川地用华沙车送彭总到火车站派出所大门，按三声喇叭，所长亲自开大门，汽车直接开上站台。站内北地东方红红卫兵排成人墙，护送彭总直接进入软卧，对派出所只说有首长乘车，仍然保密。

傍晚四五点时，谭去车站察看现场，列车已停在站台旁，他跑步在站台旁人行树下撞了一个人，一看，竟是汤野部长，他亲自在现场监察安保情况。由此，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首长和广大红卫兵对彭德怀元帅的尊崇可见一斑！汤部长指示：一切安排就绪，可以送彭进站了。谭立即返回川地，坐许彬开的奔驰车开道，彭总坐的顾师傅开的华沙车在后，按计划开往车站派出所大门，按了喇叭，大门敞开，所长立正敬礼，车直接开到软卧附近。现场王大宾、钱新等人指挥红卫兵架起彭总，在人墙中脚不沾地就上了软卧。王大宾、钱新等率七、八十红卫兵坐包厢护送彭总进京。

开车前试了一下暖气，软卧的暖气管没接上。考虑到三十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坚决要求车站派水暖工接好了暖气管才发车。临行前，钱新委托谭保华整合在蓉人员。此后，在蓉人员开了联席会议，推举谭保华担任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负责人。

彭走后，他的秘书纂魁兵把他的两只手枪托谭保华和蒋光宇保管。（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银色的据说是捷克送的礼品枪，很小，手大的话，握在手里别人看不见。）没处藏，只好放在沙发的坐垫缝里。二月下旬，纂魁兵专程从北京来蓉取走了两支手枪。彭的材料装在大地质背包里，由张华清、刘文德（？）二人提前坐火车运回北地。钱新和吕文正曾对谭保华说过：“中央文革偏袒北航《红旗》，彭是我们抓的，却不让我们斗。彭的材料交给红旗杂志了，再也看不到了。”

曾有文章说，抓彭过程中红卫兵曾对彭百般刁难虐待，显然并不是事实。

彭德怀元帅从此走上不归路。这是北地东方红红卫兵始料未及的。本以为是执行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却不知做了助纣为虐的蠢事,在文革中,这种被人当枪使的情况并不鲜见。

这件抓彭公案的真相是中央文革导演,红卫兵执行的情况却是不争的史实。

二〇〇九年七月七日 于北京

编者按:

谭保华 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1612班)

三、闫长贵、王大宾：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闫长贵 王大宾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

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

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错误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为胡说话。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

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 12 月 23 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 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人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这是 1966 年 12 月 23 日发生的波折，只好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 月 25 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高级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 1959 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 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 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

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一股同情彭总的情绪蔓延开来。大概1967年1月初，王大宾主持一次在李贵家的秘密会议，有十多个骨干参加，由王二来等向老干部李贵汇报了“揪彭”回京的经过和他们的态度。李贵公开表示，彭总革命斗争几十年，是革命的功臣、元勋，事实证明庐山会议整他是错误的，现在还要揪他，你们不同意揪是对的。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教育楼召开了掀起批判刘少奇等走资派高潮的动员会。地院李贵、聂树人、高元贵、王焕参加。7月16日，王大宾

主持召开地院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传达 15 日会议精神，大家认为，批判中央的走资派和地质部的走资派，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不去管，我们只管我们院内的事，搞教育革命。没有研究批判谁。会后，王大宾就离校去小汤山医院了。

7 月 21 日下午，聂树人等人到医院看王大宾，说：昨天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传达中央指示：“你们地院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事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要人。有关批彭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当日下午，中央文革就送来了批彭材料，包括万言书。对这件事师生反应强烈。有些人看了万言书，普遍认为庐山会议上彭总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被批判是冤枉的。王大宾说，师生的这种情绪和言论千万别向上面汇报，也不要追究，不然，中央文革查下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就非常被动。要批彭总，让北航自己去干，别拉我们地院。常委会研究过了，不听中央文革指示又不行，你说怎么办？王大宾说，只有采取应付态度应付一下。聂说，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也是这样，应付应付，和你的意见相同。革委会的常委一个也不去参加。

武汉“七二〇事件”（即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件）刚刚发生，北京示威游行，高呼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要“揪军内一小撮”。地院许多学生也坐不住了，都想往外跑，无法复课闹革命。7 月 24 日，革委会接王大宾回地院，他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扣发助学金等处罚办法，不准外出。7 月 25 日，在天安门召开了声讨陈再道的百万人大会，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只有毛主席未出席（笔者按：当时他不在北京），王大宾参加了大会，回来又传达了中央文革不准外出的指示。26 日他又去小汤山医院。

7 月 27 日上午，聂树人等人又急急忙忙到医院，非常气愤地和王大宾说：“他妈的，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开批斗彭总大会，把彭总打伤了，大热天，水也不让彭总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们也下得了手！他们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还拉来张闻天陪斗……”又说，事前没有与我们商量，开会前一天才给我们发邀请，为应付，我们只由物探系的几个班的学生打着旗子去了会场，学校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没有一人参加。

顺便说一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对他们学校批斗彭总，动手打彭总，把彭总打伤，深感内疚。“文革”后，韩爱晶曾说“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后被判15年徒刑）。他解释说：“我和别人不同啊，我是头头，我一动手，别人就跟着动手了，没轻没重，就把彭总打伤了，打成了重伤，我被判刑，罪有应得。”他认识到，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要总结和吸取沉痛教训！

彭总确实是由地质学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对彭总等人确实一次也没批斗过。

彭德怀传记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有好多学校和单位批斗彭德怀，唯独没有讲到把彭总“揪”回北京的地院——这也是地院师生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明证。

彭总1974年去世时，年仅76岁。如果不是“文革”中受到的打击和摧残，行伍出身、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其寿限也许不止此数。

1967年元旦，彭德怀致信毛主席，说：“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见《彭德怀全传》）

彭总这封信撕心裂肺，但未能减轻他的厄运。

“揪彭”事件，王大宾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怀被平反后，王大宾又因当年“揪彭”回京之罪被处刑罚。

其实，在揪、斗彭总问题上，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却没有这一条。这是为什么？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

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 1996 年版）这样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戚本禹辩护，但没有说到事情的源头。事实是，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根据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的。周总理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的手令是“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可见当时的境况。

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原载《同舟共进》2014 年第七期）

第二部分：是谁下的决定和指示，让地院东方红去揪彭德怀

一、戚本禹的回忆：

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戚本禹回忆录》中对此事叙述如下。

批斗彭德怀

戚本禹

文革的时候，彭德怀是在四川搞大三线的建设。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斗得挺厉害，彭德怀支持田家英批判李井泉，李井泉恨透了彭德怀。所以彭德怀到了四川之后，他对彭德怀看得很紧，把他的一举一动不断向中央汇报。我接到了一个西南局写来的报告，就两张纸，很简单。上面说彭德怀现在在四川很自在，到处去看大字报，并对自己的问题进行翻案。当他看到批判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就笑。说，你们现在才知道反刘少奇啊，我早在 1959 年

就反对他了，你们还斗我呢。于是，我就和关锋一起写了一个报告，说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我记得，1966年12月13日，在由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讨论彭德怀这个问题。江青在会上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彭德怀却在哪儿幸灾乐祸，优哉游哉的。她提出要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来进行批判。在讨论中，包括总理在内，大家都同意江青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彭德怀调回北京来。但是怎么把他带来北京？开始想用解放军去把他带回来。总理说，让部队去带不妥，还是由群众去带比较好。王力、关锋说，那就让红卫兵去带。就这样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让红卫兵代表群众把彭德怀带回北京。总理还说，不能坐飞机，因为飞机不安全容易出事，出了事说不清楚了。有人说，现在火车很紧张，又很乱。总理说，搞个专列车厢，他去跟卫戍区傅崇碧说。然后总理就叫我去与红卫兵联系。我问总理，带回来以后怎么办？总理说，带回来就跟我说，下面的事我来安排。

在中央文革开会作出了决定以后，14日上午，我就叫闫长贵通知朱成昭去办这件事。朱成昭提出叫当时正在四川串联的师生和王大宾主办这件事。我知道王大宾这个人做事比较稳重，不会瞎来，就同意了。王大宾到成都后不久，有人向我汇报说，彭德怀把地质学院的人给说服了，说得变成同情他了。我一听不对，批评了地质学院的人，同时又赶紧找人通知韩爱晶，说地质学院对彭德怀的事不积极，拖拖拉拉，让他去接着办这件事。韩爱晶对这个事很积极，二话没说就坚决去办了。我对韩爱晶说，如果他们不肯把彭德怀带回来，那你们去把他带回来。但最后还是王大宾他们把彭德怀带回来的。彭德怀对王大宾说，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刘少奇了。你们说我反毛主席，我不是。我是反刘少奇。王大宾很相信彭德怀的话，认为彭德怀案搞错了，彭德怀时拥毛反刘的。这些都是王大宾跟我说的。王大宾这个人是比较诚实的，我相信他不会说瞎话。

王大宾把彭德怀带到北京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海瑞”带到了，我问在路上安全吗？他说我们连一根头发都没碰他。我说，好，你们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谢谢你们。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快报组”的记者也跟我打电话告知彭德怀带到了。当时，刚好中央文革在开会，总理、陈伯达、江青都在，我报告说红卫兵已经把彭德怀带回来了，等候指示，看送哪儿去？总理马上说：好，行了，这个事情由我来安排，你别管了。他就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卫戍区找

傅崇碧。我在他后面，听到总理在电话嘱咐说，吃住都要有保证，被子要多送几床，别冻着了。总理又在电话里说，彭德怀住哪儿，要保密，不准说。不准随便拿去斗，凡是要斗，都得经过我批准。也不准到他的住处去围攻。彭德怀的身体情况、思想情况都要随时向我报告。总理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才放下电话。

在1967年的7月，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联合开大会斗争了彭德怀。在斗争大会前，北航红旗在韩爱晶的主持下，先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要彭德怀交代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彭德怀不承认。韩爱晶冲动之下，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一个耳光。文革结束后韩爱晶为了这一耳光也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2016年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527—529页）

二、王力的回忆：

当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其《王力反思录》中，对揪彭德怀事件有如下叙述。

《王力反思录》一书对此事的回忆：“我（王力）从秦城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地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作的决定。我说，中央开会我都参加的，这个会我没参加。大概不是中央的会，是专案组的会。他们说，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的决定？他们说是的。”根据《戚本禹回忆录》（香港2016年4月出版）一书证实：揪彭德怀是中央的决定。

三、闫长贵的回忆：

当年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员闫长贵对此事的回忆。

**戚本禹派我找地质学院东方红朱成昭，
让他们到成都揪彭德怀**

闫长贵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他（指戚本禹—编者注）叫我到

他办公室，气匆匆地（仿佛刚从什么地方回来，很可能是刚刚从江青那里回来，我没问）跟我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我当时也没多想什么，他让我也去，就去吧；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我本人的觉悟和认识，我也不会提出什么——我所想的，倒是戚本禹交代任务，我一定好好去完成。可能就是在戚本禹跟我谈话的当天下午，我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我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我去不了，可以派我们的王大宾带几个人，他很能干，一定能完成任务。”就这样谈定后，我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他没说什么。几天后，戚本禹收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份材料，其大意是：他们到成都和彭德怀谈了五六小时，彭比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历史，说他不反对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因而对要不要揪彭发生了疑问。就这件事，戚本禹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戚本禹一方面批评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当了，受骗了，同时又直接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的头头韩爱晶打电话，让他派人去就彭总。而这也就是后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两个学校红卫兵互相争揪彭总以及联合批斗彭总种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所在。

（摘自 闫长贵 王广宇 《问史求信集》 红旗出版社

2013年1月第三次印刷 第228-229页）

五、朱成昭专题——朱成昭八大观点

编者按：

(1) 朱成昭，上海人，1962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地院文革期间，1966年7月27日，朱成昭以“爆破战斗队”名义率先给工作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在校园内引起了轰动。大字报的观点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从而使得朱成昭等人获得了巨大的威望，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院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之后，朱又率先组织了跨班级、年级、系的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再之后，在人员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1966年8月17日，以朱成昭为首发起成立了地院全院联合统一的组织——“东方红公社”。由此朱成昭成为了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第一把手、总负责人。

(2) 朱成昭是地院东方红四进地质部行动的组织策划人；是成立首都三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奉旨揪彭德怀行动的总指挥人……。朱成昭在地院文革初期的行动和理念是受到毛主席女儿肖力的赞赏和大力支持的。正因为如此，地院东方红成为了中央文革培育的学生文革运动样板单位之一。

(3) 正是由于朱成昭奉旨组织了揪彭德怀行动，并有机会认识了彭德怀，并认真阅读了彭德怀致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万言书”，从而开始同情和支持彭德怀的一些政治观点。加上他在1966年9月开始认识了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叶向真之后，逐渐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表现的是对当时的文革运动形势和发展前途提出了他的担忧。

这在当时的学生领袖中是十分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应该看到，朱成昭是一位有独立思考、独立思想的学生领袖，可惜他在文革年代只参与了近一年时间，就退出政治舞台。

朱的这些担忧被中央文革知道后，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王广宇奉命向朱成昭当面宣读了陈伯达给朱成昭的信。1967年3月5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召集地院东方红内部不同意见派别的代表开会时，戚本禹在会后又专门个别再次听取了朱成昭、蒋良朴的意见，时间长达二个多小时。戚本禹最后对朱成昭说：“你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不都是错的，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东方红的功绩不能否定的，你有功绩也是不能否定的。小将犯错误，认识改正了就好，你要好好闭门思过，认识检讨错误。”（详见《王大宾回忆录》）

(4) 朱成昭对当时文革运动形势和发展前途提出的担忧，就是他在 1967 年 2 月 4 日向全体东方红战士做检查的发言中谈的“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个问题的看法”。后来被批判的“反动的八大观点”。(这八大观点是 1, 大串联搞早了; 2, 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 3, 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 4, 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 5, 对“联动”抓人太多; 6, 关于坐牢问题, 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 聂元梓问题; 8, 关于炮打康生和高级党校问题)(详见张华府回忆录、本专题中引述的史料及朱的检查)

(5) 1967 年 7 月 10 日, 朱成昭和叶向真等人去了广州, 后被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他们带回北京, 接受隔离审查。1967 年 11 月 2 日叶向真和朱成昭等人正式被公安部宣布逮捕, 成为叶朱反革命集团专案。

1970 年叶向真被释放。1975 年朱成昭等人也被释放。1980 年 6 月该案彻底平反, 成为中央文革炮制的文革中学生当中最大的冤假错案。涉案人员高达 150 多人。

(6) 1985 年朱成昭被分配到江苏省水文地质队工作。1990 年朱成昭在上海办公司, 从事工程施工工作, 但最终失败。1998 年在朋友的帮助下, 住在北京十三陵的一乡间寓所, 拟专心著述文革回忆录, 但不幸于 1998 年 9 月 25 日, 因心肌梗塞, 猝然去世, 年仅 57 岁。(详见《王大宾回忆录》)

(7) 站在今天的政治视角, 重新审视“叶朱反革命集团专案”, 仅凭朱成昭的“反动的八大观点”是不足以判成“反革命罪行”的, 从该案涉及的人员及人数来看, 该案一定有不被我们知晓的内幕, 其复杂性、神秘性, 毫无疑问给中国政坛投下了一颗巨大的震撼弹, 朱成昭等人最后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8) 有关朱成昭及“叶朱反革命集团”更多的资料, 在张华府、梅建明等同学的回忆录中已有详细叙述, 此处不再重复。下面把有关朱成昭专题的重点史料、回忆录、当年批判朱成昭的文章, 朱的检讨和交代材料一一列出。

(一) 梅建明和张华府对“叶朱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回忆:

据梅建明回忆:(详见本书第二篇的“梅建明的回忆录”)

据梅建明所知, 抓叶向真时, “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 当时处境困

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6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1968年3月17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的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

据张华府回忆：（详见本书第二篇“张华府回忆录”）

在这个叫“叶朱反革命集团”的案子中，叶家被抓的人最多，除了叶向真，还有叶选平、叶选宁、叶楚梅和邹家华。另外还有两个家庭，王白莎全家，她的父母都抓进去了。王北宁全家，她的父母也都被抓进去了。小梅的全家，他的父亲也被抓进监狱，关在秦城。他的母亲也被抓了，两个哥哥都进了牛棚，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受尽了迫害。“叶朱反革命集团”全案牵连的人达150多人。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叶向真就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不久还公派到美国留学去了。

本来我们这个案子，中组部原来准备作为学生冤假错案的典型公开见报的，准备公开平反。报上去后，到了叶剑英那里后，叶剑英却不同意见报。此案，叶家人受牵连太多，叶剑英不想他们家成为全国议论的焦点，他不同意见报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叶剑英当时位高权重，中组部考虑到叶帅的态度，决定降低这个案子平反的规格，把案子转交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处理了。

我们的案子终于在1980年的下半年获得平反。虽然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留尾巴，虽然是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工作，但我们吃的苦，遭的罪，亲人的担心，家人受的连累，能补回来吗？特别是，由于这个案子没有公开见报，大批受

此案牵连的“东方红”战士并不知情，他们还在本单位受歧视受迫害，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二）王大宾对“叶朱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回忆：

朱成昭與葉向真的不同人生命運

被中央文革安排“閉門思過”的朱成昭，當年既未“閉門”，亦未“思過”，而是與葉向真等人保持著緊密聯繫，堅持他們的觀點不檢討。

在67年4月20日的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前，召開的一次籌備會議上，周總理和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以及謝富治接見全體與會人員時，江青說：“當時抓聯動是對的，現在毛主席指示叫放聯動的這些學生，也是對的。王大賓，你要告訴朱成昭，我們還是希望他改正錯誤，繼續革命，早日歸隊。他說，中央文革抓聯動是錯誤的，現在毛主席批示，就全放了。”戚本禹又接著對我說：“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你回去轉告朱成昭，要他做個檢討。”謝副總理說：“抓聯動是我叫抓的，與主席無關。”

我回地院後，即向院革委會傳達了江青與戚本禹的這個指示，並商量了如何幫助朱成昭等人接受中央文革指示，寫個檢討。但朱成昭口頭答應寫個檢討，實際上一直拖著不寫，我們也就沒管。

到6月份，我又先後兩次見到關鋒、戚本禹。戚本禹對我說：“朱成昭的檢討怎麼還未交上來？我們對他的問題不好表態。蒯大富反康生、反總理，這麼大的事，他向康老，向總理請罪，康老、總理都原諒了他。你們地院這個朱成昭，要他寫一個檢查就那麼難？你們要多做他們的思想工作。”

我每次都向朱成昭轉達了中央文革對他寫個檢討的要求與希望。朱成昭仍然是我行我素。6月中旬，朱成昭等人還策劃要成立一個“地質學院新東方紅公社”，並起草了宣言和公告，並在院廣播台強行播出，但馬上被制止。朱成昭成立新組織、分裂東方紅的計劃，根本得不到地院師生的回應與支持。朱成昭感到失望。他與葉向真商議，準備離京出走。

6月底還是7月初的一天上午，一個和朱成昭關係密切的同學，突然到院革委會辦公室向我們報告，說朱成昭等人還有葉向真，他們早就議論，說在國內不讓他們革命，他們就要去越南支持胡志明主席抗美援朝，說在越南已有不少中國的紅衛兵在抗擊美帝國主義了。還說，葉向真說她認識胡志明主席。他們現在已經出走了。這個學生說，她原本也要準備和他們一起去的，後來一想，不對，就沒跟他們走。他們是坐火車走的。

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們立即報告了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同時我們趕緊查人，發現朱成昭、蔣良樸等人確實已經離校不知去向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就接到了謝富治的指示，要地院派一個認識朱成昭的學生，

并带上朱成昭的照片，到公安部找他，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執行找回朱成昭等人的任務。經商量，我們派了宮保軍同學。

7月5日，宮保軍到公安部，見到謝富治，接受任務。7月10日，宮保軍完成任務後回到學校，向我們報告了執行這次任務，找到並帶回朱成昭等人的情況。

由公安部副部長于桑帶著兩位處長和宮保軍，先到了上海，未找到人。這時公安部得到消息，說葉向真、朱成昭等人已在廣州軍區處。這樣于桑等人先折回北京後，立即又去了廣州。在廣州，找到了葉向真、朱成昭等人。對此周總理有指示：務必要把他們帶回北京。于副部長根據周總理指示，坐飛機將葉、朱等人帶回了北京，宮保軍一路陪同。

朱成昭被帶回北京後，就送回了地質學院。周總理又給地院革委會指示：“你們要把朱成昭看好，不准他亂跑，對他的錯誤要批判。”這樣，朱成昭就在地院從“閉門思過”住的有電話、有衛生間的教師宿舍，搬回水文系學生宿舍他原來住的房間居住，有人看守，也不允許其他學生去串門。

公安部為此設立了一個專案組調查處理這事。地院革委會也配合成立了一個李思田老師、雷澤雲同學組成的調查小組，調查朱成昭等人外逃的情況，有什麼事直接向公安部專案小組彙報。

朱成昭被隔離居住後，仍堅持不認錯，為此還絕食抗議。學校開了一個批判朱成昭的大會，他也不肯低頭認罪，祇肯背對群眾，向毛主席像低頭。

到7月中旬(编者注：应该是1967年11月2日)，公安部就將朱成昭等人關進了北京的功德林監獄。葉向真同時也被關進功德林監獄。這一專案當時就被宣佈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

1970年廬山會議前後，葉劍英元帥再次獲得毛主席信任。1970年底，葉向真被釋放回到家中，在家休息一年多後，轉行學醫，先後在首都醫院和301醫院做了7年醫務工作。1978年重回文藝界，以凌子之名導演拍了電影《原野》，獲得熱烈反響。后為全國政協委員。

朱成昭是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從監獄放出來的。受連累的蔣良朴、顏寬同學同時從監獄放出來。但朱成昭仍被戴著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勞改農場勞動改造。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但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1990年初隨大潮亦到上海下海經商，最終失敗。1998年9月25日，因心肌梗塞在北京昌平十三陵思陵牌林監村猝然逝世，年僅57歲。而世人早已忘卻文革運動初期還有一位叱吒風雲的學生領袖朱成昭。

據田春林說：“後來從老蔣、顏寬那裡瞭解到，梅建明和張華府曾到301醫院去找過葉向真；對方閉門不見並讓人傳出話來，總理不讓她再和朱來往。”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了孔丹的話：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著天然的聯繫”的老紅衛兵，自認和朱成昭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具有本質的區別”。你就可以理解，同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的首要分子的葉向真、朱成昭，為何會有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编者注：该文引自《王大宾回忆录》）

（三）东方红报对朱成昭的批判文章：

朱成昭的反动思想及其社会根源

红色尖兵等六个战斗队

今年一月份以来，朱成昭疯狂地炮打中央文革，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丧心病狂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朱成昭的问题，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决战的一个战场，一个侧面，我们必须在集中批判刘邓陶的同时把朱成昭的反动思潮批倒、批臭。

一、朱成昭走向反动的两个阶段

朱成昭走向反动是从今年一月份开始的，并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反动的五大观点与八大观点出笼。当时正是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十二月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并取得伟大胜利，进入了伟大的一月风暴的崭新阶段，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朱成昭，在这场大联合大夺权的暴风雨中，把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看得一团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并狂妄地认为自己比中央文革、比江青同志还高明，结果全盘接受了十二月黑风中李洪山和科大雄师、哈军工红色造反派驻京联络站某些学生、红战团和联动恶毒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观点，并与当时社会上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合流，因而一月十八日朱成昭作的形势分析报告中，就提出了反动的五大政治观点：（一）大串联过早了，（二）整风军训有害无利，（三）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条件不成熟，（四）中央文革抓人抓多了，联动不错，可能是左派，（五）中央文革运动群众。

朱成昭的反动观点露头，立即受到了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和广大东方红战士的抵制和批判。朱成昭不仅不知过改错，悬崖勒马弃旧图新，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走向反面，于二月五日抛出了名为检查，实则放毒的反动的八大观点。'由于朱成昭之流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对抗中央文革，对抗群众的揭发批判，坚持不改，因此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责令其闭门思过，并夺了朱成昭的权，把朱成昭清除了东方公社总部。

第二阶段：分裂中央文革，全面攻击中央文革，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中央文革责令朱成昭“闭门思过”，是给他最后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也是对他的挽救，然而，朱成昭决心顽固到底，特别是四月份之后，活动更加猖狂，到处和反动分子、社会渣滓、联动头目挂钩，密谈，大肆活动，更加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全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积极配合孙蓬一之流分裂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此外，朱成昭还积极配合社会上“揪陶铸二世”的反革命逆流，把矛头指向康生、总理以至林副统帅，妄图把水搅浑，扭转对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大斗争。

就这样，朱成昭终于蜕化成东方红的可耻叛徒。

二、刘邓的黑手和黑线人物的影响

戚本禹同志明确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朱成昭是有后台的，是受了刘邓黑手的影响的。这句话揭开了朱成昭问题的要害所在，事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早在去年十一月份，刘邓的黑手与黑线人物何长工之流就大肆吹捧朱成昭“有才干”，是“英雄”，是“闯将”。给朱成昭灌迷魂汤，使他政治上“狂”了起来，以至在插手地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批评。

去年十二月，余秋里几次接见朱成昭，余秋里之流的几次谈话对朱成昭的五大观点、八大观点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有：

第一、余秋里肉麻地吹捧朱成昭“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十分关心”，是“突击队”、“先锋队”，作出了很大贡献；大谈他只相信和依靠朱成昭和地质东方红去搞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还散布其他造反派不可信，当权派不可信，广大工人不可信的谬论。这对朱成昭抵制中央文革关于开展军训整风的指示，大谈军训整风有害无益论，起了重要影响，同时他对朱成昭把一月风暴看得一团糟，炮制大联合大夺权条件不成熟的谬论起很大作用。

第二、余秋里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把朱成昭拉下水。余秋里为地质东方红下厂矿大拨经费、大给车辆、大搞福利进行拉拢腐蚀，后来遭到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朱成昭拒不认错，一直为余秋里的经济主义开脱罪责，以至发展到十分仇视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江青同志的可耻地步。

二月黑风中，谭震林等一小撮刮起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逆流。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朱成昭有极大影响，特别是通过叶向真的关系，更加发展了他认为“中

央文革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观点，因而死保一小撮，后来发展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林副统帅。

在三、四月份，朱成昭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和刘少奇的大舅子、三反分子王士光之流勾搭在一起。反动透顶的王士光夫妇连连放出糖衣炮弹，竟吹捧炮打中央文革的朱成昭是“英雄”，并主动提出要与朱成昭见面，更恶毒的是王士光还把高密级小范围的党内通报内容转告朱成昭，公开支持庇护朱成昭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罪行，还极其恶毒地对朱成昭说：你们现在的处境和我们在白区作地下工作一样。由于这个刘少奇的黑手伸向朱成昭，使朱成昭沿着反革命道路越滑越远，四月之后，又犯了许多新的罪行。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朱成昭的反动思潮是有其后台的，是有刘邓的黑手及黑线人物作背景的。必须把这些大扒手揪出来示众，批倒、斗臭，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才能取得批朱的彻底胜利，也是批朱的重大意义所在。

三、社会上牛鬼蛇神提供的“黑炮弹”

朱成昭的反动言行之所以那么恶毒，全面系统，是他拾起了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乌七八糟的破烂货拼凑提炼而成的。特别是去年十二月黑风中乔兼武、李洪山、伊林、涤西之流和联动反动头头等大肆恶意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行材料，朱成昭竟搜集拼凑这些破烂，有的还派人或亲自找这些反动家伙了解情况，作为他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弹，其腔调如出一辙，其做法毫无差异。

伊林、涤西之流写的公开信等大毒草，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争权夺利”，是宗派斗争，还用“冷酷无情”“毫无人性”进行人身攻击，朱成昭继承伊林、涤西的衣钵，也是这样攻击我们的林副统帅的。

李洪山之流和科大雄师，北航首都红卫兵等反动头子贴出了“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三问中央文革”、“也问中央文革”等大毒草，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群众”、“中央文革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等等，朱成昭后来攻击、炮打中央文革，又何尝不是拾得这些破烂呢？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反动头子贴了北航红旗三个反动分子写的“谈谈孙悟空”，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朱成昭更是欣赏备至，后来又到处和盘托出，并且和叶向真一块加油加醋，大肆辱骂和丑化江青同志，其用心真最狠毒之极！

高级党校反动组织红战团大搞康生同志，大整黑材料，肆意攻击康生同志，朱成昭插了一手，根据红战团反动头头的旨意，也调查康生同志材料，并始终怀疑、攻击康生同志。此外，朱成昭还跟少数联动的反动头头密切往来，搜集对江青同志人身攻击和反中央文革的材料，全面继承与系统了反革命的联动思潮，上保反革命黑帮，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下丑化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反动组织和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合流，为之鸣冤叫屈，真是猖狂之极！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朱成昭反动政治思想和言行主要来源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的破烂武器堆。因此我东方红战士必须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打它个稀巴烂，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四、社会上反动思潮的配合

朱成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和社会上的反动思潮一呼一应，遥相配合。

第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特别是去年底今年初，这种思潮颇为盛行。例如：由高级党校“红战团”，清华“井冈山”，体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天大“八一三”等组织的“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就是这种反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此外，“人大三红”、北大XXX等公然张贴转抄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清华井冈山XX，外语学院XXX等公然张贴了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他们紧密联系，互相配合，形成了一股喧嚣一时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个思潮的冲击下，朱成昭也卷了进去，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至今不悟。

第二，“否定一切”的反动思潮。在刘邓的黑爪牙谭震林之流刮起的二月黑风前后，出现了一股否定一月风暴，否定大联合夺权，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朱成昭此刻也情不自禁地跳了出来，大叫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对了”。与此同时，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在干部问题上“左”倾，为被斗的家伙们鸣冤叫屈，为保守派涂脂抹粉，妄想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第三，联动思潮。即被打倒了的走资派和一部分严重变修的高干子弟，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仇视，千方百计地予以抗拒，妄想恢复即将失去的天堂，当朱成昭的父亲被斗以后，则进一步促使了他与联动思潮的结合。

第四，“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反动思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北大聂孙及XX大学XXX等几个人对释放联动和通知的发表，

大肆制造：“通知的发表是开始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要揪出第二条黑线”；要“揪出陶铸二世”的谬论。恶毒地挑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关系，以达到分裂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朱成昭对此十分赞赏，大叫“有道理、有道理”。进而恶狠狠地攻击林副主席和周总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朱成昭的反动言行和社会上的反动思潮是遥相呼应的，是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因此，我们在批判朱成昭的同时，一定不要放过批判这些社会基础、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理论，挖掉这些毒根。

东方红战友们，行动起来吧，在大批判中去创立新的功勋！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1967年8月29日《东方红报》第69期）

（四）朱成昭的检查与交代：

我的检查与交代——朱成昭

1967年8月15日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文化革命开始——红旗 66 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止]。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第二阶段 [红旗 66 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进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

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

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第三阶段（一月革命风暴——67年7月）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

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诵“黄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谈心。可是对这

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在闭门思过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向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1、 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师，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师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

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

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拔。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为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朝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红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 1-2 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我的态度：

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编者注：该文是朱成昭从广州被抓回北京，在地院隔离审查期间所写，原文应该保存在当时的专案组。此处引用的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当年翻印的稿件）

六、杨雨忠跳楼自杀专题

杨雨忠，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 71621 班学生（1962 年入学），上海人，工人家庭出身。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雨忠是地院东方红公社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常委、作战部部长。1968 年 5 月 30 日午后（时间就是 1968 年夏天，该班学生毕业分配前夕——编者注）跳楼自杀身亡。这在当时，以及整个地院文革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至今为止，杨雨忠为什么会跳楼自杀？仍是一个谜！现在也没办法搞清楚，真正知道事情真相的当事人，有的已去世；有的说“记不清了”；有的至今不肯说……。为此，我们把一部分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忆，和有关人员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汇集在此。

编者按：下面的回忆录中涉及的一些人，特作说明：

张振庭， 71621 班的学生、班党支部书记

马立常， 71622 班的学生，班党支部书记（已去世）

李海荣， 71621 班的学生，上海人，与杨雨忠同班、同宿舍。是护送杨雨忠父亲回上海的人员之一，兼任上海话翻译。因为院里派去送杨雨忠父亲的人，不懂上海话，无法交流。

王 焕， 当时地院的原党委书记，已结合进革委会（已去世）

聂树人， 当时地院革委会副主任

王大宾， 当时地院革委会主任

李 贵， 当时地院革委会副主任（地院的老干部，已去世）

（一）张振庭对此事的回忆：

杨雨忠跳楼的回忆

时间：1968 年夏天，毕业分配前夕

地点：北五楼东头四层处跳下，摔在 126 宿舍北窗户下，尚有呼吸。

抢救：学校及时派吉普车，由张振庭、吴坤正护送到北医三院。

医生说，宣武医院是脑神经科权威，赶紧送宣武医院。在去宣武医院的路上，司机着急，车开得很快。吴坤正一路上抱着杨雨忠的头，免受颠簸。

到了宣武医院，杨雨忠已经停止了呼吸，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尸体停放在宣武医院太平间。

火化：待杨雨忠的父亲到校后，由我和王焕陪同到宣武医院太平间。杨父见到尸体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操着上海话，我听不懂。

校方决定立即火化（杨雨忠跳楼行为在当时是理屈的：1，自绝于人民；2，问题没有搞清）。在校吃完晚饭后，学校派大货车，杨父坐在驾驶室里，我站在马槽上（还有别人否？记不得了。）我护送杨尸从宣武医院直送八宝山。骨灰及杨父回沪，我没参与，知道了。

杨雨忠跳楼起因：

71622班马立常通知我，我们二个班同学集中开会，批斗杨雨忠，作为东方红公社作战部长所犯罪行。

杨雨忠平时喊我马老三，我觉得很亲切。他当了作战部长后，很少与班上联系，他干了什么事，我一无所知。但这是革命浪潮，杨雨忠的罪行可能马立常知道。于是，我就承担了批斗会的召集人，我只管召集，无可揭发。批斗到第三天的中午，杨雨忠跳楼了。

杨雨忠跳楼的预兆：

批斗会进行到第二天，我发现杨面部表现异常（不知道是没问题被冤枉，还是问题严重怕被揭发。），晚饭后，我约他到北五楼路南的树下聊天，他说：保证没有“罪行”。我说：那就好，明天再开会，我作为主持人不论发言多么严厉，你都不要往心里去，不必多想，斗不出东西来就没事了。

送杨回到宿舍，我又把住在门口床上的刘梦均叫到楼道里，告诉他睡觉机灵点，杨雨忠出来就跟着点。批斗会的第三天，午休时间，刘梦均睡着了，杨雨忠出门，他不知道，杨跳楼了。

李海荣发现杨雨忠的抽屉里的遗书，李交给我，王大宾闻讯赶来正好在楼道里遇上，我立即把杨雨忠的遗书交给王大宾。

张振庭

2017-12-17

（二）李海荣对此事的回忆：

杨雨忠跳楼以后

杨雨忠是中午午睡的时候跳楼的。当着大家的面，我打开了他的抽屉，看到有三封信，其中有一封是给我的，其他两封是写给校革委会和他父母亲的。当时我想打开写给我的信，有同学就提醒我，别打开，交领导处理。我想有道理，所以不再坚持。这三封信从我手上拿走。直至现在我也没看到他写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信最后去了哪里。

杨雨忠经抢救无效死亡，其父亲被“请”到学校，学校哪些人出面？怎么和他谈的？和杨雨忠比较好的几个上海人，基本上都不清楚，也不知道其他同学知道不知道。

有一天，我得到通知，让我陪张有容老师送杨父回上海，我的主要任务是当向导和“翻译”。

在上海找到街道负责人时，张有容出示了介绍信，谈了杨雨忠跳楼是因为学校要向他了解文革中的几件事，他想不开，跳楼。太惋惜了。还说，调查了解的事情都是杨雨忠本人所为，与其家里没有任何关系。最后还说，杨雨忠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结论。

李海荣 2018年3月8日回忆

（三）聂树人对此事的回忆：

我到三司工作离开学校之前，并不知道杨雨中其人。后来他成了“地质东方红”的核心人物，才知道了他，但仅是相识而已，没有具体打过交道。革委会成立的时候，大家，特别是王大宾和李贵出于何种考虑，同意他进常委会，我不得而知。是认为他与朱成昭的“反革命活动”没有关系，检查的不错，还是区别对待？

革委会成立后，因为“蔡派”一再指责“革委会里有朱成昭代理人”，我才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当时的判断是，如果真如“蔡派”说的，革委会真

有朱成昭的代理人，最可能的“人选”当然就是“朱蒋杨”核心人物杨雨中了！说心里话，我对“蔡派”的话并不是一开始就加以排斥的，我还是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意见的。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杨雨中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工作能力，且较为本分的人，他并不赞成朱成昭的观点，不仅不赞成，还与朱成昭有所斗争。

朱成昭、蒋良朴、梅建明、颜宽等被抓起来后，公安部专案组曾对他们进行过较长时间的审查，却从没有发现杨雨中与之有什么问题。我也曾问过李思田和雷存云，他们也拿不出杨雨中有问题的半点证据。

因此，我得出结论，杨雨中一不赞成朱成昭的观点，二没有跟朱成昭跑到广州，不具备“朱成昭代理人”的资格。

革委会中的其它人就更沾不上“代理人”的边了。

我当时认为，“蔡派”一再祭起“保朱派”和“代理人”的法宝，是对革委会中权势利益“分配不公”的另一种表达。他们中的一些文革初期有功之人没有进革委会，心中不平衡。在社会斗争中，任何人都希望自己高瞻远瞩，势如破竹，永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尽一切力量保持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取得某种确信无疑的安全感。至少至少，人们也要极力使自己避开绝对受别人役使的命运（《问人性》P12）。因此，我曾在革委会常委会上提出过这一问题，希望能对革委会加以改组，增补“蔡派”委员。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蔡派”是地质学院的一部分，是“地质东方红”的一部分。革委会作为全院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理应有他们的代表，有他们说话的声音。在征得其它常委同意后，我曾亲自去找过蔡新平、周永璋。记得，当时“二团”的办公室在教五楼（主楼）的四层，我在那里只见到蔡新平。我对蔡新平说：

“你们一再说，革委会里有朱成昭的代理人。这代理人究竟是谁，他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说出一二。如果问题严重，我们何不共同把他揪出来？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蔡新平当时并没有说出什么来，只是说，他们有材料，以后可以提供给我们。

但是，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也没有见到他们“提供”一纸半句的材料。由此，我最后的判断是，“革委会有朱成昭代理人”这个“口号”或“概念”的提出，只是“蔡派”打向革委会的一个大棒，项庄舞剑，意在分裂，进而

搞垮革委会。

不幸的是，杨雨中却在从革委会“揪出朱成昭代理人”的一片喊打声中，跳楼自杀了！

杨雨中跳楼发生在1967年夏末秋初，一天午后两点左右。

地点：北五楼东头。从四楼顶跳下。

在杨雨中跳下后的一两分钟里，我因事正路过附近，见两三个人围拢在那里，觉得奇怪，就走了过去。大家看到我来了，立即对我说：

“杨雨中跳楼了！”

我一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此之前，偶而可以听到自杀的消息，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年青人则极少。在我们刚上大学时，曾见到一个高年级学生跳楼，据说，那是为情而自杀。后来，政界军界学术界或其它界的人，因为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审查，失去活下去信心，为了对“生不如死”的现实提出抗议，而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然而，“地质东方红”的一个曾经的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心目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同龄人，突然间走上了绝路，这对我心灵的打击是太大了。我心里虽然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不能多想，救人要紧，希望会有奇迹出现。

那时候，在每座学生宿舍楼的一层门道里，都装有一台公用电话机。除机关单位和部分身居要职的少量领导干部外，社会上电话机很少，话机的使用率很低。因此，这电话谁都可以打，而且不收费（大概算作学校的学杂费了吧！）。我立即跑进楼道，给车队打了个电话，要他们赶快派一辆小车过来。

大约三四分钟后，一辆三开门的吉普车就开过来了，围观的学生和老师（这时人多了起来）立即将杨雨中抬上了车。

“快往北医三院送！”我命令道。

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同学都上了车，我看人多，就没有上汽车，而是骑自行车紧随其后。北医三院距地院也就两公里多路程，很快就到了。当我放下自行车进到急救室时，医生正在给杨雨中作检查。杨雨中此时已神智不清，呼吸困难，生命垂危。医生的意见是，抢救这种病人，得去宣武医院，他们这里没有这样的条件。

于是，同学们又七手八脚地将他抬到车上，车就急速出了三院的大门，向宣

武医院驶去。

我没有再跟着去。我的判断是，人已经不行了，北医三院是在往外推。就以前听说的情况是，从三楼跳下，人或有救，但是，从四楼跳下，就没有希望了。

我回到学校，立即去找王大宾，汇报并商量这事如何对待和处理。当时，王大宾住在北五楼顶层（五楼）东端的一间房子里。听王大宾说，38军的军长张锋正和他在屋内谈话，因为天热，门大开着。他曾看到杨雨中从门口经过，走向四楼屋顶，却没有想到他会跳楼。

不一会儿，就得到消息，杨雨中在送往宣武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

后来，陆续得到的杨雨中死前的情况是，近期，他被班上同学软禁起来，要他交代与朱成昭的关系问题。这个情况，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我想，杨雨中是革委会成员，没有革委会的决定，他班的学生怎么如此大胆，敢对革委会成员进行软禁？显然，这样做是有上面的背景的，是公安部专案组，还是其它人？

再后来，又得到确切消息，说杨雨中跳楼前曾在自己的抽屉里给王大宾、李贵各留下遗书一封，也给他的家人留下遗书一封。这事是在常委会上说出的，王大宾和李贵都在场，应该不会有误。但是，这三封信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公开。

很快，杨雨中的父亲和另一个亲人从上海赶到地质学院，为儿子处理后事。

杨雨中之死，对上对下都有震动。在一次会议上，吴德曾就此对王大宾和我说，年轻人能有什么大问题，怎么这样想不开，走上绝路？

（摘自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一书 第474-478页）

（四）王大宾对此事：

王大宾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事根本没有提及。有人问及杨雨忠自杀之事，他回答：别问我，你们找地院党委去。又说：你们不要过问此事……。

根据以上多人回忆，王大宾应是最知情的，如今应该如实告知大家，是谁下令在杨雨忠毕业前夕审查杨雨忠的？审查杨雨忠什么问题？杨雨忠的遗书写的什么内容？王大宾为什么对此事保持沉默？

（五）蔡新平对此事的调查材料：

北京地院东方红核心组成员杨雨中之死的一些有关资料

蔡新平

与文革中其他一些全国有名的大专院校相比，同样有名的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死人很少，学生中除了在外地因武斗和其他意外事件而死亡的4-5个人外，最重要的死人事件就是东方红公社和革委会核心成员杨雨中在校内的跳楼自杀。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列传中有一条：“杨雨中，男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学生，文革中是该院“东方红”组织第四号领导人，1967年四、五月间在被追查“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事件”中跳楼身亡。朱成昭曾是“东方红”组织的领袖。”很简单，没有更多内容。（载《文革受难者》电子版 p643）

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杨雨中之死的述说。（编者注——前面已有引用，此处不再重复）

如果聂树人说的是真，那么谁最有可能知道杨雨中自杀的因缘呢？是王大宾，还是李贵？因为遗书是写给他们的。据杨雨中同班同学回忆，在杨雨中跳楼之前他要见王大宾，要和王大宾面谈，但王大宾可能是因为有事会见，杨雨中一直等了几个钟头也没有等到，后来竟然去跳了楼。这很让人惋惜痛心，也留下了更深的疑问。李贵已经去世了。理所当然，北京地院的老校友们期待王大宾能够对杨雨中之死有个说法，即便他也不清楚背后的原因，但知情最多的毕竟还是他。最近王大宾的回忆录已出版了，奇怪的事，我没有在他的回忆录中找到任何一句有关杨雨中之死的事实和原因的叙述，他完全回避了这个问题。

68年我们这帮“弃子”，草草毕业分到了野外地质队，后又继续经历了10年的风风雨雨，只到四人帮垮台，我1978年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张文佑所长的研究生，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研究生毕业后不久，张文佑先生让我承担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与深层岩溶地下水开发有关的一个科研项目。这个项目是煤炭部长高杨文与张文佑所长议定的，并被国务院和中科院列为重大科研项目。1983年4-5月份的某一天，在参加完与煤炭部领导关于项目的洽谈会后，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在友谊宾馆设宴款待张先生，我作为张先生的助手，指定的项目负责人，有幸陪同。席间的谈话竟然不经意之间揭出了一个有关杨雨中之死的惊人秘密，这非常意外。离开学校已经15年，我已很少再去回忆文革的事，但孔勋副部长的席间的突然提问，一下震惊了我，以至留下深刻印象。

我简单回忆一下事情的经过：席间孔副部长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北京地质学院，他问是哪届的？是不是东方红一派的？在我回答这些问题后，孔

副部长很严肃地说，你认不认识杨雨中，我说认识，他说他跳楼自杀了是吧？我说是。他接着说：他要不死，就现在也得判他死刑，枪毙了他。我大吃一惊，问孔副部长，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他说67年，杨雨中带人到平顶山矿务局指导夺权。你们地院东方红了不起啊，到处指导运动，说一不二，那些造反派都听他的。平顶山是特区，矿务局的领导也就是特区领导。他们夺了特区公检法的权，成立了专政委员会。公开审判平顶山特委的领导，判处我的二把手，三把手死刑。被他们当场枪毙了。这就是你们杨雨中干的，他签的字。如果我当时也在平顶山，被枪毙的第一个就是我。他们太无法无天了，这件事开了造反派以专政的名义公开杀害老干部的先例，这是中央绝对不容许的。周总理大怒，一定要查明这件事是谁干的。已经调查到杨雨中了，还没来得及抓他，他就跳楼了。孔副部长说这些情况时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我由于震惊，所以记忆也很深刻。鉴于当时的气氛和宴会的主题，我不好进一步发问，没有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但事情经过和这个简单谈话内容却深深留在我记忆中。

有关杨雨中之死，始终是个悬案，迄今为止，莫衷一是。孔勋的说法为这个谜提供了一把解开的钥匙。为什么说只是一把钥匙呢？因为没有获得更充分的历史旁证。当时大家心中都就有一个疑问。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并没有与朱成昭一起反中央文革。戚本禹在67年3月4号让朱成昭下台（闭门思过），让王大宾上台，在确定地院东方红新的领导班子时公开点了杨雨中的名，要杨雨中进入新领导班子，说明杨雨中是被中央文革信任的。（参见《昨天》54期地院专辑，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的讲话），后来抓捕的朱成昭的骨干分子中也没有杨雨中。朱成昭，蒋良辅和其他那些骨干分子放出来后让革委会看管，按聂树人的说法，革委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他们一个个的确也都很放松，个个都是一派满不在乎的劲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反中央文革的活动反而紧锣密鼓，他们哪有什么压力？朱成昭们反中央文革在67年4-5月份并没有形成高潮，这期间中央文革一直在表示对他们的关爱，一再声明是人民内部矛盾，说他们认错改错就好，批评是为了挽救，还告诫地院群众，不要一棍子打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朱成昭们有恃无恐，没有感到多了不起的压力。群众中有人嚷嚷要批判他们，一句朱成昭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文革成天乱喊的口号，他们就那么有压力了？这也太低估他们的心理素质了。那么反而是一个没有被列入朱成昭集团的

人，后来又被戚本禹推荐或“选举”进入了革委会当了常委，地位仅次于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的人四把手，却会因朱成昭的事感到巨大压力，压力大到要自杀？这不符合逻辑。但结果他的确是自杀了。既然自杀了肯定是压力很大，那这个压力来自何事？如果用朱成昭的事牵连造成的压力不可解释，那么一定还有与朱成昭无关而且有比他所谓的反中央文革更严重的事。所以说孔勋的话给解开杨雨中死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给了一把钥匙。

2015年，为了写地院文革史，我在回忆地院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时，不由得又想起了孔勋之问。为了进一步解开这个谜，我在网上查了平顶山地区文革史资料，并将上述回忆和查资料的分析整理成文，向平顶山地方志办询问，以期得到解答，或能够得到更有价值的信息，结果没有反馈，了无消息。

现在我将这个回忆和查询调查的内容发表在《昨天》，希望有知情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或指出进一步调查的线索。

附件：

《蔡新平关于杨雨中自杀向平顶山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发的调查信》

平顶山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你好！

我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位退休的科研人员。文革期间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是1968年的毕业生。请原谅我冒昧打搅你们。

1983年4-5月的某一天，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孔勋在北京友谊宾馆宴请中科院地质所所长张文佑先生，我是张文佑先生的学生、助手，煤炭部与中科院地质所签订了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张先生指定我为项目的负责人，所以也在座。孔副部长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北京地质学院，他问是哪届的？是不是东方红一派的？在我回答这些问题后，孔副部长很严肃地说，你认不认识杨雨中，我说认识，他说他跳楼自杀了是吧？我说是。他接着说：他要不死，就现在也得判他死刑，枪毙了他。我大吃一惊，问孔副部长，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他说67年初，杨雨中带人到平顶山矿务局指导夺权。你们地院东方红了不起啊，到处指导运动，说一不二，那些造反派都听他的。当时平顶山是特区，矿务局的领导也就是特区领导，生产和人事关系是直属煤炭部领导的。他们夺了特区领导的权，夺了特区公检法的权，成立了专政委员会。公开审判平顶山特委的领导，宣判死刑，我的二把手，三把手被他们当场枪毙了。这就是你们杨雨中干的，他签的字。如果我当时也在平顶山，被枪毙的第一个就是我。他们太无法无天了，这件事开了造反派以专政的名义公开杀害老干部的先例，这是中央绝对不容许的。

周总理大怒，一定要查明这件事是谁干的。已经调查到杨雨中了，还没来得及抓他，他就跳楼了。孔副部长说在这些情况时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我的记忆也很深刻。鉴于当时的气氛和宴会的主题，我不好进一步发问，没有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但事情经过和这个简单谈话内容却深深留在我记忆中。

现在我们老校友正在写北京地院文革大事记。孔部长说的这事你们平顶山地方史志对此是否有记载。网上零星查到的很简单，从网上查到当时特区特委书记是孔勋，特委副书记、矿务局局长是杨展，三把手是谁？网上说说67年是最乱的一年，但没有查到枪毙领导干部的记载。我仅就网上查到的内容（见附件）提几个问题。

问题1:

大事记写道：“11月19日夜，特委机关造反派将特委副书记、矿务局局长杨展挟持到郑州，要求河南省委将其罢官。此前，选煤设计院造反派已将特委书记孔勋挟持到郑州，要求罢孔、杨的官”。“12月26日，特委机关和选煤院造反派发起组织上访团到煤炭部造反，胁迫煤炭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杨展党内外一切职务”。孔勋为什么没有回平顶山？杨展撤职后是被押回了平顶山吗？

问题2

大事记写道：“（67年）1月5日，造反派夺了特区公安局的权，1月6日，28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查封了《平顶山战报》社。1月23日，造反派组织声称接管全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当年1月份，特委、人委各部、办、局，都被造反派一窝风似的夺了权。一切工作事务都由拿着公章的造反派说了算”。如“市人委机关被宣布夺了党政财政大权后，市人委办公室的造反派收了市人民委员会的大印。凡是上级派发的文件，都由造反派来看，签发文件则由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签字”。“夺权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或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那是谁夺了公检法的权？有北京来的红卫兵参加吗？公检法被夺权后，召开了批斗和公审当权派的大会吗？有人被枪毙吗？如果有是，是谁被枪毙了？是什么时间？杨展等领导的结局如何？网上能查到的大事记内容对此都语焉不详。

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确切信息。

此致

敬礼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蔡新平
2015年6月14日星期日

如回信请用以下Email地址：caixp3721@163.com

附网上查到的平顶山大事记的与文革有关的一些内容：

附件一：

1966年：动乱时代的初期

2007-03-19 09:39:52

大事记

1月20日，特委发出《关于平顶山煤炭基地试点工作进展情况简报》。

2月7日，全区掀起向焦裕禄学习的高潮。

3月25日，四矿在煤炭部召开的全国煤矿干部会议上被列为全国创大庆式企业重点矿。

5

月5日，特区政治部召开各战线职工代表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座谈会。

5月上旬，中共平顶山特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孔勋任组长。

6月，矿务局化工厂动工兴建。河南第一绢纺厂在平顶山动工兴建。

综述

1966年是个让人迷惑的年代：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确定。

这一年初，“大四清”正在进行。《平顶山市志》主编韩向忱被抽到第二分团煤校四清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后，除了传达宣讲“第二十三条”，还要揭发和批判组织上和个人四不清问题。运动的重点在校部机关，学生中主要发动群众揭发和批判。

据韩向忱回忆，5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区平顶山特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开始在文化各界掀起批判“三家村”黑店的热潮，号召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组织教职工学习“五·一六”通知。市里确定了选煤院、矿务局机关、煤校、报社、文化局等11个单位为文革重点单位。6月份，特委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动员大会。会后，全区中学以上学校“停课闹革命”，机关实行半日工作制，掀起揭发批判高潮。

8月中旬是个让很多人难以忘记的时间，也带来了以后数年的人心惶惶。韩向忱记得，选煤院造反派将两名工作人员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从此，全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抄家之风迅速泛滥起来。

根据《平顶山市志》记载，9月份，北京矿业学院、郑州大学等地学生到平顶山串联，煽动学生成立造反组织，鼓动造反。平顶山高中、矿务局中学最早成

立群众组织。之后，全区群众组织纷纷建立，造反活动风靡一时，全区工作开始陷入半瘫痪状态。

《平顶山市志》记载显示，11月19日夜，特委机关造反派将特委副书记、矿务局局长杨展挟持到郑州，要求河南省委将其罢官。此前，选煤设计院造反派已将特委书记孔勋挟持到郑州，要求罢孔、杨的官。另一部分干部和工人乘十几辆汽车去郑州保书记。平顶山形势大乱，不少单位停工停产。12月26日，特委机关和选煤院造反派发起组织上访团到煤炭部造反，胁迫煤炭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杨展党内外一切职务。（本报记者李科学）（本栏目由平顶山晚报与市地方志志办公室合办）

附件二：

1967年：“文革”中最乱的一年

2007-03-26 09:46:15

综述

1月5日，造反派夺了特区公安局的权。1月6日，28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查封了《平顶山战报》社。1月23日，造反派组织声称接管全区的党、政、财、文大权。3月27日，平顶山电厂动工兴建。5月13日，大庄矿动工兴建，设计能力90万吨/年。

大事记

这一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最乱的一年。《平顶山市志》主编韩向忱记得，年初，特区公安局造反派首先夺了公安局的权。有的群众表示“赞成”，但绝大部分人持反对态度，认为专政机关的权不能夺，在街头与造反派展开辩论。

韩向忱回忆，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领导阶层都被认为是走资派。当年1月份，特委、人委各部、办、局，都被造反派一窝风似的夺了权。所谓的“夺权”，也就是把公章收了，让当时的领导靠边站。一切工作事务都由拿着公章的造反派说了算。当时还发生了一件现在听起来比较可笑的事情：造反派组织有个人收了十几枚公章没处放，就用挂包装起来，整天背在身上。

而韩向忱所就职的市人委机关也宣布夺了党政财政大权。市人委办公室的造反派收了市人民委员会的大印。凡是上级派发的文件，都由造反派来看，签发文件则由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签字。

无论如何，“夺权”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党政机关和企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或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

3月，解放军8210部队进驻平顶山特区执行“支左”任务。

韩向忱还记得，当时，街上到处都是游行的学生，一辆辆车在街上开来开去，宣扬各个派别的观点，展开辩论。

5月，平顶山特区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成立，欲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当月27日，指挥部发出通告，要求全区各单位、厂矿企业职工坚持8小时工作制；机关全日制工作，不许动用生产车辆改装喇叭搞非生产活动；严禁打、砸、抢、抄、抓。

孔勋，四川南部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第九军团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1935年后入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组织干事，中央军委供给部教导员，冀中军区团长、团政委，第二野战军团长、师参谋长。参加了襄木然、淮海等战役。建国后，历任西南煤炭管理局局长，煤炭工业部地质总局副局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炭管理局局长、经委副主任，西北煤炭管理局局长，**中共平顶山特委书记**，燃料化学工业部经济协作组组长，煤炭工业部基建局局长（陈钝：接替孔勋任煤炭工业部基建局局长）、**煤炭部副部长**，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杨展：平顶山矿务局第一任局长，平顶山特委党委副书记。

七、二进地质部专题

编者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曾经四次走进地质部机关大院，进行上访请愿活动，简称“四进地质部”。（本书第一章：《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对“四次走进地质部”情况都已有叙述）在四次走进地质部机关中，唯有“二进地质部”时间最长，发生的事情最多，影响最广。二进地质部是从1966年9月5日至9月19日，在地质部机关大院历时十三天，在这十三天中发生了例如：地质部调动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围攻、殴打、谩骂地院东方红事件；地院食堂不给学生送饭而被迫绝食事件；地质部偷装窃听器事件；除此以外，此事引起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女儿肖力的注意，并都介入了此事；而地院东方红“朱派”和“蔡派”由此产生等等。因此，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就成为了地院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是由于事件发生在文革初期，现存的和已收集到的当年的文字史料不多（地院《东方红报》是1966年10月13日才开始改为铅印版，这是第三期，之前为油印版，多有丢失。），因此，此事件中所发生的众多事件其细节部分，主要还是依靠本书中相关人员的回忆录和相关专题来补充完善，此处不再重复。在这里，我们用七个方面当年的史料，来尽可能还原当年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真实状况。

（一）1966年10月13日地院《东方红报》第三期刊登了《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与展望》——东方红报评论员文章，其中有关二进地质部的情况叙述如下：

八、揪住邹家尤，炮轰地质部、火烧何长工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批判，就不能树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就不能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这个道理经过两次大辩论后已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

水有源、树有根，何长工就是地质部党委破坏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幕后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东方红公社》顺蔓摸瓜，决定揪住邹家尤，炮打司令部，火烧何长工。于九月五日一千多社员再次浩浩荡荡开进了地质部。

狡猾的邹家尤闻讯后却暗暗潜回地院，加紧了对《东方红公社》的反革命反扑。他们组织了内外两条路线的反扑。在外线造谣诽谤，诬蔑中伤，分化瓦解，企图拖垮《东方红公社》，在内线恐吓威胁，残酷打击，梦想一举摧毁毛泽东主义红教联和毛泽东主义红干联。

地质部党委利用不明真相的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围攻谩骂《东方红》同学，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甚至皮带、砖头、煤块、木棍都成了他们行凶的武器。他们还限制了《东方红公社》同学的人身自由。并且捏造了《东方红公社》“绑架”张以诚的“事件”。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九月十三日请邹家尤到《东方红公社》听取意见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绑架殴打邹家尤的“反革命暴徒行动”，印发数以几十万计的造谣传单，开动专车散发与全市、以致全国、制造社会舆论。他们控制了广播台，整天大骂《东方红公社》，企图分化瓦解《东方红公社》。最后竟然煽动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公社》同学供饭吃，企图饿死他们，对青年身心健康实行野蛮的摧残。还教幼儿园小儿童唱：“东方红，脸皮厚，原子弹打不透.....”的歌谣。在那个严峻的时刻，东方红战士红心连红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他们忍饥受寒，毫无怨言，斗志饱满，精神充沛，他们威武不能屈，壮志不可夺，发出了“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誓言，同地质部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艰苦卓绝、坚贞不屈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在外线攻击《东方红公社》的同时，内线也猛烈地攻击与《东方红公社》并肩战斗的毛泽东主义红教联，毛泽东主义红干联。地质部的亲信，我院党委书记王焕亲自出马，制造白色恐怖，把他们说成是“东方红的后台”，诬蔑东方红“是为了给高元贵翻案”，“方向是错误的”，还利用学生写什么“急电寻人”“撕开‘平等’的遮羞布”等各种攻击性的大字报，扬言“十一以前要整垮东方红”，当时真是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这场反革命反扑中，何长工坐镇地质部党委，调兵遣将，坐山观虎斗。邹家尤深居我院暗中指挥，一手牵着院文革，一手抓住《斗批改战斗兵团》，挂听

取意见之名，行反革命部署之实。王焕及工作队“御林军”中的干将充当单线联络员和担负一些出头露面的工作。形成地质部党委，邹家尤为首的前工作队党委及其“御林军”三线一体、上中下三结合的组织机构、共同执行践踏十六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力求垂死挣扎，挽救自己，破坏文化大革命。

年青的《东方红公社》胜利地经受了这场战斗的洗礼，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进我院文化大革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立下了奇功殊勋。她的战士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脱胎换骨、百炼成钢。对少人变成了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斗争，善于革命，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啊！

（二）李颖：“二进地质部点滴回忆”

二进地质部的点滴回忆

我们作为东方红的普通成员，参加了一进至四进地质部。其中二进地质部持续时间最长，我把我经历的二进地质部的一些事写出来。

◇ 西纠围困

9月5日午饭后，通知在操场集合，然后有近一千人，浩浩荡荡的队伍，从地院出发，步行经过学院路、平安里最后进入西四的地质部大院。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席地而坐。总部安排：女同学坐在中间，出身不好的坐在中间，而出身红五类、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坐在外围。行动由蒋良朴指挥，他代表东方红要求邹家尤出来做检查。而何长工来说邹家尤不在部里。正在双方僵持时，一会“西纠”来到地质部，把我们围起来，与外围的同学发生冲突，有同学被打伤，衣服撕破。我们派代表去找邹家尤，西纠守着大楼不让我们的人上楼，于是又发生了冲突。双方一直持续了一晚上。地院东方红是第一个进入政府机关去闹革命的，中央文革与国务院都知道事态的发展。第三天，突然西纠接到命令就撤离了地质部

◇ 东方红总部出现“叛徒”、“托派”——地质部偷偷安装窃听器：

我们进入地质部后，一天下午出现大暴雨，我们只能躲在楼边的屋檐下，

可是人多，不少人都淋湿了。那是北京的夏天，下午一阵大雨是常见的。第二天下午，暴雨如期而至，这时，部里的一个干部，拿了钥匙，打开了广场东边的礼堂门，说让大家可以进去躲雨。大家很高兴，不知怎么有人发善心，让我们有地方待。当时的礼堂十分简陋，就是一间平房。可是这成为了我们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基地啊！在礼堂里面，还有一间小房间，这就成为头头们讨论事情之用。

几天后，总部召集各年级负责人紧急会议，我们年级头不在，就让我代表参加会议。负责人会议在该礼堂开的，朱成昭说，我们核心组出现“叛徒”、“托派”，核心组讨论的事，包括我们的战略部署，第二天地质部的人就知道，一定有人出卖了信息，要求发动大家找出叛徒。开完这会，我把这事很放在心上，绕着礼堂外墙走一圈，看看小房子根本没有窗，不可能有人偷听。我当时又把核心组 7-8 人排了一下，认为不可能有人是卧底，或是当叛徒。但是核心组的裂痕从此开始。由于在地质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朱与蔡新平观点不同。回学校后，朱成昭就把蔡新平那些人叫做托派。从此，东方红内部的朱派和蔡派就产生了……。

1973 年底，我丈夫老张在部里参加科研项目，我探亲假就到北京，在部里住了几天。我见到熟人陈薇西，她叫我一同到她丈夫蔡某办公室坐坐，蔡某当时在部里政治部负责宣传，于是我们一起在蔡某办公室聊天。后出来见到老朋友李承达，他劝告我，不要与蔡某来往，那人人品很次。当年地院东方红在部里的礼堂里，是他去安装窃听器，偷听了你们东方红的消息！啊，7 年前秘密，原来是这么回事！在部里知道这事的人还有，只是我们一直不知道，包括朱成昭到最后也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

◇ 肖力就是李讷

9 月 15 日是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朱成昭上了天安门，见到了肖力，下午回来，马上在部礼堂召开全体会议。朱成昭向大家报告了最激动人心的消息。他说，他在天安门城楼见到肖力，站在毛主席身旁，原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肖力，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我们通天了！大家群情激奋。本来在地质部已经十天，大家都非常疲乏，这个消息，又使大家激动不已。有当时的照片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 绝食——看见朱成昭在吃饭

在地质部待了近十天后，学校食堂的工人不支持我们去地质部，于是工人罢工，不给我们送饭。这样，就开始了绝食斗争。实际上是被迫没有饭吃而抗议。第二天，我与王同学认为没必要绝食，还是要少吃点，维持生命与体力。于是我们到地质部门外的小吃店，买点烧饼。这时，看见朱成昭在里面吃饭，于是我们对他笑一笑，就离开了。当时我们对这事有点看法，就是策略上就不该叫绝食，而是人家不给我们饭吃。事后，他们解释，是肖力来了解情况，他们与肖力一起吃点东西，一边谈话。我们回去没与其他人谈起此事，但是有不少人也看到这件事。

◇ 我们睡在楼道里

我们刚到地质部的前几天，晚上就在广场上过夜。几天后，部里有人支持同情我们，把西楼的门打开，同意我们在西楼一层的楼道里过夜，刚开始，铺点报纸，后来，大家回学校拿了行李，在西楼楼道按系、班分配地方，打了大通铺住下来。在这期间，大家与部里不同观点的人，通过讨论或辩论，让地质部的人了解我们，于是部里有的人开始转为支持我们。

◇ 学校的同学来地质部支持我们

在校有不少同情东方红的人，听说我们绝食了，学校发了大卡车，不少人来看望我们。我们年级也来了好几位，其中还有二位女同学来看望我们。而且来的人，有的当场表示加入东方红，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我们的力量不断在壮大。

在此期间，外地院校也不断有人来地质部支持地院东方红。

还有在我们二进地质部没几天，地质部主楼五层窗外贴出“坚决支持东方红的革命行动”的标语，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我们也不断与地质部干部说了工作队整学生之事，地质部的干部也有不少人开始倾向我们与支持我们。

二进地质部后期，东方红一直处于僵持阶段，后来，朱成昭听了肖力的意见，以要回校过国庆节为由，于9月19日撤出地质部回到了学校。

◇ 斗批改趁机私自查看我们物品

在我们回到宿舍后，发现我的抽屉锁被撬了，箱子的锁也被撬了（还放了其

他同学的日记与信件)。这是我们年级“斗批改兵团”的周 xx，乘我们不在校，进入我们宿舍，私自撬开锁，私自查看我们的日记与私人信件。据说，她坐在桌上，高声朗读我们的日记。这个同学自以为是红五类，在地院“斗批改兵团”掌握大权时，对不同观点东方红的同学，就能这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撬开私人物品，随意检查私人日记与信件。这足以看到当时东方红受压制时，“斗批改兵团”是怎样对待被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东方红同学的。

(三) 何长工部长、孔丹在其回忆录中谈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

1，何长工当年曾说：“我们过去流血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

在何长工文革回忆录里，他对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是这样写的：

“九月五日至十七日，还是地质学院的那个群众组织，一千多人第二次来地质部‘请愿’。为了机关保密档案材料的安全并防止意外事件发生，请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都是中学生）来机关维持秩序。同时，地质部党委的同志们和机关广大干部、群众，耐心、细致地做来部机关闹事的大学生们的工作。并且在地质学院停止给进驻地质部的学生送饭时，部党委一边做工作让地院给学生送饭，一边组织机关食堂做饭给学生吃。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已不能进行了。”

“当时，我就感觉到：学生们这种做法肯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背后策划，其目的是首先把地质部搞垮，然后推波助澜，冲垮其他部委，最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副总理们。在那紧张斗争的过程中，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几次打电话给我，并派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机关或找我去开会，要求我一定要做好各方面工作，不能让机关瘫痪。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一个部，对国务院几十个部都很有影响。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关怀和支持下，我终于顶住了压力。我后来才知道，在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的时候，关锋等人受陈伯达、康生、江青委派，曾秘密来到地质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暗中支持造反派，火上加油。十月八日还是地院那派组织第三次来冲击，大闹地质部机关，召开了长达九小时的批判大会，到深夜十二点才离去。”

“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编到西北局小组。康生在西北局的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指责我：你知不知道地质部有人写信给《红

旗》杂志社，追查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的人。他说，这实际上是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在追查我和陈伯达。康生这两句话道破了天机。原来恰恰是中央文革小组在支持地质学院一个组织冲击地质部。”

“由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毛主席和林彪告黑状，使得我和薄一波、汪锋、李范五同志受到了点名批评。”

“刘澜涛同志在西北局小组会上传达毛主席在小组汇报会上的指示时，说毛主席讲：除薄一波、何长工、汪锋、李范五这四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外，你们其他人在运动中都不要承认这个问题。林彪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恶狠狠地说：何长工对党有刻骨仇恨，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凶狠。我们不向他进攻，他就要向我们进攻。”（详见《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2，9月5日晚上九点左右，孔丹带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大批老红卫兵来到地质部大院。事态激化，演变成西纠和地院东方红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四十八年后的今天，在孔丹的《难得本色任天然》（2013年10月香港出版）书中写道：

“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的反应。”

“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与地院东方红的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编者注：薄熙来、邹家尤的女儿等也参加了这次围攻，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的儿子孔丹也参加了这次西纠行动。）

孔丹当时还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

西纠最后在地质部大院坚守了三天，最后孔丹母亲许明（曾在周总理办公室工作）给孔丹电话，强制要求西纠立即撤离地质部，他们才撤离了。孔丹在回忆录里说，认为他妈妈的话就是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四）地院“斗批改兵团”所属的12652星火战斗队成员，以“观察员”身份奉命在地质部观看了“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大部分过程，并详细记录了9月5日至9月12日的全过程，形成了当时的记录摘要，并提交了当时地院工作队控制的院文革保存。现将这份记录稿公布如下，也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当年“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历史真实状况。

九月五日

下午：1：00

（2）学校“东方红”广播站通知，全体“东方红”战斗员到操场集合。不到10分钟，各个队并打着“红色巨浪”、“工读先锋”、“东方红”等旗号集合于大操场，蒋良朴发表讲话，说明去地质部的目的和要求：

1、要求罢邹家尤的官，回我院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

2、要求高治平回地院，澄清“6.3反扑”事实。

3、部党委承认我们派工作组（后改为毛泽东主义宣传队）是合法的，给以工作、生活的方便，保证人身安全。

4、以上几点必须在（下午）八点钟以前明确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地质部党委负全部责任。

（下午）3：15

一千二百多名社员来到地质部。唱完“东方红”、《说打就打》后，念几段主席语录，以后开始了……

蒋良朴：我们到地质部的目的，就是强烈要求地质部党委把邹家尤交出来，交给革命群众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声音极高，面对何长工同志）。何长工，你听到了没有？希望你立即回答。

何长工：同志们，同学们，这个邹家尤不是我们不交，根据双方协议，陶鲁笳同志说，双方辩论几次，然后邹家尤再回去作检查。鲁笳同志是我们的上级，

又是双方协议，现在，邹家尤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

蒋良朴：堂堂的地质部党委第一书记，不知邹家尤到什么地方去开会。同志们，我们相信不相信？（下边答：不相信！）我们地院二千多名群众要求邹家尤回去听意见，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不交，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部党委负责。

何长工：我不能单方面破坏协议。我们检查不深刻，可以再作检查，如不深刻，可以再作。双方的协议，我们单方面怎么能决定呢？我们接受鲁笏同志的指示，你们可以与鲁笏同志再联系。

蒋良朴：我们与鲁笏同志协议，哪条他是把邹家尤揪回去要双方决定？周总理的报告你听了没有？……现在，何长工回答：邹家尤到哪里去开会了？

何长工：我怎么知道？我是副部长，他也是副部长，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也没有告诉我。

蒋良朴：这真是奇谈怪论，一个堂堂的地质部党委书记、副部长，不知道副部长到什么地方去了。同志们，你们相信不相信？（不相信！）（转向何长工）何长工，你是吃干饭的吗？！问题你完全有权利也应该回答。

何长工：陶鲁笏同志和我们讲的嘛，这由陶鲁笏同志安排。

蒋良朴：我们需要的不是叫他去作检查，是要他去听取批判！

何长工：我们那时双方都派了代表，现在才辩了一次，再辩一二次，我们再来检查。

蒋良朴：何长工你再将陶鲁笏的指示讲一遍。

何长工：陶鲁笏同志对我说，双方辩论几次，看辩论情况再作检查。

某同学：我是二十个代表之一，陶鲁笏根本没有这样讲！

蒋良朴：我们要求部党委把邹家尤交出来，交给革命群众去听取批判，哪有不符合协议的呢！中央没有一条规定群众不可以要求邹家尤回去。

何长工：我们和陶鲁笏联系一下。……邹家尤检查还没有好。

蒋良朴：何长工，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要求他不是去作检查，是去听取意见。正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更要去听意见，才能检查得深刻，哪有不合理的？

何长工：我没有说不合理。

蒋良朴：同学们，要不要何长工下来听取群众意见？

群众：要……

×××：他不下来！

蒋良朴：提几点要求：

- 1、把邹家尤交给我们，回去听取意见，我们保证他的安全。
- 2、要求部党委给我们革命串联以方便。
- 3、把高治平叫回学校，听取群众意见（批评）。

希望何长工下来对这三个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去四个人请。

群众：正义要求，必须答复！（几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几遍）

（几个人上楼，下边正在大吵大闹。跑来一个去市委的人谈情况）

×××：刚才何长工说：邹家尤去市委开会了，陶鲁笳同志答应邹家尤回去听取意见和检查。我们61个人去市委，秘书处打电话说：今天各会议室都没有会议。后来，给何长工打电话，打不通。我们就回来了。何长工又说，邹家尤已经到地质学院去了。现在那里争吵很厉害。

×××：播送一篇大字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念着，学校汽车送饭来了）。

蒋良朴：同学们，工人给我们送饭来了，我们表示感谢！（拍手）可是，何长工没有下来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不能吃饭。

×××：何长工上去打电话，我们希望他赶快下来！

群众：何长工，请下来！

（何长工同志下来，但仍在继续播大字报）

何长工：同学们，邹家尤已经到地院去了。邹家尤要罢官与否，要请示一下。

蒋良朴：请你表示个人态度。

何长工：这个由广大师生说，我个人不好说。

蒋良朴：满意不满意？

群众：不满意！

蒋良朴：希望你发表个人看法，不代表党委。

何长工：同学们，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

蒋良朴：8月12日检查的情况（按：指8月12日邹家尤在地质学院所作的检查）……现在谈你的看法。

何长工：他的检查我基本同意。现在根据十六条，不够不深刻，再揭发，再批判，再检查。

蒋良朴：台下有 2000 多人喊“通不过！”这是为什么？你听到了没有？

何长工：我当然听到了。

蒋良朴：你怎么听的？为什么几千人的呼声不考虑？……

何长工：你们怎么不相信我，我没有办法，我今天不能答复。

蒋良朴：什么时候才能罢邹家尤的官？

何长工：上级什么时候批下来，我就什么时候答复。

蒋良朴：你准备什么时候报？

何长工：明天。

蒋良朴：这个问题就到这儿。……

第二，立即把邹家尤从地院叫回来，听取群众控诉、批评。请你马上打电话给他，叫他回来。

何长工：这个问题我这样答复，你们就是要邹家尤同志，他已经去了，你们非要他回来，我就不答复了。

蒋良朴：（重复一遍去市委开会的事）这是怎么回事？请回答！

何长工：他是去市委开会的，哪个房子我就知道了。他已经去地院了。你们非要他回来，我就没办法了。

蒋良朴：我们要求把邹家尤交给我们……完全应该交给我们，否则将会产生群众斗群众，这个责任希望何长工考虑一下。

何长工：要双方协商一段才行，今天非要邹家尤回去，市委让他回去了！……在毛泽东思想、十六条下，可以团结起来。他已经去地院了！

蒋良朴：你打电话叫邹家尤回来，有什么困难？

何长工：他已经去地院了，我管不着了。

蒋良朴：你不打电话？

何长工：这是个原则问题，我管不着了，他已经去了嘛！

蒋良朴：归谁管呢？……

何长工：我身体不好，支持不了！

（何长工同志坐下）

蒋良朴：向坐在地上的社员：同学们，你们累不累？“不累！”

（于是，叫何长工同志起来）

何说：“我有高血压！”

有的喊：“我也有高血压！”……

（何长工进去打电话。稍停，一个同学跑下来说：何长工又在耍花招，……我们已派人监视他了。）

蒋良朴：请下列同志到前面西边来。何培威……现在，何长工去打电话了，借这个时间讲几句话。今天我们第二次来地质部请邹家尤回去。何长工今天又说不知道，邹家尤知道了，地质部又耍了一个花招，慌慌忙忙跑到地院去，何长工又有了借口。邹家尤是个混蛋……我们警告何长工，群众斗群众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我们等一会，请胥光义代表何长工回去！何长工身体，老了，我们可以体谅一下。但是，为什么困难时期跳舞跳到十二点，就有他呢？

（下午）9：00

（秩序较乱，蒋宣布，我们先吃饭，吃完再等胥光义回答。）

（吃饭后，西城区纠察队员读了几段主席语录）

××：我代表东方红全体社员向西区纠察队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送来了精神武器。

西纠：我们念语录不光是给你们们的，是给全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的。

（高旗无畏念十六条。纠察队员进出于地质大楼）

蒋良朴：为什么纠察队员可以随便进出，不准我们红卫兵上楼？对此，向地质部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警告地质部党委，如果何长工、胥光义在短时间内不下来，我们就冲，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十一点十分发起第一次冲锋）

蒋良朴：我们警告西城区纠察队、地质部党委，谁阻挡我们去见何长工，我们就冲进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西城区纠察队总部和地质部党委负全部责任！

（冲锋。蒋用话筒大叫：“打人了，把我们女同学打得哇哇叫！”“这是什么行为？”抓住了一个所谓的“凶手”，吕财发赶紧照了相。冲进近百人。后稍静。

开来几队纠察队员。吕同样给他们照了相。)

(下午) 11: 40 左右

朱成昭: 报告一个消息, 刚才和国务院周总秘书长联系, 周总秘书长说: 你们可以把邹家尤拖回地质部斗他一顿(掌声), 还可以给他戴高帽子(掌声雷动, 呼声震天!), 斗完了再押回去, 看起来(掌声, 呼声)。

念几个条子: 要做两个高帽子给何长工、胥光义准备上!(众: 好!)

(下午) 12 点多, 在传达室。

朱成昭在拿一个电话机: 我是朱成昭, 吴德同志在吗? 我们这里情况很紧急, 有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我们的红卫兵和他们一一就是纠察队, 还有地质部红卫兵干上了。学校争执也很激烈。希望你和吴德同志……看一下……(左手边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朱成昭, 你的衣服撕破了, 一定要顶住, 坚持斗争, 这里大家斗争热情很高。把邹家尤关一个屋子里, 决不能让他们抢去!(又拿起左手电话机) 我们要求坚决罢邹家尤的官, 交给我们批判斗争。要求罢何长工的官, 胥光义先放下, 先抓住这两个再说, ……

近 1 点(注: 已经到了 9 月 6 日凌晨)。朱成昭说:

家中, 我们的人斗争很艰苦, 只有一百多人, 红卫兵、赤卫队已经攻到三楼, 他们打开另一个门冲进去的……

我们对国务院提了四点要求: 1、坚决要求罢何长工、邹家尤的官, 交给地院革命师生斗争批判; 2、胥光义停职反省; 3、改组地质部党委; 4、不达目的, 誓不罢休。周总秘书长说: 等一会儿答复我们。(欢呼……)

九月六日

8: 50, 东方红公社开始广播:

1、强烈要求纠察队立即退出大楼, 否则, 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2、最强烈质问何长工、胥光义, 你们心中无鬼的话, 为什么害怕群众, 强

烈要求何长工、胥光义立即出来。

何长工、胥光义赶快下来，纠察队赶快下来，不然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此时，东方红集合百余人冲主楼，一人站在桌子上指挥，并高举毛主席像，喊着，一、二、三，冲！冲！地质部很多女同志挡不住，被推、拉等，纠察队也被推拉等）

8: 55，第七次警告：

何长工、胥光义，纠察队应马上下来，否则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全部责任。

最强烈地质问何长工、胥光义，如果你们是革命的话，这什么不敢出来？对群众害怕得要死呢？

（一计不成，又改一计，新主意拿出来了）试问东方红公社领导人，你们为什么要纠察队退出主楼？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勾当呢？

9: 07，广播：东方红的战士们先下来，然后，叫纠察队、何长工、胥光义都下来。限时 5 分钟，否则我们就采取行动，把他们赶下来，看同志们同意不同意？（下，少部分人回答：同意！）

试问，你们采取什么行动，把他们赶下楼来？威胁、恐吓、造谣，这是东方红领导人的一贯伎俩！

9: 11，又广播：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已经撤出来了，纠察队必须在 5 分钟内撤出来，否则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现在时间是 9: 11。

（此时，东方红人内有人喊：“必须用武力解决，不用武力解决不了问题！”）还在继续冲主楼!!!

9: 13 时何部长下楼来，胥光义同志也下了楼。

9: 14，东方红广播说：纠察队同志，现在是 9: 14，还有二分钟，请你们赶快下来！

9: 20，东方红与纠察队吵架！

“请何部长拿出语录，我们共同学习最高指示”——广播员软弱无力，并带讽刺、讥笑！

学习语录七段。

9: 25, 李铁水(?)命令何长工翻主席语录。

东方红广播: 我们冲破重重障碍, 现在总算把何长工请下来了。现在, 我问一个问题: 同志们三番五次要求你下来, 你为什么不下来?

何部长: 我不是不下来, 我已经两次回答了你们的问题, 你们和纠察队协商, 楼上堆满了人, 不是我不下来, 我已经两次要求下来!

东方红: 何长工的回答有没有道理?(下答: 没有道理!)何长工不下来是害怕群众。现在, 我们再提出问题, 请回答: 立即把邹家尤揪回地院, 交给东方红声讨、批判、斗争!

何: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昨天你们要求邹家尤回校, 他已经回去了。并且在东方红总部里了。

东(方红): 我揭穿一个大阴谋。关于邹家尤回地质学院, 是地质部党委有意安排的。昨天我们要求把邹家尤交给东方红, 但并没有交给我们。邹家尤没有回地质部, 匆忙回地院去了, 因为地质学院有人保护。

何长工: 你们来, 主要叫邹家尤回去, 已经到地质学院了, 并到了你们东方红总部。回来的问题, 由你们地质学院决定, 我就没有权力了。还有问题没有? 没有我就回去了。……

9: 55, 学习主席语录(内容略)

东方红广播: 我们要正告何长工, 由此而引起的学生斗群众完全由你负责。

揭穿一个大阴谋我们派人要邹家尤回来, 邹滑头滑脑地说: 我已经回去了, 就不走了。以后, 院文革的人说: 邹家尤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毛主席的好学生, 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工作队是革命的。当时(指5号晚)邹家尤在我们的总部。但工人和红卫兵越来越多, 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挨了打。但, 我们始终没还手。这场群众斗群众的责任由谁来负呢?(下面回答: 何长工)……

(下午)7: 35, 东方红提出几点要求。19: 35

- 1、坚决要求罢何长工的官, 罢邹家尤的官, 勒令胥光义停职反省;
- 2、坚决要求改组地质部党委;
- 3、坚决要求部党委将邹家尤交给地院革命群众, 进行批判斗争;

4、坚决要求部党委将高治平交给地院革命群众进行批判斗争，澄清“6.3事件”；

5、承认派住地质部的毛泽东主义宣传队，并保证安全；

6、不达以上要求，决不罢休。

(下午)7:50, 向东方红社员们提出几条要求:

1、高姿态, 高风格, 要文斗, 不要武斗, 坚决做到不打人骂人;

2、每个东方红公社的社员严禁在外流动, 外出时, 要经战斗队批准, 规定二人以上外出。

3、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头脑清醒, 保持革命的秩序。

4、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 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 制造流血事件。

以上四条都必须坚决执行。

九月七日

下雨前, 院文革委员会用广播告诉东方红的人, 天气冷, 请到西楼和老饭厅去睡觉。广播五六次, 有一部分人进去睡觉了。下雨后, (3点26分)大部分都到西楼去了。在3点29分时以睡觉为借口, 冲进了主楼, 并拉出去两个纠察队员, 并照了相。

3点32分, 很多东方红的人从西楼和老饭厅里出来向主楼冲。广播说, 让他在一、二层住, 但他们非往三层冲。纠察队员站在楼梯上阻挡他们向三楼冲, 东方红的人大声喊着向上冲, 并拚命向下拉纠察队员。4点21分时拚命拉一个女同学, 由于其他同学的保护, 才没有拉下来。这次冲是蒋良朴带头冲的。

在4点48分时蒋良朴和郭凯等四人商量一下便又开始了冲锋。这次都把袖章拿下来, 一些黑五类出身的坏分子乘机捣乱, 纠察队员被拉下楼的很多。有几个人抱住翠微中学的杨巨的腿拉下楼, 从二层一摔扔在一层, 把杨巨左臀部大肌扭伤(有北医附属人民医院的证明), 同时, 杨巨的毛选语录、钢笔、鞋子都不见了, 裤子也被撕破了。地质部工人陈中凯被挤左胸痛, 人民医院看, 休息四五天。编辑田朴左肋骨挤伤, 休息四天(医院证明)。而且把陈中凯从楼梯侧旁向楼下挤, 后也拉住了腿, 但东方红的人还用手使劲地向下按脖子。更使人气愤的

是一些流氓用手去拉站在后排的女纠察队员，把女三中刘南南从三楼使劲拉下二楼，摔倒在地上踩上一脚。把女三中张兰兰的皮带从后边伸手解走，说是打人的凶器。把张英华拉倒，抢走了军帽，就要拿走，被地质部的人看见，一把抢了过来才没拿走。有个流氓还去拉一个女纠察队员的裤子，多么下流无耻。这些自称是革命者的人竟把干部于存盛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抢走，地质部的另外一个同志和四中纠察队的同志也丢了手表。这难道也是找地方睡觉吗？

纠察队的人说：“你们地质学院的问题我们不管，我们的责任是负责保卫国家机关和首长的安全，以及国家的机密档案！”

东方红的人说：“管他档案不档案，我们冲！”“什么国家机关，冲！”

在5点时，石油老师贾振远、蒋良朴、郭凯等人又开小会，一会又开始冲和拉人。在5点30分，东方红的人才停止冲，并派十名代表上三层楼，纠察队给带进一间屋子问他们：

“为什么揍人！”“为什么冲主楼？”

东方红的人答不上来，便说：“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见何长工！”

“你们为什么冲楼？”

东方红问：“你们为什么守楼？谁给你们的权力？”

“你们为什么冲楼？谁给你们的权力？我们就是要保卫国家机关，国家给有权力！”

“我们再次声明要见何长工，不是来辩论的。”直到最后把他们放出楼。

7点35分，西城区红卫兵来人很多，将东方红的人围起来。并把晚上打人的人抓起来好几个，其中有一个62623班郑裕斌，其祖父是上海最大食品公司的大资本家，父在那个公司工作，可能是右派。

晚上曾宣布绝食，不答复要求绝不罢休。后来又自动取消，说为了照顾同学的身体健康，改为静坐。

始终没有让东方红的人进主楼，他们在西楼和老饭厅也住得下了。

九月八日

8点35分，东方红核心组成员和各队负责人开紧急会议。

8点50分，广播“最强烈的控诉，最严重的声讨”，大意是：

昨天当着地质部红卫兵不明真相的纠察队在部党委的指示下，把我们九人监

视和看守了 21 小时，今天当着高治平的面，用武力把我们拖出来，拳打脚踢，又发生了法西斯暴行，对此，提出最强烈抗议和最严厉的声讨。

提出两点要求：

(1) 何长工，胥光义、高治平三人马上安排地点时间接受我们的控诉。

(2) 何长工派车陪我们去国务院，当着中央首长的面汇报这两天法西斯暴行的经过。

褚祥林等九人，66 年 9 月 8 号早 8 点

广播台：纠察队喊“造谣”。

9 点，地质部广播筹委会通知：

- 1、各单位除少数人值班，全体同志学习十六条和社论。
- 2、各单位生产办公室人员照常上班，进行工作。

9 点半，各系分别集合开会

9 点 55 分，九个人放回下来时，院内社员鼓掌“问候”，并准备派人去国务院。同时，纠察队陆续撤离。

10 点 15 分，广播物探战地伙委会通知：

- 1、一食堂规定，从 9 月 9 日起，没有餐卷的，一律不能领饭。对这一规定，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 2、中午吃米饭，大家准备餐具。

11 点 21 分，开出一辆摩托

11 点 25 分，航院 11 人（红旗大队）支援“东方红”

11 点 49 分，34 个红卫兵整队出后门。（注：应当时保皇派红卫兵）

12 点 10 分，东方红广播，各战斗队派一名代表整理大字报，按顺序排好。

12 点 15 分，开中饭。

13 点 05 分，广播“评论”：“警告何长工要悬崖勒马”，否则一切后果你负责。

请同志们想一想，地质部党委某些人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是不是“扒手”？

13点53分，广播“工作队在岩石教研室干了些什么？”

后门外胡同里贴大字报“工作队是典型的第三类”。

17点10分，东方红大队各队核心组成员到总部开会。

18点15分，广播通知：今晚八点在主楼前召开大会，希各连队整队入场。

20点50分，开会，整队“向右看齐”，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说打就打”，学习毛主席语录。

21点08分，朱成昭讲话，宣布开会内容：（1）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月；（2）纪念“东方红”诞生一周月；（3）吸收新战友参加“东方红”；（4）揭发、批判、控诉。

21点11分到37分，播十六条。

21点40分，田春林讲话。21点48分，批准附中孙小华加入东方红，戴袖章，孙小华讲话；批准广州两女同学为“名誉社员”。

朱成昭介绍别人给东方红的礼品：

菠萝一个（华南工学院——航院红旗——东方红）

梨一个（五个小孩送的）

大苹果（河南送的）

22点，播送炮轰河南省委的呼吁书等。

播送一些大字报：“何长工心中没有毛主席”，“地质部的又一大阴谋大暴露”。

23点22分，航院红旗大队40~50人来支援并讲话。

九日0点30分大会结束。

9月9日

5:40，东方红开始广播

10:55，各班战斗队负责同志到总部去开会。

这时北京女三中来东方红揪大流氓（杨金莲、刘××、×××等）

10:55，广播：“就对东方红的几种非议谈看法”。

1、党政机关就是党政机关

2、……（原件不清）

揭穿一个政治大阴谋

.....（向地质部）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包办代替，我们革命.....宣传十六条的，是群众的自发行动，这是群众的创举。

批一个观点

地质部不属本单位。我们不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冶金部、林业部等。阻力实际来源于地质部压制革命的纲领，工作队犯严重错误与地质部无关吗？有没有当权呢？（注：这些话，得动脑筋好好理解。比如“地质部不属本单位”。对。但是，是不是地质学院的直接上级？地质学院的工作队是不是地质部派的？地质部是不是当着地质学院的家呢？）

12: 00 左右

岩石教研室孙桂英等几位先生....进入地质部....孙在地质部门口....想走而未走，告诉一个同学：“你们要坚持到底，取得胜利！”之后，又告诉另一位先生：“来到先问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你问这干什么？参加辩论都可以吗？”在东方红支持西安地校时，孙桂英又与其他三人密谈，在主楼前靠右边（内容不详），没注意啥时孙离开。

12: 20, “东方红公社紧急集合，并把其他同学叫一下。”

首先说明集合原因：西安地校几十人从后门进，门岗不让后，何部长进了门。西安地校的人问：“为何官兵不一致？”门岗答曰“官兵不一致。”他们抓住这句话要门岗检查。

地质部同志检查。检查行不行（答曰：不行！）

学习主席语录针对犯错误部分

呼口号：“坚决支持西安地校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西安地校战友们的合理要求！”

战友们，你们辛苦了，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坚决向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作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无保留地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和要求！.....

刚才那个同志（检查得）深刻不深刻？（答曰：不深刻！）

……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改……你的架子越大，人家越不理你……

东方红：同志们，西安地校进行了很多斗争，来到了北京，又与地质部斗争，请他们介绍斗争经过。

西安地校：介绍他们……

东方红：要求合理不合理？（合理）（合理请回答！）

西安地校：我们到广播室，他们说过了，请地质部的同志协助找一找。何部长答应了叫他作检查，没必要再跟部长谈，检查深刻不深刻，能不能通过？（通不过，少数人）

〔注意〕西安地校的正当要求被朱成昭利用了，朱把矛头转向了何部长、胥光义同志。

朱成昭：刚才西安同学介绍了情况，一个部里同志讲了，“官兵不一致”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在地质部不一定错，地质部就是官兵不一致。我们请何部长不要这位同志检查了，胥光义下来好不好？（好！）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位同志不一定下来了，他已检查了，不一定再检查。

……

东方红：何长工部长，同学们在太阳光下等你，希望你赶快下来，向同学们解释。

朱成昭：同志们，刚才我们说，何长工不下来，两方派十名代表，但，地质部红卫兵说，不准东方红进去。同志们，捍卫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是不是只有西安地校有责，我们没责？（不是！）对，我们要去！不让进怎么办？“派代表去！”对，不让进也得去！

再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求何长工下来，只几分钟，他说：“61岁了，身体不好。为了照顾身体，派代表，抬沙发，放在树阴处，好不好？”

“好！”（派了四名代表）

（下午）1：13，欢送我们的代表，专请何长工部长。——朱成昭

朱成昭：同志们，我们来地质部不少（时间）了，请何长工也不少次，都时

间很短，我们有许多心里话要与何长工讲。今天，好不容易请下来，请同志们准备条子，我们好安排。

[注意] 同学们感到没什么意见，有些乱，不够严肃。

播送一个条子：阶级斗争，要严肃对待。……

何长工下楼来。（有一同学在主楼门口给打了一把伞，……被推开。他还恬不知耻地打着伞，一直把何部长护送到树阴下，还打着伞不动，真可谓对首长“关怀备至”）

东方红：何长工在和我们谈话中，说要替那们同志检查，为什么呢？

何长工：……犯错误是我们部里教育不够，管教不严，我也有责任……

东方红：你为什么替那们同志检查？

何长工：我是领导，应该检查。那个同志，也应该检查。

（东方红抬沙发，让何部长坐，何说：我虽身体不好，要沙发干什么？又不是老爷，又不是……抬沙发干什么呢？）——意图何在？

东方红：何长工讲……（不清）为什么订这个制度？

何长工：……略

东方红：为什么不把大门打开？

何长工：略

东方红：提出开门和进主楼问题

何长工：很气愤地回答：开就开吧，把大门打开，楼要进就进，一切生产单位都没有什么秘密。

何部长说完就回楼了。

语录：“对待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帮……”

这时，不知胥光义同志从哪儿来，被朱成昭看到，说：“请胥光义同志来和群众见面！”胥光义不理他们，只和西安地校的同学招手，说话就进去了。胥在主楼前。

朱成昭：今天，何长工给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很不满意。今天会没掌握好（一根稻草也没抓住），我向大家检查。何长工的时间很宝贵，我们很多问题没提问，以后，保留再提问的权力，好不好？（好！）“希望你们赶快打开大门，主楼畅通

无阻，想找谁就找谁。希望地质部红卫兵给我们革命串联以机会。”

念个条子，强烈抗议文革委员会阻挠我们贴大字报，不给我们浆糊，他们说，没办法。其实是他们对革命的大字报怕得要死，筹委会啥给我们浆糊？

朱成昭：为了掀起四大高潮，提出要求，希望提供笔墨纸张，希望考虑我们的要求。再派代表，协商一下，下午再说。

(下午) 1: 52, 下午三点开会，地点在旧饭厅

17: 00, 北京戏曲专科学校.....40 多人代表 300 多人

戏曲代表.....发言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们来到地质部后，遭到地质部党委一小撮另有用心的人的阻止，他们对我们进行围攻，.....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17: 20, 戏曲专校滚蛋了。

17: 30, 东方红吹哨，到旧饭厅去了（开会内容不知）

23: 40, 东方红集合整队。

(九月十日)

13: 30, 广播：责问何长工（新街口小学），关于.....

15: 40. 东方红贴出“通谋”大字报（详见大字报选抄）

16: 30, 东方红贴出通告：政法学院斗争杨秀锋，各系派 50 名代表参加。

九月十一日

[注意] 3: 32, 东方红走了一批人，估计可能市委去了。据说是接待组去的。

6: 24~6: 43, 广播大字报和社论。

6: 43, 东方红总部通知：毛泽东主义宣传队，高、无（注：可能指“高旗无畏”）出版组，采访组，各系负责宣传的同志，各战斗队负责同志，.....7: 30 在总部开会，如负责人不在，派代表参加。

7: 32~8: 02, 回来 67 人（估计是从市委回来的）

8: 14, 广播揭发何长工的大字报。

九月十二日

10: 00, 东方红社员去饭厅开会, 有人在外面议事。

13: 20, 全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紧急集合, 宣布, 明天中午开的大会。(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司令部给我们了一个名额, 东方红只有一人上主席台, 要红卫兵, 必须是红卫兵(?), 观礼 85 人, 他们(指红卫兵) 40 人, 我们 40 人(红太阳 5 人), 另 80 人担任纠察队工作, 要红卫兵, 必须是红卫兵, 80 人分 5 个系, 每系 15 人, 高旗无畏 5 人, 各系选一负责人, 由选举讨论, 上主席台的人也由大家选举讨论。

11: 50~17: 00, 东方红六人进入西楼 232 室, 无理取闹。……就根本不讲道理, 后来派出代表, 和他们谈判, 剩下四人被赶出去了。

16: 15, 部机关几个同志与东方红人员进行争论, 因东方红人在未通过本人及部文革筹委会的情况下, 贴出大字报, ……有人说, 我们一定要搞垮地质部。

17: 00, 王大宾讲, 在院子里设立辩论台。

21: 00, 以后发生的几件事(直至九月十三日三点)

1、朱(成昭带人)夜闯入地质部家属大楼“抓黑帮”

12 日晚 10: 00 左右, 100 多人, 声称来地质部家属宿舍进行“串联”, ×观员问, “了解情况”。进来后大喊“我们是来抓黑帮的”。分了队……是大字报点名的人进行“串联”“访问”(告家属, 要抓二十个黑帮), 1~5 层全部被敲了, 冲进屋里就说, “你们是何长工的知情人, 快起来揭发”, 大讲, 何长工如何……

王义偕(宋应秘书, 咒骂大跃进), 汪涛(包庇地主), 副处长王贵玉(攻击何长工)干部部赵魁涛, 办公厅张一平(宣扬合二而一), 干部部邹中新、杨彩衡(反动言词)大小处长以上的干部, 后被赶出来。而刘万恩躲在楼下, 林小秋藏门后, 后被揪出, 无学生证, 只好作检讨。

田春林给代表说: 这些人都是知情人, 可以提供何长工的材料。

2、到黑帮宋应家里搞“串联”, 有 20 多人, 因大门已封, 他们高喊打门也没开。只好在门前坐, 没进去, 直到 11 点后才回去。

3、50 多人到黑帮刘汉生的秘书丁路家去“造反”。

门已关，他们翻墙而过，踏坏了很多砖瓦，但他们不斗刘汉生，只要何长工的材料。并××围丁路，他揭了刘汉生问题，写了很多大字报，刘汉生恨之入骨。东方红进去后，翻箱倒柜，丁路穿拖鞋跳窗跑回地质部。2、3点，丁路回去拿××文件，不让进门，从窗内递出，并且态度很凶，说：“你们给我划了黑帮……”

4、斗李轩（黑帮），家40多人，搜集何长工的材料。

5、夜11点，在主楼，贴出了“最后通牒”。

1) 要求明天派汽车到天安门，120人，三辆大卡在；

2) ……

冲上主楼200人，楼门挤坏。派了六个代表，进部长办公室。进去后，又增加一个条件，在兵马司被抓的人一切后果由部党委负责。后条件不答应。一直……少很久。最后，伏庆是说：“我们是找党委的，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明天再来找何长工！”就不欢而散了。

（五）由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发表在1967年10月31日《东方红报》第90期上，其中有关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事件的描述如下：

九月七日，他们调来了“宪兵队”——西纠，凶神恶煞地把东方红的队伍重重包围，以保护“老干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点名的三反分子何长工）为名，大打出手，撕衣服，揪头发，皮带抽，砖头砸，并抓去了八名东方红战士，进行毒打，关押达二十小时之久。

在9月6日调来西纠挑起武斗的同时，他们又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攻势。粗暴地歪曲“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的精神，一天广播几十遍，大叫大嚷：东方红违背了中央精神，不在本学院搞文化革命，影响部机关的生产，攻击东方红“影响了他们斗黑帮。”他们制造了法西斯的“九·七事件”，然后又加以歪曲，反咬一口，写了《严正的联名抗议书》，以及所谓的揭发控诉书等等，到处张贴，散发全市。

当他们上述的阴谋都失败后，最后，九月十四日起，他们挑动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战士送饭，然而，饥饿算得了什么？东方红战士照样学毛选出早操，还召开了生气勃勃、充满革命造反精神的联欢会。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革

命战友，北航红旗、北工大东方红等在斗争艰苦的时刻，给地院东方红小将送去《毛主席语录》，棉衣和食物。

（六）《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

该文发表在1967年3月9日和1967年3月15日《东方红报》第16、17、18期上。其中有关西城纠察队在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的表现，叙述如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旗，四进地质部，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为首的大小牛鬼蛇神勾结利用西城纠察队，镇压“东方红”。

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上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

地质部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何长工、邹家尤、胥光义一手操纵的。何长工这个反党老手曾假惺惺地说，“我们过去流血流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胥光义说：“地质学院是何部长一手辛辛苦苦地搞起来的。”西纠则说：“何长工是跟毛主席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还“保证”邹家尤没问题，造谣说：“中央发给了他们一个给予保护的证件。”

西纠刚一到，何长工就如见到了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口里大骂“狗崽子”、“混蛋”，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人保驾。他们爱谁，恨谁不是很鲜明吗？

地院“东方红”当时虽处于少数，但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保皇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西纠拼命保皇，地院“东方红”一反到底，斗争非常激烈。西纠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命令他们撤退，直至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

地质部事件终于以革命造反派的胜利告终。⁹

(七) 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时珍贵的历史照片：



9月5日地院东方红向地质部行进途中



地院东方红夜晚睡在地质大院



后来东方红睡在西楼的楼道里



地院东方红在地质部机关大院



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在地质部机关大院围攻地院东方红



9月19日晚地院东方红返回地院途中

第四篇 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 审查的地院师生

目录明细

一、北京地院因文革而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317
(一) 文革开始	
(二) 工作队在校时期	
(三) 工作队撤离到地院革委会正式成立的权力空白期	
(四) 地院革委会时期	
二、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而遭受打击、挨整的地院师生	320
(一) 对全院师生遭受打击、挨整的统计	
(二) 探工系师生遭受打击、挨整的统计	
三、地院革委会领导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而遭受关押、 审查的地院师生	326
(一) 地院革委会四个通告（令）等	
(二) 《东方红报》点鬼台	
(三) “高安反革命集团”	
(四) 《东方红报》点名批判的地院师生	
(五) 院革委会扣减工资、冻结存款的通告和通令	
四、军宣队进驻地院后，因文革、因清查“五一六”分子而遭受关押、 审查的地院师生	335
编者按	
(一) 军宣队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名，隔离审查人员	
(二) 地院革委会被审查的人员	
(三) 在江西五七干校接受隔离审查人员	
(四) 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地院学生接受隔离审查人员	
(五) 被中央文革炮制的“叶朱反革命集团”受审成员	

一、北京地院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统计

蔡新平 收集整理

前言：根据前一段时间向校友征集“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信息”在各校友群推出后，得到了部分校友的反馈信息。据此重新补充订正后又整理了一份统计名单，并在此向校友及有关知情者再次征集意见和新的信息。

（一）文革开始

光开敏，物理教研室主任，文革初期开始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卧轨自杀。

（二）工作队在校时期（1966年6月8日～8月13日）

暂未查到有非正常死亡事件。

（三）工作队撤离到地院革委会正式成立的权力空白期（1966年8月13日～1967年4月3日）

（这期间工作队建立地院院文革掌管行政事务，无权过问运动。造反派“东方红”和保守派“斗批改”两派争斗，在对学校的控制上各有千秋，1966年8月～10月保守派占优势，10月后到1967年4月东方红独大。）

刘彩云，女，学生。东方红大队成立不久，工作队刚撤离后的某一天（具体时间待查），东方红去地安门地质部干校找工作队副队长卞固，一名参与行动的女生因车祸致死。东方红本来准备搞纪念活动的，但她们班保工作队的人在她遗物中发现了她与彭真有照片，还有有很多丝袜。这同学本是学校的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的模范青年，现在被说成是彭真的修正主义黑苗子，为此有人大做文章。纪念活动作罢。

（四）地院革委会时期（1967年4月～1968年8月）

1，与串联和外地武斗有关的死亡

卢福田（一说叫卢布田〔音〕），男，水文系三年级（63级），武汉人，我的老乡，我们同一天入学。1967年8月1日，在武汉举行的大型渡江活动中因组织不善发生大规模踩踏溺水事故中意外死亡。

李全华，男，地质系二年级，地院东方红广播台编辑，1967年5月6日，

成都 132 厂发生武斗冲突，造反派冲击该厂、保守派产业军开枪“护厂”造成打死 48 人，打伤 127 人的流血惨案，李全华在前去声援造反派的宣传车上头部中弹身亡。

杜金山，男，15632 班学生，和我同班、同宿舍上下铺。他父亲是南京大学职工，姐姐在北京邮电学院任教。文革前我们最要好。文革初期他是我班少有的几个一直支持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参加了串联发起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是东方红最早的成员。我和朱成昭发生分歧后，他站在朱成昭一边。朱成昭 1967 年被中央文革罢免东方红负责人后南下广州，是杜金山打的前站。从广州回校后我曾和他长谈，他心灰意冷，决意出走。1967 年 8 月，在去江西的轮船上，因下舱有人玩枪走火，打中腰部，到岸后因流血过多，到医院已抢救不及死亡。我帮助他姐姐处理了后事。

2，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期

王鸿、薛挺华夫妇：王鸿，男，地史研室教员；薛挺华，女，古生物教研室教员。夫妻俩才华出众，1957 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地史、古生物教研室也分为两派，他们与以湘江队为代表的倾向“二团”（蔡派）的老师更接近。在革委会掌权期间，通过整王鸿、薛挺华以整蔡派。王、薛夫妇是分开隔离审查批斗的。薛不堪折磨，先上吊自杀。王鸿被单独关在西一楼一层、锅炉房对面的小屋，得知妻子自杀后，在骷髅架床的竖柱上用他四岁左右儿子王磊的背带裤背带上吊自杀。现场暖气片上粘着不少头发，估计是他先打算撞死，未遂，又改为上吊。他脚前整齐地摆放着儿子一双小鞋，可知他多么想念儿子。听说在隔离期间，曾让他去幼儿园接儿子回家过周末。革委会在王、薛夫妇死后，对死者展开了新一轮批斗，广播上说他俩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王鸿留给儿子的《示儿》诗是抄录陆游的原诗，也批判为是“反攻倒算”、“不甘心失败”的证据。

胡德润，男，外语教研室教师。死因待查。

杨雨忠，男，探工系 71621 班学生，东方红核心组成员，地院革委会常委，在受到专案审查迫害中于 1968 年 5 月 30 日午后在地院北五楼东头顶层跳楼自杀，留有三封遗书，一封给家里，一封给专案组组长王焕（地院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三结合干部）；一封给革委会主任王大宾。这三封遗书内容至今没有公开，王大宾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此事。杨雨忠之死留下了最多的谜。聂树人回忆录中揣测是因为审查朱成昭问题造成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后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在 1983 年曾当面向我提到杨雨忠之死，似乎与平顶山文革中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事件有牵连（孔时任平顶山特区党委书记）。因当时没有询问孔勋说法的来源，多年后有关人员多已离世，近年再作调查，迄无结果。

（五）军宣队控制地院和迁校时期（1967年9月~1977年上半年）

李明哲，男，岩石教研室老师。文革初期反工作队，参加东方红后是驻国家经委联络站负责人。在江西五七干校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屡遭严刑逼供，遭残酷殴打后失踪后，在山后发现遗骸，军宣队宣布是逃走后自杀。死因成谜。

于丕休，男，构造教研室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但仍在教研室工作。文革中革委会掌权后，大约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自杀死亡。（陶世龙老师提供）

孙明哲，男，在军、工宣队控制期间，约1969年自杀死亡。死因或与病痛有关（据说患了脑癌）。

刘冠军，男，老教授，地院建院时即任体育教研室主任。与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等老一辈知识分子齐名。文革开始后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去五七干校时已届高龄，单身前往“接受改造”，并在“清查五一六”中受到追查，身心交瘁，在劳动中不幸猝死。

（六）其他与文革有关的死亡

李洛根，男，15632班学生，和我同班。他是1962年入学的，学习期间体检发现肺结核，休学一年后1964年分到我班。可能因插班，和大家生疏，文革前在班上很不活跃，基本是旁观者。但他到河南串联后，支持二七公社，成为郑州文革的活跃人物。二七公社遭到镇压后，他也被捕，后虽平反，但在清查五一六时又受到审查。听说还遭到过两次陪杀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得了自闭症。毕业分配到河南地质局十八地质队，后并入地质二队，因干不了活，大队让他病退回老家河北，没过几年就病故，终生未婚，家中还有一个弟弟。虽然死在文革后，但绝对与文革中的恐怖遭遇有关。

杜洪涛，男，古宝琳日记摘抄里提到：“1967年11月29日 追悼刘彩云、卢福田、杜洪涛三烈士。不用低着头默哀，昂起头，直视着前方，继续战斗……”，刘彩云和卢福田已经有记载了，但杜洪涛尚无人提供信息。

李仲学，男，探工系64级学生，与古宝琳同班，毕业后分配在陕西，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受到专案组迫害，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最后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古宝琳回忆录有专章写李仲学之死。）

其他

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和军宣队抓五一六期间还有多名自杀未遂者，我记得的有：煤田教师李思田（朱成昭专案组负责人），岩石教研室一个教员，还有地质系一个干部。

传说在福建三明地区武斗中有地院三人死亡，但无具体信息，征求知情人提供。地院学生和老师在文革后期抓“五一六分子”期间，虽然不一定在地院，特别是学生分配离校后，如与抓“五一六”有关的有非正常死亡，都应算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除了李明哲、李仲学等，是否还有其他人？期待大家提供信息。

2017年7月补充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7月30日《昨天》第95期）

二、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而遭受打击、 挨整的地院师生

（一）1966年10月13日《东方红报》评论员在第3期上发表了《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其中把工作队从1966年6月13日至8月13日两个月的领导期间，以“反干扰”为名，在地院开展的这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是这样记述的：

六月二十九日，工作队又搬来李人林，作了一个反革命报告，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并美其名曰：“反干扰”。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便“名正言顺”地在地院铺展开来。

“反干扰”共用了二十三天，占工作队进院时间百分之五十尚多。“反干扰”规模之大，危害之深，是无以复加的。

工作队在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整整两个月中，他们没有组织群众斗过一个黑帮，没有开过一次斗黑帮的会，把主要力量都集中在斗争群众上。

在“反干扰”中，工作队用杀一儆百的手段，把带头反对工作队的十三名干部教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辟大字报专栏进行围攻，召开几百人至上千人大会斗争，并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处理其中八人。他们之中有人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被认为是“通不过”，继续进行逼、供、信，“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从而扼杀了群众的革命精神。

工作队把革命学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庆祝党的生日时，召开大会斗争无辜的“高旗”“无畏”同学，并开辟专栏批判他们，把他们打成“反党干将”“现刑反革命”，“特务分子”。工作队还下团内清洗令，罢掉了反工作队的同学的官，逼同学写检查、作交代。被迫承认反党或犯有立场错误的不下三百人。下面是“反干扰”恶果部分统计表（学生中的）

班级数		被大字报点名者					被撤职停职者					被迫检查者	整理材料者
		总数	红五类子弟		党团员		总数	红五类子弟		党团员			
总数	统计数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37	68	219	115	52.50%	149	68%	66	53	80.30%	58	87.90%	435	125

在“反干扰”中，工作队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一手泡制的伪院文革全是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为我院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又设置了一块绊脚石。

“反干扰”是工作队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革命群众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犯下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反干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挫折，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再次大暴露。历史证明，“反干扰”糟得很！

上文中所提到的，被工作队确认的十三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名单如下：

1. 李贵：院党委委员、教辅处处长，党员
2. 王大来：原探工系团总支书记，党员（注：当时作为干部培养对象，调到京郊农村公社任职）
3. 安静中：院团委书记，党员
4. 郑伯让：地质系副主任、岩石教研室主任，党员
5. 江祖如：地质系政治辅导员，党员
6. 张海涛：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7. 刘万翔：地质附中教师，党员
8. 沈孝宇：教师，党员
9. 王瑄堂：教辅处干部，党员
10. 陆炎德：探工系总支副书记，党员
11. 陶世龙：院教务处干部
12. 李明哲：岩石教研室教师

13. 傅昭仁：区地教研室教师，党员

（二）从探工系“反干扰”看“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探工分会《反逆流》战斗队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如此，地质学院也如此，而我院探工系更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打击一大片

探工系共有教师、干部一百零九人（当时在校仅九十三人），学生四百九十四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探工系就是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因此，探工系被工作队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反干扰”中被工作队打成“探工黑分店”。当时，工作队党委公开说：“探工系这次是重点，反工作队最坚决、人数最多、最活跃，开“黑会”最多，不能放过。”系工作组也宣布：“探工系前阶段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反工作队最积极，还公开反对我。”

基于这种颠倒是非的估计，“反干扰”时，工作队员激增至二十三人，平均每二十七人中就有工作队员一名。当时，工作队党委、工交政治部均有人亲临探工“蹲点”，搞反革命镇压。甚至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也三赴学生班中，搞分化瓦解工作。

从“反干扰”开始，工作队党委就认为探工系“烂掉”了，从而进行了夺权和分类排队。

夺权、罢官

1. 教师、干部中原九名文革成员，因反工作队，全部被撤换。同学中也大部被撤换。

2. 党总支书记、委员七人中，五人被罢官，甚至当时尚未返校参加运动的总支委员也因“不可靠”被罢官，总支工作由工作组接替。而党支部正副书记十人中，八人被撤换。学生中党团干部也大部被撤换。

分类排队、大片打击

根据李人林的反革命指示，当时把探工系在校九十三名教师、干部排为五类。

“探工黑店”的“首恶分子”和“后台”十人，这是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党总支正、副书记二人，党总支委员二人，党员教研室主任二人，辅导员三人，

一般教师一人，教研室副主任一人。

所谓“骨干分子”二十人，这是分化瓦解对象。

一般分子计有三十多人，这是争取对象。

“立场动摇”者共十多人，这是团结、利用对象。

“左派”，只有三人，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而其中一人为恶霸地主出身，严重丧失立场，错误严重，有很大民愤的总支副书记；一为富农出身，初期镇压革命群众的总支委员为何长工的亲信，有流氓行为的群众。

根据这个排队，在“反干扰”中，工作队对探工系的大批教师、干部和学生，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当时对探工系革命教师、干部、学生的迫害斗争情况，可由下表看出：

探工系学生受迫害情况

总人数	大字报点名批判人数	被盯梢人数	打成“小 黑帮”人 数	被迫检查 人数	备注
493	50	17	39	352	当时有大批同学是“反干扰”前二、三天才回校

探工系教师、干部被批判、斗争情况

在校 人数	全院性斗争的			全系斗争或准备斗争			大字报专栏批 判		大字报点名 批判	
	人 数	党 员	备 注	人 数	党 员	备 注	人 数	党 员	人 数	党 员
93	2	2	均系 总支 委员	8	7	辅导 员 3 人 教 研 室 副 主 任 2 人	11	9	38	25

为了打击广大革命师生、干部，工作队采用了极其卑劣和恶毒的手法。

1. 歪曲受迫害人的出身历史和政治表现。如说一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志，“家

是国民党窝”；把有的同志无中生有地说成是“小流氓”，“个人野心家”，对党有“刻骨仇恨”……等，借以达到挑动同学仇恨这些革命教师、干部的目的。

2. 分化瓦解，拉一批、打一批，力求全歼。

如对“首恶分子”中的二人，工作队开小会“攻心”，开大会斗争。并对“知情人”和其他“骨干”以挽救为名，行政治贿赂（立“功”赎罪）之实，逼迫引诱他们“揭发”。

而七月二十六日，在工作队撤离前夕，还向法院政治部，保卫科布置“内清十二条”的黑文件（由地质部保卫部发），对探工系革命师生、干部进行审查、排队，以便清洗。当时连劳改地点在宣化、五台等地均已确定。

3. 对同学施加压力，挑动学生斗干部。第一次斗争王xx大会开过后，因气氛“不足”，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卞固大发雷霆，说：“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斗争观点”，强迫同学讨论改进办法。为此，一工作队员段XX逼迫7163.2班一同学上台发言，并让他拿一个篮球当作王XX同志的头，一边骂、一边练习发言。真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4. 限制人身自由，剥夺政治权利。

当时被定为“反党”的同志，在“反干扰”时不准外出，有人盯梢，甚至洗澡均有人“陪同”。有人干脆不发出门证，连买日用品也要请示。有的十七级以上干部不让听党内文件传达，有的同志，甚至被禁止参加党团活动。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残酷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系，同志间人人自危，互相怀疑，“反干扰”前生气勃勃的局面完全消失了。

七月二十九日工作队宣布撤离后，反动路线通过保皇组织院文革、红卫兵、工人赤卫队等继续对革命干部、教师、学生进行迫害，工作队临走前公开宣称：“干部、教师的问题，待运动后期处理”，甚至在中央有关撤销工作队的指示下达后，工作队仍继续在探工系保留十二至十四人的材料组，工交党委张XX公然说：“干部的材料不准退。”

在这种情况下，院政治部在八月二日曾通过一个五百多人的大签名，对探工系一百八十多人贴出的彻底清算工作队执行的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进行大围剿。并且通过陪斗、抄家、骂“狗崽子”，甚至公开斗争被工作队打成“反党”的革命干部，来继续对探工系革命师生施加压力，进行政治迫害。

保护一个人

工作队在实行打击一大片，把探工系大批教师和干部打成“三反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骨干”、“黑分店成员”的同时，对于具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丧失立场，运动初期镇压革命群众的系总支副书记王X却十分受护，甚至封为“左派”，作为“反干扰”的依靠对象。

王X是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大小姐，是地主阶级的孝女贤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探工系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千百张大字报对其进行揭发和批判，并且强烈要求开群众大会对其进行批判和斗争。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工作队，对群众的革命行动和要求却大泼冷水。一方面千方百计阻挠和压制斗争会的召开，一方面则划框框定调子，说什么“王X的问题是生活作风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王X至多是二类干部”等等，拚命保护她过关。在“反干扰”期间，王X更成了工作队的大红人，工作队把探工系的党政大权全部交她，让其发号施令，王X则恬不知耻地说：“探工系只有我和X X X是左派”，态度嚣张一时，不可一世。在工作队的庇护下，王X在工作队和探工系之间上窜下跳，到处煽阴风、点鬼火，挑动学生斗教师、挑动学生斗干部，大肆进行打击报复，利用“反干扰”发泄私愤，进行阶级报复，充当了工作队的可耻打手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可悲的殉葬人。

总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所表现的就是这样，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个人。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1967年4月12日《方红东报》第26期上）

编者按：从探工分会发表的该文可以看到：在地院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仅一个系，就这么多师生被迫检查、打击、挨整、点名批判、斗争……。当时全院共六个大系，可想而知全院遭受打击、挨整的地院师生是何其多也！这就是文革年代的时代特征！

三、地院革委会领导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而 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1967年4月3日——1968年8月25日)

(一)地院革委会从1968年1月16日起，执行上级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发布了四个通告（令），并于1968年1月19日起在《东方红报》第112期开辟了：《点鬼台》新栏目，对具体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点名批判。现将这四个通告（令）和《点鬼台》转录如下：

1, 001号通告：

革命委员会通告

〇〇一号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我院广大东方红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揪出了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小丑。这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我革命委员会坚决支持这一切革命行动！

十几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我院的代理人周守成，聂克之流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任人唯亲、招降纳叛，把一些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拉入了我们的队伍，甚至拉入了党内，有的还钻到了掌管全院水电、机要通讯的要害部门；更有一小撮混蛋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美帝、苏修特务提供情报，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今天是该总清算的时候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黑司令部倒台了。这一小撮牛鬼蛇神也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打倒，为此我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如下：

一、限令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流氓阿飞、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及一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家伙必须在此通告发出四十八小时内到指定地点报案自首不得有误，否则由群众揪出后将严加惩处。

二、从即日起，上述人员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听候革命群众的审判处理。

三、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2, 002号通令:

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通令

关于彻底粉碎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通令

革字(002)号

反革命叛国分子叶向真、朱成昭纠集校内外一小撮坏人，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策划反革命政变活动，叛国投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全体东方红战士和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这场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彻底查清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一切反革命罪行，把这个反革命叛国集团一网打尽，揪出隐藏在幕后的黑手。

现通令:

参与叶、朱反革命集团活动的分子听令!

你们现在已经陷入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天罗地网，你们结盟的那个反革命集团已经土崩瓦解，你们的防线已彻底攻破，你们背后那些人，已经被揪住了尾巴。数日之前你们还在秘密进行的那些刮阴风、放暗箭，通风报信，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威胁利诱等反革命活动只不过是照妖镜下的继续表演。广大东方红战士向你们发动的总攻击就要开始了，是彻底回头和叶、朱反革命集团决裂，立即坦白交代反戈一击？还是步叶向真、朱成昭的后尘？何去何从，由你们选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一贯政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限令你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立即向革委会和广大东方红战士彻底交代！否则，广大东方红战士将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希望受叶向真、朱成昭蒙蔽的人，能猛醒过来，起来揭发。“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六时十分

3, 003 号通令:

关于肃清《五·一六》分子的通令

革字(003)号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场“乱敌人，树队伍”的人民战争在我院打响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一个地被揪了出来。这真是大快人心，好极了！

一段时期以来，王、关、潘、吴、林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到处插手，他们煽阴风、点鬼火、阴谋策划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颠覆年轻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用各种手腕，拉一派、打一派，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

种种事实表明，王、关、潘、吴、林反党集团的黑手伸进了地院，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的黑手伸进了地院。全院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教师、革命干部应该立即行动起来，斩断黑手，揪出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为此，我们发出通令：

(一) 所有参加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或参加其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阴谋组织的成员，必须在本通令发出之后，四十八小时内向我清理办公室坦白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在此期间拒不交代，揪出后将从严惩处。

(二) 所有和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五·一六》有过联系，或曾参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活动的受蒙蔽群众应立即进行揭发交代，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打倒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六时十分

4, 004 号通令:

关于斩尽大特务郑公盾伸进我院的黑手的通令

革字(004)号

几天来的红色风暴,已把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阵线吹得七零八落,不少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都被揪出来示众了。但我们更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现在还暗藏在我们队伍内部尚未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猖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一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陈家庚等人就是大特务郑公盾伸向我院的黑手,为了彻底清算其全部反革命罪行,我革命委员会发出如下通告:

凡参与郑公盾及陈家庚等人反革命活动者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投案自首彻底交待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坦白从宽,立功赎罪。拒不交代者必从严处理。

特此公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六时十分

5, 点鬼台

点鬼台

(北京地院《东方红报》 113期 1968年1月23日)

陶世龙

陶犯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法西斯青年党党徒,搞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他参加发展反动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党。他的狗爹是国民党伪国大代表、青年党候补中央委员,解放前逃往台湾。他的叔父是青年党机关报主编。他一家都是罪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陶犯是漏网的大右派,五七年他和我院的大右派马万钧一唱一和,向党猖狂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陶犯不仅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黑参谋,而且也是一个反动的杂家,是吴晗的得力打手。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配合三家村黑店,写了许多反动黑杂文,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攻击党。

他还猖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攻击毛主席、炮打康生。他和反革

命分子沈孝宇结成死党、大肆为右派翻案、乱阴风、点鬼火、阴谋组织“六二〇”革命委员会，企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扰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就是这样一个反动的家伙，至今仍不低头认罪，百般抵赖态度，极端恶劣。

陶世龙必须老实低头认罪、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谢小鱼：

女，二十一岁，附中高三学生，出身与及其反动的家庭。父母都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得力干将。胡风的反革命“十万言书”就是其狗父参与下搞出来并由她的狗娘亲手抄写的。因而谢对党对人民有着刻骨的仇恨，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谢混蛋一贯为她狗父母翻案，写了很多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并企图保存下来给其狗老子看。她还写了很多恶毒攻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的大字报。

坚决打倒反动学生谢小鱼！

温树朴：

温犯是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的马前卒，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北京解放前夕，温犯任北平五州中学体育主任。当时他勾结国民党宪兵队，写黑名单，秘密策划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解放后仍不老实交代，混入我院后，在周、聂等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下，长期隐瞒历史。文化大革命中，温又伪装积极，钻进我东方红内部，并窃据了体育教研室核心领导，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温树朴这个狗特务、大汉奸。现被我们揪出来示众了，真是大快人心！

田应丰：

男，现年四十七岁，原任附中校长。

田犯是个地地道道的头顶生疮，脚下流脓的腐烂透顶的大混蛋，顽固不化的

走资派。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十足的大流氓。这个反动家伙政治上一贯反动。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一贯包庇地富反坏右，历史上曾多次参加反动组织，会道门。曾参加大军阀大汉奸阎锡山的“同志会”，“还乡道”，“保安队”等，充当了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田犯生活上极端糜烂，流氓成性，一贯乱搞男女关系。

我们要严重警告田应丰，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否则，立即严厉镇压！

(编者按：1968年1月19日《东方红报》112期的《点鬼台》上还点了陈汝箴、黄彭年。)

(二) 1968年5月23日《东方红报》137期上介绍院革委会从1968年5月16日——18日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揭发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高元贵破坏文革运动罪行。院革委会组织了全院大会批斗“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院革委会常委任云堂代表革委会在大会上发言：“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这篇发言稿刊登在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148期上，文章认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由三股反革命势力合流组成。

第一股势力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其中有吕禄生、刘普伦、池际尚、马杏垣、曹添、赵xx、翟xx、程xx等人。

第二股势力是以安静中、郑伯让直接操纵的，其中有叶德隆、纪群、江祖如、周永璋、蔡新平等。

第三股势力是以陶世龙、沈孝宇、王鸿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

(三) 在这段时间里，地院《东方红报》以反革命分子之名点名批判了许多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有如下这些人（除了以上已点名人员外）：

徐维汉、韩温溪、田均、陈家庚、冯景兰、周守成、聂克、王冬夫、李明哲、李鹏九等人。

(四)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些未在《东方红报》被点名，而也遭受关押、审查的师生，其中有：杨雨忠、田春林、伏庆是等。

（五）院革委会扣减工资、冻结存款的通告和通令

编者按：地院革委会在1968年2月18日宣布成立“经济监督小组”（详见《东方红报》1968年2月22日第117期），而在1968年1月1日，以海燕、山鹰、东方红广播台、红卫兵总部等20多个战斗队宣告成立了“砸烂修正主义高薪制度联络站”（详见《东方红报》1968年1月5日第108期）。从此开始了对“地院党内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以及“高安邦反革命阴谋集团”成员等进行经济上的降薪、限薪、冻结他们的个人存款等处理。下面是当年刊登在《东方红报》上具体经济处罚的通令、战报、紧急公告、报道、通告，原文如下：

（1）通令 001 号

我院党内走资派：周守成、聂克；反动学术权威：冯景兰、杨遵义、张明哲、王鸿祯、袁复礼和阶级异己分子丰源之流，以及右派分子，已查明的四类分子，务必在元月三日、四日、五日三天之内（下午两点三十分——五点）到我联络站（11—117）处理工资问题，有违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并作以下准备：A 交代对高薪制度的看法 B 带上户口册汇报家庭经济情况）

砸烂修正主义高薪制度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

（编者注：引自《东方红报》1968年1月5日第108期）

（2）通令 002 号

周守成、聂克、丰源、冯景兰、杨遵义、张明哲、袁复礼、王鸿祯于一月九日下午二点三十分至五点到财务科领取生活费。

砸烂修正主义高薪制度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

战 报

为了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为了砸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经济上的高新制度，为了彻底打倒我院党内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经济上把他们的威风打下去！我联络站决定，坚决处理我院走资派及

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问题，经报请红卫兵总部批准，现决定取消他们的高薪，按下列标准供给生活费：

1, 对于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最低生活水平即 12.50 元。

2, 对其家属、子女应分别对待，他们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市中等水平 18 元。

现将处理结果公布如下：

姓名	原工资	现降到
周守成	170 元	12.50 元
聂 克	170 元	12.50 元
丰 源	170 元	12.50 元
冯景兰	345 元	31 元
杨遵义	287 元	67 元
张明哲	207 元	49 元
袁复礼	287 元	49 元
王鸿贞	177 元	12.50 元

砸烂修正主义高薪制度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引自《东方红报》1968 年 1 月 12 日 第 110 期)

(3) 砸烂高薪联络站紧急公告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地院的战鼓敲响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打击阶级敌人的新战役开始了，长期来在学校党内走资派的刘邓黑线包底下的乌龟王八蛋一个个被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红卫兵小将揪出来了，批判斗争了。为了配合此革命行动，我联络站特作如下决定：

一、坚决处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揪出来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

二、处理原则：A 自二月份起取消其高薪（工资），B、按本人十二.五元，家属十八元的标准供生活费。

三、上述专政对象所在部门教研室、科室及各战斗队必须负责处理。必须揪出一个处理一个，当机立断，并立即与本联络站联系决定。

砸高薪联络站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

（引自《东方红报》1968年1月19日 第112期）

（4）经济监督小组 砸高薪联络站 报道

自中共中央六八（三一）文件二十二日下达以后，我小组全体人员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坚决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决心，在院革委会李贵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于二十二日立即召开全组成员会议，研究执行方案，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立即按中央指示办事，对我院党内走资派、叛徒、特务，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知识分子等等的存款进行冻结。二十三日报请革委会审批，立即发通令，投入战斗。在院专案组，斗批改办公室，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大力协助下，取得了辉煌战果，截止二十九日，暂时冻结计：

存款： 三十万余元

公债： 五千七百余元

现金： 一万二千余元

注：①现金、公债未扣下②上述数字包括运动初期被抄走的数③上述数字暂作临时冻结。有少数顽固分子，三次通令不来报到，也有少数顽固分子虚报、谎报存款现金，对于这些家伙我们自有处理。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希望全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协助我们工作，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

（引自《东方红报》1968年3月8日 第119,120期）

（5）通告

我院“三反一粉碎”的讨高伐安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为了跟上这大好形势，配合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有力斗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骤，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最近我们研究决定，按广大革命

师生的要求，处理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高薪。

高元贵	供给生活费	70.00 元
安静中	供给生活费	32.50 元
郑伯让	供给生活费	35.50 元
吕禄生	供给生活费	45.50 元
刘普伦	供给生活费	44.50 元
李永升	供给生活费	17.50 元

此决定自八月份起生效。

砸高薪联络站

经济监督小组

一九六八年七月

（引自《东方红报》1968年8月1日 第146,147期）

编者按：地院革委会从1967年4月3日成立起，到1968年8月25日中央派军宣队进驻地院，从而接管了地院革委会的党政大权为止，总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地院师生遭受无辜关押、审查的人数之多不可思议。根据以上报纸上收集的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总共挨整被关押、审查人数至少超过四十多人。后来，对他们的降薪、限薪、冻结存款后，又把审查人数扩大到了家属和子女，其伤害的后果更为严重。军宣队进驻后，扣发的工资 冻结的存款又如数归还给本人了。其中不少人在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挨过整，院革委会掌权后，又再次挨整。而打倒“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又成为地院文革史上的最大的冤假错案。

四、军宣队进驻地院后，因文革、因清查“五一六” 分子而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编者按：军宣队从1968年8月25日进驻地院，接管了地院党政权力后，执行

中央在全国范围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及又一次大规模“清查五一六”、“清查三种人”运动。在中央和地质部党委的组织领导下，地质学院军宣队向全国地质部系统各省局单位、全国的地矿单位机构、与其他与地质相关系统单位（煤炭、冶金等等）发出了对“地院东方红”部分成员的全面隔离、审查、关押人员名单。这一运动时间长达五年之久，到1973年才基本结束，个别人到1980年以后才陆续平反。但是至今为止，人们没见到公布的这方面的文件。

（一）军宣队在1968年12月15日后，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名，将伏庆是、田春林、黄瑞华、梅建明、刘万恩、刘梅、林小湫、郑文卿、庄一龙、杨宾芳等人隔离审查，直到1969年6月后这些同学才被批准毕业分配。（详见本书伏庆是回忆录）

（二）地院革委会的全部成员，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人无一幸免，全部遭受关押、审查或判刑。

王大宾1971年被抓回北京，关押在地院隔离审查长达四年之久，证实其“五一六”罪名不成立释放。后又于1978年正式被捕，最后在1983年不公正、不公平地判其有期徒刑九年（详见本书第三篇“王大宾专题”）

聂树人在青海地矿局从1970年起被隔离审查长达三年之久，证实其“五一六”罪名不成立释放。后又于1978年被捕，关押长达一年多，以不构成犯罪而释放。

（三）绝大多数的地院教员从1970年起被派往地院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在军宣队统一指挥下整“五一六”，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还采用逼供信、打骂等手段对宋翔雁、唐振权、李明哲、陆炎德、陶世龙等老师进行了残酷的隔离审查。采用诱骗等各种手段，让他们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才给与人身自由。李明哲老师就是在这无法忍受身心痛苦与折磨中自杀身亡（详见本书宋翔雁的回忆录）。

（四）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地院东方红的学生，特别是东方红的活跃分子无人幸免，尤其是分配到地质部系统的人都没能躲过关押、审查。但是，具体的名单，都在党政部门，以保密为由，至今未公布文件与全部的统计结果，故我们无法提供确切的文字史料。

仅以青海省地质局关押、审查人数的资料来看，保守地估算全国的“清理五

一六”分子的关押、审查人数。据聂树人的回忆录《“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一书中，第 169—173 页所述：青海地质局在西宁省探矿厂等地集中以“办学习班”为名，对地院东方红等上述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包括聂树人等共计九人。其中八人是地院东方红的学生，另一人是北京航空学院分到青海省地质局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在青海地质局所属各地质队上，未进行隔离审查，但实质上进行了审查的地院东方红学生还有七人。很显然，在青海省地质局被关押、审查的学生总计达 16 人。

当时地质部在全国有 30 个地质局，还有不少的部所属的研究机构、工厂、事业单位。再加上在地质部之外的系统工作的地院东方红学生、地院本部的老师与员工，可以肯定地说：当年被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至少好几百人以上。仅一个大学——地质学院被关押审查的人数就是如此之多，那么全国各省市的大学加起来，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就是文革时期青年学生奉旨起来造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悲惨下场！这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色！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色和时代特征！

（五）被中央文革炮制为“叶朱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叶向真、朱成昭等人，从 1967 年 11 月 2 日先后被捕的，为此案而接受审查和关押的地院学生人数众多。除了朱成昭、蒋良朴之外，还有杨雨忠、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梅建明、王北宁、王白莎、程希平、颜宽等人，还包括王北宁和王白莎、梅建明的父母、兄弟等都受到了牵连。据知该案长达 13 年之久，牵连人数多达 150 多人，直到 1980 年 6 月，经中组部批准，才彻底平反，成为中央文革炮制的文革中学生中最大的冤假错案。此案至今也未见到文字史料、文件等，只能靠当事人的回忆录来佐证其真相。

当事人梅建明对此案的回忆：

抓叶向真时，“中央文革”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当时处境困难的叶帅说：你们抓吧，抓谁我都不管。据叶向真后来回忆，江青早就想抓她，因为她太活跃了。但抓她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搞倒父亲。她出狱后才知道，为了整叶剑英的材料，当时叶家的 6 个子女和保姆都被抓进了监狱。

1968 年 3 月 17 日，梅建明被北京卫戍区带走，关进了功德林监狱。走时，他听到校广播站的广播正在播放：“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逮捕反革命分子梅建明！”

8月下旬，朱成昭被公安部正式拘留，同叶向真、蒋良朴等人一起，也关进了功德林监狱。

1969年2月，梅建明被转移到半步桥监狱。6月，又被转移到北京市北苑少年犯管教所。从1968年9月到1972年9月的四年间，这里设有三期“干部子女学习班”。据研究者称，这个学习班前后关押过65名高干子女，其中副总理级以上的干部子女有19名，部长级干部子女17人，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女儿贺黎明，叶剑英之子叶选宁、叶选平，陆定一之子陆德，薄一波之子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傅锐等人。梅建明是第三期，同期的有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婿邹家华等13人。

当事人张华府对此案的回忆：

终于平反

1979年初，春节又快来临了，我和朱敏约好了在郑州见面。那时全国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了，我沉寂的心已经开始跳跃了。我和朱敏在郑州住了几天，就一起去了北京，找到了学校。我没有想到，当时小梅（梅建明）正在急着要找我们。我和小梅在学校见了面，一时间觉得有千言万语，却说不出来，只有激动，别的全忘了。小梅先要给我找住处，他找到了他的老师徐老师和邵老师两口子。徐老师和邵老师极其热情，对我和朱敏是一见如故。他们把他们西四楼的一间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两口子住。

安顿住好以后，小梅给我讲了我进去以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是我被抓进去的同时，小梅，程希平，石白河也先后被抓了进去，但他们被关的时间都没有我长，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没有被单独囚禁，是关的集体号。大概关了一年多，在1970年庐山会议毛林决裂后，就放出来了。叶向真关的时间比较长，我估计她可能也是单独囚禁（我没有问过她当时的情况）。在这个叫“叶朱反革命集团”的案子中，叶家被抓的人最多，除了叶向真，还有叶选平、叶选宁、叶楚梅和邹家华。另外还有两个家庭，王白莎全家，她的父母都抓进去了。王北宁全家，她的父母也都被抓进去了。小梅的全家，他的父亲也被抓进监狱，关在秦城。他的母亲也被抓了，两个哥哥都进了牛棚，全家人都受到牵连，受尽了迫害。“叶朱反革命集团”全案牵连的人达150多人。在1971年林彪事件后不久，叶向

真就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不久还公派到美国留学去了。

小梅给我讲了北京当前的局势。他说，中组部现在正在平反冤假错案，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涉及学生的冤假错案，哪一个案子能比我们这个案子更冤？我心急得不能行，想赶快找到你们，赶快写申诉材料，争取早日平反。正好你过来了。我们要赶快找到他们几个，尽快写材料递上去申诉，争取早日平反。材料递得越早，平反来得才会越早。我说，我的材料我现在就可以写。其他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只有麻烦你运用关系找他们了。

我用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申诉材料写好了。小梅看了一下，说，我们两个明天就去中组部，先把我们两个的材料递上去，先挂上号再说，然后再找他们几个，他们的材料以后再分头递上去。先找到谁，谁先写好了谁就递上去。写好一个递一个，越快越好。递上去早了，肯定会先解决，递上去晚了，肯定排到后边了。

我和小梅在第二天就跑到中组部把我们的申诉材料递了上去。

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我的探亲假时间快到了。我和小梅商量，是不是我先回农场一趟，请了假再出来。小梅说，还回去干什么呀？本来就冤枉我们了，再回去受冤枉？不回去。我觉得小梅说得在理，不回去了。当天我给农场陈子善副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明我正在北京要求平反我的冤假错案，不回农场了。陈副书记后来还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说，要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回到农场来，边劳动边等待，等等。我没有理他，也没有给他回信。

（下图：十余年冤狱后同案部分难友重逢。左起：张华府、朱成昭、蒋良朴、程希平。）

没过多久，想不到蒋良朴自己也摸到北京，到学校来了，他见了小梅和我，也看到了北京的形势，信心大增，很快就写好了申诉材料，也递交给了中组部。那时朱敏的探亲假也快到期的了，我



们俩决定先回郑州住一段时间，她再从郑州回单位。蒋良朴在北京无依无靠，我

请蒋良朴和我们一起去郑州住一段时间，等朱敏回单位了，我和蒋良朴再一起到北京来。蒋良朴欣然同意，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了郑州。我母亲很欢迎蒋良朴的到来，我妹妹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经常炖羊肉给我们吃。我们还到黄河边花园口去玩了一天，到郑州附近的公园景区转了转。这一段时间是我和蒋良朴这么多年以来，少有的开心日子。

送走了朱敏以后，我和蒋良朴又回到了北京。这次回来又和王北宁取得了联系，王北宁的家已经搬到了外交部大院，房子也比较宽裕了。蒋良朴就住在了王北宁家里，我还是住在邵老师家里。那时北京正流行放映内部电影，中央各大机关都在放，外交部礼堂每星期都会放几场。王北宁的妹妹北星、弟弟北方都有办法搞到内部电影票。我们就经常去外交部礼堂看内部电影，主要是香港的武打片。文化大革命十年只能看几个样板戏，现在能看到这些香港的武打片，感觉很新颖，确实耳目一新。

后来又先后找到了朱成昭和颜宽，我们这几个难友算是到齐了。他们两个也各自写了申诉材料，分别递交给了中组部。这期间，我们还见了我们学校的高元贵院长，我们非常敬重我们的老院长，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造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曾经批判过他。

1979年下半年，我又找小梅问我们案子的进展情况。小梅给我说了一个新情况，是上面的人对他说的。本来我们这个案子，中组部原来准备作为学生冤假错案的典型公开见报的，准备公开平反。报上去后，到了叶剑英那里后，叶剑英却不同意见报。此案，叶家人受牵连太多，叶剑英不想他们家成为全国议论的焦点，他不同意见报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叶剑英当时位高权重，中组部考虑到叶帅的态度，决定降低这个案子平反的规格，把案子转交给湖北省委组织部处理了。重新移交卷宗，重新阅卷，使我们的平反时间差不多晚了一年之久。当时，中组部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说中组部积压的冤假错案太多，如果全靠中组部来平反，将会拖很长时间。于是中央决定分流一些案子，像我们的案子，由于我们学校已经迁到武汉了，中组部就我们的案子转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委托湖北省委组织部审核平反我们的案子了。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我、朱成昭、蒋良朴、颜宽四个人就从北京来到了武昌喻家山，那是我们学校的新校址。学校给我们四个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住，我们在这里

等候消息。我们去省委组织部见了湖北省委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他们详细地向我们询问了很多当时的情况。然后叫我们安心地回学校等消息。这期间，小梅经常给我们通报北京的情况和新消息。

我们的案子终于在**1980**年的下半年获得平反。虽然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留尾巴，虽然是补发了工资，安排了工作，但我们吃的苦，遭的罪，亲人的担心，家人受的连累，能补回来吗？特别是，由于这个案子没有公开见报，大批受此案牵连的“东方红”战士并不知情，他们还在本单位受歧视受迫害，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往事已经过去，并没有如烟消散。它还留在当事人的心中，还留在历史的长河中。由历史来评判吧。

编者按：该案发源于地院东方红，但就其复杂性、神秘性却给中国的政坛投下了一个十分巨大的震撼弹……。该案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幕！

综上所述，地院东方红从中央文革选中和支持的一个样板单位，最后变成了一个重灾区。

详情请参见本书第二篇中当事人梅建明、张华府所写的回忆录。

第五篇 涉及地院文革的回忆、讨论、 反思和研究文章汇集

目录明细

【文革研究者专论】

- 一、陶世龙：不能压制不同意见——“620事件”中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343
- 二、何蜀：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萧李廖”、罗广斌案 346
- 1、“萧李廖”案
- 2、罗广斌案
- 3、北京地院“东方红”介入重庆两案
- 4、调查工作被迫中止
- 尾声
- 三、敖本利：红楼座谈会王大宾没有参加 360
- 四、肖劲东 蔡新平：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363
- 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 372
- 六、蔡新平：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高安郑反革命集团”
 险遭“覆灭”的命运 386

【对地院文革的反思和研究】

- 一、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392
- 前言
-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 （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二、刘建业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406
- 三、肖劲东《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读后感 408
- 四、王锐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409
- 五、晓星谈“伏庆是回忆录” 410

【文革研究者专论】

一、不能压制不同意见——“620 事件”中 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陶世龙

每到 6 月 20 日，我都要回顾一下 1966 年这一天的往事。

因为在这一天中午，北京地质学院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不经当时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工作队的同意，就在校园内集会、游行，并到工作队的住地周围停留不走，推举代表，对工作队来校后的作为，提出了不同意见和要求，最后以工作队长和大家见了面，并答应了部分要求而落幕，约在下午四、五点钟和平散去。

我是那天在办公室午休时，听见楼下大马路上有人喊支持李贵的口号，一看原来是十多位和我一起参加过山西四清的物探系同学，手持艳纸片，一纸一字，合起来就是“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这李贵是 1953 年初就调到北京地质学院的老干部，长期做保卫工作，时任教学辅导处处长兼该处党总支书记，并是党代会选举产生的院党委委员。这回他对工作队的作为也看不下去了，一大早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意见，并要求派人来了解情况，这正是大家所期望的。

在那个特别看重出身成分的年代，有这样一位老同志出来和大家站在一起，格外使人激动。于是我跟着这些同学到了办公楼后面的广场。有人搬来一条板凳，站上去就演说，还有人从李贵家拿来破旧的床单，证明这位级别不低的老同志保持着工农本色，增进了本不了解他的同学对他的信任。人越聚越多，但和广场比起来 仍显得少。有人建议到宿舍区转一圈，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先进入教职工眷属区绕行，再上大马路转南，到达工作队驻地。我估计最多时可达两千，最少时也超过一千。有些人可能因时间太久或得到工作队方面的警示而退出，我是从头到尾都在场。后来就麻烦了，因为没过几天就被工作队定性为一次“反革命事件”。

其实这次行动是很有理性的，并无越轨之举。在工作队门前停留的时间久，

有人搬来个饭桌，愿发言的都可以上去发表，批评工作队和拥护工作队的师生一样地有发言权，辩论很热烈。工作队长也是登上这个桌子和大家见面，此时秩序依旧井然。

6月21日，尽管工作队组织了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家属来地质学院游行，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反工作队就是反党、反革命。并由一位副部长宣布将高元贵的院长也撤销（高元贵本为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书记一职几个月前已换他人）。但自由的辩论到22日夜晚仍在进行。

6月20日我没说什么话，21和22这两天则说了不少。主要是地质部领导人说“高元贵三年不进地质部”，“地质部只管了地质学院的后勤”，即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问题与地质部无关，黑线来自旧市委和教育部。我深知都不是事实，有来查问的，我据实回答。但到23日后，辩论的空间没有了，25日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副总理“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批示，顿时反右的阴云笼罩了地院。这个批示他们早在22日就得到了，推迟发布，是1957年引蛇出洞的故技重施。这一切均非工作队的创造，而是来自高层，现在根据历史文献，得知他们当时是这样看待群众反工作队（组）的：

当时在京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详见周良宵、顾菊英编著《十年文革大事记》）

多数反工作组者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确有坏人“与工作组争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右派反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同上书，新任市委书记李雪峰1966年6月23日的报告）

按照他们的逻辑，工作队把包括我在内的13名干部和教师打成反革命，不足为奇。同时也就成为地质学院文革的一大特点。

新近有人发现个名单，作为重点打击的是15人，也有可能，因为挨整的程度很难量化，实际上教师和干部中因反工作队被整的，远比十三人多。这也是红

教联在教工中一开始就是多数的原因，成为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的一大特色。

有这样多的教师反工作队，不能不看到高元贵的作用，但并不是工作队的黑线图所示，在高元贵这个 620 的总后台指挥下，一条线通过王大来到学生；一条线通过陶世龙到教员。

是高元贵来地质学院后的八年中，作为第一书记兼院长他，不抓权却偏偏喜欢抓教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学生，并及其他人。简言之，他是难得的一位有人性的领导干部，以致得了个“高老夫子”的外号。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他这是不突出政治，文革开始前几个月，把他的书记一职拿掉，当有此因，大家或不以为意。

但工作队一来就有意将矛头引向这位老夫子，做法还很拙劣，6月16日，突然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这就不能不使人警觉，感到工作队可疑。

了解这些前因后果，就可以看到，当时并不是有什么人要反党，他们不过是对工作组的作法和导向有不同意见。

如果说本人因与高元贵院长有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志同道合，被怀疑有一损俱损之忧，出于私心而反工作队，或可理解。但那么多人出来反工作队，尤其是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入学后通过野外实习，仍能接触到底层，有是非之心而不知利害，出于公义，毋庸置疑。

但工作队却把这些有不同意见的人视为敌人，甚至怀疑是有“旧市委的残渣余孽”策划的阴谋，展开批判斗争，把这些人列入另册。其结果只能是激起更坚决的反抗。这正是在北京高校中，地质学院反工作队的力量能迅速壮大的基础。压制不同意见，何其毒也！是工作队所犯的最大错误，毛泽东先生说的对。不应压制不同意见，是后人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2015年6月20日。

(编者注：此文发表在2015年6月21日五柳村网站)

二、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萧李廖”、罗广斌案

何 蜀

在文革造反运动时期的首都红卫兵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组织。他们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敢于为一些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蒙冤者仗义执言，鸣冤翻案。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地质学院成了上访告状的蒙冤者聚集的重要地点——连后来大名鼎鼎的蒯大富在刚得到平反但还未能清华大学站住脚时都曾到地院寻求保护。为此，北京地质学院还一度得到了周恩来和康生的赞赏，将其比之为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在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的一次讲话中就说到：

……地质学院这些学生是有风格的，地质学院他自己出粮票，就是保护这些人，他听了以后是革命的，他们就保护，公安部来抓人，他不让抓，藏起来，没有地方睡觉，一个小床睡两个人，没有吃饭的，他自己买两个小馒头，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康老、总理表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作风，小旋风柴进嘛！柴进就是专门搜罗造宋朝皇帝反的人。地质学院就有这么个风格，专门搜罗造反的革命群众……¹⁰

《水浒传》中绰号“小旋风”的柴进，按书中介绍，是前朝“大周皇帝的嫡派子孙”，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到官府发配（判刑流放）的人，是现世的孟尝君。柴进之所以敢于接济官府眼中的“罪犯”，是因为他家有宋太祖颁发的“丹书铁券”，有免罪免死特权。而文革中北京地院“东方红”敢于收留和扶助受过政治处分、顶着“反党”、“反革命”罪名的蒙冤者，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倚重一时的“铁拳头”，另一方面是他们当中平民子弟居多，较能体察民间疾苦——这是他们与柴进这样的前朝皇帝“嫡派子孙”最不相同的特点。至于中央领导人赞誉他们为“小旋风柴进”，则不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时之需，到了不再需要造反派的1968年夏，北京航空学院接纳各地遭受打压迫害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开会，就被斥为“北航黑会”而且遭到严厉追查了。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需要倚重造反派的时候，重庆就有两件大案被北京地院“东方红”列为了调查翻案的重点。

“萧李廖”案

¹⁰陈伯达戚本禹对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的讲话，1967年4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重庆的“萧李廖”一案，是在 1963 年按“反党集团”性质处理、震动四川政坛的大案，此案所处分干部主要有：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

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

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于克书，时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团市委日常工作）；

此外还有副市长邓垦，市委党校党委书记余时亮，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团市委副书记王竹、赵济……一大批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折腾而尚存良知、敢说真话的干部。

1962 年，萧、李、廖等许多干部因接触了解到四川农村连年大饥荒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惨痛现实，并发现问题并非出在农村“阶级斗争”或基层干部问题上，而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决策错误和独断专行、强迫命令瞎指挥等恶劣作风造成的。1962 年 2 月底，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干部们纷纷对四川省委领导提了很多而且很尖锐的意见。萧、李、廖及于克书等还通过不同方式向中央反映了有关意见，中央书记处派人到四川“微服私访”时他们又参与接待和提供材料。这些就成了他们“反党”的罪状。在 1962 年夏秋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将“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扩大化错误以及提出的一些合乎实际的正确意见，都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李井泉看到政治风向对他有利了，立即对给他提过批评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击报复。随即，重庆市委按李井泉的严令，将萧、李、廖等干部按“反党集团”性质进行了批判处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报复心特别强的李井泉又要求重庆市委将已经处理过的“萧李廖”案重新抛出来，定性为“反党黑帮”，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批判。

罗广斌案

罗广斌是六十年代初期最走红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

1948 年，24 岁的罗广斌刚加入中共不久，即遇到重庆及川东、川康地下党因多个领导人连环叛变而引起的中共地下组织大破坏，9 月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后转押重庆，先后囚禁于渣滓洞、白公馆两处看守所。1949 年 11 月 27 日国民党当局从重庆败退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政治犯（包括中共地下党

人、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及国民党军统局违纪人员等实行大屠杀之夜,罗广斌从白公馆看守所率十多人逃出。

中共执政后,罗广斌长期致力于通过亲身经历向青少年宣讲国民党狱中革命烈士英雄事迹和控诉国民党狱政罪恶的“革命传统教育”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与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写作了纪实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和长篇小说《红岩》。但在此期间,有关方面从原国民党特务、官吏的交代及起义、投诚人士的回忆中,却得知罗广斌当年是被释放或已经通知释放出狱的,因此对其“冒死越狱”的自述产生怀疑,进行了反复调查,始终未能得出 50 年代初期那样“没有问题”的明确结论。小说《红岩》出版并获得巨大轰动效应后,罗广斌与他的长期合作者杨益言、刘德彬(因在 1958 年被定为“严重右倾”而在小说出版时由市委决定不作为作者署名)一起被市委安排调入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专业作家),但罗广斌的“出狱问题”仍然是一疑点,在“阶级斗争”观念日益增强的形势下,这一疑点就越来越成为对罗广斌政治生命的巨大威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罗广斌在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下起来造反,并于 1966 年 10 月 25 日主持以所谓“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在仅有二十多人的小小文联机关中即剥夺了“黑帮”、“黑帮爪牙”及“摘帽右派”共 8 人的选举权),选出名为“工人(炊事员)领导”实际由罗广斌控制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在重庆市机关事业单位中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但他一直被有关部门怀疑的“历史问题”,变成了群众组织中对立派攻击他的重大把柄,先是保守派以此攻击他,并借此攻击造反派“组织不纯”。保守派瓦解后,造反派中的对立派又以此攻击他。在 1966 年底开始的重庆造反派内部分歧中,罗广斌站到了反对重大八一五的一方。1967 年 1 月下旬重庆造反派按毛泽东号召、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后,造反派矛盾激化,正式分裂为两派,罗广斌站在反对革联会的一方,被革联会一派视为“山城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政治扒手”、“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2 月 5 日,革联会一派红卫兵和支持革联会的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人员到重庆市文联院内将罗广斌抓走。2 月 10 日晨,罗广斌在关押他的解放军重庆后勤工程学院八一楼三楼借上厕所之机跳楼自杀身亡。此后,革联会一派就干脆称罗广斌为“叛徒”——因为当时作为共产党员,自杀就是叛党,再加上他还有历史上被怀疑的问题。由此,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创作小组被打成“罗氏三家村”、“罗广斌叛徒集团”,他们创作的小说《红岩》也被定性为“大毒草”,遭到“革命大批判”。

北京地院“东方红”介入重庆两案

北京地院“东方红”到重庆串联的人员，很早就介入到了为“萧李廖”翻案的工作中。据“萧李廖”三大要犯之一的廖伯康回忆：

……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见到满街贴有“打倒萧李廖反党黑帮”的标语、大字报，却又未见公开批斗。他们就到市委要求交出这几个大“黑帮”进行公开批斗，遭到拒绝。这时，市委深恐红卫兵和我们接触，便急忙将我们秘密转移到远郊红卫兵不易去串联的地方，改名换姓地隔离关押起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要求公开批斗萧李廖被拒绝后，引起他们中一些人的怀疑：既然是黑帮，为何不让公开批斗？这时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也被揭发批判了，说他反对毛主席。北京的红卫兵就感到奇怪，省委这个大“黑帮”又把那批人打成了“黑帮”，于是就提出究竟谁是“黑帮”的问题。有黑吃黑，也有红吃黑或者黑吃红，打的和被打的究竟谁红谁黑？他们想摸一摸这个问题，于是就想找到我们。¹¹

北京地院“东方红”的大学生千方百计把被重庆市委分别秘密关押在不同地方的萧、李、廖等人找到，并接到当时设于重庆市政协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一作交谈了解，便得知这些干部被打成“反党黑帮”的内幕，“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即决定要帮他们申冤翻案。廖伯康记得把他从綦江县关押地找到后接到重庆市政协的几个大学生是李云生、黄景贤、任克亚¹²。

当1967年初重庆造反派两派公开分裂后，站在反对革联会一边的北地“东方红”人员被迫离开重庆，临走前给廖伯康等写了到北京地质学院找“东方红”联系的介绍信。萧、李、廖及高兰戈等随即去了北京。据廖伯康回忆：

北京地质学院设有一个专门接待各地来京人员的接待站。1967年2月15日，我们便持联络站的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北翼楼上的一间小教室，叫我们去抱了几捆稻草铺地铺。过了一会，接待站站长庄成章来问：“你们有位叫廖伯康的吗？”我说我就是。他又问我们为什么到北京，经我作了简要说明后便马上提高了对我们的待遇，要我们去抬床和领取被盖垫絮等。原来地质学院有位女教授郝怡纯¹³也在接待站工作，1957年她曾参加赴日青年代表团，是副团长，我那次也参加了赴日青年代表团，而且同她在一个小组。这事虽已隔多年，但她对我的印象犹存。我们在接待站登记时她在里面看见了我，便对庄站长

¹¹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¹²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2页。

¹³ 郝怡纯，地质古生物学家，1980年当选中科院院士，历任九三学社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她当时处于被监督劳动状态，但她心地善良，不忘帮助更困难的人。

说他们中有一位廖伯康是原重庆团市委的书记，这样我们就受到了特别优待。我们在北京地院住了九个月，可是我却从未与她再见过面。……

1967年3月31日，地质学院的李云生告诉我们，他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案件，总理指示把有关材料报去。4月3日，李云生把我们所写的有关四川问题及我们的申诉材料送交给了周总理的联络员。¹⁴

与此同时，被打成“罗广斌叛徒集团”成员并遭到八一五派通缉的杨益言、刘德彬，也在罗广斌被抓走后相继逃离重庆，辗转经贵阳逃到北京，也住进了北京地质学院。据刘德彬在1969年重庆市文化系统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写交代材料中回忆：

四月初，杨益言在地院作报告后的不几天，地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孟繁华在地院十二楼（我们住在十二楼）碰见我说，他找了三个同学，东方红的战士，专门对罗广斌的问题进行调查，我当时很高兴。他把三个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叫曾昭贵，另两个名字记不起。一个月以后，这两个就未参加调查了。此外，北大的四个女同学，清华的周学勤，美院附中的余刚勇，都参加了调查组。我同杨益言为调查组提供线索，他们的调查报告参加过讨论，杨和我还协助调查组收调查材料，按历史顺序编印了一本罗广斌历史资料。调查组的活动情况可以问该组负责人曾昭贵同志，他是地院67年毕业生……¹⁵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实际上同时也成为“萧李廖”专案调查组。

比较起来，“萧李廖”案中的萧、李、廖等干部与李井泉谁是谁非的问题，比较容易判断，而且当事人都在，蒙冤干部可以自己写申诉和揭发材料。而罗广斌案，则涉及到罗广斌的历史即狱中表现与怎样出狱的问题，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深挖“叛徒”的时代气氛中，又十分敏感，风险极大，加上罗广斌自杀身亡，许多事情外人很难搞清楚。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和重庆的八一五派批判罗广斌的一个要点，就是抓他的“历史问题”。因此，北地“东方红”的调查组建立起来后，就首先着手进行罗广斌历史问题的调查，并撰写《罗广斌历史问题调查报告》，同时，他们还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等一起创办了专门为罗广斌案鸣冤翻案的小报《红岩战报》，并支持杨益言、张羽和罗

¹⁴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5～206页。

¹⁵刘德彬《我在罗广斌死后的一些活动》，载《昨天》第7期，2012年7月30日。

广斌夫人胡蜀兴等到北京一些单位去作报告，宣讲罗广斌的革命历史和文革中的革命造反表现，控诉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杀害了罗广斌。

因得到杨益言、胡蜀兴再三请求江青接见以反映有关罗广斌身死等情况的信，4月24日，在北京地质学院12号楼二楼某室，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按江青批示派来的两个工作人员接见了杨益言、刘德彬、胡蜀兴等，地院“东方红”调查组的曾昭贵和参与为罗广斌翻案的北大学生朱学文、中央美院附中学生余纲勇等也在场旁听。中央文革代表听了有关汇报，临走时对胡、杨、刘说：你们要写的材料，快点写。以后再送材料时，可送中南海西门收发室，交江青同志办公室，这样可以快些，江青同志可以及时看到。¹⁶

5月26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39、40期合刊发表了地院“东方红”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撰写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5月30日，北地《东方红报》41期发表当年与罗广斌一起从重庆白公馆狱中逃出的脱险志士郑业瑞的回忆文章《白公馆中的罗广斌同志》。

6月5日，《红岩战报》第二期出版，发表地院“东方红”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罗广斌问题调查报告（历史部分）》……

当时北京的形势，对重庆八一五派十分不利。1967年5月26日，重大八一五勤务组成员秦安全在重庆做了个内部报告，汇报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重庆问题会议期间的遭遇，其中说到：

杨益言、胡蜀兴在北京大肆放毒，说罗广斌是被谋杀的，北京和全国其他地方舆论一边倒（如广州、上海、内蒙等地），说8·15是贩卖集团，8·15是保皇派。

我们挨北地东方红的打（他们打了三十七个单位，只有一个单位给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挨了三次，第三次挨打后，我们到他校游行抗议。我们有30多人住了院。八一兵团¹⁷一战士冒充周家喻¹⁸挨了毒打。¹⁹

调查工作被迫中止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与实践都充满了朝三暮四、反复无常、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一方面，他认定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¹⁶ 张羽《在地院12号楼的一次“接见会”》，载《昨天》第6期，2012年6月30日。

¹⁷ 八一兵团：重庆国防工业系统的八一五派组织，革联会的重要成员单位，其主要负责人阳增泰是革联会常委。

¹⁸ 周家喻：即周家喻，文革中一般被写作“周家喻”，重庆大学学生，重大八一五战斗团总团勤务组成员，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因其经常参加辩论和在公众场合演讲，被视为八一五派的主要代表。

¹⁹ 摘自重庆八一五派“罗广斌专案组”工作笔记中的“重庆八一五派在北京的遭遇”，杨世元提供，何蜀整理，未刊稿。

许多地方和单位都被刘少奇的代理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比如四川，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的说法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可是另一方面，对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哪怕都是在这类“刘少奇的代理人”具体领导下进行、而且这类“代理人”比如李井泉正是靠这些运动的“政绩”得以步步高升的，也决不能对这些运动质疑，更不能否定，谁要质疑或否定，就是“反对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已有先例：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等人被毛泽东钦定为打倒李井泉的“突破口”，已由中共中央正式平反，对“萧李廖”案这样的历史冤案仍然没人敢轻易表态，任何一个接待上访申诉的文革接待站人员都只能答应向上转交材料，并答复“等待运动后期处理”。

据廖伯康回忆：

1967年9、10月间，中央指示所有来京上访人员都要回到原地区解决问题，各单位设立的接待站陆续撤销，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也随之撤销。我们对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不明，且武斗还在升级，尚无回四川的条件，真是走投无路。后来通过一位北京钢铁学院名叫余吉冰²⁰的同学暂时住到他们实验大楼的一间实验室里。

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在重庆设联络站时就成立了“萧李廖专案组”，陆续有李云生、黄敬贤²¹、邓光中、曾昭贵等同学参加。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何亚瑄也和他们一道做过一些调查和整理资料工作。他们在重庆查看了一些档案材料，并在重庆、北京访问过一些知情干部，整理了一套《萧李廖调查材料汇编》，写出了《调查报告》。1967年9月下旬，为帮助我们返回四川，“专案组”派曾昭贵去成都，向四川省革委会筹备组汇报并将《资料汇编》和《报告》送交省革筹组长张国华。张国华表示支持对萧李廖一案进行调查，并提出最好有四川造反派参加……

在北京钢院住了近两月，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提出要我们回成都向省革筹作一次汇报。我们也考虑到，无论中央态度如何，作为四川的干部，最终还得回四川解决问题。北京地院“专案组”派曾昭贵护送李止舟和我于1968年2月18日离开北京回成都。²²

另据刘德彬回忆：

²⁰ 余吉冰：在重庆八一五派“罗广斌专案组”的一个笔记本上写作“余吉斌”，称之为“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成员。

²¹ 黄敬贤：在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另一处写作“黄景贤”。

²²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7～208页。

67年国庆节，我们不能在地院住了，同时地院罗广斌调查组准备结束，把我们这一案送四川省革筹处理。因此，10月2日杨益言和我由京乘车到成都，我们到成都后，碰见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他已把罗广斌有关调查材料送给了省革筹，并请示了张政委。张政委指示地院调查组及重庆造反派继续进行调查。杨益言和我被安排在地质局地院驻蓉联络站住宿。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川大第二招待所。²³

这里所说的张政委，即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当时他的态度是偏向于成都八二六派和重庆反到底派的，不过不像省革筹另外两个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那样露骨。

另据当年重庆市文联编辑熊小凡（曾任反到底派文联东方红纵队主要负责人）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中回忆，1967年底，他听西南师院参与为罗广斌翻案的学生侯光清讲到：

曾昭贵曾把北地搞的为罗翻案的全部材料带到成都，移交给了省革筹。据说，曾昭贵曾请求张政委 接见，当时张政委很忙，委托天宝同志接见了，并转述了张政委的意见，大意是说：①北地东方红小将支援四川造反派做了许多工作，表示感谢他们；②关于罗广斌的调查，可以转给四川造反派小将继续进行。总之，他们转述的基本精神是，张政委表示支持他们的工作。²⁴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罗广斌问题专案调查组，根据张国华指示，把调查工作移交给了重庆反到底派西南师院八三一纵队的同学继续调查——实际上，西师八三一有同学一直在参加这一调查工作。最有趣的是，西南师院的女学生何亚瑄，在工作中与调查组负责人曾昭贵相识相恋，后来结成了夫妻。因这个调查组同时在进行“萧李廖”和罗广斌两个大案的调查翻案工作，所以后来李止舟说他是曾、何的媒人，刘德彬也说他是曾、何的媒人。

杨益言、刘德彬转移到成都后，翻印了北地“东方红”调查组写的罗广斌历史调查材料，并根据调查组的调查报告，重新写了《罗广斌历史调查报告》，编印了油印的《罗广斌同志历史调查（证明材料选编）》，汇集了有关罗广斌从1944年至1949年间历史情况的一些证明人所写材料，在《序言》中说，从这些材料可以证明罗广斌的历史是“革命的，鲜红的”。

然而，在当时的语境下，那些证明人本身是否“革命”已经是个问题，这些

²³刘德彬《我在罗广斌死后的一些活动》，载《昨天》第7期，2012年7月30日。

²⁴熊小凡《关于罗广斌叛徒集团的翻案活动——我的检查和交代》，根据手稿录入。

证明材料是十分无力的——在北地《东方红报》上发表回忆文章歌颂罗广斌在白公馆狱中英勇表现的同狱难友郑业瑞，就是一个“摘帽右派”，后来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还被诬为在武斗中“指使杀人”，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枪杀。

致命的打击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

1968年3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对四川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时称“三一五讲话”或“三一五指示”。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成都红成派和重庆八一五派的，因为他们从1967年底掀起了全省一派群众组织打倒省革筹领导人中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浪潮，在“三一五指示”中甚至上纲到了“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说语）的高度。周恩来讲话中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对重庆反到底派带有支持、欣赏意味的几句话，周恩来说：“重庆去年把李井泉搞去，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²⁵因此当这个讲话传达下来后，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派欣喜若狂，而红成、八一五派则垂头丧气，怨气冲天。

不过，这个讲话中也有对八二六、反到底派不利的内容。当周恩来谈到四川的“敌情”时说：“国民党在四川留下的人很多，有刘文辉、杨森、宋希濂、罗广文、胡宗南，还有王陵基、蒋介石等军阀的人，情况复杂，旧社会渣滓多。”²⁶江青接着周恩来的话，讲了这样几句：“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蓥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这样简短的几句话，对于正在为罗广斌及四川地下党的许多冤案进行调查翻案工作的四川八二六、反到底派和北京地院“东方红”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江青说的“一个剧”，指的就是她从文革前就已经安排进行的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京剧，后来大概听说了罗广斌的自杀和他的“历史问题”，又得知四川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情况十分复杂，不好作为文艺样板的题材，在1967年5月决定放弃了已经进入彩排阶段的京剧《山城旭日》²⁷。而这一次，江青毫

²⁵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时的讲话》，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1968年3月19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工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政治部翻印，1966年3月20日。

²⁶ 这个说法十分滑稽，因为即使按中共的观点看，提到的人中，刘文辉、罗广文是“起义将领”，宋希濂、王陵基是被俘“战犯”，而杨森、胡宗南都是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战犯”，怎么能够混为一谈？

²⁷ 有关情况可参见笔者《“样板戏”〈红岩〉夭折记》，2003年9月25日《南方周末》第1024期。

不含糊地表明了对罗广斌问题的态度——尽管“是罗广文的弟弟”根本算不上什么罪名，但她对罗广斌的否定已是明白无误的了。

鉴于“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的传达贯彻，北京地院“东方红”不得不断然中止为“萧李廖”和罗广斌翻案的调查工作。

1968年3月下旬，曾昭贵、何亚瑄再次去重庆，打算向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汇报有关罗广斌案及“萧李廖”案的调查情况，以作一个了结。到重庆后，他们借宿于反到底派工总司的办公处，重庆市革筹组大院（即原市委大院）斜对面的原共青团重庆市委院内。

3月27日午后，被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激怒的八一五派，决心以实力打出胜局，在同样对“三一五指示”心怀怨愤的驻军及市革筹（市革筹负责人即驻军负责人）的默许下，八一五派的多路武斗人马公然向市革筹对面团市委院内的反到底派工总司、机关司令部发起武力进攻，乱枪齐发，当场打死二人。反到底派本以为近在市革筹眼皮底下，安全应有保障，才从市体委那边搬过来的，而且未做任何防守准备，这时只有不断打电话向市革筹、警备区请求来人制止武斗，但根本无人理睬。反到底派的部分人员只得在对方机枪扫射间隙时从后面的嘉陵江岸坡边冒险逃离，其余数十人成了“俘虏”，曾昭贵、何亚瑄二人也在其中。经过一番惊恐、屈辱的殴打关押审讯后，曾、何二人被迫返回成都。当时住在四川大学的廖伯康回忆：

曾昭贵对我们说，他们也不能在成都久留，只能把我们的材料交给省革筹，由省革筹审查处理，他们回北京后再向中央文革作一次全面汇报。至此，北京地质学院负责调查我们问题的“专案组”宣告结束。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²⁸

熊小凡在“清队”学习班的那份交代材料中回忆：

（1968年春）侯光清、何亚瑄又回到了重庆，接着，曾昭贵也到了重庆，曾、侯都住在机关司令部搞为肖、李、廖翻案的“调查报告”，曾昭贵到重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工总司（原设在团市委内）被占的事件。大约正是在这段期间，我听侯说，何亚瑄曾到过北京，同曾昭贵等找中央接待站西南组的负责人汇报过他们调查罗广斌问题的情况。

“三一五”指示下达后，曾昭贵又到过一次重庆，他对我说了几点（在我的印象中，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他的组织的意见）：①我们（指北地小将）

²⁸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9页。

搞罗广斌问题，目的是想揭露李任及其同伙利用罗广斌打击一大片；②我们的调查工作不深入，不全面，有些问题没有触及，如中央首长指示：“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我们对罗广斌与罗广文的政治关系就没有调查，这是有缺点的。我们对罗广斌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向中央上报的材料，都是根据调查材料，没有捏造事实；③中央点了罗广斌的名，坚决按中央首长指示办事，不再搞这个问题了。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上是记的大意，并非原话）。²⁹

北京地院“东方红”为蒙冤者平反翻案的专案调查被迫结束了，而重庆八一五派继续追打“叛徒”的专案工作却在进一步展开。1968年5月4日，借着“三一五指示”的“东风”，重庆八一五工总部向重庆市革筹组和重庆警备区上报《关于“揪叛徒、批〈红岩〉”专案工作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中还罗列了八一五派所了解的重庆反到底派、成都八二六派、首都红代会北京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及一些个人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情况：

江青同志在“3·15”指示中提到了有人替罗广斌翻案的情况，事实的确是这样。从罗广斌被揭发出来那一天开始，为罗广斌翻案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去年二月，罗广斌的追随者杨益言等就抛出了《罗广斌是个好同志》的传单，三月份在北京出现了署名“解放大西南兵团”以及署名“红岩纵队”的翻案大字报和传单，四月，杨益言、胡蜀兴、张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叛徒）、陈家俊（高级党校干部，原重庆市团委干部）、于蓝（电影演员）等人就赤膊上阵了，在北京、天津等地到处作报告、写文章，什么《分歧何在》、《不许诬蔑〈红岩〉》、《罗广斌同志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等等，接踵而来，大量印发，流毒全国。接着，六月，北地《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以肖、李、廖证明材料为主的翻案调查报告，和郑业瑞（叛徒，极右分子）的翻案文章，七月发表了为电影《烈火中永生》和罗广斌翻案的文章，八月又发表了内蒙作者乌兰巴干的文章。单是为罗广斌翻案的专刊《红岩战报》就发行了三十七万余册。去年十月，叛徒翻案组又以两江纵队名义大量散发了所谓的《罗广斌同志历史调查（证明材料选辑）》。十一、十二月份，成都《新解大报》连续抛出《罗广斌问题揭晓》之一、之二，今年一月份起，为罗广斌翻案更出现了“新水平”，即是为四川地下党，为华蓥山游击队翻案为中心，以罗广斌问题为“突破口”的作法，同时火力表现得很猛，如反到底派《红满天》小报第五、六、七、八、九期连续发表了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九二一炮声》和《井冈山评论》68年2月合刊，以“九评”（重庆九人平反小组）的名义，发表了《也谈罗广斌问题》。成都《红三司》小报第七期（68.12.9）发

²⁹熊小凡《关于罗广斌叛徒集团的翻案活动——我的检查和交代》，根据手稿录入。

表了《邓小平是镇压华蓥山游击队的罪魁祸首》，重庆《机关反到底》小报第三期（68.3.16）发表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更有甚者，是《军工井冈山》报第一期用如像《四川日报》的版面在报纸四个整版上集中发表了由《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红岩战报》编辑部、《八二六炮声》编辑部三报联合署名的一、二、三、四“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的翻案文章（二、三、四评文章的标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关于小说《红岩》”），并且还有西南局组织处雷雨田（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审查情况》的文章。直到“三一五”指示前，重庆反到底并准备出版由北地东方红、西师8·31编的全国为罗广斌、肖、李、廖翻案的文章。只因“3·15”指示下达，才有所收敛。³⁰

当时全国自3月下旬中央宣布揪出“杨、余、傅反党集团”后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粉碎右倾翻案风”运动，因此八一五工总部的这个报告称为罗广斌翻案“也是右倾翻案风在四川的重要表现之一”。

尾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萧、李、廖和罗广斌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文联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12月31日，中共重庆市委发出《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因这个《平反决定》回避了案件实质是李井泉打击报复，掩盖了事情真相，萧、李、廖均未认可。后经多次修改，1982年12月23日，重庆市委重新下发了《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同时撤销了1978年市委下发的《平反决定》。廖伯康说：“为我们平反的决定大约先后修改了六次，但我们始终都没有签字。不签字的原因只有一个，《平反决定》没有指明问题的实质是打击报复。”³¹

为什么给“萧李廖”一案平反的文件始终不能提李井泉打击报复？因为李井泉这个整人者早在被整的萧、李、廖平反之前就已经由毛泽东先“平反”了。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因自己一手提拔起来并坚持写进《党章》和《宪法（草案）》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居然背叛了他，思想上、精神上都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不得不重新起用了一些文革以来被他怀疑并打倒的老干部，其中就有李井泉——在对西南和四川人民不作任何解释、交代的情况下，就给李井泉摘

³⁰ 重庆八一五工总部《关于“揪叛徒、批〈红岩〉”专案工作的请示报告》，打印件。

³¹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23页。

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独立王国”等帽子，在1973年就安排为中共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就安排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井泉已经重新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重庆（当时还只是四川省辖市）市委的平反决定哪里还能说李井泉半点不是？

相反的是，曾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效尽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造反派，却早在毛泽东大权独揽、宣告文化大革命取得“摧毁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之时，就被他们的“红司令”无情抛弃，派出所谓工宣队、军宣队，以远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更为恶劣更加粗暴的方式赶下了文革舞台。特别是那些曾经自视为“中央文革铁拳头”的首都红卫兵，更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整得七荤八素痛不欲生，有的甚至被逼得自杀或被整死整伤整病整残……文革结束之后他们继续遭到“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清算，有的判刑入狱，有的“记录在案”——从此不准入党，不准提拔，不准出国……在许多文艺作品和官方史著中，他们都被脸谱化地写成了穷凶极恶的“社会渣滓”、“帮派骨干”、“三种人”……

然而，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是复杂的。红卫兵、造反派在毛泽东那套文革理论蛊惑、诱导下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确实干了不少傻事、蠢事、错事、坏事，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也干了些好事。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当年冒着风险不遗余力为一些蒙冤者调查翻案，就是其中值得记录、值得点赞的一件。

改革开放后，廖伯康曾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在离休后，他在年龄比他大、身体比他差的“同案难友”萧泽宽、李止舟的大力支持下（向他提供了各自的回忆材料），在重庆党史工作者胡康民、赵权璧等热心协助下（帮他查档案、找资料、访问当事人、整理录入文稿），写出了他对那段难忘经历的回忆，其中写道：

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遇到曾昭贵、何亚瑄，问他们当年为什么对我们的平反问题那样执着，那样坚信我们是冤枉的？他们说，文革期间，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³²从重庆回北京后向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看法。他们还从邓照明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报告中摘录了八千字。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将所有调查材料交给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了。³³

³² 萧风、邓照明：1962年中央书记处接到四川干部、群众举报农村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并听取了廖伯康、于克书的当面反映后，从中央部委机关选派到四川去“微服私访”的十七名司局级干部中的二人。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组长，邓照明时任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

³³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207～208

李锐读了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后，在《炎黄春秋》杂志 2004 年第 1 期上发表了读后感《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其中十分感慨地写道：

通常，人们一谈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其实，不仅是这些为“萧李廖”、罗广斌鸣冤翻案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那些当年认定罗广斌是“叛徒”、“萧李廖”是“黑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另一派红卫兵、造反派，以及两派冲突中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互相往死里打的红卫兵、造反派，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

这正是那场“大革命”值得研究的“史无前例”的特点之一。

2018 年 2 月 26 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昨天》2018 年 2 月 28 日 107 期上）

三、 红楼座谈会王大宾没有参加

敖本利

卜伟华在其《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对“大专院校座谈会”（本文作者说明：因该座谈会在北京沙滩原北大校址的红楼举行的，故一般被称为“红楼座谈会”），作如下记述：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张春桥主持，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学校群众组织的七八个代表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张春桥别有用心地说：‘林副主席9月15日讲的，有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指同志们。’暗示少数派可以继续向上造反。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人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指责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他们批判李先念、簿一波、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还点了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如杨秀峰、何长工、吴德峰、蒋南翔、王观澜、吴波等。会后，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整理，经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审阅，由江青审核，印发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记录之一》和《大专院校部分革命师生座谈会情况简报》。《简报》最后建议：‘请中央考虑，领导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从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怀疑暗中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在执行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与以毛主席和林彪为首的党中央对抗。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了座谈会记录和《简报》，张春桥在会上分析这次座谈会反映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有三个问题：一、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还在暗中存在，他的那条错误路线，还没有在群众中批判；二、‘造反派’还受压，还没有占优势；三、总理‘和稀泥’。张春桥每讲一条，江青就予以肯定，如说到‘总理和稀泥’时，江青就说，‘总理就是这样的’。江青还对陈伯达说：‘你把座谈会记录送一份给总理看看。’（陈伯达后来没有敢送）陈伯达对王力、关锋说：总理旗帜不鲜明，要写一篇《红旗》国庆社论，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将座谈会的材料送毛泽东，同时写一篇《红旗》杂志的国庆社论。这期《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

都参加了审定和讨论，陈伯达定稿。”

红楼座谈会，及随后的《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推动了全国性群众性的公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化大革命发展中，造反派队伍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主流的转折点，实是文革历史中的重要一页。过往的文革研究著述对此忽视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零星少见。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一书，对此作了记述是好的。现仅对其记述中我所了解的史实错误与不全部分补充如下，望能得到当时的与会者、知情者继续补正，以还历史的全貌与真实。

1、红楼座谈会的起因，据我所知，是在当时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仍处于少数受压的情势下，十几个高校造反派组织串联后，联名写信向中央汇报，请求支持。该信是送交《红旗》杂志社，请其转递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的一个同学，就是在《红旗》杂志社的大院内，在这封信上签名代表中财院八八队参与的。由此接到通知后，中财院八八队的敖本立等人参加了这个红楼座谈会。

2、红楼座谈会的地址，就在北京沙滩《红旗》杂志社附近的原北京大学校址红楼的一楼，进大门后靠西走廊外侧的一间大房子里举行的。西头摆了一列书桌，为座谈会主持者席位，面对主持者席摆着好几排靠背椅，即为与会者座位。红楼为文物保护单位，为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时的策源地。现为国家文物局占用。

3、主持座谈会的，除卜伟华书中所记述的外，还有当时的文革小组成员，军队的谢镗忠和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参与。

4、参与座谈会的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有十几个，除卜伟华书中所记述的外，还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等，每天都有三十人左右参会，而不是书中所说的“七、八个代表”，开会的房间每天都座满了人。

5、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参与座谈会的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当时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每天都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陪着他一起来的。王大宾根本未参加这次座谈会，也就不存在卜伟华书中王大宾发言攻击什么的了。

6、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参与座谈会的是韩爱晶。

7、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参会的敖本立，在会上发言批判了李先念、吴波执行了错误路线，打压造反派。卜伟华书中所说：“还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是否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全国广大革命人民中公开进行。”这个人就是敖本立。

8、北京工业大学的造反派提供了许多谭力夫宣传血统论与为工作组辩护的讲话材料，批判谭力夫保工作组打压造反派的言行。谭力夫讲话被广泛传播的影响，及其对刘邓错误路线的保护作用，成为座谈会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关于红楼座谈会及随后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性的公开批判，可以成为文革历史研究的一个专题。作者愿与关注者交流资料与看法。

2011年2月13日

四、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肖劲东 蔡新平

2015年1月27日是安静中老师诞辰八十周年的纪念日，眼看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总想为这位是官非官，是民非民，又总是在地质大学历史重要关头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人说点什么，来祭奠这位尊敬的师长。



地院文革中所谓蔡派“黑高参”高安郑江四人在高元贵家
(从左起)安静中(院团委书记)、高元贵(院长、党委书记)郑伯让(岩石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辅导员,党支部书记)

初次知道安静中是在1966年8月24日，但凡在地院经历文革的学生与教职员工都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一天的夜晚举行了轰动京城大学界的8.24大辩论。当时我正站在大操场的人群中，数千名校内外的同学和老师中不时出现为蔡新平和殷维侯同学铮铮有词的辩论发出的喝彩声。记不清是因为什么，只听到台上的人在喊“请安静中老师到主席台来！”，我才第一次听到安静中这个名字。台上的人喊了几次，台下还是没有动静。只听台上的人说“他在、他在、他刚才还在下面”。人群里开始有人喊，“他在这！”，之后台下开始有了骚动。安静中走上了主

席台，看上去很不情愿，也记不清这位老师说了些什么。只是感觉他很不愿意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觉得他与别人不一样。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个全民疯狂的时代，一个糊涂的人把自己置身事外容易，一个清醒的人要把自己置身事外又是何等的艰难。

我能够结识安静中老师还是托蔡新平的引见，那是 1966 年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之后，东方红内部出现了分裂，蔡新平、殷维侯、孙司权和我几个同学不认同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前后的过激言行，更不赞成“砸烂斗批改”之类的口号。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以反右倾为名，召集了排除蔡新平参加的总部秘密会议，将蔡新平挤出了东方红总部。我们四个人就凑在一起搞了一个红色造反兵团，宣传我们的主张。后来又与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邱世寿四位同学的六二〇兵团合并，就是以后的红二团。那段时间几乎是每天晚饭后就不自觉的三三两两聚集在安静中或江祖如老师家里讨论，常常争论国家或者地院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此我们这些学生与安静中老师的频繁交流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毕业分配。我在青海地质局工作期间除了保持通讯以外，我还到江西仁和干校、北京地质大院探望安老师。1978 年考研回到学校，前后有将近二十年相遇，最敬佩的就是他深邃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魅力。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首先在于是他的思想，在我的记忆中，文革期间他好像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也没有公开表明、参与或支持某个群众组织。即便是后来成立革委会、地质学院迁出北京，异地办校等重大事件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一是不趋炎附势，二是服从组织原则，三是保留个人意见。我们这些地院文革期间经常与安静中老师相处的学生（蔡新平、周永璋、殷维侯、赵国柱、吉让寿、孙司权、程关林和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好像和自己的兄长或者是与一位智慧的长者在一起一样。他从不要求我们做什么，也从不批评我们做错什么。在那种举国无政府状态的形势下，他总是从党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基本事实出发和我们反复讨论，如何理解文革中变化无常的局面。

我清晰地记得一件事。那是在 1966 年 8、9 月份一天的傍晚，我们听到了一

个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建议，大意是建议我们借当前群众运动起来之势，想办法把那些当权派、学术权威和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人统统都煽动起来，让他们充分表演，然后再一网打尽。听到这个建议的传达，我的第一感觉是有点“不那么光明磊落”，怎么办？去和安老师商量一下。于是我们几个（好像有蔡新平、周永璋、赵国柱、吉让寿和我）就去了安静中老师家。讨论了一夜，最后得出三点结论：一、我们的党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执政党，完全可以采取正面宣传与教育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完全没有必要让我们这些学生去鼓噪。二、那样做不仅不符合我党一贯宣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反而有害于党的声誉。三、虽然当时我们也隐约知道点提出这个建议者的特殊身份，但是终究我们不认识其人，谁知其是否一定就是我们以为的那人？据此，我们达成共识：既然是意见，可执行也可不执行，暂时还是不予理睬为好。

在文革那几年，许多事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讨论、争辩甚至吵架中取得一致的。当时江祖如老师也曾戏说我们二团的“八个人是九个主意”。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从安静中老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终生受益匪浅。

安静中老师的独立还在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无私。中央党校 84 岁的任登第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公’从何来，公自天道而来，所谓天无私盖，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就是公。”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乃至文革后；无论是校内外的领导、前辈学者、教员学生，还是普通工人；更无论是先进、落后或是所谓“反动权威”，他都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这就是安静中老师的大公无私。

文革前 11622 班的吉让寿同学，由于自幼父母双亡，受过不少的艰难苦楚，所以进校以后有过一些过激的言语，行为也比较怪异，在一些人眼里是个“问题学生”。安静中老师知道后，到 11622 班蹲点时主动与吉让寿同学接触、谈心，化解他心中的疑虑，帮助他主动融入班集体之中。使吉让寿也学到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不随大流，在地院文革的风口浪尖之中顺利地度过，后来又考取研究生，成长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据吉让寿自己对我说，这一切首先是得益于安静中老师

多年的教导。而在我们二团的8个学生当中，他与安老师始终保持着一种我们都不能及的师生情谊。

凡是北京地院的师生都知道安静中老师是一个特别有思想的人，但是安静中老师为人低调，从不张扬，文革中曾经有一篇大字报标题就是“安静中在安静中”，这位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本意是对安静中老师在文革中的这种低调不张扬风格的嘲讽。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恰恰是安静中老师最令人可敬之处，也是旁人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对他人一视同仁，真诚相待，以心交心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了地院基层师生的普遍认同，不论是早期参加过“斗批改”还是“东方红”，“朱派”还是“蔡派”的师生，还是被地质部打倒的“走资派”院长高元贵、“三家村黑店”的伙计陶世龙老师，还是普通教员、工人、学生，就连王大宾、聂树人等头头，都曾是安静中老师的座上宾，他都一视同仁，仔细聆听，帮助分析，毫无保留地畅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田春林同学是地院东方红早期核心组成员之一，可以说是一位“铁杆朱派”。后来他与朱成昭分道扬镳，被结合进了文革期间的地院革委会（这段历史，田春林同学自己写有专述）。据田春林同学自己说，他文革期间也一直与安静中老师有往来，特别是与朱成昭分手之后，去安静中老师那里就更多一些，慢慢就觉得安老师说的有道理，结果他也就时常被指责为安静中或二团在革委会的代理人。类似这样的“代理人”还有当时革委会的委员孟繁华同学、刘玉发老师等。

还有一位同学叫程关林，他是所谓保皇派“斗批改”的发起人，地院“8·24”大辩论，他是代表“斗批改”上台的辩手。“8·24”以后，“斗批改”解散了，很长时间他很不理解。后来他的同班同学余九乡把他引到安静中老师家。程关林很可爱，很直率，不躲不藏，直陈己见，不认输就直接与安静中老师辩，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有时甚至彻夜长谈，终于与安静中老师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所以仅仅认为安静中是二团或“蔡派”的幕后高参、后台，这其实是低估了安老师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除二团外，他还给了很多人帮助。在他逝世的追悼

会上，有不少人，有的是夫妇老两口，在安静中灵前失声痛哭，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从来也没有发表过与安静中存在某种关系的声明，安静中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属于“蔡派”，他安静中就是安静中，他尽管表示过赞成“蔡派”的观点，很多人也认为他就是“蔡派”的核心，但实际上他始终是独立于地院“东方红”、“斗批改”、“蔡派”、“朱派”和革委会之外的一个独立的人，因为他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安静中老师不仅对那些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与指导的同学与老师真诚相待。即使对那些曾经批斗或者反对过他的同学与老师亦是如此。1968年是北京红卫兵运动派性斗争最混乱的一年，在所谓“大批判”斗争中，当时的地院革委会在少数同学的操纵之下开展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制造了长期非法拘禁高元贵院长、安静中和郑伯让老师等有悖人道、伦理且最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其中安静中老师受害最深，羁押时间最长，自1968年5月27日全院批斗高元贵院长大会当天抓走，到8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进校逐步被解救回家，历时近五月余，至今尚无人醒悟，能公开为此承担责任。但是安静中老师在挺过这段非人的折磨以后，却对参与制定、实施非法拘禁事件的学生持谅解态度，始终认为他们被人利用，同样也值得同情，紧紧地封闭了他的这段经历，几十年未吐一字。到今天当我们想了解安静中老师是如何度过这一段非人的经历时，不仅我们这些周围的学生，就连安老师的夫人濮长萱老师也不知道去找谁了解。可见安静中老师是何等大仁大量！

安静中老师对迁校持不同政见是校内人所共知的事，但在有关方面最后确定了在武汉建校后，他保留了意见，从组织上服从了决定。1977年我在青海收到安静中老师的来信，说他“现在被安排在矿产系任总支书记，开始大家以为矿产系与安静中持不同政见的老师较多，担心去这个系的工作难度大。但是大家都支持我的工作，结果反而成为当时全校建校工作开展最好的一个系”。

1978年我考取研究生返回学校的当年春节回老家。无意中与老父亲谈及此事，这位饱经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政治风浪的老民主人士竟然伸出大拇指说：“这是一个有大本事的人，你就只有二流本事。”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会识人

用人。”

安静中老师曾经一度调离地质大学出任地科院研究生部主任。但是他在北京临时安置的家，几乎经常有来自南北地质学院的领导与教员（赵鹏大、翟玉生、郑伯让、王良、扬起、陈光远、朱上庆……）来与他谈论武汉地院的建设，其间藏着对安静中老师的多少关心、多少期望不言自明。赵鹏大校长当时长住武汉，只要回到北京，就总要到安静中老师家来，一进屋就关进小房子里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

自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学校进入文革后期，我们也于1968年底毕业分配离校。虽然我曾到江西仁和干校、武汉地校和北京地质大院看望过安静中老师，但大多数时间只能靠信件往来交流思想。这段时间谈得最多的是地质学院的迁校、建校和异地办学问题。经过45年时间的检验，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当时的地质部领导的确错误地估计了文革后期的国内形势，同时也错误地估计了地院广大教职员工的觉悟，错误地做出向中央报告要求把地质学院迁出北京的决定。冤枉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不说，结果是一个地质学院迁出北京，折腾了几十年，变成了两个地质学院（大学）。其中的一个换了个名字又回到了北京地质大院。迁校所导致的从上世纪初中国开始创办地质教育以来百年的教学资源分散、损失，优质教师资源的流失，由于迁校在校内引发的一系列新的矛盾……都极大影响了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质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迁校的大是大非上是最能体现安静中老师不为官，不为名、不为利，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有利于地质教育事业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与广大教职员工在一起的精神。地质学院的教职员工都知道安静中是明确反对迁校的。即使在迁校工作组进校以赞成与否在教职员工中划线的高压状况下，仍然坚持了组织上服从，保留个人意见的态度，在实际行动上还是打前站的首批干部之一。

在反右运动初期，地质学院有三位年青教员，因大鸣大放中出现的乱象曾直接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市委领导安排刘仁副市长接待了他们。到反右运动后期此事在北京地院也曾颇具争议。此时安静中老师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校团委书记，参加了学院的一次扩大会议，讨论这三位年青教员是否因此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

在会上安静中老师第一个发言，不顾个人是否会受牵连，慷慨陈词历数他们只属于非正常的组织行为，有错误但不应被划为右派等理由。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所谓“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期间，为了罗织安静中老师的罪名，居然有人把他与那三位老师连在一起，污蔑他是“漏网右派分子”。为此我和孙司权同学还专门骑自行车去天津找当事人之一的王玉茹老师落实情况。

文革期间安静中老师未曾写过一份大字报，只是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和一封《给新市委李雪峰、吴德、郭影秋同志的信》（由工作队收集编入《大字报选编》第二期）。《呼吁书》写于1966年6月16日，呼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工作队党委的直接领导，我校十七级以上干部勇敢地站出来”，积极投身于文化革命之中。给新市委的信写于1966年6月19日，写信的理由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问题涉及几乎所有在校的党委书记、党委常委，也涉及到地质部工作队党委和地质部本身。因此，只能向你们反映。要求向市委领导同志或向市委派出的联络员反映”。他判断和处理问题极少掺杂个人的情感好恶，总是冷静地分析判断可能会发生的最坏结果，提前给出预警和劝诫。文革中我们能够避免许多年轻人的鲁莽冲动行为，避免了犯大的错误，就是得益于安老师的这种“预警”和“劝诫”。他作为一个睿智的长辈，如果内心已经清晰地知道了前面有巨大危险，他是鼓动学生呢，还是应当去阻止学生的行动？阻止，可能产生误解，但那才是一个智慧的长者对还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的保护。

20年前蔡新平同学在安静中老师的追悼会上写的几幅挽联，我认为很深刻地表达了我们对安静中老师的认知和情感。现抄录如下，以再次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和致敬。

与大师晤谈 可度迷津劫难

师兄长风范 能立天地人间

往事如烟 经几多风雨 全仗恩师睿智谋断 哀教诲难再

清心似水 历千般坎坷 方显兄长磊落襟怀 挽高风长存

安静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今天仔细掂量，他究竟给我们留下并能

持续发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唯一就是——他身体力行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不然一个活着的人就如同行尸走肉，就失去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26年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动用所有的资源去教人不要思考，只要“听话”。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十几亿人都如同行尸走肉，只靠一个人发号施令，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不产生动乱吗？难怪钱学森在临终前会禁不住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提出那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现在一些同学正在总结北京地院的文革史，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毫无疑问，文革必须彻底否定。北京地院的文革自然也必须否定。文革中的地院东方红曾经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曾经在大江南北叱咤风云。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得更深一些，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呢，还是应该进行反思？一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是：地质学院的文革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与指使下运作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前期中央文革是在幕后推动，但从1967年初，当地质学院大多数教职员工与部分学生开始抛弃朱成昭的时候，中央文革就直接进入前台，把一个老实人王大宾扶植起来，成立地院革命委员会，继续执行中央文革的路线。其结果就是直接在地院引发了长达两年的派性争斗。

我看过田春林同学的回忆，很真实。从他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我们的天真、我们的忠诚是怎样被利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太单纯，已经单纯到不用思考。其结果却让我们有些同学付出的是多年囚禁生涯甚至生命的代价。

从青春少年到年近六旬谢世，安静中老师在北京地质学院（后改为中国地质大学）度过了他最传奇的人生。凡是与安静中老师同时代的人，都了解安静中老师在地大有最广泛的群众联系，不论是教员还是工人，不论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群众，不论是前辈学术泰斗还是青年学子，只要与他接触，就会因为他有思想，很愿意成为他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有思想，在那个全民都不需要思想的年代，他又是官方最不受待见的人。他一生最大的官也只是地质大学（北京）一个管学生的党委副书记。他受到官方最器重的瞬间是在高元贵时代，那时他与彭志忠老师被这位高老夫子评点为北京地院“红专”学习的典型人物；可惜后来竟被错误地

解读为“安静中是只红不专，彭志忠是只专不红”，那是一个时代对人才的误读。时过四十年后反思，难道他们不应当都是我们地大人应当引以为自豪的学习典范吗？其实评价一个人最公允的是口碑与时间。

1995年安静中老师突发心脏病去世，500多学校师生员工自发参加追悼会，告别大厅内外挂满了深情的挽联，可见功德自在人心。再次特引用其中几幅挽联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安静中老师 1995年去世的追悼会上八宝山告别大厅内外挂满了挽联
思才辩才 学界难得人才
子师友师 我辈痛失良师
师道美德同江河长存
功勋伟业与日月同辉

2015年1月24日

五、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

蔡新平

一、安静的音容笑貌始终不曾离我而去

2015年一月27日，是安静中先生80冥寿。为准备这个纪念活动，我和夫人牛彩茹，一起制作了一个纪念册。在我存留的老照片中，我精心选择了安静的一张头像作为纪念册的封面。插一句，我们都习惯简称安静中为安静。安静这张照片的眼神和表情，深深的撼动了我已沉寂了的情感和思绪。我和安静相交结识在那时局波云谲诡，命运跌宕起伏的文革十年，而亦师亦友的情感则终生相伴，尽管他已经仙去，可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不曾离我而去。在这张照片中，他那深邃智慧的眼神中蕴含着隐隐的忧郁，透过这忧郁的眼神，可以感到在平静的外表下那颗不平静的大脑在不断的思考着问题。他平时的运动锻炼很少，他主要就是运动这个脑袋了。我选取的这张照片摄于文革结束后不久，乍暖还寒。因为文革期间留下照片很少，且质量都强差人意。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它很具有代表性，文革中的安静中在我印象中就是这样。

我们这伙人，以“二团”为主，但不限于“二团”，都是一帮性格叛逆，各有主见，爱争论，不服输的家伙。文革中问题多多，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每当大事来临，认识上总难统一，争论是家常便饭。这时安静的家就成了我们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各抒己见，高谈阔论。当我们争论得不亦乐乎时，安静就在那里安静地听，头微微上仰，嘴唇禁闭，眼神内敛。这说明他在边听边思考。从他抽烟的神态，可以感知他也不轻松。遇到重要严峻的大事，面临转折的关头，我们也会紧张焦虑，但安静此时反而显得更加沉稳冷静，似乎波澜不惊。他的这种情绪就如同定海神针一样也传给了我们一种冷静和坚毅。当我们眼光注视安静的时，激烈的争论会平静下来。当他说：“我说几句吧”，我们的争论就会戛然而止。大家都会安静地等待，聆听安静给我们一个说法。他说话的语调从来是不急不缓，分析一个问题总是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徐徐道来。一般他会提出几种可能的推测，然后又给出对每一种可能的分析判断，最后会给我们一个最中肯的建议。他不轻易下结论，但一旦把他的意见说出，就可以感到，那已经过了他的深思熟虑。

在我们这群人中，安静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够一言九鼎，我们这些人中，总有那么几个爱较真，并不能马上就接受他的建议的人，总要再为自己的想法找出种种理由，这时我们相互之间就不可避免又要“军阀重开战”。在这种情况下，安静面带一种特殊的微笑，感觉既憨厚又狡黠，嘴角会不时微微抽动几下，一改仰视和内敛，眼睛专注视着说话者，虽然还是静静地听，但似乎已不是那么有耐心了。等争的差不多了，他会抓住时机及时介入，针对反对者论据的要害之处予以驳斥，将争论范围收紧，归纳利害得失，不再含糊，而是更为清晰明了地重申自己的意见。在安静的辩才面前，我们这些人中最好的铁嘴，也得甘拜下风。在大多数情况小，他总能使大家的意见在整体上得以统一。

他严肃的时候多，不过遇到高兴的事情也会出现开心的微笑。但我印象中即便是在难得的高兴中，你也可从他不多的快意的微笑中感到一种含蓄的警醒。似乎老子的哲言“福兮祸所伏”始终没离开过他的脑袋。在我和他相处的过程中，记忆里，似乎没有见到过他会开怀大笑。

写安静，有说不完的话题。在安静去世的追悼会上，我写了三幅挽联，那都是我对安静最真切的情感、感悟和认知的表达。三幅挽联如下：

往事如烟，经几多风雨，全仗恩师睿思谋断，哀教诲难再。

清心似水，历千般坎坷，方显兄长磊落襟怀，挽高风长存。

思才辩才学界难得人才，子师友师我辈痛失良师。

与大师悟谈可过迷津劫难，学兄长风范能立天地人间。

安静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是一个很大的专题，在这里仅说一个与地院文革命运最为关切的问题，看看安静这个智者，我们的恩师，是如何陪伴我们历经风雨，引导我们渡过迷津险滩的。

二、研究文革者之间

很多外校的朋友和研究文革的人，总会问一个问题，你们地院的两大派为什么没有分裂？为什么没有发生武斗？的确，文革中独树一帜，造反最早，影响最

大，号召力最强的地院《东方红》，当清华、北大、钢院、邮电、矿院、石油……等等高校打得天昏地暗之时，地院竟然相对地平静。这在北京高校中的确显得很怪异，即使在全国也很罕见。

地院文革中，《东方红》集团内部也存在对立的两大派。早期是东方红领导者内部出于斗争策略不一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群众支持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另一部分群众支持核心组成员蔡新平，成为所谓的“朱派”“蔡派”之争。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斗争普遍存在，斗争激烈时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斗得死去活来，后期往往进入白热化，形成大规模的武斗。地院的这两派，虽然也斗得很厉害，但既没有形成组织上的分裂，没有像北大、清华等院校那样以集团的形式发生激烈的对抗，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斗。两派的争斗始终维持着“文斗”（相对而言）的形式。这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在当前文革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问题。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文斗”是单方面的。无论是“蔡派”还是真正的“朱派”，其后来的对立面都是地院革委会。革委会曾多次发起对“蔡派”的武斗，对二团学生老师中的核心成员、对朱成昭及其核心成员的抓捕关押批斗审讯等迫害行为，已根本不是什么群众组织的“文斗”“武斗”的问题了。革委会成立，预示地院有了新的权力机构，他们还自立了党委。这些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滥权滥专政，它与毛泽东给工作队定义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属同一性质。有权了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打击报复，就可以贪腐。这种权力的任性，根深蒂固。讨论已超出了本文范围。

地院东方红没有组织的分裂，没有大规模的武斗发生，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原因并不简单，因素并不单一，我在有关文章会中有更详细阐述。这里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分裂，没有武斗，与“二团”后面有以“高、安、郑”为首的干部智囊团的作用密不可分。其中“高、安、郑”中的“安”，就是安静中，安静中是这个智囊团的智慧核心。在我的记忆中，“分裂”的机会有三次，分裂大的危机有两次。

三、地院文革中师生干群的关系特征

在细说这三次“分裂”危机之前，先要简单说说地院文革中师生干群的关系特殊性。

地院反工作队，干部老师先于学生，最早发表反工作队言论和付之行动（上访告状写信）的是李贵（教辅处处长，党委委员）、安静中（团委书记，党委委员）、王暄堂（教辅处副处长）、郑伯让（支部书）为首的岩石教研室、等等，他们都是干部。学生为支持这些干部的革命行为，发起了反工作队的6.20大游行，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支部书记）、万天丰等老师竟然也带头参加了这次行动，而且走在了队伍前面。这些反工作队的主要干部老师全都打成了反革命，其中定性为极右13人。学生因支持了这些老师干部造反，也有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唯一的差别是，因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给这些学生正式挂牌。因此从一开始地院师生关系就不同一般。地院学生、干部教员，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战友的关系已超越师生关系，这与北大清华有显著的不同。再一个特殊情况是，地院的校长、前党委书记高元贵，被地院师生共同拥护，无论是反工作队的还是保工作队的，都不反高元贵。这种情况在其他院校还不曾有过。当时在任的党委书记王换来校时间太短，大家只当是何长工搁在地院的一个傀儡，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把他当回事，反他保他在地院都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地院两派（指东方红内部的两派）中很早就都融入了许多老师干部，如早期倾向“朱派”的李贵、王大来，张海涛、柴文全、陆炎德等（有的人后来倾向发生了变化），倾向“蔡派”中的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等。特别是后者人数众多，在有的单位，如岩石教研室，除个别人外几乎全是“蔡派”。当实行三结合时，李贵、高元贵、郑伯让、张海涛、叶德隆等等都顺利进入革委会各级领导班子，王焕也进入了革委会。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革委会在拒绝“蔡派”核心成员进入革委会的同时，并没能阻挡住“蔡派”观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这也成为革委会几个主要负责人的眼中钉，为后来发起的清理纯洁革委会的运动埋下了伏笔。在他们眼中，“高、安、郑”等就是二团的黑后台，黑高参，乃至幕后黑指挥。在当时运动的环境下，要收拾反对派，整学生不如整老师，整老师就选老师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的先下手，这是攻破堡垒的战术技巧。给老师带上“黑指挥”的帽子可以将他们的“罪行”拔高。大约从67年11月起，他们为使权力更加合法化，酝酿要成立党委，但他们自己还不是党员，于是他们要自己发展自

己入党。可是来自群众，特别是革委会系统内部原有党员干部的阻力非常大，因此清理和纯洁革委会成了他们当务之急。清理革委会异己分子，针对不同人采取了不同手段。一种是抓机会找借口，突然袭击，比如清理田春林就是利用郑公盾问题，突然将田春林隔离审查。另一种是先扣帽子，如对“高安郑”系统在革委会内部的干部则扣上二团黑后台、颠覆革委会的帽子，再接着打成反革命。革委会成立了一个揪二团在革委会代理人的专案组，目前看到的，写在他们文件中的名称是《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 414 联办》。打击突破口选在二团老师中有海外关系的郑雪禾。郑雪禾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二团老师群体中十分活跃的人物，负责外联和情报，二团群体的大小会，差不多都到场，而且善于做记录，写总结。所以革委会选择了她做突破口，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 67 年 3 月 22 号抓捕了她，彻底抄了她家。她的工作日记、会议记录，和外校来往的信息等，全部落于专案组手中。以此为突破口，又迅速抓捕了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随后又关押了高元贵。于此同时抓捕了二团核心成员周永璋、吉让寿、殷惟候、孙司权、肖体修、余九乡等。蔡新平、赵国柱、邱世涛等侥幸逃脱。革委会专案组编辑了一本《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大事记的时间段为 1967.6 月——1968.3.。（参见附件二）。到 1968 年 3-4 月后，地院革委会的反对派就陷入了革委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几个没有被抓到的，和后来逃出来的同学都一直住在校外，或者回家，一直到军宣队进驻后才回校。江祖如老师夫人钱佩娟（北京地质局的干部）的回忆录生动的记述了这个过程。

这种抓捕清洗涉及到所有与革委会一、二把手意见不一致的人，田春林（革委会常委、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在他回忆录中也记录了革委会对他的抓捕审讯经过。下面引至他的回忆录：

这次革委会大清洗的结果，高元贵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赶出革委会，交群众批斗，张海涛以关系在附中为借口赶出革委会，我是因“郑公盾黑手”清洗回班当上了逍遥派，黄振群被清除的借口是什么忘记了。通过这次清洗，“纯洁了革委会，打击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清除了二团的代言人，院革委会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后来又闹出了自己批准自己入党，成立院党委会，李贵顺理成章当上了党委书记，王大宾、聂树人也入了党并进入了党委班子。不久在 1968 年的冬季（应当是早春），在新的院党委和革委会的英明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

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他总结了：纵观地院十年文革史，有四个最黑暗的时段。

第一个黑暗时段是“反干扰”，发生在1966年6月20日至7月底，是由地质部邹家尤、边固工作队造成的，没有逼人至死的记录。

第二个黑暗时段是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发生在1968年元月至二月间，是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的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王大宾虽不是直接操作者，但负有领导责任。（在这阶段，地院非正常死亡人最多。）

第三次黑暗时段发生在1968年的秋冬之交，是由空军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牛润五，林凯领导造成的。

第四个最黑暗的时段是1970年下半年开始的抓5·16运动，也是由军宣队导演。这次的特点是第二次的整人者一个不剩地进入了重点被整和打击对象，像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头面人物都成了抓5·16的重点人物，而他们之前的战绩被认为是真5·16假抓5·16的行为。当然像我这样的早就列入另册的人也和他们殊途同归了。

四、安静引导我们渡过迷津险滩

1、第一次分裂危机

第一次分裂危机出现在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认为内部出现了叛徒，告密者，把怀疑对象指向对二进地质部与其有策略分歧的蔡新平。这事出有因，据地院文革大事记记载：在“二进地质部”初期的一天，大雨，大家都在院子里淋着，后来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就说这个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托派，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地质部的“无间道”策略获得了成功。

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组织王大来等发起了对蔡新平的大批判，就像写九评那样，发表了一评、二评、三评、……。起先是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继而升级为抓“托派”。其结果导致几位与蔡新平持相同意见的东方红骨干成员聚集到一起，

他们在写反批评大字报的过程中成立一个战斗队叫“红色造反兵团”。不久（大约是10月中下旬）朱成昭又将三司的创建者周永璋开除三司，与周永璋一起创建三司的几位对朱成昭不满的同学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战斗队叫“620造反兵团”，这两拨人自然结成了反朱同盟，合称“二团”。不过“二团”这个称呼的正式出现还要靠后一些，大约是在67年的2-3月份，两团才开始联合在一起发表大字报。这时有人提议，将更多的支持者组织起来，自己拉队伍，我没有同意。当时殷惟候有一张大字报“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被聂树人抓住，在他回忆录中说成是二团企图分裂东方红的宣言书。其实这是殷惟候为吸引眼球的“标题党”做法，实际内容并非如此，我现在找到了这张大字报的油印附件。在大字报论战期间，我们和安静已经有了联系。二团中各有一人与安静文革前就有较深的交往，“红色造反兵团”里是殷惟候，“620造反兵团”里是吉让寿，他们都是11622班的，安静中文革前任团委书记时就在他们班蹲点，好像濮长萱老师还当过他们年级的辅导员。我和安静认识要晚，第一次接触是6.20后的一天，李人林到地院来，在地质系食堂听取两派意见，保工作队的人不让安静中发言，把他话筒抢走了，我冲上去把话筒抢回来交给安静中，并且护着他讲话。会后安静中问我叫什么，哪个班的。以后就渐渐有了接触。我们两个团，是一起还是分别找安静谈各自的想法，已记不清了。但安静说了一句话：“你们就做内部的反对派吧”，支持了我不拉队伍的意见，这句话在我印象之深，至今不忘。我后来的不同阶段的斗争中，“内部斗争”这句话一直在起作用。虽然有过摇摆，但斗争的结果还是回到了这个理性的道路上，可以说他成为了我道路上的一个鲜明的指示牌。他说党内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不同意见的斗争，并列举了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党内斗争历史，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不是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嘛，不也是一直坚持内部斗争？他对“坚持内部斗争”问题向我们做了理论性的阐述，鼓励我们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要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争取群众的方法就是讲道理，在关键问题上要及时正确的表态。他还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搞斗争，但不能搞组织分裂，这是一条原则。当然这是指的共产党内，至于群众组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说你们笔杆子都不错，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让事实教育群众。安静的这个不拉队伍，做内部反对派的思想并不是机会主义的，他是有自己的原则的，这个思想贯穿始终。

这一次因危机不算尖锐，加之很快开始了大串联，学生纷纷离校，祸水冲向

了外地，所以很平静地度过了。

2、第二次分裂危机

第二次分裂的机会出现在成立革委会之际，而且出现了真正的危机。朱成昭在66年12月份已经与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方针发生分歧，2-3月份已经公开了他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二团的人在66年底和67年1-2月份也纷纷从外地串联回到学校。两派之间又开始了较量。朱成昭这时的矛盾焦点已不在校内二团这伙人了，他们眼睛向上，眼界已伸到了全国，矛头冲着中央文革了。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秉承中央文革的指示，配合军训，开始了整风运动。而恰恰朱成昭在这时开始了反中央文革。整风的矛头自然就集中到了朱成昭身上。公社总部成立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宫保军。整风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大会，让朱成昭做公开检查。大约在66年10月中下旬后，随着蔡新平，周永璋等离开东方红核心，二团的人已很少与朱成昭等接触，随着十月中旬大家都外出串联，比如我和肖体修等是66年末回校，殷惟候、孙司权等步行串联到67年2月回校，周永璋、吉让寿、赵国柱等也是67年2月回校，对朱成昭在这期间的言论活动都不甚了解。串联回校后听到朱成昭的反中央文革言论，在起初震惊过后，联想到他一贯的性格作风和文革形势气候在这几个月发生的变化，也就不奇怪了。随着朱的言论和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升级，全院群众中反朱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这事不仅是二团内部，其他一些倾向二团的战斗队，都提出了东方红应当与朱成昭划清界限，如果东方红总部不能通过整风把朱成昭等清理出去，我们就应当和他们划清界限，重新树旗组织队伍。为此我们和安静中等老师有过多次的交流，反复分析拉队伍的利弊。我们与安静中等老师的联系就是在外出串联回京才开始多了起来。后钱佩娟老师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李纳来地院干什么？当时文革的形势是北京造反派压垮了保守派，造反派掌了权，但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各自成立组织，地院内部分歧也很大，形成了朱派、蔡派，均属东方红。朱派是掌大权的，唯独蔡派没从组织上分裂出去。蔡派即二团（以周永璋为首的620革命造反兵团4人，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革命造反兵团4人），当时因蔡派没拉队伍另成立组织，还看不出有多少人，实际上支持蔡派的人很多很多。李纳来地院找二团，地点在教五楼东北角二团的办公室，鼓动二团拉队伍，从东方红分出去另成立组织，李纳为此事而来。二团某日晚上在我们家讨论决定：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我作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

的，拉队伍有李纳支持，不拉队伍与当时形势相悖的，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某日在市党校召开两派辩论会上，二团只有 8 个人，江青也不相信蔡派只有 8 个人，能量这么大。实际上地院支持蔡派的不属少数也，现写文革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回顾历史真相，不是争谁对谁错，对与错，历史自有评述。”

钱老师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做出这个不拉队伍决定的关键意见还是安静中。这次他主要是从文化革命发展的大局考虑问题。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进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局面。地院已经只有一个组织控制局面了，有希望建立给委会，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他很可能被中央文革抛弃，他进入革委会几乎不会有机会了，这成了我们的优势。如果这时拉队伍，在分裂的格局下，我们的机会反而减少了。

3 月 4 号深夜戚本禹突然让东方红总部通知到政协礼堂开会。这时朱成昭已处在停职状态，虽然正式宣布停职是在这之后。当时总部实际上应当是王大宾在主持工作，戚本禹这次会议的意图或许他多少知道些。但我进入会场后发现，我们这一派的骨干一共只有四个人，其余约四十来人差不多都是“朱派”和倾向朱派的人。没想到这次会议就是中央文革要改组地院东方红的领导班子，筹备成立地院革委会。会上戚本禹宣布朱成昭闭门思过，决定用王大宾取代朱成昭，同时要求尽快成立革委会。成立革委会的具体工作由周景芳来辅导。周景芳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会上戚本禹有一个奇怪的说法，他说蔡新平，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组织起来整风。一边是让王大宾们尽快成立革委会，一方面又让我独立出来整风。他想干什么？会后我与安静讨论这个问题，安静说，很可能是担心蔡派干扰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是真的想让你拉队伍。戚本禹选择王大宾，说明他们还是偏向朱成昭的左倾风格，偏向王大宾“老实听话”。不喜欢你的偏右的风格，你又不会唯唯诺诺，其实中央文革对你们还不够了解。将来成立革委会会有很大麻烦。要作好斗争的思想准备。我在二团内支持了安静的意见，不拉队伍，和平方式参加选举。

事实也正如安静所料，当我们依仗人多，特别是在地质系和教职员工中人数占有巨大优势的有利条件下，以为可以夺得选举胜利的情况下，周景芳传达了戚本禹指示（也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指示）“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同时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改变了选举程序。革委会叫“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候选人改由东方红公社内部协商提名（实际上是戚本禹、周景芳、王大宾指定提名）。

也就是说这个革委会不是全院的革委会，是东方红公社自己的革委会。这一招非常高明。当时地院的形势是，保守派解散了，原保守派的大多数群众并没有明确加入东方红，原来的中间派，按现在说法是吃瓜的群众也为数众多，估计地院60-70%的群众什么组织也不是。这个搞法就顺理成章的把地院这拨群众排除在选举之外了。保守组织垮台后，游离在东方红之外的群众在思想上都几乎倾向“蔡派”，因为蔡派相对温和右倾。如果真的搞巴黎公社式选举，既然是选举全院的革委会，那就一人一票，其结果就可想而知。这样在“高人”的指导下，一场闹剧式的选举结束了。蔡派主要成员一个也没有进入革委会。过了不久，一个简单的内部调整，“东方红革委会”的招牌大印就变成了“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群众也就浑浑噩噩，没有什么感觉的就认可了。就连我们这伙内部反对派，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多少年后回过头看，这一招实在是高。

选举结束后我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次是蔡派自己的机会主义者，于是我也就获得了一个著名的绰号“蔡老机”，这个绰号至今在“蔡派”内部还保留着，叫的很亲切。安静也遭到了炮轰，认为他的不拉队伍的主意绝对错误。安静中自己后来也曾经说，上了戚本禹的当，没想到在成立革委会时玩这么一手。虽然我们失去了拉队伍的最好机会，但我不后悔。他顶住了这个内部的压力。一年后，当北大清华因两派各有队伍而导致大规模武斗时，安静的这一“右倾”决策，就显出了他的超前的正确。

3、第三次分裂危机

第三次分裂危机发生在1967年的6月份，一直到10月份也没有完全消停。拉队伍与反对拉队“较量”的时间最长，“斗争”的也最“激烈”。这个情况在“高安反革命大事记”也记载的最详细。要感谢这个大事记，否则我也回忆不起这么多事情。

革委会成立后，由于掌权者的任性，对持不同意见的挤压，在朱成昭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导致群众不满情绪越演越烈。当时这种“反革委会”的情绪已经不是二团的问题了，全院多个战斗队，其中有不少对二团也持有戒备之心的群众，不满情绪反而更为强烈，批革委会的大字报到处都是。6月29号二团用大字报贴出了他们收集整理的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言论，尽管大字报很快被清除了，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注意这个时间，在这之前二团没有主动公开朱成昭等的反中央文革的言论。中央文革几乎是在朱成昭等开“黑会”后很快就获得了他们

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和言论内容,这个时间应当是在67年1月23的陈伯达“指示”之前,而二团的大字报差不多晚了半年。在“七一”即将来临前,30多个战斗队发起了成立“七一”串联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炮轰革委会。大家的问题是朱成昭的这些言论革委会头头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隐瞒保护。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革委会迫于压力,于6月30号召开了批判朱成昭的大会。在各种资料中,没有查到这会的记录,只有这个“高安反革命大事记”中提到了。七月一号“七一串联会”正式启动,火力很猛。这时有人类比清华的414,希望借此机会拉出队伍。在这种形势下,七月上旬的一天在东三楼214室,安静中家,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高院长也参加了。根据这个“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记载,会上讨论了拉队伍的问题。安静说如果说拉队伍,今年2月份是最有利的时机,由于我们没有拉,上了戚本禹的当,大家很后悔,这可以理解。但反革委会要捕捉战机。意思是还不具备条件。

不久,7月的中上旬发生了朱成昭等人的出走、抓回和“新东方红公社宣言”事件。地院革委会建立朱成昭专案组。继而朱成昭等主要成员被正式逮捕,骨干成员被专案组立案审讯。社会上各高校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纷纷出现“拉队伍,竖旗子”的风潮。地院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局面也相当混乱。外面有人传话来,北师大都干起来了,你们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拉队伍。朱成昭都公开反中央文革了,你们还不旗子鲜明地站出来,划清界限。校外与地院东方红对立的组织和势力,纷纷鼓动地院的反对派拉队伍。地院的七一串联会也进一步发展为有更多战斗队参加的“大批判联络站”。拉队伍的呼声也进一步高涨。

“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记载:

△ 1967年9月7日

△上午,王大来、田春林在北航与韩爱晶、蒯大富同往电影学院后院,和“天派”头头一起开会,在场的蒯、韩、井岗山、田东等都叫田春林干起来,表示支持他,王大来也批评田春林“胆小,怕事”,鼓动他大胆地干起来。

△中午,在教七楼二层,由陈学敏出面召集大批站骨干分子会,研究“师大公开干上了,我们要不要公开干?”的问题。

△下午。清华派车,王大来、安静中、莫宣学和清华《红教工》来晋炎同去三军海直《红联总》诬告革委会。

△在教八楼四层西头化学实验室开会。《大批站》各战斗队派人参加,有王

大来、安静中、江祖如、郑雪禾、莫宣学、丰茂森、二团。

主要研究《大批站》的组织形式问题，有两种意见。

(1) 王大来、牛定杰、丰茂森、赵国柱主张另成立一个兵团。称“东方红公社××兵团”，并认为这样“旗帜鲜明，可以争取群众”，“大批站名称本身就决定没有权力。只是一种召集机构，长此下去就成为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2) 安静中、江祖如、余九乡当时不同意另成立一个兵团。

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暂定继续用《大批站》。决定由王大来、牛定杰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周景芳问题的声明（宣言）晚上讨论通过。次日清晨公布。

会上，汤鸣皋表示要写大标语和大字报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会前介绍了校外形势，说什么“谭厚兰不行了，我们学校也和师大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还是反对拉队伍，对“高、安、郑”是一个严峻考验。我曾经和安静讨论，我说如果支持要考虑后果，如果反对也很失“民心”。对“民心”怎么估计？安静说：“民心就是拉队伍？我看不一定。地院“蔡派”中冷静思考问题的是大多数。”

“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里记录了一段会议的发言。

1967年8月2号，

晚上，在数二楼428室召开地质系一些师生形势串联会，讨论校内外形势，研究怎么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刘肇昌、万天丰、叶德隆、郑伯让、邓晋福、李明哲、刘文华、毕先梅、王宝瑜、吴瑞棠、梁定益、郭铁英、闻立峰、阮天健、骆庭川、王珍如、叶俊林等参加。

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1) 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校内运动必须与社会上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关门搞斗批改；朱成昭的问题也要联系到社会上问题一起考虑。

(2) 校内两派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干下去；今年一月份来，我院究竟立了什么功？

(3) 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拉队伍，应在内部斗争。“分裂”只能是错误者对正确者而言。正确者向错误者的决裂斗争决不是什么“分裂”，对分裂一反对，二不怕（这段有关分裂的论述，是莫宣学讲的，他和6.29郑伯让在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上的发言完全一样，莫是郑的传声筒）

△ 1967.8.21.

△上午十点钟,在教八楼308开骨干碰头会。蔡薪平根据8.20.讨论的情况,提出初步意见“不拉队伍,先干起来”,“成立宣传组和外联组”。

宣传组由蔡新平、殷维侯、莫宣学负责,外联组由周永璋负责。

参加《大批站》工作的主要成员有郑伯让、江祖如、莫宣学、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毕先梅、梁定益、吴瑞棠、万天丰等。其中多数是(院系革委会)委员和战斗队长。

会上,江祖如向郑雪禾提出,要在化学楼借房子,还想安电话。

五、“高、安、郑”，功德无量！

这段记录可以印证安静对“民心”的估计是有依据。也就是有一大批稳健冷静的中间和“偏右”的力量是不支持拉队伍。作为二团的后盾、高参，“高、安、郑”等都是不赞成拉队伍的。从而二团本身来看，一多半以上力量是不赞成拉队伍的。在这个所谓的“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活动大事记中尽管着力将“高安郑”描黑成支持、鼓励、煽动、策划拉队伍搞分裂的幕后主持，但仔细阅读后，还是让人深切地感到，在地院复杂尖锐的文革斗争的激流中，总能够感到一股理性冷静力量，一种具有对历史深刻的洞察与感悟的智慧，蕴含在这些摇“摇羽毛扇”的先生们中，是他们在给年轻的学生们把舵。这个记录中有多处，有的学生一再要求安静就是否拉队伍表态，安静予以了回避。专案组的记录编写者的评语是“狡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但这反过来正好说明了安静的睿智、沉稳和深谋远虑。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王大来，记录中王大来总是跳在前面，多次提出要抓紧时机拉队伍。但他的号召力不够，在安静的巨大气场下，他的煽忽影响有限。所以钱佩娟老师说：二团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我做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的。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我们设想，如果蔡派如同清华414、北大井冈山，也都自立山头，拉出队伍，枪占大楼，建立起一套“文功武卫”系统，而地院革委会的几个活阎王，那个也不是善茬，那还不打得一塌糊涂。地院要打起来，比清华、北大，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回头看清华、北大的武斗后果，就会知道这将给国家、北京市，特别是给地院自身造成多大的损失。

按“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的记录，甚至到了 67 年底，还有同学来动员高元贵，安静中跳出来领头干。但都被这些“狡猾”的老头们婉转的拒绝了。我们庆幸，地院只到最后也没有发生两派的武斗。到了 68 年三月后，地院革委会开始疯狂的抓捕反对派，这些“温良恭谦让”，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高、安、郑、江，一个不落的陷入了魔爪。这就是他们忍辱负重的代价。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后悔。劫后，每当回校的师生，看到一个完整、没有一点武斗痕迹的地院，都会不约而同的感叹：奇迹啊！幸亏地院没有发生武斗。这一切，我们要感谢这些幕后的“高参”，我要说“高、安、郑”，你们保卫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

六、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高安邦反革命集团”

险遭“覆灭”的命运

蔡新平

前言

张运钧在编写地院东方红大事记时，从地院东方红报的倒数第二期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录成电子版后寄给了我。这东西看得我头皮发麻。竟然还有这么个东西，我怎么就不知道？很可能很多人都不曾见过。看看这份报纸的时间，大概可以找到答案。我在军宣队进院前，差不多有两三个多月不在学校了，在聂树人王大宾们大抓“高安邦及其黑爪牙”的威慑下，先是躲在北大，后来回了老家武汉。是军宣队通知摧我，急急的回了学校。这张报纸出笼的时间应当在军宣队进驻之前，王聂革委会断气前的产物，因此还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广为发送。

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史料，他是地院文化大革命在校内发展到极致时的产物。从它出笼的时间（1968年8月8号）可以看出，地院文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刻，如果没有意外（没发生转折）继续发展下去，一个活生生的不亚于“镇反”、“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的阶级斗争局面就将在地院全面铺开。反革命集团的名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全点名、半点名、隐点名，已经按他们的需要分门别类的公布了，点名的已经有几十个了，已超工队的战绩。打击的舆论已经造的足足的了，各种罪名都已罗列好了，而且都有充分的论证。欲加之罪的“反革命罪证”也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号称是“铁证如山”。镇压的行动已经启动，批斗大会接二连三，抓捕行动也已经全面展开。如果没有意外，这些“反革命分子”铁定了要完蛋。但意外还真的发生了，这情况与当年工作队完蛋前的情况非常类似。工作队也是准备好了几十个老师学生名单，准备大会批斗后就送农场劳改，可偏偏毛老人家游完泳了回北京了，看看北京那个惨样子，龙颜大怒，不知是什么话从中南海传出来了，66年7月18号邹家尤的批斗会突然就变成了检讨会。

这帮家伙们搞的也太出格了，在清华、北大，大搞武斗，烽火连天；在地院因为对立面没有拉队伍，对仗打不起来，因此他们就更加为所有为。按他们的话

说就是嘎嘣脆，“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不管是蒯大富还是王大宾，总之是招致龙颜大怒了。几十年后在深圳，王大宾曾对蒯大富的说：你们这个样子搞法也太不像话了，搞过头了嘛，完全打乱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要不他老人家咋会那个样子生气，把我们都赶出北京呢？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学校也是搞过了头，还以为自己是受蒯大富和老佛爷牵连的。不管怎样，这个意外也是以迅雷不及耳的速度发生了，历史又一次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折。

一、《彻底砸烂高安邦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文的出笼

聂树人在回忆录中长篇大论地描述了如何砸烂““高安邦”反革命集团”。述说中批判“高安邦”多引用东方红报刊载的一些战斗队的大字报文章，而且都是大段大段的引用。但唯独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聂树人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这篇文章就是载于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148期的《彻底砸烂高安邦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文，此文是任云堂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邦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长篇发言。此文上纲上线的反革命帽子之大，火力之猛，语言之狠毒，歪曲诬陷编造的“反革命活动事实”之多，都达到超级水平。任云堂是谁？革委会常委在开除了高元贵、田春林等人后调整班子提升的学生，原水文系分会的主任。在聂的回忆录电子版中搜索“任云堂”三字，一共找到三处，两处出现在革委会成员名单中，另一次也是出现在无关紧要位置，其他就再也找不到了，回避的很彻底。为什么？

那这篇东西谁写的呢？王大宾吗？不可能，长时间住院，大权都交给了聂副主任了，再说人家是一把手怎么会自己动笔；李贵吗，那肯定是个笑话，谁都知道，他是资格老文化低的大老粗；任云堂自己吗？还没有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剩下几个常委，贾振远、侯力平、李一民、刘佛兴、刘家齐，有一个笔杆子吗？唯独聂大人，那是地院有名的铁笔杆子，从三司《首都红卫兵报》的主编下野后，据说是被李贵这个大老粗老革命三顾茅庐请到地院革委会来的，聂回忆录中有很长一段描述李贵因何又如何请他进入革委会的。李贵因自己喝墨水少，和二团这帮摇唇鼓舌之徒打交道甚感吃力，他特赏识聂树人的生花妙笔，正好能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干革命没有笔杆子怎么行？因此就礼贤下士把聂请将近来。在革委会的大位，聂牢控舆论阵地，一个东方红报，一个广播电台，可能还有若干专案组。据聂树人自己在回忆录中吹嘘，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地院《东方红报》

很多重要文章都是他亲自动笔或授意他人起草由他定稿的，如孟繁华的那篇发表在《首都红卫兵报》被毛老人家看中的打到私字的文章，“那篇文章应该是在我列出提纲的情况下，由孟执笔起草，由我修改完成的”；那篇以“井冈山、风景这边独好”战斗队为作者名发表的『我地院东方红的对外路线不容中伤』是“由我亲自动笔”，“我先让广播台反复广播。在此基础上，又加以修改后在地院《东方红报》发表的。”；……，不一一列举了。据此，大体上就能够想象这篇东西的来龙去脉了。

二、这篇东西里都说了些什么？

聂写回忆录充分利用了“三报一编”，（《首都红卫兵报》、地院《东方红报》《动态报》、工作队的《大字报选编》），而且非常习惯大篇大篇引用，这是个优点，说话讲究真凭实据嘛。可是只要一离开引文，那发挥起来就妙笔生花了。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聂就完全回避呢？这个问题，只有在读过后才多少能有些理解。请看：

-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大搞“四右”活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反革命集团。在揪出走资派周、聂，叶朱叛国集团之后，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是我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穷追猛打，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点评，“高安郑”成了地院文革中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高安郑”的方针是“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三股反革命势力的合流。一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打着“受害者”“革命干部”的旗号，由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组成。他们向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夺权。其主要成员有，高元贵、吕禄生、刘普仑、池际尚、马杏垣、曹添、赵XX（赵鹏大？）、翟XX（翟裕生？）、程XX等。二是以安静中、郑伯让直接操纵的，打着“老造反派”旗号网罗的一批顽固地为反动路线翻案的老保、老右倾，利用他们混入东方红内部的身分，勾结社会上的“二流派”和反动势力，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主要成员有：安静中、郑伯让、叶德隆、纪群、江XX（江祖如？）及其打手周永璋、蔡新平等。三是以陶世龙、沈孝宇、王鸿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点评：这是他们对高安郑集团的定性，集中国共产党定义的各种反革命、反动分子、坏分子之大成，其打击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多，远超工作队。）
- 高元贵，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我院头号走资派，“四右”的总代表。为了夺回已失去的“天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必然地要伙同他昔日所包庇纵容的难兄难弟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参加过汪精卫青年团的吕禄生，反动组织“大

刀会”的成员，三反分子刘普仑，大叛徒池际尚，反动学术权威马杏垣，地质系走资派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曹添，勘探系修正主义分子赵XX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程XX等，结成反革命复辟小集团。（点评：给这些革命干部和老教授们扣的污名之刻毒闻所未闻）

- 但是，高元贵们也很懂得，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他再明目张胆地伙同这批乌龟王八，……（把地院的最好的干部、最受人尊重教师们统统骂为“乌龟王八蛋”，其内心是多么仇恨又多么阴暗）
- 高安郑之流又怎样和陶世龙、沈孝宇、王鸿这股右派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陶世龙、沈孝宇、王鸿等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时企图翻案复辟。有谁敢替他们翻案呢？他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各派势力中，找到了高安郑一小撮；而高安郑之流也保证上台后为陶沈翻案。条件是他们继续为高安郑之流卖力，控制教务部门和水文系大权，成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支别动队。（点评：无中生有的诬陷和编造谎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一个要翻案，一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要替他翻案，于是反动的翻案目的，就把他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策划于密室，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请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打气，狼狈为奸的。安静中曾对陶世龙说：“整沈孝宇的材料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有那么回事，但不一定是右派言论，到运动后期打不成右派。王XX也始终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陶世龙连忙将安静中这些话转告沈孝宇，同时对他说：“我是‘大批站’方面的秘密成员，是通过清华和他们联系的。朱成昭虽然倒了，‘大批站’这股势力如不能胜利，你还是翻不过来。你要等待时机，要顶住，不要躺下去，要干起来，还要注意不要再被抓住辫子来打我们的人。”从安静中、陶世龙的自白里，我们不难看出：安静中既然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自然就要为沈孝宇翻案了。而陶世龙、沈孝宇也必然要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后期被安静中、郑伯让之流所控制的为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操纵的“大批站”的胜利上。正因为在地院有“大批站”这个右倾分裂组织的存在和社会上反动组织“清华红教工”的支持，陶沈翻案气焰更加嚣张。连篇累牍地一个接着一个上书，大刮翻案妖风，其猖狂程度达到了极点。甚至极右分子张文澜也在去年写信给曹添，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曹添的身上。（点评，把这些老师统统与57年的右派套串在一起，坐实罪名，以便最后一网打尽）
- 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进行着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复辟活动。（点评：如果被扣上了这些罪名，灭你没商量，也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 许多铁的事实说明了，高安郑之流为了颠覆院革委会，夺取领导权，手法是极毒辣的，有机必乘，无孔不入。高安郑之流的野心，不仅仅是为颠覆我院革命委员会。更大的阴谋是想颠覆市革命委员会，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点评：高安郑的罪过大的去了，竟然其野心是颠覆市革命委员会，而且还有铁证。）
- 当郑XX（郑雪禾？）炮打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贴出之后，激起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恨，地质公社的革命小将揪斗了郑XX，这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拍手称赞。可是，高安郑之流和“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立

场上，为其鸣冤叫屈。安静中要写信给中央，说什么“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把一个仅仅写了《十二个为什么》的普通教员拿来揪斗”，二团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揪斗郑 XX 是“反革命的报复事件”。并贴出大幅标语，“坚决要求革委会 立即释放郑 XX, 为郑 XX 平反，并公开向郑 X X 同志赔礼道歉。”他们的主子高元贵也赤膊上阵。为郑 XX 鸣冤叫屈。从安静中这一封信，“二团”的一张声明，一条标语和高元贵的话里，就充分地暴露出他们“二流派”的反动面目，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倒谢活动，企图颠覆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责难逃！（点评，他们已不再是口头批了，已经开始抓人了，就是从抓郑雪禾老师开始，很快就把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陶世龙、周永璋、殷惟候、余九乡、……等老师干部学生都抓捕关押起来。）

三、戏剧性的结局

这篇东西在最后写道：“经过两个多月以来的搏斗，我们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在组织上摧垮了他们，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果然在这个批判会后不久，他们开始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聂树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百个战斗队对高元贵及“高安郑”集团的声讨，是革委会做出打击决定的导火索。对上述三个人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隔离审查”之后，即对其公开定性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进行全校性的批判斗争。郑伯让是否在全院大会上批斗过，我记不清了。高元贵和安静中被拉到大饭厅主席台上进行批斗，我记忆较深。高元贵因年纪大，安静中身体原本就不大好，又经过较长时间隔离审查，低头弯腰站在主席台接受长时间的批斗，确实有些支持不住”，“我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本文中被点名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王虹夫妇已经受不了他们的残酷的批斗，舍下才几岁的亲骨肉双双自杀了。正当他们准备大干，实现他们“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罪恶计划时，毛老人家实在是看不下去这帮家伙们的胡闹了，派出军、工选队进驻了地院。很快东方红也好，王大宾聂树人的革委会也好，统统被赶下了历史舞台。聂树人们这类的极左文革的狂热分子，小小的小野心家们也都被罢了官，褫夺了他们自编自演戴上的假党员桂冠和革委会党委常委的封号。他在回忆录中无奈的写道：“于是，一个原本周身干净的人，突然被人泼了一身又脏又臭的污水粪尿，突然被人推进粪坑中呛了一肚子粪水，熏个昏迷，呛个半死，既不能自己爬上来，更不允许他人拉一把。”看看，多么的可怜，这让我想起了鲁

迅先生笔下的某种人物。自艾自怜也没人同情，随之毫无悬念地被轰出了北京。不过聂树人回忆录中说他本已被留下可继续做官，但他看破红尘，主动要求去了青海的，在这里我们要为这个地派二把手点赞了。后来这些差点就要跳过龙门的革命骄子，虎落入平阳被犬欺，也亲自尝到了挨斗和坐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监狱的滋味。有的人坐明白了，头脑清醒了，人格也升了几格。聂二把手是否坐明白了就不得而知。设想，如果让他们再继续掌权下去，上述被他们在此文中所列举的地院干部、教师、学生，肯定都得完蛋，其命运一定比 57 年右派的下场还惨。看到他们这个东西后，再看看他们的结局，我也是为自己庆幸。

【对地院文革的反思和研究】

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张运钧 李颖

编者按：该文发表在2017年7月30日出版的《昨天》第九十五期上。该文中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一节的内容与本书的第一篇“大事记”等章节部分内容上有重复，所以在此将这部分内容省略，特此说明。

前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半个多世纪啊！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人，都已是“古稀”老人了！“讲真话”是古稀人应有的品格，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把真实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奉献给世人。尽管年代太久远，尽管现存的、当年的、文字档案记载资料少而又少（仅有《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动态报》、《大字报汇编》等），但是我们这些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还是尽全力来回忆和记述当年的文革运动。尽管每个人的回忆会有错位、遗漏，我们选用多人的回忆录，找更多人来回忆证实，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展现当年红遍中国的“地院东方红”的兴起、发展、灭亡的兴衰沉浮和曲折过程。看看我们这些青年人如何从天真单纯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疯狂地信奉个人迷信，成为最为狂热的崇拜者，再到派性膨胀、再到……我们既是错误路线的追随者、执行者，我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同样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错误路线的执行中加害于他人，以至于为此受到了惩罚，付出了青春大好年华的代价。我们想：人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五十多年后再看这段历史，我们更多的是思考、再思考，反思、再反思。

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当年参加了文革运动又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些就是我们这代人晚秋的沉思！

●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省略）

●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梳理，为我们反思、研究和再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特别是为地院东方红的兴衰与沉浮，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平台。为我们理出一条清晰的典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脉络，从脉络中很可能看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生态特色的缩影。

（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史，不仅是全国高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全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个性特色，这是其他许多单位所不具备的。这些特色就是：地院东方红成为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同时成为了党内高层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利用的对象。

清华大学的杨继绳先生在其《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一段论述，对文革运动进行了极为深刻准确的总结和评价，他代表了当年参加文革运动的这一代人，在经过对文革的认真反思之后，对文革的再认识。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逼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正因为如此，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号召参加文革的一代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

自从一个神秘人物——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走进北京地质学院、走进北京地院东方红之后，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从此就具有了“通天”的特色。在当时的情况下，地院的广大师生，特别是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得知此消息都是欣喜若狂，以此为荣，感到骄傲和自豪！继此之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关锋、阎长贵、王广宇，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人也先后走进了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在他们后面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也根据不同场合接见过地院东方红代表，发表讲话，表示对地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地院东方红（也有斗批改兵团）的关怀和支持！这样，地院东方红成了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指挥的“战斗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当时，我们是不明白的。

五十多年后，当我们再看文革，从聂元梓、蒯大富、万润南等人写的文革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这些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与布置的。清华大学的文革是刘少奇、薄一波、王光美蹲点的单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一时禁止中央文革小组介入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详见参考文献 21 和 25），改派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文革运动中发生的各类事项。而北京大学的文革，则是派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去介入的。很显然，肖力等人走进地院，是受毛泽东、江青的指派。至于毛泽东为什么这样策划与布置，在清华大学编辑的文革回忆录中，虽然已有多人对此提出了分析和解释，但是至今仍耐人寻味！

北京地院东方红也正是由于“通天”，得以迅速壮大、发展，助推了原来不出名的“何家兵”（何长工之语）——迅速地红遍北京市、红遍全中国。北京地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走在了北京各高校的前列，成了北京高校的典型代表和榜样之一，许多院校的战斗队，都集聚在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下。地院东方红也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而后，另一个神秘人物——叶向真，也走进了地院东方红，这是东方红的另一条“通天”之路。

这两个神秘人物先后走进北京地院、走进地院东方红，既给地院东方红“增光添辉”，同时也飞来了“横祸”，更增加了耐人寻味和不解之谜！显然，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成为了党内高层不同政治势力争夺与利用的对象！

地院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出身于平民与底层，农村出身的学生尤多，高干子弟极少，于是地院的学生具有朴实、单纯、忠厚的特质，这与北大、清华学生的成分结构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这可能就是成为神秘人物选定地院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因为这样，地院的文革与北大、清华的文革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相对而言，地院文革运动简单，较为平和，二派斗争并不激烈，也没有出现大型武斗。尤其在肖力身份公开，表示支持东方红后，几乎一边倒，地院东方红占据了绝对多数及领导地位。

今天回头看这个问题，神秘人物之所以选择地院，实质是党内高层政治势力尖锐权力斗争的需要。从肖力、叶向真、周荣鑫介入地院文革运动，目的就是争夺和利用学生的政治热情，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以神秘人物方式出现在文革运动中，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共产党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化。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

（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

1. 1966年6月20日，地院发生了著名的“6·20事件”。广大师生自发组织近千人的游行队伍，到工作队驻地，向工作队反映群众对地院文革运动的意见和希望。这是首都高校第一个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没有发生任何不文明的争斗事件，以和平方式开始，以和平方式结束，获得了成功。

2. 1966年8月17日，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的组织——“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这在首都高校中，北京地质学院第一个实现了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3. 从1966年8月23日至1966年10月27日止，为期两个多月，地院东方红组织了上千名师生先后四次进驻地质部机关上访、请愿，要求地质部党委让地院工作队回校承认错误，交出整人的黑材料，给师生平反、道歉。地院东方红的行动获得最后胜利。这四进地质部的行动，开创了造反派第一个进驻国家部委机关的先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极其广泛。

4. 1966年9月19日，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和目标行动计划，下决心一定要争取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来改变造反派组织当时处于受压制的状态。在北京高校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夺权口号。

5.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报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现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再论一切权力归左派万岁》（详见参考文献 11）。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经他批准，题目改为：《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并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地院东方红的孟繁华同学。这清楚地表明：地院东方红的广大师生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高校中，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造反派队伍中存在许多问题，所以率先提出：必须打倒“私”字，实现大联合，才是唯一的出路，从而也获得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6.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实际上，是地院东方红掌握了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切领导大权。

7. 地院革委会成立后，一切校园秩序与管理恢复正常，于是也是高校中第一个接待外国来宾的。先后接待的有：越南副总理黄文欢、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日本和非洲国家的民间团体等。（详见参考文献 2）

8. 1966年12月14日下午阎长贵受戚本禹委托，向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下达去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指示。这也是地院东方红第一次接受中央文革直接下达的任务。地院东方红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先是在成都的北京地院东方红具体负责人给朱成昭电话，阐述了不同意揪彭回京理由；朱认为执行不得力，为此发火，而在成都的地院东方红派代表飞回北京，向朱成昭说明观点与理由，强烈要求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这在当时完全是大胆的、出格的行为，因而受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转而，戚本禹表示，你们地院东方红不干，我就找北航去干。无奈之下，朱成昭派总部人员赴成都监督执行揪彭行动。五十多年后，重新认识这件事，证明：当时地院东方红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是正确的。

9. 1967年3月5日，由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谢富治和周景芳等人向地院东方红代表宣布，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闭门思过”，不再担任头头，宣布了由王大宾、李贵、杨雨忠、孟繁华等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还明确表态：“地院东方红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受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命令改组领导班子的造反派组织。

10. 1967年1月开始，地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在各种不同场合，提出他对当前文革的思考与看法，后来总结为“八大观点”，为此，他最终坐了八年监狱。朱成昭是当时第一个敢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提出怀疑与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今日重新认识，应该承认，朱成昭当时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不完全盲从、不完全狂热崇拜的年轻人。当然，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他的思考与精神最终还是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11. 1967年底，地院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将当时还不是党员的革委会主任

王大宾和副主任聂树人也选进了核心小组，这在全国当时的“群众性整党”中是首创性的“新生事物”。1968年7、8月，聂树人、王大宾相继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开了吸收造反派负责人入党的先例。但后来此事未得到军宣队的承认。

（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

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也和全国一样，不停地有人整人，不停地有人挨整、被打倒。从文革运动开始，是工作队整了给他们提意见的师生，把他们定成“反革命”、“右派”；学生开始造反，然后是反过来批判与批斗工作队长邹家尤，地质部何长工等当权派；再后来，地院革委会把高元贵、安静中等人打成“高安反革命集团”；最后到朱成昭、蒋良朴、杨雨忠、王大宾、聂树人、田春林、伏庆是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挨整，甚至坐牢，无一幸免……再看全国的文革运动更是如此，从中国最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到各级当权派无一幸免的挨斗、挨整、入狱，包括林彪、江青“四人帮”都是如此命运。

如此看来，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这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而争斗。这可能就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中国特色的浓缩，也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民主与法治的大倒退的典型范例。

正如王大宾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文革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在幕后。此次他亲自安排制止清华大学的武斗行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借此进一步让高校的学生退出政治舞台。事先不打招呼，工人与学生会发生冲突，可能会流血，都是毛泽东事前想好想好的。……随后而来的是造反派被清洗、被镇压，更有一场所谓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将我们五个头头一网打尽。”（详见参考文献5）

王大宾的回忆录第165-167页还写道：“实践证明我们没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所以到1976年，毛主席说老中青三结合，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

聂树人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我也在‘反思’。我反复回顾文革中我有什么错，值得反思？想来想去，在文革中，我好像没什么大错，我该反思什么？文革一开始，我因对学校党委、工作队提了点极为善意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打成‘反革命’。”

“为了这个不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奋起与专制者进行了斗争，要求他们为我们平反。经过长期较量，我们才夺了权，建立了革委会。”

“我唯一的错误，就是不敢对毛泽东的专制公开提出批评，还违心地执行之。如不执行，我就有可能成为朱成昭第二。”（详见参考文献18）

田春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说：“以我一个文革中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

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五一六’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 1949 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 年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详见参考文献 6）

再来看地院一位普通教师宋翔雁老师在他的文革回忆录中的叙述：“在文革结束近 50 年的今天，冷静深思，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地院东方红所代表的造反派群体，在这场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坦诚道出的：‘我就是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

“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这场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从而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次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详见参考文献 3）

地院学生古宝琳（王大宾的前妻）在经过痛苦的反思之后，是这样认识的：“这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地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任，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详见参考文献 22）

以上是当年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 50 年后对文革的反思。接着，看当年的风云人物清华大学蒯大富 50 年后对文革的反思：“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们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 1968 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力下，毛泽

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详见参考文献 23）

我们最后还看参与文革的一般群众，清华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对文革的看法：“纵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带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一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详见参考文献 24）

综上所述，看到亲历者心中发出的呐喊：文革是一场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

（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

文革中，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受毛泽东的极端政治思维和意识形态的鼓动，很快就狂热起来，盲目地投入疯狂的运动中。而后，迷惑了民众的认知，颠覆了传统道德，丧失了人类的理性，把野蛮、粗暴、残忍看作为革命行动。只要是伟大领袖发出的号召，人们就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去执行，去做各种荒唐的事，甚至愿为它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政治狂热、绝对盲从就是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幼稚、无知的真实写照。

正如清华大学万润南在其文革回忆录中所说：“在 1966 年 12 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详见参考文献 25）

上海复旦大学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在回忆录中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

“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详见参考文献 26）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慧中在回忆录中也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详见参考文献 27）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在文革回忆录中这样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被领袖玩弄于股掌，

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详见参考文献 28）

当年，我们这一代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时，在没有搞懂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谁是中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问题的情况下，凭着狂热的革命热情，盲目服从，投身运动。五十年后，再回首此事，深感可笑与可悲！当年拼命冲锋陷阵是为了什么？今日终于明白，我们的激情、狂热，我们为之付出的宝贵青春年华，就是被人利用了。我们为年青幼稚、无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然，也丰富了这一代人的生阅历与宝贵精神财富。

（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的政治思维

在文革中到处充满了极端政治思维，也有人取了一个专用名称——文革思维。尤以极左的政治思维充斥全国，上至中央高层，下至普通百姓，文革思维无处不在。极端政治思维最具代表性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和理论，在其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大民主和极端的集权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处于极端政治思维的疯狂之中。

“造反有理”、“怀疑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口号行动，比比皆是，再现了“湖南农民运动”。

“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造神活动，全国上下遍地开花。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充斥全国。

“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的口号与行动随处可见。

还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些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口号，在当年却被人们奉为神明，指导着千万热血、狂热革命青年的斗争行动。今日反思，回首当年，是多么幼稚可笑，也非常可悲，完全是封建的“愚忠”。

在地院的文革中，同样充斥着这些极端的政治思维。当年我们就被这极端的政治思维的掌门人所利用，不管是哪派，都是其受害人。即地院的各派（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这极端政治思维下错误路线的执行人，也是受害者，甚至在执行错误路线时，伤害自己的亲人、同学、战友、老师及不同意见者。当然，自己也成为了文化革命“政治恶斗”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时至今日，当年参与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已进入了老年，更应该勇敢、深刻地反思自身在文化革命中的得失、对错，吸取教训，忠告后人，这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众所周知，文革思维——这种极端政治思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特色：

1. 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是真理化身，凡是持不同观点的都认为是谬误；
2. 强调一元化的统一认识，排斥思想多元；
3. 非黑即白，两极对立，缺乏平和包容精神；
4. 把不同观念碰撞看作是思想领域里你死我活的斗争；
5. 把一切社会事物都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6. 把政治妥协视为投降、背叛；

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这种用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人民政府，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理应发生变化，要从一个革命党的政治思维，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转变。因为，这时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执政，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地运用手中的权力，使自己得到大多数公众拥护的问题。仅此，就强烈地需要执政党从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从革命党的阶级定性的极端政治思维方式走向执政党的淡化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方式。然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证明：党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相反，文革将极端政治思维方式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从以上极端政治思维的六个特点，对照当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作所为，可以看出：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极左极右，狂热、盲从行动，以及“天派”、“地派”，地院的“保守派”、“造反派”，东方红的“朱派”、“蔡派”派性斗争等的政治恶斗，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极端政治思维在作祟。这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受历史的局限，文革中各派组织，都同是这一错误政治思维的受害者，以至于在掌权后，也带着这种政治思维，不断重演、重犯“政治恶斗”。一旦极端政治思维与没有民主、没有法治伴生，这种极端政治思维伺机就会超越政治红线、法律红线，演绎出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的政治事件。

地院东方红的“朱派”、“蔡派”的派性争斗就是案例之一。这里的“朱派”，是指拥护朱成昭政治观点的人，“蔡派”是指支持蔡新平政治观点的人（公开并固定的人数为8人）。朱成昭是东方红的一把手，蔡新平是地院东方红成立初期的核心组成员，二人最初的政治观点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策略上有不同意见。朱成昭很激进、胆大；蔡新平偏温和，讲究策略。所以后来朱成昭称蔡新平是东方红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本来，在同一群众组织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在极端政治思维作祟下，二派分歧日趋严重，以至于完全对立……。（详见参考文献1）

“朱派”和“蔡派”的分歧起源于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当时，处境

困难，朱成昭还是要高调继续留在地质部，而蔡新平主张策略地撤回，这些是东方红核心组成员会上的讨论意见，而随即被地质部的人截获，并扬言要支持蔡新平等等。于是，朱成昭开始怀疑“蔡派”人员泄露机密，造成朱成昭对蔡新平的极度不信任，并称“蔡派”为“托派”，将蔡新平排斥在东方红核心组之外。由于“蔡派”认为不公，双方的对峙有增无减，以至于成立革委会时，仍将“蔡派”成员排斥在外，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件事在若干年以后才真相大白，事实是，地质部政治部的人当年在东方红核心组开会的小屋，偷偷安装了窃听器，他们完全掌握了当时东方红的所有动态，故意制造东方红分裂。而地院东方红这二派，越来越对立，“朱派”要把“蔡派”打下去，“蔡派”在朱成昭被捕后，也有一些过激行动，如新建广播台，强烈要求院革委会中“朱派”代理人下台等等。双方的派性斗争持续地进行，不断升级。但是当时的极端政治思维占主导，极左思潮盛行，极左的口号与行动会有更大多数的拥护与支持，而温和偏理性的思想，拥护者则少。“蔡派”在地院一直为少数派，好在他们始终未从东方红中分裂出去，避免出现重大分裂与武斗的事端。而在1968年初，在王大宾、聂树人主持革委会时，终于对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等人下手了，认为他们是“蔡派”的后台，把他们打成“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组织批斗。而对周永璋、孙司权等人进行关押、拷打等残酷的迫害。这些行动触碰了政治红线与法律红线，其性质也发生质的变化。这些当事人在极端政治思维下，不仅伤害了其他人，最后自己也都成为错误路线的“替罪羊”和政治恶斗的牺牲品。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新中国成长的，从小接受的“听党的话”“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政治思维教育。正是这种党化、奴化教育，我们的头脑已被清洗，使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革思维，表现出政治狂热、盲从、崇拜、走极端的政治思维和行为。这正是极端政治思维对我们的毒害，也是我们满腔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最后犯错误的主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的教训之一。

(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通过对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过程的反思，又纵观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得出以下的认识：

人们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胜利者。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激进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管是红卫兵，还是走资派；不管是文革的参与者，还是对文革持有不同意见者；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四人帮”，还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都曾经或最终被抛入“地狱”，文革真是一部“人肉搅拌机”，所有人都失败了，没有胜利者。

文革没有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但它确实是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以全民疯狂和苦难为代价，付清了一笔厚重的历史孽债。

文革以中国为舞台，以亿万人民为试验品，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改造人性的社会实验，想像要创造出一代无限忠于、无私奉献的人，但实验失败了，新人未出，旧人不在了。

当年响应号召，积极跟随毛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政者都没有好下场；反过来，有独立思考精神，对文化革命持有不同意见的议政者，同样也没有好下场。在这种“政治恶斗”“群众专政”的形势下，人民群众失去了参政、议政的热情、勇气和路径，被推到了政治之外；唯有的选择是：远离政治、自我保护，保持“沉默”、“等待”……。“一切为了权力”、“一切向钱看”的政治生态奇观逐渐出现。这也许就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严酷的现实。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失误和损失之一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1. 文革摧毁了长期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
2. 文革摧毁了对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3.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
4. 一切为了权力而奋斗的、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既伤害了广大百姓，也伤害了官僚集团；
5. 整个国家的管理、治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

正如杨继绳所说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阔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个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详见参考文献 36）。

这里，我们不是希望要重新恢复和重塑过去的时代，这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应该正视目前严酷的政治现实，去重建中国新的政治生态势在必行，但是这种心理上深深的创伤，要予以抚平坦何容易，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大智慧。

结束语

回顾五十多年前，我们都是抱着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信念，走进了文化大革命，可是谁也无法意料到最后的結果：包括以学生为主的群众运动头头在

内的一大批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惩罚、批判以至于坐牢。我们为年青、政治上狂热、盲从、崇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但是，我们也感到幸运，在我们的一生中能赶上这样一段非常时期，亲历了这么多的政治斗争，历练了我们，收获不少的教训。

至少，我们懂得了：要认真读书；要实事求是；不盲从、不狂热、不崇拜和不迷信；要有独立思考精神。我们学会了：要不断追求真理，求真摒假；我们懂得了：人要有高尚的人格，有大爱之心；我们懂得了：要敬畏生命、尊重人性，要有法治；我们不会对整我们的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我们要对被我们伤害的人，心怀愧疚、道歉赔罪。我们也看到：人在春风得意、目空一切时，就是犯错误的开始……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怀念我们敬爱的高元贵老院长。当年工作队进驻地院，就是带着“舍高保聂”的目标。工作队进驻短短几天，高院长就被迫做检查，被批判、撤职。而在以后批斗“走资派”时，他又是被批、被斗。而我们走近老院长时，没听到过一声埋怨。迁校时，是他决断选定校址，才有美丽的武汉校园；朱成昭释放后，他承担了给朱成昭等人平反的工作。整“五一六”结束后，他尽力去帮挨整的学生平反。他对地院充满着爱，对地院学生充满着爱。不管是到他家抄家的学生，还是批斗过他的学生，他都那么平和、亲切。他总说，地院的学生对他好，批斗时从不动手，外单位人批斗他、打他，都是地院学生在护着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高院长不接受高教部安排他去南大或南开当校长，他在等待，等哪一天北京地质学院恢复了，他继续当北京地质学院的校长……

我们还要缅怀安静中等一批已离开我们的老师。正是有这样的校长、干部与老师，培育了一大批朴实、认真、爱思考、有独立思考精神、有爱心品质的地院学生，才会在文革的大潮中表现出与其他学校明显不同的结果。

我们要永远怀念地院所有在文革中因各种原因而逝去的老师、同学！

最后感谢地院的许多老师和同学，你们奉献出你们对地院文革的回忆，或献出珍贵的历史文献，让我们依据那些资料，编写完成了本文，这是我们给世人、给后人奉献上的，我们亲历的文革历史记录，以作为了解这个非常时期的参考史料。

2016年6月5日 初稿

2017年3月1日 定稿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7月30日出版的《昨天》第95期）

参考文献

1. 聂树人：《地院东方红兴亡史》 2011年12月香港出版
2. 伏庆是：“我与北地文革”
3. 宋翔雁：“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4. 万天丰：“回忆六二〇事件”
5.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 2015年10月香港出版
6. 田春林：《田春林文革回忆录》
7. 陈永迪：“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8. 谭保华：“北地东方红抓彭德怀进京纪实”
9. 钱佩娟：“忆江祖如和地院文革”
10. 张运钧、李颖：《晚秋沉思》 2012年12月香港出版
11. 孟繁华：“打倒私字，实现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首都红卫兵》报 1967年1月25日）
12. 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13. 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14.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
15. 聂树人：《“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6. 聂树人：《北京天、地派的争斗》 2013年12月香港出版
17. 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18. 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 2014年香港出版
19. 周永璋：“关于文革中有关问题”
20. 梅建明：“我与朱叶反党集团”
21.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2. 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3.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 2011年3月香港出版
24. 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5. 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2007年12月
26. 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 1999年3月
27. 赵慧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 2016年2月
28. 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 2015年香港出版
29. 11622班“聂沙华”大字报：“党委的检查过不了关”
30. 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的呼吁书
31. 江祖如等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

32. 王大来、陆炎德等 24 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
33. 朱成昭等人（爆破战斗队）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34.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 年 8 月 17 日
35. 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 2013 年 10 月香港出版
36.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革的思考”

二、谈《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刘建业

《昨天》95 期张运钧、李颖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以下简称“兴衰沉浮”）很有看头，我感受最深的有几点：

1. 朱成昭思想转变的轨迹

作为著名造反派“地院东方红”的灵魂，朱成昭批工作组、发起成立“三司”、“四进地质部”逼迫工作组组长回校检查赔礼道歉，还是蒯大富曾经的保护者、引路人。用当年话语，是位“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头子，中央文革最为倚重的“铁拳头”。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仅仅半年之后，朱成昭便由一个中央文革的“打手”，变成一个反叛者。他同情彭德怀，质疑中央文革，即使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批评、威胁，不仅“不思悔改”，还巧妙地以公开“检查”为名，把自己的质疑扩散（当年用语“放毒”）。最终为其带来了十余年的牢狱之灾。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是一个具备独立思考、有良知的人识破文革罪恶本质的过程，是一代人觉醒的缩影。

2. “神秘人物”的秘密活动

“兴衰沉浮”披露：1966 年 8 月初，北地校园内就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她自称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级学生肖力，持有陈伯达签名委派她“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的“手谕”。她经常出现在“东方红”总部，频繁与朱成昭等人接触。

“东方红”首次进地质部当天，她即以“观察员”身份表示支持：“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很快会有人来解决问题的，要

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

地院 8 月 24 日的“大辩论”，她亲临现场观察……

到了“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她不仅亲赴现场了解情况，还出谋划策，提出建议……她已经不仅限于一个“观察员”，实际成为了“东方红”背后的“参谋”和“靠山”。

直到 1966 年 9 月 15 日，朱成昭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肖力，方知她原来是毛和江的女儿李讷！当晚，朱成昭兴奋地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通天”了！（以上见《昨天》95 期 P.16-18）

从肖力在地院的秘密活动中，我们可以大体窥破文革的谋略：那些拿不到、或一时不方便拿到桌面上的东西，是如何通过暗地里的秘密活动，指使或授意造反派来实现的。

3.背着“反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连俘”三员“大将”

“揪回”彭德怀的整个过程之所以有看头，并不完全在毛的意愿是如何通过江青与中央文革授意、鼓动和指令造反派去实施——这是文革中毛、江及中央文革运动群众的惯例。“揪彭”中最有看头的，还是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都先后成了彭德怀的精神“俘虏”。

第一个“落马”的是王大来，接到“揪彭”任务后，不仅迅速找到了彭的住处，还“见到了彭德怀本人，与彭德怀作了多次交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将与彭的谈话做了多达 50 多页的记录。

紧接着，王大宾出场——他后来取代朱成昭成为“东方红”的一把手。听取王大来的汇报并阅读了王大来所提供的 50 多页的谈话记录后，王大宾又与彭德怀谈了一个下午。他同样被彭所感动……

更为神奇的是一把手朱成昭。平心而论，中央文革能把这样重要的政治任务交给“东方红”，是何等的信任！又是怎样的荣耀啊！前一刻钟还在发火臭骂二王“耽误了战机”，但耐心地听完了专程从四川赶回来的王大来等人的汇报，并阅读了他们与彭德怀的谈话记录稿后，朱成昭——这位当时最受中央文革器重的造反派领袖——居然也转向了！成为了彭德怀的第三个“俘虏”。（以上见《昨天》95 期 P.28-29）

“庐山会议”的前因是“大跃进”，后果是“大饥荒”。而这一切又构成了毛发动文革的最重要动因。朱成昭触摸到了这个脉络，他转变了。这是中央文革无论如何也始料未及的。

后来，地院“东方红”还是按照毛和中央文革交办的任务，把彭德怀押解回了北京。然而彭在地院却影响深远。在当年“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氛围下，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喧嚣声中，背着“反

毛”罪名的彭德怀居然能从精神上先后“征服”了地院“东方红”三员“大将”，却不能不说是文革中一个奇迹！

朱成昭的思想转变；“肖力”暗地里的秘密活动；彭德怀“连俘”三员“大将”……都折射出：凡是非正义的东西，总要千方百计编造谎言、掩盖真相。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靠暗地里的秘密活动，靠玩弄阴谋诡计，总是难以永久欺瞒下去的。

哲人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一个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兴衰沉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2017.11.15

（编者注：该文在2017年11月30日出版的《昨天》第100期上发表。）

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读后感

肖劲东

老蔡，你好！

今天闲来无事，打开邮箱，浏览了张运钧、李颖在《昨天》第95期刊出发表的宏文《地院文革专辑第四辑》。好文章啊！特别是最后面综述部分写的很有见解。我以为回顾历史就应当这样写，把历史阶段个人的功过丢弃在一边，特别是对亲历者，唯有如此才有意义。才具有警示后人的作用回顾的历史的终极目标，就是打碎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与思想中崇拜伟人、崇拜权利缺失理性和独立精神的民族劣根，方能真正实现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肖劲东

2017年7月30日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1月30日出版的《昨天》第100期）

四、王锐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新的两期《昨天》仔细读了，都不错。第100期丁育民先生《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尤为我看重。该文对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回忆，其最有价值处在于，作者以亲历者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了“安亭事件”中一个真实的张春桥，可以说是完全颠覆了过去文革史著述中对张春桥的认知。以前写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张春桥另搞一套，甚至玩弄阴谋诡计，作政治赌博，不仅背叛了上海市委（张本身也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之一），而且违背了中央指示。笔者也曾经研究过“安亭事件”，拙作《“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网络版，也持类似观点——若丁先生这篇文章早些面世并为笔者见到，肯定笔者会修订其中某些内容及部分观点。

从丁育民先生文章可见，张春桥奉命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基本上是按中央指示在行事，而且是立了“军令状”的（陈伯达手书“不解决安亭的事情就别回北京”那个字条就是“军令状”），而且这也不是陈个人的意思，而是毛的意思。张春桥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不让工总司几千人上北京，这是他的最高原则或底线，也是他必须完成的中央交办的任务，否则无法向中央交待，无法向毛交待。从丁文中亦可见，张春桥在处理事件过程中，不仅几经周折，且有相当难度，甚至有被激进造反工人挟持甚至挨打的风险。但张冷静处置，耐心周旋，并依靠三司同学做了许多工作，终于劝回了欲赴京告状的几千工总司人马，可以说是较圆满地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

我认为丁文的价值在于：为文革史学者和后世重新认识并定位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的角色与作用，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特别是，这是亲历记，有相当可信度。这也支持了我一个观点：文革早期的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成员，不一定都在干坏事，或者说，他们所干的不一定都是坏事，其中有些应该说是好事。

此外，作者文笔朴实，不多加渲染，但细节具体，生动细致。文中的张春桥，以及着笔不多的王洪文等，展示的是一个鲜活的可信度的形象，没作故意贬低乃至丑化。当然，文章也有不足处，丁育民先生最后那首骂“四人帮”的诗，实在没必要，有画蛇添足之感，不知是不是担心文章被认为是在为张春桥唱赞歌

而特意添加的？还有就是，这么有份量有价值的文章，早一点写出来该多好！幸亏是终于写出来了，否则沉埋了多可惜。也望作者（包括其他亲历者）多写一些类似文章。

此外，同期《昨天》陈永迪先生《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一文也很好。为研究四川“二月镇反”提供了一些未知史料，十分可贵。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2月30日《昨天》第103期。）

五、晓星谈“伏庆是回忆录”

《昨天》101期刊载的伏庆是回忆录，文笔老到，细腻生动，有的段落近似纪实文学。我虽然也经历过文革，但阅历尚浅，对于他所叙述的北京地院往事几乎不知，全然是个局外人，但读他的回忆录依然兴味盎然。这是为何？仅从写作上看，自有其优点在。

优点一：叙事方式较为出色，不是平铺直叙报流水账，而是在回眸历史风云的同时，不断插入一些有趣的小细节，以窥见时代之诡异与人性之复杂。比如，院办公室主任因自家客厅挂着一幅裸体油画而被揪出来批斗（3页）；江老师关心学生健康，提醒他别在楼道昏暗的灯下看毛著，却成了反革命言论（9页）；身为党员的三哥，不让作者回上海家中休息，而要他回校继续参加革命（25页）；在“横扫牛鬼蛇神”的狂潮中，他在上海一户人家窗前瞥见的那种惧怕、乞怜、绝望的神情（27页）；学校放电影师傅利用文革机会，狠狠报复了与他妻子有染的保卫处干部（29页）；在地质队劳动期间，那位在批斗会上喜欢站起来查看台下群众表情的美女工宣队员（62页），等等。这类看似游离于叙事主线之外的闲笔，其实也是为了烘托主线的需要。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氛围，就像当下社会千千万万人都在努力寻找赚钱机会一样，文革时代的无数人都在挖空心思地捕捉“阶级敌人”。能够反映时代氛围的细节，就是有生命力的，让读者难以忘怀的。

优点二：这本回忆录的时间下限应该是文革结束，但作者的笔触灵活，有时

还故意打破时空间隔，插叙若干人物后来的消息或趣闻。比如，作者在叙述学校大操场辩论会的情景之后，笔调一转，又补述了 2002 年同学聚会时，“二癞子”毛炎超向各位赠送王昭君瓷人一事（19 页），读来令人莞尔。最精彩的是，作者用将近三千字的篇幅，叙述了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朱成昭后来卷入经济大潮后的种种表现（38-40 页），令人回味无穷。这几页讲述的朱成昭晚年逸闻，留给读者的印象，可能比前文的“指点江山”更深刻。“俱往矣”，政治运动终成陈迹，而人性是不会变的，一代又一代仍在繁衍。

优点三：作者也是在文革中有过大起大落经历的，但相比于同类回忆录，他的情绪比较平和。他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亲历者或蒙难者的身份，而是努力在做一個观察者和思考者。即使到了文章结尾，需要说几句总结性的话了，他仍然表示自己“没有能力评论文化大革命”，却用一连串问句结束了这部回忆录。这些问句有的很浅显，但很难回答，因为那层窗户纸无法捅破。他的那个比喻“文化大革命好比是一列火车……”（67 页），相当精辟，发人深省。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包含了无数人的心酸和血泪。为了这个话题，有人写了上万字仍感到意犹未尽，而伏庆是仅用了不到一百字，说了一个类似黑色幽默的比喻，基本意思都在里面了。这或许就是写作教程上反复提到的“举重若轻”吧。

衷心祝贺《昨天》越过百期雄关！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7 年 12 月 30 日《昨天》103 期）

第六篇 本书编辑中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史料

一、中央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在地院文革的指示、谈话

1, 关锋、戚本禹、吴德在北京地质学院的讲话（1966年9月23日——24日）（刊登在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年11月第84-88页）

2, 关锋在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8日）（刊登在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年11月第109-110页）

3, 李富春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1966年10月9日凌晨）（刊登在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年11月第131页）

4, 周荣鑫对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员工的讲话（1966年10月9日上午）（刊登在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6年11月第131页）

5, 王广宇奉命对朱成昭的严厉批评（1967年1月23日）（刊登在闫长贵 王广宇著《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第390-391页）

6, 中央首长关于朱成昭问题的指示汇编（资料来源于北京轻工学院红鹰兵团主办的《红鹰》第27期1967年8月31日）

7, 闫长贵与北京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纪要（1967年2月8日）（刊登在当年北京地质学院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1967年2月第57-61页）

8, 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1967年3月5日）（刊登在《昨天》2015年6月30日第54期）

9, 蔡新平对1967年3月5日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1967年3月5日）（刊登在《昨天》2015年6月30日第54期）

10, 谢富治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负责同志电话指示（1967年7月23

日)(资料来源:周良宵、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2009)

11, 王震希望地院“东方红”给予帮助(刊登在《王大宾回忆录》119-120)

12, 闫长贵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刊登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二、地院文革期间重要文字史料

1. 《东方红报》评论员文章:《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回顾与展望》(刊登在《东方红报》1966年10月13日第3期)
2. 《东方红报》记者文章:《三次进军地质部 再次炮轰何长工》(刊登在《东方红报》1966年10月13日第3期)
3. 安静中大字报:《放下包袱,投入战斗呼吁书》(1966年6月16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4. 江祖如等五人大字报:《致全院师生员工的公开信》(1966年6月20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5. 王大来、陆炎德等24人大字报:《大家来讨论:这是为什么?》(1966年6月21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6. 王大来、宋翔雁、许高燕等46人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评六月二十一日所发生的事情(1966年6月22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7. 政治教研室全体同志(王子贤等人)的大字报:《针锋相对,坚决反击——我们也来写封公开信》(1966年6月22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8. 李明哲等22人的大字报:《我们拭目以待》(1966年6月23日)(刊登在地院工作队党委办公室编印的《大字报选》)
9.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宣言》(1966年8月17日)(刊登在1967年2月17日《东方红报》第13期)
10. 地院东方红战斗队:《东方红报》第一期社论:《历史无情地批判着旧事物,历史无情地嘲笑着守旧派》(1966年8月8日 蔡新平执笔)(根据

当年《东方红报》第一期油印版转录)

11. 孟繁华:《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原文刊登在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全文刊载)
12. 毛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根据王大宾、谭厚兰当年的记录稿整理而成,刊登在《晚秋沉思》一书中)
13. 地院“斗批改兵团”“红号兵”战斗队:《第三司令部向何处去?》(1966年9月)(根据当年散发的传单转录)

三、地院师生已发表的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目录)

(一)、聂树人著作:

- 1,《“地院东方红”兴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忆”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 2,《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2年7月出版
- 3,《“三司”与“首都红卫兵”》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 4,《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年12月出版
- 5,《“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 6,《逮捕审查与看守所纪事》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

(二)王大宾著作:

《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三)张运钧、李颖著作:

《晚秋沉思》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2年12月出版



(四)《昨天》电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A)、《昨天》第 54 期（2015 年 6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1, 伏庆是：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提纲讨论稿）
- 2, 孟繁华、蔡新平、赵国柱、伏庆是、丁育民：
有关编写北京地院文革史的通讯
- 3, 程关林：被遗忘的群体
- 4, 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节选）
- 5, 蔡新平：对一次戚本禹接见北京地院同学讲话的说明
- 6, 戚本禹接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部分同学的讲话(1967 年 3 月 5 日)

(B)、《昨天》第 63 期（2016 年 1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1, 古宝琳：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 2, 古宝琳：古宝琳日记摘抄

(C)、《昨天》第 73 期（2016 年 7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1,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发言纪要（记录整理）
 - 2, 蔡新平：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 3, 庄一龙：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 4, 何建勋：怀念几位“东方红”难友
 - 5, 北京地院革委会整“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一份大事记
- (D)、《昨天》第 95 期（2017 年 7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1, 张运钧 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 2, 北京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蔡新平收集整理）
- (E)、《昨天》第 100 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1, 伏庆是：我所知道的北京地院东方红驻外联络站
 - 2, 丁育民：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 3, 陈永迪：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 4, 张华府：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 5, 刘建业：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
 - 6, 肖劲东：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有感
- (F)、《昨天》第 101 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发表的文章
-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 (G) 《昨天》第 103 期（2017 年 12 月 30 日）
- 1, 王锐：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 2, 晓星：读“伏庆是回忆录”
- (H) 《昨天》第 106 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 张华府：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 (I) 《昨天》第 107 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 1,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 2, 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 3, 周永璋：关于文革中的有关问题
 - 4, 陈永迪：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五)、在电子杂志《记忆》上发表的文章

(A)《记忆》第 145 期 (2015 年 12 月 15 日)

- 1, 万天丰: 回忆“620 事件”
- 2, 唐振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 3,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节选)

(B)《记忆》第 214 期 (2018 年 2 月 28 日第 4 期)

宋翔雁: 我的回忆: 关于地院文革 (十五) ——沙洋干校

(六)、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 年第 8 期

陈永迪: 我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七)、发表在《同舟共进》2014 年第 7 期

闫长贵 王大宾: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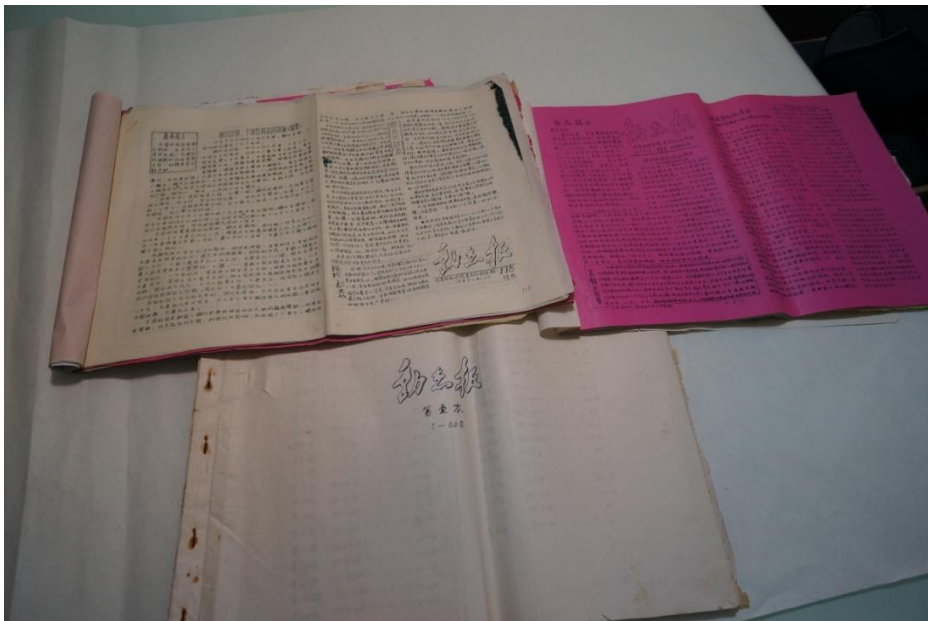
四、其他参考文献史料

1,北京地质学院当年编印的《东方红报》、《首都红卫兵报》、《大字报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首长讲话》、《动态报》、油印小报、传单等。

2, 王力、戚本禹、吴德、闫长贵、王广宇、何长工、孔丹等人已出版的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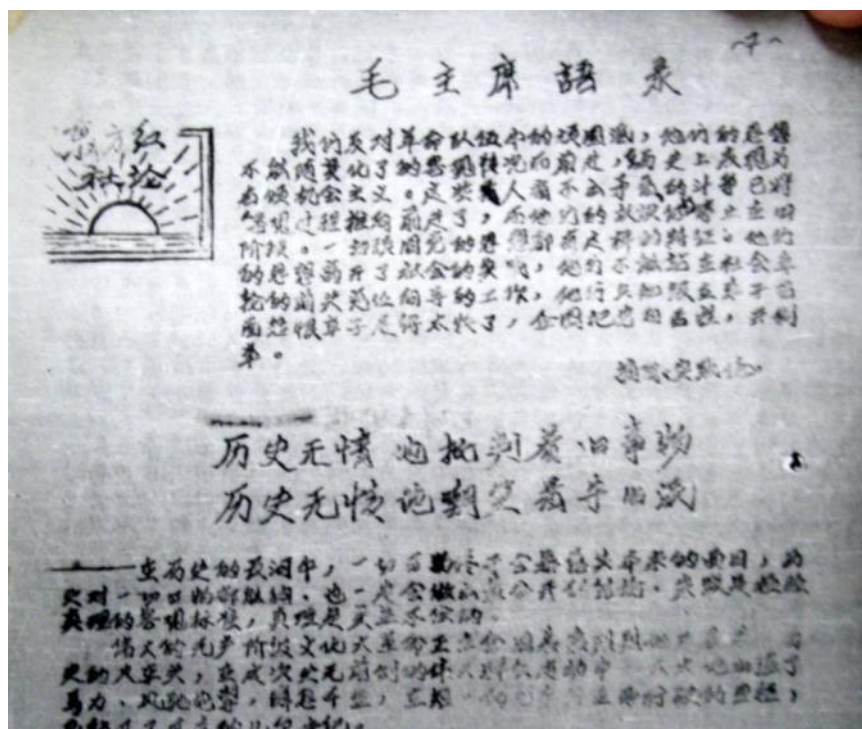
编者收藏的文革期间出版物：地院《东方红报》



编者收藏的文革期间出版物：地院《动态报》



编者收藏的文革期间出版物:地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



1966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一期(油印版)

编辑后记

在陶世龙老师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蔡新平等同学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一书终于完成了编辑任务，可以交付印刷成书，与大家见面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非常值得庆贺！

首先必须感谢：在长达七年多时间里，积极、热情参与、关心和支持此事的地院师生。特别是那些亲自动手、多次反复修改、撰写地院文革回忆录的师生，以及到处去寻找地院文革史料的地院师生，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正是由于你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充实和奠定了《昨天的记忆》一书的编辑基础；尽可能地还原、重现了当年北京地院文革的真实场景、历史真相；达到了陶世龙老师题字：“敬畏历史，说出真话，留下真相”的编辑要求；也让我们能得以对地院的文革进行比较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份丰富、真实、可靠、客观的地院文革史料。

其次必须感谢：《昨天》和《记忆》二份电子杂志的编辑老总何蜀先生和吴迪先生，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他们对绝大部分地院文革回忆录、史料文稿作了精心和严格、认真的编审工作，并给与公开发表。使我们编辑本书时，节约了大量的编辑工作量和时间。谢谢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还必须感谢的是清华大学的孙怒涛先生。是他率先撰写了剖析自己、震撼人心的文革反思大作，然后精心组织、策划清华大学文革中各个不同政治派别的同学，弥合派性伤痕，号召大家认真撰写了清华大学文革反思回忆录，并先后出版了《历史拒绝遗忘》、《良知的拷问》、《真话与忏悔》等三部几百万字的巨幅清华文革反思、讨论集，从而填补了高校文革研究的空白，极大地鼓舞、支持、推动和拓展了我们地院《昨天的记忆》一书的编写工作，成为了我们地院的学习榜样。

还必须感谢伏庆是同学，为我们编写《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作了很多前期工作，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同时还必须感谢蔡新平的夫人牛彩茹和儿子蔡旭东等人。他们为部分地院文革史料进行了文字转录、打字、整理等繁琐的工作，作出了无私的奉献。

最后还必须强调感谢的是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童隆裴等同学，他们若干年来毫不动摇地、无私奉献，组织策划、动员各个政治派别的老师同学写回忆

录。特别是蔡新平同学亲自细心与认真地修改每一份稿件、仔细核对事实，还主动联系《昨天》和《记忆》电子杂志刊登文章，多年来积累了地院丰富的文革史料。他是本书文稿的积极策划者。

我们这代人，从小学开始，就被灌输了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战略欺骗的思想教育；对共产党忠诚、感恩的党化教育；一切为政治服务、为权力服务的奉献教育；极端（极左）政治思维的意识形态等愚民洗脑教育。再加上当权者的政治高压管理谋略手段（被关进牢笼或严惩法办...），和与外部封闭的大环境，迫使我们没有了思想的自由性和选择性。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于是，这就造就了我们这代人自身先天的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在文革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文革的急先锋；疯狂的个人迷信的信奉者；盲目狂热的崇拜者；私心膨胀的派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权力斗争的打手、牺牲品、替罪羊；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个别人对他人进行了政治迫害.....。

文革中，最初工作队用极端的手段压制不同意见者，然后受工作队压制的造反派，在掌权后，在坐镇革委会后，用前者同样的方式压制不同意见，同样的整人。军宣队接管权力后也是一样。无论谁在台上，采取的手段完全相同。不能不认识到，帝制的残余，在我们身上的深深的烙印。

时至今日，我们在反思文革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受骗上当了，被政治和权力斗争利用了。**尽管当时也有人**对文革提出了异议**，尽管也有人甚至至今仍坚持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可是无论那种人都未能逃脱政治清算和惩罚。

反思文革历史，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思想自由；一定要对政治口号、行为，进行充分地、历史地、辩证地比较分析研究；一定要在充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地作出选择；切不可盲目崇拜、狂热服从。**

最后，特别要提示一下：本书地院师生回忆录中，对地院文革中同一事件的时间、地点、场景、内容等细节的回忆上，会因个人记忆不同、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之处（例如李讷首次来地院一事）。目前只能保留个人的叙述。因此，请读者与研究者慎用。

2018年12月8日

附件

一、蔡新平关于请张运钧李颖着手整理编撰《地院文革史料汇编》

致信各位校友

各位校友：

在地院老校友们的支持下，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目前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数量与地院文革有关的各种资料。初步归纳如下：

1、这些资料首推各位校友的回忆录和个人日记笔记的整理，在实际史料相当匮乏的情况下，为研究地院文革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和思考；

2、以这些回忆录为主体，在《昨天》主编何蜀先生、《记忆》主编吴迪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昨天》已经发表了六个地院文革专辑，计有 42 万字，在《记忆》已发表了三个老师的回忆录，原稿件计有 44 万字，实际发表 30 多万字，也就是说已经有了近 80 多万完成了编辑的可靠文字。预计还可以发表 40 万字左右的稿件。

3、朱德瑜等校友从地大（武汉）档案室搜集来的的资料照片，使我们多少有了一些实物性的资料，其中特别宝贵是有相当数量历史场景照片、有地院批清和抓 516 期间的文字资料、有缺失了的东方红报一二期的原始刻印版（涉及从东方红战斗队成立到东方红公社成立阶段）和其他一些重要档案文字；

4、濮长宣老师从安静中老师的遗物中发现了文革期间的大量手稿笔记，发现了院革委会编撰的“高安反革命集团大事记”；

5、张运钧李颖二位保留了地院东方红绝大部分《东方红报》，《动态报》和其他一些原始资料；

6、已尽可能收集到了当年中央和地方部门领导人涉及地院文革的有关讲话和言论。

以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虽不算很丰富，但对了解和研究地院文革史已可是提供重要史料了。简单举一个例子，如果以中央领导人对地院文革的各种讲话为线索，对每一个讲话的历史背景，起因，作用，后果等予以分析讨论，都可以写出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串联起来就是地院文革史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旁枝。

另外我们几位重要的校友，已经正式出版了他们的文革回忆录，正式出版物虽然数量不多，但因他们的地位而举足轻重，提供了前鉴，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积累的这些资料，如果就这样散漫的搁置家中，或仅保留在个人的计算机中，不能被大家共享，不能为研究者所用，就是死的东西，和废物没有两样。我们都是古稀之年了，那天撒手人寰，记忆、思想、包括手头的一些本有价值东西，都将湮灭飘散。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些东西变成有序的文字档案，变成可以传播的电子文件，也要努力变成便于阅读使用纸质文档。道理都很明白，可怎么做？谁来做？这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必追究过去有什么问题。我想这个时候，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有人出来撑头做这件事，那就是我们的英雄。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虽也在努力，但自知能力不足担当。谁来挑大梁，我绝对支持和拥护，并尽我能力予以协助。各位不要去计较什么水平高低，没做出来，再高也是空话。水平本来就是比较而言的，如果只有一人做出来了，没有可比性，他就是最高的水平。这是个苦力的活，无名无利。干出来就是水平。

经过和一些校友们磋商，包括与陶老师讨论，我推荐张运钧李颖夫妇来做这件事。这使得他们很为难，不说大家也能体会到这里的难处。二位心虽坎坷，顾虑难消，但终归难却盛情，加之内在责任心的驱使，还愿意出山拼一把的不服老劲头，使他们终于接受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我没有什么总体构想，也没有具体的提纲，谁来做这件事，就按他本人的思路和习惯的工作方法来做。如果有什么想法那就是：基于实际，相互信任，开放包容，一步一坑。

我已把我手头全部电脑的资料，累计 28G，除刚收到的一份不成熟的东西外，都提供给了运钧。我手头保留备份，我将继续按我的思路做些工作，我计划在《昨天》再推出 4 期专辑，这样就有了约 60-70 万字的已编辑文字。这些资料我已在准备之中。

张运钧李颖动手很快，已拿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征求大家意见。我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意见。请各位一起琢磨，给他们一些鼓励和建议。需要指出的这个编辑过程是完全开放的，如果有新的内容会随时加入。他们二位工作有什么难题，有什么新的想法，工作的阶段性进展，会适时向校友们通报。各位校友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随时向他们提出。

蔡新平

2017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三

二、“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代序）

蔡新平

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经过地院文革师生们几年的辛苦努力，地院文革史叙事的第一个电子版现在终于可以与大家见面了，这距离文革发起时间过去了 52 年，距文革结束 42 年，距我离开北京地质学院整整 50 周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今天网上流传一个葛剑雄教授的反思文革的讲话，说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绝对没有什么“几几开”之说，这似乎与今天官方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网上评语，说他句句犀利，大加赞扬。但奇怪的是，句句犀利，却可以广为流传。

细听后，我明白了，葛先生告诉大家，彻底否定文革是党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今天并没有被否决。文革虽然一无是处，要反思，但你不要去反思毛泽东、刘少奇，你要反思自己，也不要老反思别人。反思别人之前你首先要反思自己。他告诫，不要拿今天的弊端、不公平，去与想象中的文革时期怎么好、怎么公平作比较。“文革好”那是想象的。他的话应当是大体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政府还就是不喜欢一帮文粉毛粉们用想象的文革的好来攻击今天的弊端。这大概是葛剑雄讲话不被封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文粉毛粉没那么傻，以为他们真喜欢文革？他们只不过要为抨击今天的弊端找一个参照物，拣一根打人的武器，哪怕那些“好”都是想象的，也需有一个红色的附体，总不能拿大跃进饿死千万人的时代作比较吧？也不能拿国民党时期作比较吧？

这真是个奇妙的论调，文革要反思，却不要反思文革的发动者和政策方针的制定者、执行者，而是要受害者先反思，当然很多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反思也是必须的。但总不能本末倒置吧？

不过我们还真是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但这不是为适应“新时代”做个新的“好学生”，这是一个深层的自觉思想清理过程，是内省、理智、责任感的需要。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故事给后代留下，越是有人要抹杀，我们越是要抓紧。浩劫后的惨痛的教训、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感悟和认知，都必须告知后人，勿蹈覆辙！

追忆是反思的基础，地院文革史是中国浩大文革史中的一个环节，在特殊的机遇下，它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地院这个平民子弟聚集的普通高校，一度走在了北京高校造反行动的前沿，被中央文革树为造反派的一面旗帜，得到从毛泽东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青睐，视之为嫡系、造反的主力军。但党内的斗争，终于在

一个“公主”、一个“郡主”的影响下传导过来。这个队伍的首领不愿意去征方腊，反而又一次造反，造了曾经号召、支持他们造反的人的反。中央文革说，“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于是指定了新的继承人。这次吸取了教训，地院东方红的头一定得是个听话的角色。但看人走眼也是难免的，选国家接班人这么大的事还屡屡看走眼呢。最终，“五大领袖”一个不留，贵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也还是统统被赶出了京城。几个十年过去了，从大狱出来后，这些毛泽东当年的宠孩，文革的娇子，他们也开始反思文革，但结论却是“我们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以此引为终生遗憾。是不是应当遗憾？这反思是否正确？首先就要缕清历史，看清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陶世龙老师在给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确立了的方针就是“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历来著史不易，特别是写一个自己虽经亲历却已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但对个体而言，却是有生之年不多矣。最大的难点是，原始档案至今仍锁在重重铁门之后，而我们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其次，我们都是垂暮之年，思维、精力和体力都不赶趟了。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障碍就是，校友之间的分歧竟然如此之大，特别是微信流行之后，老同学、老校友刚刚在各种“群”里相聚，没过多久竟又纷纷撕裂重组。这点我已深有体会，因此我对何蜀说了下面一段话：“经过一番波折，原有在一起研讨地院大事记和编辑地院文革史的计划已难以执行下去了。除了想法没法统一外，主要是都各有各的难处，无法凑到一起。最后决定人自为战，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愿意互相交流的可以邮件传阅，不愿意的不勉强。”我在向校友们推荐由张运钧、李颖夫妇来编著文革史的时候说过，我本人已掌握的资料对于校友都是透明的，大量文章已经公开发表，谁来做我都支持，将来可以有张版、可以有孟版、可以有朱版，还可以有其他各种版本，无需同意，完全开放，读者自有分辨，也必定各有各的价值。在“张版”出来后，发现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作为一部基本定型的大著，改动实属不易，我也尝试自己动手改，结果费力不讨好。于是决定自己重新开始，反正资料一篇篇都是现成的，而且我经过这段时间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何不按自己的思路来编著呢？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和便于流传应用，我决定制作电子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版。待条件具备，也可以转为印刷版。

（以下“地院文革史编著历程的回顾”略）

今天我如释重负，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参与本书工作，提供并承诺发表你们稿件的老校友们对我的信任；再次真诚地感谢何蜀、吴迪二位主编率领的《昨天》、

《记忆》两个编辑部全体义务工作者，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与无私的奉献！写下这段话作为我的阶段总结。我想我今年该回武汉过中秋，几十年了很少中秋全家团圆。

祝老校友们中秋快乐！

2018年9月20日

三、《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导读

蔡新平

本书印刷版由张运钧、李颖编辑，初稿完成后发到校友群讨论，有校友告知很不便于阅读，而纸版又暂时不可得。我一直有意编辑电子版，便于读者在网上和移动媒介上阅读和检索，于是决定再编制一个电子版。电子版有极大优势，可以灵活编排，增补扩充、调整修改。可以不受容量限制，图片、影印件都可以直接纳入，各种参考资料可以同时配附，也可以附上链接到有关网络文库、网文。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了解这段历史，让研究者便于参阅利用。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资料，会被相应的研究机构、文库收集保存，长久留存。国内的现实状况，使出版文革类书籍成了禁区，寄期望解禁？那是望不到尽头的奢望。虽然可以另辟蹊径，但也如走悬索。决心既定，我就开始尝试。现在初版杀青，肯定非常粗糙，但好在编修并不困难，今后可以遵循读者好的意见、建议，及时修改补充完善。我自己试了试，感觉阅读已较方便。读者可以随意阅读，没看完，文内章节目录均有超链接，下次可以很容易回到停留地方继续阅读。

一、电子版与同名印刷版的比较

(1) 张、李编定原纸版书名是《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史料汇编》，考虑到还有大量原始资料尚不能编入本书，而本书主要的依据是已发表在《昨天》、《记忆》的地院专辑或北京高校专辑中的文章资料，我建议改名《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张、李赞同，遂改名。电子版沿用相同名字。

(2) 内容上，书中已有的，本电子版都有，但电子版强调了保留原著的完整性，所有因为适应杂志特点而节选或拆散的原著作均恢复原来的结构，省略的

内容也重新恢复，但杂志在编辑过程中修改的文字内容则全部保留。电子版增加了相当数量尚未在《昨天》、《记忆》杂志上刊登的文稿和资料。对因为适应出书而删去的原文中的大量图片，重新补充。在新编写的内容中如需要插入图片资料的则直接插入。如第二篇的“王秀允：回忆周永璋”、第四篇包含的“事件人物简介”等，都包含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3) 结构上有调整和增加。与纸版书相比，文革大事记作为第一篇保留不动；第二篇回忆录部分略去了沿用《昨天》中的专题性的小标题形成的分节，都重新分别归并在电子版的回忆录学生篇（第二篇）和回忆录教师篇（第三篇）中，把涉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回忆文章分离后集中在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的“要事杂忆”中，电子版的第四篇大体相当于原书的第四篇，但结构内容都有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在内容和结构上有所调整扩充，原书将《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单独立为第四篇，调整后将其归并到了电子版的第五篇中，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的文章直接列篇，并有较多的补充。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则是本电子版新增加的，均为电子邮件和微信通讯的摘录，按时间排序。二者虽然都是七篇，但形式和内容已有很大改变。

(4) 原书的每篇的开篇有编者的按语，对某些内容有编后感评。本电子版一般都保留并注明是原书的编者按或评语，因结构调整，有些已不能与本版对应，只保留了可用的部分。请读者注意，按语中某些涉及原文结构的文字，可能会有不对应的地方。电子版自身在重要章节开篇一般都作一个简介。

(5) 本电子版对每篇文章（word 文档）的文字量逐篇进行了统计，累计 240 万字。较纸版书文字增加了一倍的容量。增加图件类没统计。张运钧、李颖保留有《东方红报》和《动态报》扫描电子文档，本电子版没有编入，如有需要者来函商量。朱德瑜、田春林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翻拍收集的资料，内容丰富，但照片清晰度和可读性较差，本电子版暂未列入。如需要可向孟繁华、朱德瑜索取。在本版的第五篇中列有史料目录。

(6) 电子版相当于活页笔记，随着今后工作的进展，可以及时修改补充调整，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库。有两个版本，一个 word 版，一个 PDF 版，准备再制作一个 chm 版。word 版灵活方便，按文档目录依次拉开点击阅读，如同卡片盒一样方便。Chm 版便于检索查寻，但对于庞大的文库制作工作量很大。PDF 版可以保留原著风格结构内容不变，但使用下载阅读并不方便。读者可以按需要随意使用。版权完全开放。使用时请注明出处、注明原著作者和原文章名称。如有改动应一一注明。

使用前请先做备份，保留原版，便于出差错后的恢复。

二、内容简介

(1) 第一篇《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是张运钧、李颖编撰，初稿发表在《昨天》95期（地院专辑4）。在《昨天》54期（地院专辑1）中，还发表了伏庆是的地院大事记编写提纲，在本电子版中第七篇的文革史通讯中，2010年的几篇文件中还有孟繁华的大事记编写纪要，提纲。读者可以参考。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大事记是我们开初的设想，但实现难度太大。目前张运钧完成的大事记已经有一个较好的框架了，使读者在阅读时能有一个事件、时间轴线作为依托，虽还不够细致精确，但至少可以使阅读回忆录时不至于出现混乱，还可以从中发现是否有时间错位。电子版在大事记内容上有少量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工作队撤离前后和东方红建立过程的细节补充。

(2) 第二篇、第三篇是地院部分师生的文革回忆录（分为学生篇和教师篇）

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在《昨天》和《记忆》电子杂志上刊载。学生篇计有：蔡新平、周永璋、王秀允、田春林、伏庆是、古宝琳、蒋良朴、程关林、张华府、何建勋、梅建明、李颖、殷惟侯、胡昌明、石白河；老师篇计有：宋翔雁、陶世龙、钱佩娟、万天丰、唐振权。第四篇“要事杂忆”中还有陈永迪、庄一龙、丁育民、林天明、甘振波等同学的回忆录，也收集了阎长贵、敖本立、何蜀的有关回忆或文章。电子版发布的都是作者的全文，部分作者仅完成了写作提纲，有个别的，如石白河的，是从网上收集的，不全。

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殷惟侯、庄一龙，都是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最早的发起人和创建核心成员，记述了东方红初创到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历史。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都曾经是朱成昭的左膀右臂，他们的经历可以让你看到地院东方红的首领朱成昭是如何成长和转变的；

蒋良朴是东方红公社的二把手，他和张华府、何建勋都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都经历了多个大狱的磨难，他们的回忆领你走进中国铁窗，看到黑幕后是如何残酷地践踏人性。监狱也是一个大学堂，你也可以看到监狱是如何拯救或毁灭一个人的灵魂的。在监狱这个大学里如果有幸遇到高人，而你又善于适应和学习，出狱就如同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梅建明是地院少有的正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也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他深深地卷入了“叶朱反革命集团”事件，其父亲梅龚彬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先驱，和国共两党巨头们都有很深的关系。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显赫的地位，以双层身份为掩护，文革中有形无形地支持了儿子的“造反”和“再造反”，

对朱成昭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他因民委档案事件使其隐蔽身份暴露，最终也遭到了“四人帮”迫害，他的死，水很深很深。梅建明进了“789 集中营”，他的回忆有一个特殊的视角：

何建勋是朱成昭“死党”中享受了被判死刑的待遇的唯一一人，因林彪突然爆炸完蛋而保住了性命。他的记忆惊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从监狱大学毕业了，成了诗人和诗词韵律学的专家。他的回忆涉及未遂的“兵谏”，是朱成昭们被捕审讯的核心内容，但大多数当事人至今都否认或回避这个问题，认为何建勋是在胡说：

古宝琳是王大宾的前妻，一个历尽坎坷的才女，你可以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坚贞，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她的另一面的他：

周永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创建人。1966 年 10 月 18 日，毛泽东第五次检阅红卫兵，周永璋负责指挥三司参与维持秩序，杨成武叫周永璋上了中央首长检阅的指挥车，叶剑英元帅还开玩笑说：“你就是三司司令啊！”从此大家也玩笑地称其为周司令。周永璋多年前就因中风偏瘫失语，他的很多故事都埋在了肚子里。比如，1966 年国庆，他代表三司进了中南海，登上了天安门，这事他从来也没说过，包括我们“二团”的人在他生前都不知道。“地派二把手”的回忆录中生动细致地讲述了他自己这次活动的经历，但他是三司负责人周永璋给他的请柬，可他只字不提和他同时上天安门的三司周永璋。王大宾那天也上了天安门了，从他的回忆录看，也好像不认识周永璋了。感谢周永璋的夫人王秀允的回忆录，大量宝贵的照片，不语自明：

程关林是东方红早期的对立面“老保”红卫兵的头头，没有他的回忆录，地院早期文革史就塌了半边天。文革前，程关林是地院文学社成员，你读他的回忆录那是行云流水，有情有感，有述有议，让你看到了当年从工交口、地质部到工作队这条“黑线”是如何操纵和控制地院保守派红卫兵的。而这些是造反派们多年后也毫不知情的。保守派在遭遇失败后的苦闷和纠结，犹豫和彷徨，背叛和出卖，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个中的内心煎熬。

老师中的回忆录我特别要介绍的是宋翔雁老师的长篇回忆录，80 岁的老人，回国时被我们一番忽悠，仅用半年时间就写出来了 24 万字的鸿篇。宋老师的回忆录生动具体，严谨真实。宋老师在反工作队时期发表过地院轰动一时的大字报。造反时是红教联的骨干，地院革委会时期是革委会简报（向中央文革和有关高层定期报告）的负责人。忠诚耿直，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学生在校闹得再厉害也就是两三年即作鸟兽散，后期地院文革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军宣队进驻后的历史占十年文革史的一多半，后来地院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清查 516、批清、五七干校、迁校……造反派重新“回炉”煎烤，在恐怖的高压下逼供，检举揭发乱咬，

人性人格又一次在炼狱中经受考验。这些不看宋老师的回忆录我们就几无所知。

地院文革史早期有一个“6·20”事件，就是著名的反工作队大游行，把“6·20”作为一个专题写入回忆录，目前只有万天丰老师的一篇。因“6·20”，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学生中，周永璋、蔡新平、庄一龙、郭凯等因为带头组织了游行，被工作队打成了极右的反动学生；老师中，因反工作队而引发了“6·20”事件的李贵、王暄堂、安静中、郑伯让等也打成了极右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人最后又成了工作队的掘墓人。万天丰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回忆，让你回到了1966年的6月20号这一天，像观剧一样，看到了各种角色在地院这个大舞台上一天天的精彩演出。

总之篇篇精彩，是研究文革的最有价值的素材。大部分回忆录已在《昨天》和《记忆》发表，部分是本版首发。

（3）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

孟繁华早期设想了许多专题，但很多专题苦于没有相应的资料而难以编辑。我们现在所列专题，均基于现有史料或回忆录中有较多内容可资利用者。开篇对专题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一简介。校外对地院文革的印象，大概主要都和“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相联系。网上有很多离奇的王大宾故事，地院东方红的功罪都归于王大宾一身，本文将历史回归本来面目。谈地院东方红史，一定离不开朱成昭，离不开朱派、蔡派和“高安郑”，离不开6·20反工作队大游行，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离不开二进地质部的轰动效应，离不开毛泽东女儿肖力在地院的活动，离不开叶向真对朱成昭的影响和朱成昭如何由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宠儿到走向反面的心路历程，离不开地院革委会和“地派二把手”是如何疯狂镇压反对派的。当然许多人也想知道如此彪悍的地院东方红，两派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也想知道蒯大富当年是如何藏身地院，地院如何帮蒯大富和众多学校造反派拉大旗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在第四篇中尽情浏览。

本篇计有：事件人物简介、“要事杂忆”、“高安郑与二团专题”、“9·4”、“9·6”及周永璋两次被抓捕专题、关于肖力的记忆、朱成昭及其异端思想、王大宾庭审资料、杨雨中之死、沈孝宇的遭遇、当事人再忆揪彭德怀、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等。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和《记忆》刊载。

需要说明这并不是地院文革大事件的全貌，也还有一些很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没有专列篇幅介绍，他们多包含在不同的回忆录中，由于缺少专门的研究文章和史料，也由于编著者的精力能力所限没能一一列举，这有待后续工作弥补。

（4）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

计有蔡新平、张运钧收集整理“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和严重迫害事件统计”、“工作队期间大字报辑录”、“地院东方红和革委会期间重要史料辑录”、“文革期间中央及其他要人有关地院文革言论选录”等等。也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分布在第四篇之中，此篇不重复。地院校友已经出版的文革专著不多，仅有王大宾、聂树人的回忆录，张运钧李颖的反思著作《晚秋沉思》等，其他就是近年发表在《昨天》、《记忆》电子期刊上的文章，均列在《已出版和印刷的文献目录索引》中。本篇特别将朱德瑜、田春林 2012 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档案室翻拍的档案照片目录列入。本人因精力眼力均不济，仅仅粗有浏览，根据浏览稍加分类命名，完全不够编档水平。每个目录下都是照片，有几十上百张的，也有只几张的。照片有的尚清晰，有的很难看清。其中不同目录下相互重复的也不少。只能留待有心人研究了。需要者可和孟繁华、朱德瑜、田春林联系。

（5）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

收集了最近几年我院开展文革史编著和研究工作的前后，校内外师生和研究者们对地院文革反思、评述、研讨的文章。这仅仅是开始，我们期待本记事出版后，会有更多更深刻的反思和研讨文章出世。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6）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

是地院文革史编著的缘起和推进过程重要通信讨论的历史记录，这里包含着地院师生的许多重要的思考，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反思。这些内容经过整理后应当可以放到第六篇的《文革反思研讨文集》中。本篇中最重要的是包含了在地院文革史编著推进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通信中有些内容原属个人之间的意见思想交流，在当时或许具有隐私性质，但编著工作走到今天，曾经有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或已经化解，所以本人觉得也无需隐讳。这主要是让校友们了解编著地院文革史之不易，了解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资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借鉴。本篇校友对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本电子版编辑中一定会有错误与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好在是电子版，对于好的建议，阅读中发现的差错，新发现的有价值的资料、文章、照片，都可以及时增补和修改。

2018年8月31日